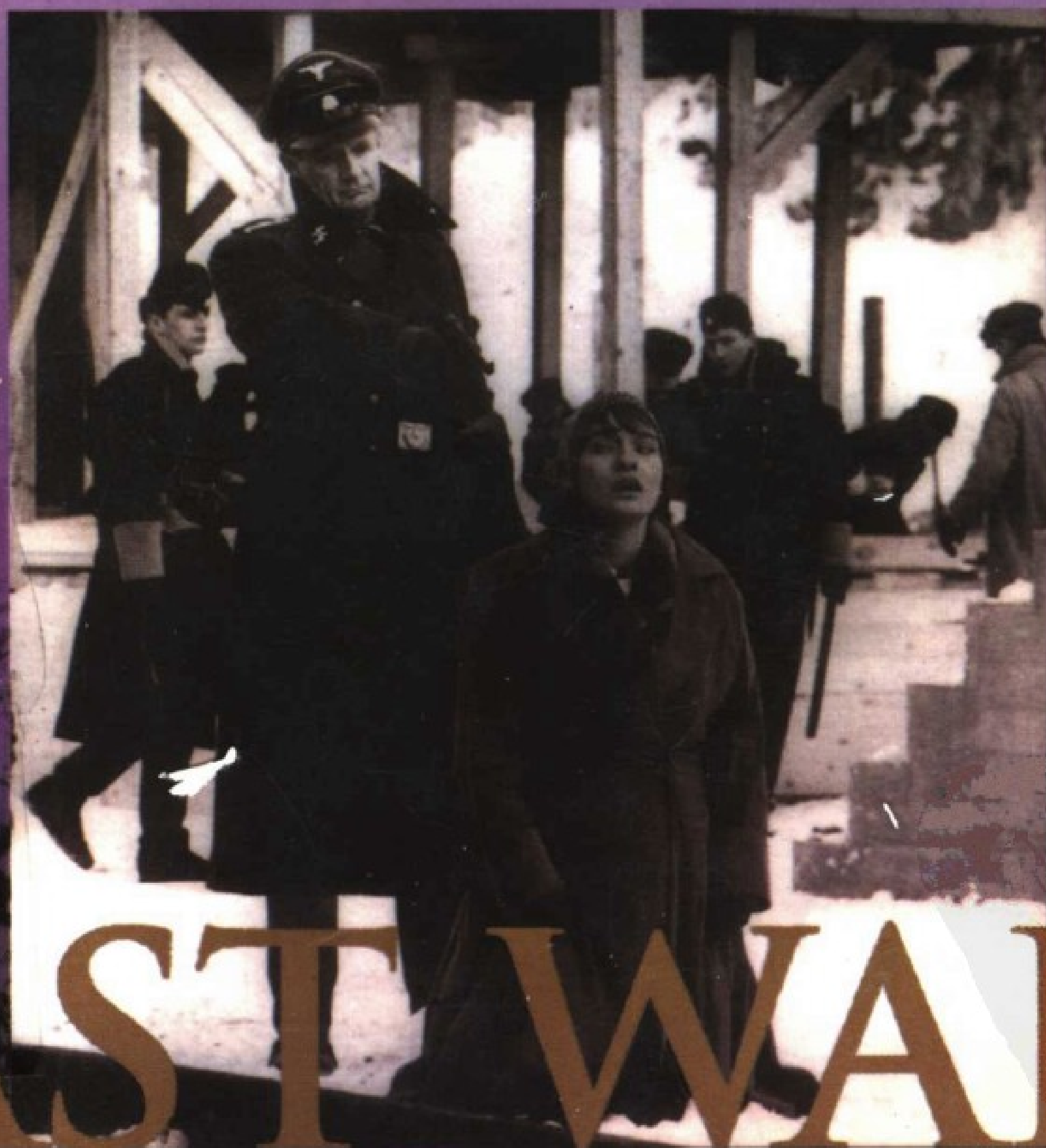


澳 大 利 亚 文 学 作 品 选

纳瑞斯金公园 最后的散步

[澳] 罗斯·兹维 著 李 尧 译

中国·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HINA

LAST WALK IN NARYSHKIN PARK

这是一段苦难的历史！

这是一段不可忘记的历史！

立陶宛扎戈的纳瑞斯金公园曾经是恋人们散步的地方。1941年10月20日，纳粹在这里进行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至今至少有 3000 名犹太人的尸骨埋葬在这里，其中包括本书作者罗斯·兹维的家人。

罗斯·兹维说：“历史不能忘记，……。但仅仅知道并牢记在心，还阻止不了柬埔寨、波希米亚、卢旺达的大屠杀发生。更重要的是弄清灾难发生的原因，并且为彻底铲除这个原因而进行不停的斗争”。

ISBN 7-5366-4079-X



9 787536 640795 >

LAST WALK IN NARYSHKIN PARK

ISBN 7-5366-4079-X/1·808

定价：17.50 元

澳 大 利 亚 文 学 作 品 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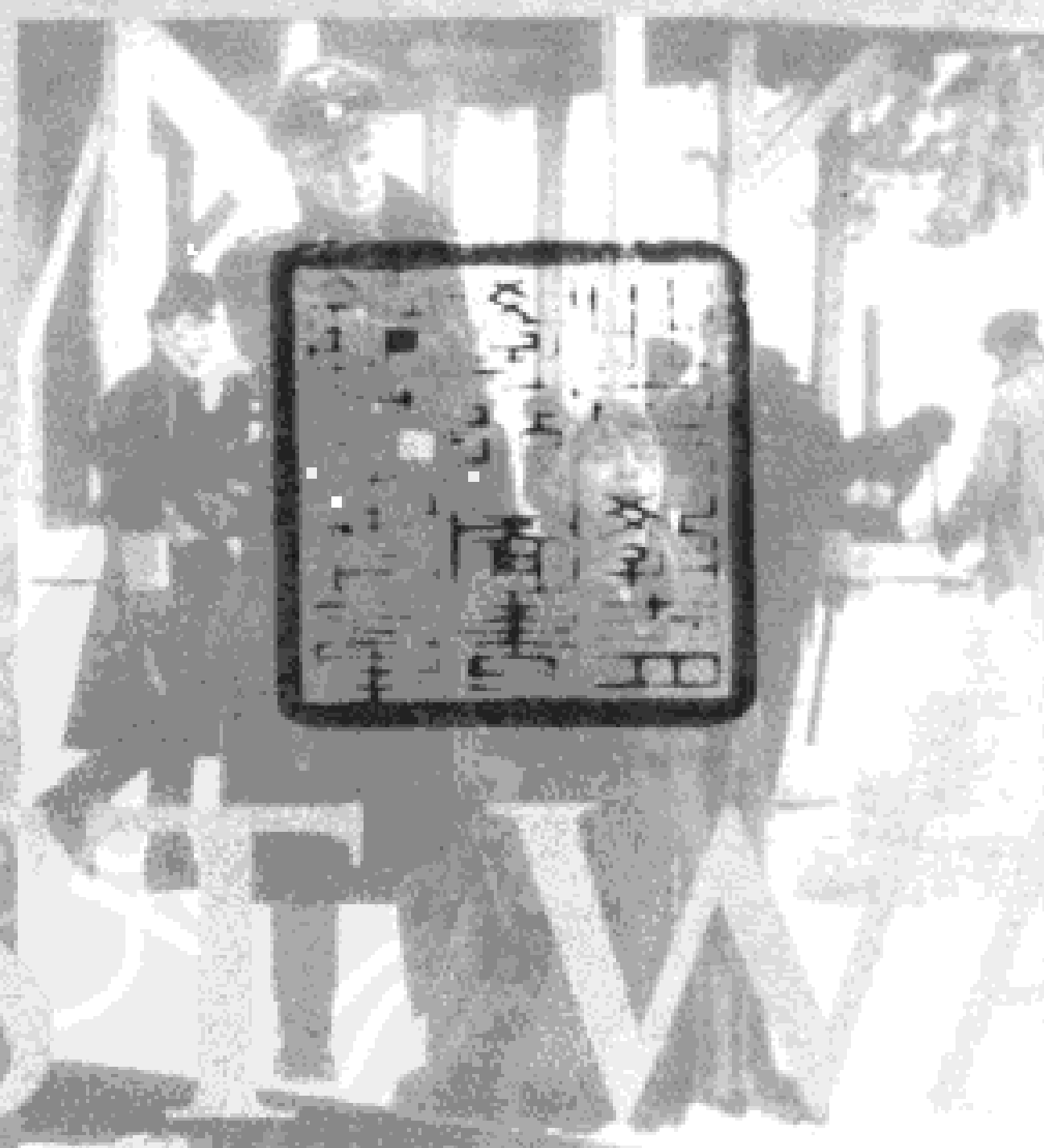


本书由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资助出版
本书根据澳大利亚 Spinifex press 1997 出版的
LAST WALK IN NARYSHKIN PARK
译 出

纳瑞斯金公园 最后的散步

[澳] 罗斯·兹维 著 李 尧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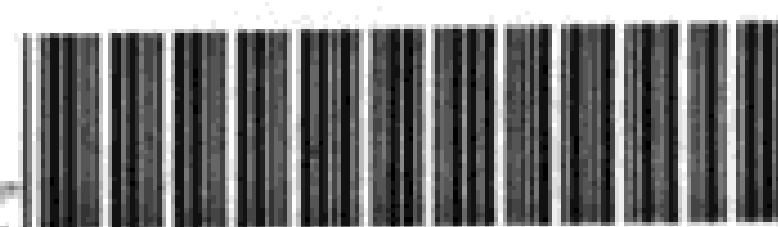
主编 胡文仲 副主编 李书敏



LAST WALK
IN NARYSHKIN PARK

413644

中国·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HINA



0000113922

给我的儿女和孙儿孙女们。

纪念 220000 立陶宛犹太人。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家人和朋友在 1941 年被纳粹及其帮凶屠杀。

从公元4世纪起，一直推行反对犹太人的三大政策：改变宗教信仰，驱逐和消灭……基督教传教士们散布：作为犹太人，你们没有权利在我们当中生活。信仰基督教的世俗的统治者也宣称：你们没有权利在我们当中生活。最后纳粹下令：你们没有生存的权利。

罗尔·希尔伯戈：《欧洲犹太人的毁灭》

“你杀死了我的家人。”

“是的，我杀了你的双亲……我奉命而行……长官说……我不杀他们，他就杀我。”

“我的父亲是你的教父。你是他的邻居……你还是我的朋友。你像我的哥哥……”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干这种事情。可我是基督教徒……”

天真的卡贝拉，一个图西人^① 指控约翰·特瓦吉拉玛古，一位胡图人^②，在卢旺达的一

① 图西人：卢旺达与布隆迪境内的少数民族。

② 胡图人：中非的一个少数民族。

个村庄杀害他的家人。

《卫报周刊》，1995 年 5 月 7 日

中 文 本 前 言

即使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人,也喜欢引用“祸福相依,喜忧参半”这句老话。是的,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亦喜亦忧、纷繁复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把人类送上月球的科学技术,潜藏着毁灭人类的威力;天才创造了美妙的音乐、美术、文学,也可以使人类遭受可怕的苦难。这是一个充满伟大的希望同时又充满更大的失望的世纪。和同代人一样,我怀着惊奇和恐惧注视着这个世界。作为作家,我觉得有必要以我能够利用的唯一的方式——文字,为这段历史作证。

我出生在墨西哥一个美丽的小镇奥萨卡。父母亲的祖先世代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之一的立陶宛。他们有过好日子,也有过艰难的岁月,可是即使最倒霉的时候,也没有想到,20世纪他们将遭受史无前例的灾难。1941年德国侵略立陶宛——那时它是苏联的一部分——之后短短两年,纳粹

在立陶宛走狗的帮助下，屠杀了 95% 的犹太人。我父亲一家就在死难者之列。如果我的父母不是 1927 年离开老家到墨西哥，他们早已和那 3000 到 7000 犹太男人、女人、儿童一起，躺在纳瑞斯金公园的万人坑里了。

在墨西哥住了几年之后，他们来到南非，和我母亲家的其他亲戚生活在一起。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作为犹太移民的孩子，我说依地语——东欧犹太人的语言。等到上学念书的时候，我几乎连一句英语也不会。父母亲给我唱的歌，讲的故事，都是浓缩了的犹太人的历史，而不是通常孩子们喜欢听的故事和童话。我被摇晃着，在凄凉忧伤的依地语歌声中进入梦乡。那些歌叙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燃烧的村庄，遥遥无期的流放。孤儿们光着脚在雪地里走路，幸运一点的孩子们在拉比^① 家的壁炉旁边，用单调的声音念字母表。情侣被迫离开心上人；父亲背井离乡到美洲寻找好一点的生活。还有一些关于劳动者的诗歌。说的是，工人给权贵们建造豪华的住宅，自己却住在茅屋草舍；裁缝给有钱人缝衣做衫，自己却衣不蔽体；农民终日在田地里辛勤耕作，仍然食不裹腹。

也有一些欢乐、幽默的歌，伴随犹太人度过苦难的岁月。1941 年到 1942 年，立陶宛犹太人的生活被彻底毁灭了。世纪之初，我父母的故乡扎戈，是一个颇为繁华的商业小城，共有 5500 犹太人，占小城人口总数的 40%。可是 1992 年，我去扎

^① 拉比：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

戈访问时,大约 3000 名立陶宛人里只有一个犹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移居国外的人都打听不到留在欧洲的家人的消息。每一个人,包括我的父亲,都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然而,1945 年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从电影上看到的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情景远比预想的更可怕。父亲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他无法原谅自己——所有的亲人都死在法西斯的屠刀之下,自己却幸存于世。我成了他这种内疚的继承者。

我在大屠杀的阴影和南非种族隔离主义政策的统治下长大,因此对人权问题有一种天然的关心。在南非,如果你是白人,就会受到优待。在既享受这种优惠,又反对种族隔离政府这二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笔下的那些移民,努力奋斗,融入一个新国家,学习一种新语言,很少有人站出来反对这种政治制度的罪恶。因为,他们终于脱离了社会最底层。他们的孩子是这个不平等的、种族主义社会真正的“既得利益者”。然而,也正是这些孩子,不得不面对一个道德问题。他们之中,有的人还在南非。我和另外一些人移居到新建立的以色列国。我们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起初,我们都充满希望、热情和快乐,可是好景不长,没有多久,幻想破灭,我和丈夫离开以色列,又回到南非。在那里,我们又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三个孩子年纪大了一点之后,我又到大学读书,学习历史、社会人类学和英国文学。毕业以后,开始写作,与此同时,还在妇女民权运动顾问办公室工作。我们那个组织叫“黑

带”。每逢政府通过一项强制性的法案,或者不经起诉就逮捕人,我们就系上黑带子,默默地站在大街上以示抗议,手里还举着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审判或释放!”有几年,我在 RAVAN 出版社工作。这家出版社不大,出社会、政治、历史方面的书籍。还出版一本刊物《骑手》。主要发表黑人作家的作品。他们除了写文章,没有别的宣泄心中愤怒的办法。《骑手》出了几期之后,就被政府查禁。出版社负责人写信给书报审查官要求复刊。他写道:“一首诗不是一枝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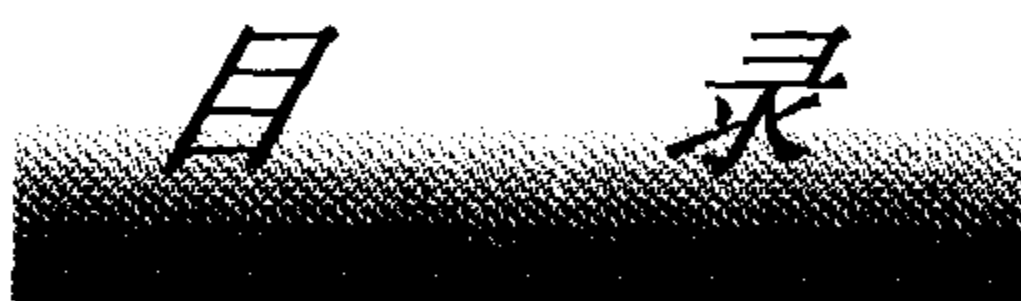
我的小说虽然有自传的性质,但归根结底还是小说。我展示了人物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命运。

我的第一部小说《非洲又一年》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讲述了南非犹太移民的故事。故事后面的两部是《倒置的金字塔》和《流放》。第四部小说《三瓣木兰》以 1978 年索韦托起义为背景。

1986 年,在南非的时候,我就开始写第五部小说《平安的房屋》。不过这部书是在澳大利亚完成的。书出版不久,曼德拉获释。那是一个我们为之奋斗多年的伟大的日子,遗憾的是,当时我们不在南非,与那一刻失之交臂。历史又一次捉弄了我们。

我希望《纳瑞斯金公园最后的散步》能使我祖先的亡灵安息。但愿我以后写的书能在一种更加轻松、更加愉快的氛围里完成。

1998 年 5 月 24 日写于澳大利亚



中文本前言

第一部

1 序 言	1
2 流亡到“伊甸园”	5
3 等待革命	14
4 奥萨卡,墨西哥	26
5 问题	33
6 “德国人来了!”	45

第二部

7	回 家	59
8	目击者	70
9	米尔克	78
10	雷勃,是英雄吗?	87
11	扎戈的毁灭	97
12	探 索	109

第三部

13	维尔纽斯	122
14	谁的耶路撒冷	137
15	应邀参加祈祷	149
16	维尔纽斯的宗教仪式	161
17	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	172
18	卡拉派信徒和哈扎尔人	185
19	通往扎戈的道路	193
20	扎 戈	204
21	阿尔托娜的故事	216
22	凄凉的墓地	222
23	雷勃之死	232
24	尾 声	241

第 1 部

1 序 言

顿河边的小镇叶莱茨有一座坟墓,50 年来无人祭扫。这座坟躺在别的陌生人的坟墓当中,夏日白草萋萋,冬天冰雪覆盖,碑文依稀可见:雷勃·西蒙诺维奇·约费,1909 年—1943 年。是啊,一座立于战争年代的墓碑,还能指望写些什么呢?

雷勃·西蒙诺维奇的母亲、妹妹和弟弟躺在扎戈纳瑞斯金公园的万人坑里。扎戈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边境上的一座小镇,在叶莱茨西北 2000 公里远的地方。另外一个弟弟和妹妹以及他们的家人的命运无人知晓。

大屠杀的幸存者在扎戈万人坑立了一块大约 1.5 米高的、凿刻得很粗糙的方尖碑。苏维埃政府在碑上钉了一块用俄文写的牌匾,盖住了先前用依地语写的碑文,只有开头的几



纳瑞斯金公园万人坑的纪念碑

个字尚可辨认：“这里躺着……”那块俄文牌匾写的是：

1941年10月2日，3000位苏联公民被屠杀于此地，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牺牲者。

1990年，立陶宛独立后，“苏联”两个字被凿掉，留下一块伤疤似的空白。两年后，那块苏联时代的牌匾被取下来，方尖碑整修一新，镶上3块金属牌匾，分别用立陶宛语、依地语、和希伯来语写着墓志铭：

1941年10月2日，希特勒刽子手和他们在当地的帮凶屠杀了沙维尔地区大约3000名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

生活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中南部城市考那斯的幸存者每年一次来万人坑祭奠，虽然人数已经越来越少。他们在赎罪日结伴而来，悼念死者。有的人说，死难者接近7000而不是3000。

雷勃8口之家只有两个人死在自己的床上。他的父亲西蒙，死于20世纪20年代初。那时候，这种死法在扎戈的犹太人当中还相当普遍。雷勃的哥哥戈森就是我的父亲。戈森1927年离开立陶宛。他因为被误诊为冠状动脉血栓症而死于心脏病。那时他才58岁，我们家生活在非洲的中心。

像扎戈这样的纪念碑，在东欧的城镇乡村、密密的森木、纵横的沟壑有成千上万座。现在重新描绘这些纪念碑后面的灾难似乎已经为时太晚。那些饱受折磨、心有余悸的幸存者早已逃离浸透鲜血的故乡，有的年事已高，有的行将就木。而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家伙，假装得了健忘症，矢口否认他们的罪行，还在如今已被绿荫和鲜花覆盖的屠场上自由自在地行走。

如果我的父母当时留在立陶宛，我们也许早已躺在纳瑞斯金的万人坑了。戈森一直为自己远走高飞，幸存于世，而不肯原谅自己。我继承了他的负疚之感和想要告慰死者的心

愿。幸免于难便该承担责任,但是我该怎样抚慰那些无法安息的灵魂?拜倒在坟前发誓复仇,还是为父亲戈森辩护,是历史让他背井离乡?怎样才能向那些伤害了灵魂、凝冻了热血的刽子手讨还血债?那骇人听闻的暴行,那灭绝人性的屠杀,无法用语言来描绘。

我要祭奠的亡灵并不要求向那些最凶残的刽子手复仇。他们只需被人记住。记住就是报仇。如果被忘记,他们便注定要在历史的长河飘荡,在那些疯狂的理论家和军阀的屠场上徘徊,为其他无辜的生灵被涂炭而悲伤,因仇恨和毁灭而绝望。记住他们!因为有人会忘记。

大屠杀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像被人忽略的伤口不停地化脓。我在理想王国的梦境和绝望的深渊之间徘徊,一次次参加又一次次退出这样那样的运动。最后终于明白,解决的办法——如果真有办法的话——在一个无法到达的深渊。在那儿,为正义进行的斗争以及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渴望简直毫无意义。大屠杀属于邪恶的王国,我们不可能通过立法的手段去阻止造成这场悲剧的灵魂的疾病、恶魔般的仇恨,以及原始的激愤。

在过去的日子里,类似“六百万”、“最后的解决”、“万人坑”、“毒气室”、“装运牲口的车厢”,这样一些短语已经变成人们听腻了的老生常谈,淡化了恐怖,给人们的激情披上盔甲。追踪6个人,而不是600万人命运的变迁,我们或许能从人性的角度,捕捉到这场悲剧的实质。这样做或许可以告慰那些无法安息的亡灵。我的父亲也在其中。

就这样,历史的长卷增加了我用铅笔做的一个记号。那是一种已经永远消逝的生活方式小小的印记——幸存者讲的



20年代的纳瑞斯金公园

故事,褪色的照片,歌曲,逸事。如果雷勃还活着,我们也许能知道更多的情况。随着岁月的流逝,“事实”已经蜕变为“神话”,只留给我们一些支离破碎的材料,去拼缀一床百衲被,而不是漂亮的挂毯。记住也许还不够,但忘记则是没有道德之心。

2 流亡到“伊甸园”

我在移民当中长大,他们的歌声和故事无不浸透了对家乡的思念。立陶宛便也不可避免地成了我的“老家”。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美丽的森林和田野,乘雪橇,采草莓。当父母亲讲起被驱逐的情景时,我和他们一起经历了精神上的痛苦。茫茫草原,平日里运牛的火车在漫漫长途颠簸;炎热、饥饿、干渴;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对一无所知的目的地充满了恐惧。

于是,从小时候起,一看到火车车厢,我就害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的父亲 12 岁,母亲谢瓦比他小几个月。1915 年,德国军队向立陶宛逼近时,已经统治立陶宛 120 年的沙皇政府下令驱逐居住在前线城镇、乡村的所有犹太人。沙皇政府认为,他们有可能成为德国人的同盟者。因为他们讲的依地语是以中世纪德语为基础的。至于其他民族的立陶宛人则不在驱逐之列。

犹太人在沙皇的统治之下饱受苦难。从 1825 年到 1855 年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针对犹太人的法律就多达 600 条。按照这些法律,犹太人被赶出他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城市和乡村。到 1827 年 8 月,政府还颁布了一项征兵法令,规定犹太人社区必须负责把从 12 岁到 18 岁的年轻男子送到沙皇军队当兵,而且一当就是 25 年。如果对这项可恶的法令执行不力,政府就派人亲自出马四处搜捕。甚至许多八九岁的儿童被他们抓走。这些可怜的孩子很少生还。有的还没有到达帝国遥远的边关就死在路上,有的被迫改信了基督教。

传说,扎戈有一位名叫伊里亚胡·斯凯克的拉比曾经在 19 世纪拿起武器反对这项强征入伍的法令。他是没钱没权的平民百姓的保护人。当犹太人镇公所要把从穷人家抓来的孩子交给沙皇部队的军官,而把有钱人家的孩子藏起来的时候,他奋起反抗。有一次,听说几个孩子被抓起来关在镇公所,他便操起一把斧子,带领一群犹太穷人大闹镇公所,放了那几个孩子,并且把他们藏在自己家里,直到前来征兵的人离开小镇。

到 19 世纪末,这项法令稍微宽松了一点儿,规定每个家庭必须有一个男丁服役,但养家糊口的人和独生子可以免服

兵役。1904年，我的祖父参加了日俄战争。而外祖父因为唯一的哥哥“过继”给一位没有子女的姑妈，没有去打仗。许多年轻人在到服兵役年龄之前便远走他乡。可是立陶宛独立之后，他们都高高兴兴去当兵。

立陶宛犹太人在沙皇统治下的历史血泪斑斑。因此，1915年，当政府命令他们24小时之内在最近的火车站集合时，大家心里都充满了恐惧和焦急，就不足为奇了。头一天夜里，戈森和弟弟雷勃在后院半冻的泥土中挖了一个不深的坑。小院黑暗的角落积雪闪着微光。我的奶奶弗瑞德一边哭一边把她的铜壶、俄国式茶炊、杵、钵、铜烛台埋到那个浅浅的坑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家乡。

第二天，5000名犹太人从扎戈步行或者坐马车到火车站。他们被胡乱赶上运牛的车厢，火车将把他们送到俄罗斯内地不同的地方。混乱中，母亲找不到孩子，丈夫和妻子离散，年轻人不见了家里老人的踪影。战后，大多数家庭再度团圆，但是也有不少亲人再也没能相见。在向东南方乌克兰进发的漫漫长途，许多人死于伤寒和别的疾病。

在让人难以忍受的、非常容易得病的车厢里颠簸了好几个星期，他们终于来到亚速海边的港市别尔佳斯克。这时候，一个个早已累得精疲力竭，茫然不知所措。别尔佳斯克位于小麦产区，又是海滨疗养胜地，铁路四通八达，旅游者络绎不绝，都来著名的咸水湖泥浴。但是这一次火车送来的不是度假的游客，而是难民。他们带着饿得半死的家眷从运牲口的车厢里爬出来，孩子们又哭又叫。来接他们的人眼里闪烁着怜悯和厌恶。

别尔佳斯克犹太人受的是俄罗斯教育。他们和这些从乡

下来的弟兄们除了宗教信仰相同之外,没有一点儿共同之处。尽管他们还保留着宗教和文化的特色,但早已融入大城市繁华的社会生活。因此,从一开始,面对这些向他们施舍食品、衣物,而又毫无热情可言的恩人,难民们的心情就十分矛盾。

父亲一家被安置到一座闲置不用的兵营。母亲一家和别的难民挤在一个大厅里。救济难民的施粥所开张了,衣服和床上用品也都发给大家。别尔佳斯克的教友管他们叫 Bezhintzes——难民。于是,在他们极其有限的俄文词汇里又增加了一个新单词。他们说依地语,用希伯来文做祈祷,懂足够的立陶宛语同市场上的农民做买卖,但是对俄语一窍不通。如果受过什么教育,也只是在村子里的希伯来学馆学会一点希伯来文。

不知姓名的人编了许多描绘难民艰辛与痛苦的笑话,也编了不少凄凉婉转的歌。戈森喜欢用他那低沉沙哑的歌喉唱根据 19 世纪一首民歌改编的歌。那首民歌叙述了沙皇军队里犹太新兵的思乡之苦。改编过的这首歌则拿被放逐的辛酸和温馨、安谧的家庭生活做了一番对比,还描绘了安息日蜡烛的闪光、传统的饭菜,以及士兵和难民都饱尝的痛苦。

... *Fraytig tsunacht derlangt men di lokshn,*

Oy vey gevalt!

Undz traybt men arum azoy vi di oksn,

Oy vey gevalt! ...

Fraytig tsunacht derlangt men dem tsimes,

Oy vey gevalt!

Undz traybt men avek in vayte medines,

Oy vey gevalt! ...

几个星期以后,手艺人在他们的行当找到了工作,其他人碰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戈森一家从兵营搬到城里的贫民区,和大多数人一样,一家几口挤在一个房间里。命令传来,不要依靠市政府,也不要依靠施舍。这地方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食物多的是。葡萄,橘子,西红柿在扎戈的小村庄都是有钱人家才享受得起的“奢侈品”,在这儿,一到瓜果飘香的季节都非常便宜。黑面包和西瓜也不贵。亚速海产的一种鲱鱼也很多。孩子们长得结结实实。老家的农村,主食一直是鲱鱼和土豆,而且常常是只有土豆没有鲱鱼。只是在安息日和其他宗教节日才变变花样。戈森说,那时候或许可以吃上土豆泥布丁,关于这事儿,人们也编过一首歌。

Zuntig bulves montig bulves,

Dinstig un mitvoch——bulves,

Donershtig un fraytig——bulves,

Shabes in a novine, a bulve kugel...

孩子们比大人更愿意接受这种流亡生活。别尔佳斯克向他们打开了一个让人兴奋的新世界。他们到不受教会约束的世俗学校念书,学习读、写俄文。他们走在林荫大道上,呼吸着洋槐树的香气,除了拿家乡的木屋、土路和这座城市的石头建筑、石板路面做一番比较外,很少想起留在身后的那座小村庄。克服了最初的恐惧之后,孩子们大着胆子走到比左邻右舍更远的地方。他们处处感到新奇。在港口,傻乎乎地看码头工人往轮船上装小麦;在海滨直盯盯地望着那些衣着高雅

的旅游者出入于一座座豪华的旅馆。商店里五光十色的商品让他们目不暇接，林荫道上飞快驶过的汽车更叫他们目瞪口呆。

“在这以前，我只见过一次汽车，”妈妈告诉我。那玩意儿驶过扎戈镇拉克图维加斯街的时候，孩子们都跟在后面边跑边喊：那辆车发疯了！那辆车中邪了！可不是嘛，一辆不用马拉就能跑的车还不是中了什么魔法嘛。

亚速海浩渺无际，经刻赤海峡流入黑海。孩子们起初望而怯步，可是没过多久，那儿就成了他们的“游乐场”。夏天，他们在沙滩或者水里嬉戏，12月到3月，在已经封冻的海面上滑冰。

孩子们丢掉小镇人的怯懦，也不再面黄肌瘦。他们变得充满自信，身板结实，面颊绯红。父母们都说，像异族人。年纪大一点的人都不会说或者写俄语。不得不和沙皇政府的工作人员打交道的时候，就靠孩子们当翻译。于是，人们开玩笑说，现在是蛋教鸡了。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害怕政府官员、士兵和警察。他们管这些代表政府当局的有权有势的人叫 knep-peldikke。kneppeldikke 身穿制服，扣子亮光闪闪，掌握着犹太人的生杀大权。

“不贿赂什么也干不成，”戈森回忆道。“我们甚至为了赶快被驱逐而花钱。”他讲了一个或许是杜撰的故事。有一天，又闷又热，火车突然在茫茫无际的大草原停了下来。人们从拥挤不堪的货车车厢里爬出来，看见火车司机正拿着一把榔头沿铁道敲打车轮。

“出什么问题了？”他们问道。

“车轮不转了，”司机说，“得上点儿润滑油。”

“上点儿油就转了，”难民们叹了一口气，用依地语说，开始凑钱贿赂司机。



20年代的扎戈

贫穷过早地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按照犹太教的教规，男孩13岁举行成人仪式。之后，穷人家的孩子就开始自谋生路。男孩子到裁缝铺、理发店、鞋铺或者木匠铺学徒。女孩儿在家里帮助母亲照料弟妹，或者学习缝衣服，织毛衣，做女帽。戈森12岁的时候，一放学便到一家理发店干活儿。伊特兹——我母亲的哥哥，很早就开始学习裁缝，举行成人仪式时，他穿的竟是自己做的衣服。很少有人继续上学受教育。面对更加广阔的、生气蓬勃的世界，他们急切地学习任何可以学到的东西。

晚上，他们或者参加“联盟”——犹太人工人联盟——组织的学习，或者参加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组织的活动。这些团体从以献身精神迎接千周年纪念日的极端的教派到竭力鼓吹通过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的努力获得救赎的极左派，应有尽有。

有。“联盟”的成员看不起犹太复国主义。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社会主义可以恢复这个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尊严和平等。而犹太人正属于这个被踩在脚底的阶层。

戈森和他的同龄人去夜校学习俄国文学,历史,还参加合唱团。他们沉浸在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大变化即将到来的欢乐之中。大家都确信,压迫人民的旧制度即将崩溃,在他们无法估价的努力之下,一个新的、平等的社会即将诞生。

戈森一有空就到犹太工人俱乐部和图书馆读书或者参加讲座。父亲西蒙发现戈森褥子下面藏着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之后,便赶紧烧掉。“你知道闹革命是什么下场吗?”他一边叫喊一边朝戈森身上乱打。

西蒙知道闹革命会落个什么下场。1904年,他参加过日俄战争。这场战争不得人心,引发了1905年的十月革命。那时候起义遍及俄国各地,扎戈也是燃起革命之火的地区之一。那儿的革命者有许多犹太人。他们成立了短命的扎戈共和国。沙皇政府立即做出反响,并且非常残暴。他派来奥洛夫将军和他的哥萨克军队。他们捣毁了犹太人的家,把几百名犹太人打得鲜血淋漓。男人们被关进犹太教堂,沙皇的走卒威胁,不说出革命者隐藏的地方,就把他们统统处死。谁也不说话。后来,犹太人村社交了4500卢布罚款,大家才幸免于难。革命者更惨,佐马赫·艾辛,一位裁缝,被枪毙。一个名叫雷特的社会主义者在雷加监狱被杀害。剩下的人有的被折磨死,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只有很少几个人逃出国境线。其中有一个女人,名叫莱芙卡·克雷戈。她绣了那面扎戈共和国的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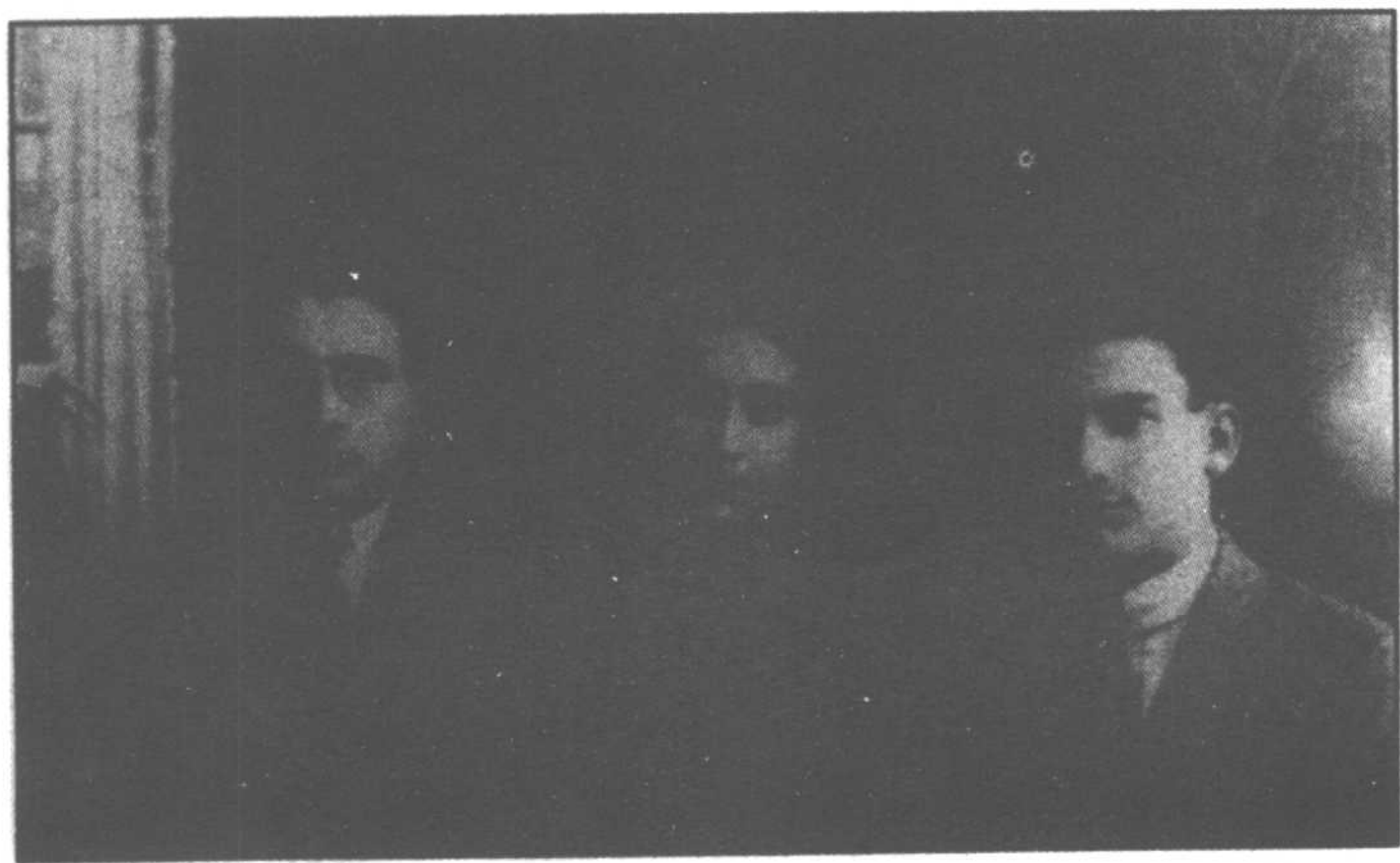
“他们会把你枪毙，把我们流放到西伯利亚，”戈森的妈妈一边哭，一边求他赶快停止这些社会主义活动。但是，父亲打也好，母亲骂也罢，都没能阻止戈森参加“联盟”的会议。他极力安慰妈妈，同时把那些宣传品藏到更隐蔽的地方。雷勃比戈森小6岁。在他的眼里，哥哥是英雄。

流亡生活的前两年使得这些难民免于战争的苦难。可是没过多久，他们便又卷入战火之中。1917年，沙皇俄国被德国打败之后，整个国家爆发了革命。乌克兰人趁国内动乱之机，宣布成立自治的乌克兰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没能维持多久。和平协定签定之后，新的共产党政府和沙皇统治者一样，不愿意放弃对这块富庶之地的支配权。经过多次战斗——其中一次，先前的敌人波兰站在乌克兰一边——红军打败了所有敌人的进攻，于1919年12月，成立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红军和白军之间的争斗并没有结束，没有多久，别尔佳斯克郊区就听见了枪炮声。

难民们向有关部门申请返回立陶宛，虽然年轻人极力反对。“如果布尔什维克赢了，他们会把我们当作资本家枪毙，”他们争论说，“如果白军赢了，他们会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

“我本来可以不顾父母的反对留在别尔佳斯克，”许多年以后戈森对我说，“可是16岁那年，我一下子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父亲得了喉癌，母亲怀上第六个孩子。”

运送老百姓的火车一通，他们就离开别尔佳斯克，结束了“伊甸园”的4年流亡生活。



由左到右:20年代时的戈森、妹妹亨克、弟弟雷勃

3 等待革命

Vu zayt ir alle , mayne chaverimlech

Tzu lebt ir , tzu vandert ir ,

Tzu zayt ir shein teit ?

Zingt mir a liedala , zingst mir a leidala ,

Zingt mir fun Yiddishen neit...

这首歌问那些没有回来的朋友,你活着吗?还是已经死了?你还在到处流浪,不愿意回到家乡?

犹太人从流放地回到故乡之后,发现他们的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财物全都不翼而飞,谋生的手段更派不上用场。非犹太人邻居和他们的共同之处只是贫穷,现在看他们又回来,一个个绷着脸生闷气。犹太人又歌声四起,唱艰辛,唱遭受的

损失,唱心中的痛苦。

约费家的房子坐落在斯维特河附近的山坡上,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连地板也被人刨起来当柴烧了。窗户砸得稀烂,房顶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瓦。我的祖母弗瑞德挖出临走时埋在地下的铜壶、茶炊、杵、钵和铜烛台,又伤心地哭了起来。西蒙要死了,孩子们都小,戈森 16 岁就得支撑这个家。

约费一家和别的流亡者一样,已经习惯了在逆境中重新崛起,重建家园。有的人移民到了美国,剩下的人还留在小镇。他们修好房屋,重开学馆,又回到先前的作坊,重新和邻居们做起买卖。然而,年轻人并不安分,流亡生活为他们打开新的世界。他们再也不能过原先那种小村庄的生活,再也不能接受传统的价值观。他们当中一位挺有名的文化人说,只要你下定决心去奋斗,就不会是神话。于是他们开始着手把心中的神话变成现实。

其他民族的立陶宛人也开始重新发现他们的“神话”。直到 1861 年农奴制被废除,农民从来就没有从犁杖上抬起过头。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一个脆弱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立陶宛民族主义第一次在人们心中产生震荡。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民族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他们重申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强烈要求建设长期被压制的本民族独特的文化。这种抱负与热情在立陶宛犹太人的心中引起共鸣。从 14 世纪起,他们就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把自己叫作 Litvaks。从沙皇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之后,他们都希望在一个独立的立陶宛政府的领导之下,过和平安宁的生活。

1917 年,德国政府占领立陶宛期间,允许组建一个由 20 个人组成的理事会。1918 年 2 月,这个理事会宣布立陶宛独

立。这件事得到了德国的承认。同年 11 月,政府成立。布尔什维克和波兰都想控制这个只有 300 万人口的小国,可是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立陶宛的头上。政治和军事混战一直持续到 1921 年,立陶宛被国际联盟^① 接纳。这样做符合大国的需要,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独立的缓冲国。

立陶宛犹太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在立陶宛刚刚独立的那些兴奋激动的日子里,十分活跃。尽管国家贫穷,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当立陶宛作为国际联盟的签字国,在那些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种族、宗教信仰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希望的彩虹还是高高升起。犹太人工作部和犹太人全国理事会在考那斯成立;犹太人可以参加政府行政部门和议会的工作,还可以在军队里当军官。考那斯的大街上甚至出现了用希伯来文写的标牌。一时间,有的人幻想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有的人希望革命能在立陶宛建起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但是那些对历史长河记忆犹新的人并不相信千年纪念日的美梦。他们不信任东道国的利他主义。他们坚信,只有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才能避免多少世纪以来遭受的迫害。

戈森的理发馆正对市场广场,年轻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他们的信仰和抱负激烈地争论着。我的奶奶弗瑞德纳闷,为什么儿子的理发馆顾客盈门,可他总是赚不了几个钱。“我们是为更好的生活绘制蓝图,”戈森对她说,“而不是为了多赚

^① 国际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根据《凡尔赛和约》于 1920 年建立的国际组织,旨在促进国际和平与维护世界和平,总部设在日内瓦,于 1946 年解散,其某些职能由联合国取代。

几个钱。”

独立之后,除了公立学校,小镇还成立了另外3种学校:以犹太复国主义为宗旨的“塔巴特”学校,教希伯来语;传统的“亚夫内赫”宗教学校,也是用希伯来语授课;依地语初级学校。这种学校是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文化站建立的。他们希望能对绝大多数讲依地语的犹太人进行实用的基础教育。1919年,扎戈已经培养出一批不错的教师。文化站不仅在小镇建立初级学校,他们还给工人建立了图书馆和夜校。

“那是我们的大学,”回忆起往事,戈森经常骄傲地说。“年轻工人的大学。”

青年男女渴望知识,成群结队地到文化站上夜校。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慢慢地建立起来。学习小组从俄国文学、德国文学到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戈森的奖品是达尔文著的一套三卷集依地语《物种起源》。这套书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架上,赭色的封面已经成了淡褐色。封面上印着达尔文的像,封底是尼安德特人^①的画像,还画着鱼、鸟、羚羊和猿猴。戈森在为文化站的学习小组准备发言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仅仅20年之后,他自己的家族会成为被歪曲了的进化论的牺牲品,而且由于非自然的选择,悲惨地死去。

小镇里的年轻人生气蓬勃。文化站不仅吸引了自学的人,还吸引了不少其他年轻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最受欢迎

^① 尼安德特人:人类学用语,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化石,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和中亚,最初发现于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尼安德特河流域的洞穴中,故得此名。



19 英语班的同学

的是合唱团。我的母亲谢瓦就在合唱团唱歌。雷勃也在。他们唱的歌反映了那时候的革命精神。就连谢瓦这样没有政治色彩的年轻妇女,也用歌声鼓舞各国受苦受难的穷人,消灭剥削和压迫,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Un du akerst , un du zeist ,

Un du fiterst , un du neist ,

Un du hammerst , un du shpinst ,

Zog mir mein fraynt vos du fardinst ?

Gling glang , gling , glang ,

Zingkt der hammer mit zayn gezang , gling , glang...

你耕耘,你播种,

你放牧羊群;

你纺纱,你织布,

你敲打着铁砧。
但是生活永远那样贫穷，
就像手里那把铁锤的歌声：
叮当，叮当，叮当……

合唱团的团长看到雷勃颇有音乐天赋，便教他些基本的乐理。在戈森的理发店学徒之后，雷勃节约每一个辛辛苦苦赚来的戈比，想买一个喇叭。“总有一天，”他对妈妈说，“我要当一个真正的音乐家。”

“瞧你那点儿志向，”妈妈嘲笑他。“最好当你的理发匠，别像吉卜赛人那样，四处流浪。”

也许喇叭是雷勃那时候唯一能够买到的乐器？或者他生性就喜欢这玩意儿？喇叭毕竟是喜庆时人们爱吹的乐器，也是平民百姓喜欢的乐器。危难之时，它可以向他们发出警报，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战，还会报告新时代的到来。倘若他是富家子弟，他也许会选择小提琴或者大提琴。他会到大城市，比如里加^①学习，成为专业音乐家。他的天才和爱好当然在这方面。可是条件不允许，他只能向别的方向发展。

16岁那年，雷勃参加了镇消防队的管乐队。像扎戈这样的小镇，房子大部分都是木头建造的，消防队的工作主要靠当地居民志愿参加。为了吸引更多的支持者，他们经常组织各种宣传活动，管乐队就在街头表演。队员们戴着头盔，穿着制服，制服上面是两排闪闪发光的扣子，活像政府里的官员，只是没有权力罢了。倘若什么地方着了火，号手吹起号角，惊动

^① 里加：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首都。

了全镇的居民。“起火了！起火了！”的喊声响彻整个小镇。消防工具也很简单：马拉的水车。但是消防队自己又没有马，一旦有事，都是有马的人家自愿把马套到水车上赶到火场。熊熊烈火从一家窜到另外一家，志愿者从街上的水泵抽来一桶桶水，或者用手摇水泵从斯维特河取水。1881年的大火烧毁400座房子，1902年的一场大火更把整个老扎戈城夷为平地，以至于许多年人们都谈火色变。谈起雷勃，大家都说，年轻时候他献身于救火，后来却想方设法让火烧得更旺。

作为一个学徒，雷勃把剪下来的头发扫走，把梳子擦干净，剪子磨快。这当儿，他就注意地听理发馆里的辩论。等到开始给顾客理发、刮胡子的时候——那时，他自己的胡子也需要刮了——他也参加了讨论。起初，和戈森一样，他也成了“联盟”——犹太工人联盟的一个成员。戈森离开立陶宛之后，雷勃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贫穷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的理想使他变得激进。许多年以后，雷勃的一位熟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说，和雷勃辩论很难，甚至很危险。

“我躺在理发用的椅子上，一双手在白单子下面动弹不得。他居高临下，挥舞着锋利的剃刀。那把刀可蛮有‘说服力’，谁还敢跟他争论。”

在这个民主空气甚浓、可惜昙花一现的时期，犹太青年团结在文化站周围，学习、辩论、跳舞、唱歌、恋爱、结婚。生活平静安宁。星期六，他们穿上安息日才穿的漂亮衣服，在纳瑞斯金伯爵公园散步。尽管日子还很艰难，但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谁整整一个星期都穿安息日才穿的礼服？”这是雷勃常常让人猜的谜语。小镇里的人谁都会把谜底告诉你：“没有安

息日礼服的人。”

戈森 22 岁那年,和俄国文学老师谈上了恋爱。她是从里加来的一位受过教育的女子,比戈森大几岁,文化站就是她帮助建起来的。他们的恋爱持续了将近一年,期间,戈森学了不少俄文。“学那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呢?”谢瓦评论说。“我没法想象他看中了那个老姑娘什么!”那个老师的名字,我已经忘了。那时候她大概 28 岁。“她相貌平平,不修边幅,裙子皱皱巴巴,长袜总是卷在脚脖子上。”这显然是谢瓦的一家之言。戈森提到她的时候,总是不无赞赏。看得出,没有娶那女子为妻,他一直引以为憾。

谢瓦是戈森的朋友伊特兹·雷森的妹妹。他们是那座以姑娘漂亮、小伙子聪明而闻名的小镇的美人儿。她那美丽的容貌、活泼的性格吸引了许多崇拜者。“结婚前,”她常常回忆道,“舞会上,我收到的 sekretkes 比谁都多。什么叫 sekretkes? 那是你参加舞会时买的一种卡片。你可以在卡片上给你的意中人写几句心里话,然后迭起来,写上他或她的名字,便有专人像邮递员一样,把卡片送到对方手里。我们管他叫‘飞行邮政’。我们那时候已经很‘现代化’了。都自己找对象,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用这种办法,就是最腼腆、最不吸引人的姑娘也可以不失体面地向她看中的人表白心迹。当然,大多数情况都是小伙子给姑娘送 sekretkes。你只要写几句类似‘星期六你愿意和我到纳瑞斯金公园散散步吗?’之类的话,其他事情就好办了。结婚前,我把我收到的那些 sekretkes 都烧了。”

谢瓦爱上了她的一位崇拜者。两个人手挽着手漫步在纳瑞斯金公园,度过两年美好的时光。后来,他随家里人一起到

了南非。临走前,海誓山盟回来接她。可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戈森对他的朋友伊特兹这位孤独、悲伤的妹妹十分同情。没过几个月,那位教俄国文学的女老师也回里加去了。

这时,立陶宛的民主进程陷入泥淖。独立之后,立陶宛党派林立,政局不稳。1926年,发生了一次政变,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政府开始执政。安塔纳斯·斯米特纳和他手下一批年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取缔了反对党,剥夺了民众的自由,杀害了几个共产党人,逮捕了一大批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1927年,他们解散了国会,颁布了临时宪法。这个宪法废除了旧宪法最重要的民主原则。其实,早在政变之前,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就已经被剥夺。“黄金时代”从1919年持续到1922年。到1924年,文化站和下属的最重要的机构——初级学校、夜校和图书馆都被查封。

排犹情绪在经济领域也日益高涨。大批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之后,面临和已经在城里扎根的犹太、德国、波兰买卖人、手艺人的竞争。一个由技术工人组成的组织提出“立陶宛是立陶宛人的立陶宛”的口号,推行一系列歧视立陶宛少数民族的政策。事实上,立陶宛的基督教徒从来都没有把犹太人看作自己的同胞。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他们不过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暂且和犹太人合作的。犹太人在这块土地上虽然生活了几个世纪,仍然被看作“外人”。尽管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大迫害已经停止,反对犹太人的游行示威还经常发生。基督教教会在布道坛上愤怒谴责“杀害耶稣基督的人”,煽动排犹情绪。

戈森对立陶宛政治上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终于彻底

绝望。在一个极右政府的统治之下，革命很难成功。谢瓦的孪生哥哥本兹几年前移民到了墨西哥，一直催他们也到那儿去定居。“在那个旧世界，我们受够了贫穷和迫害，”他写道。“墨西哥没有反对犹太人的情绪。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犹太人。”谢瓦深受鼓舞。她希望能在一个新的国家开始自己婚后的新生活。扎戈给她留下了太多的痛苦的记忆。“等我们安顿下来就可以把你的家人接来，”她对戈森说。这也正是当时其他移民心里的想法。

“犹太人在立陶宛没有前途，”刚刚结婚，戈森便对家里人说。“谢瓦和我先到墨西哥，一等攒够坐船来的路费，就回来接你们。我们很快就又能在一起了。”他还据理力争，即使他离开立陶宛，家里人也能维持生活。妹妹亨克缝绣花床罩和台布，手里的活儿不断；雷勃和跟他学徒的弟弟费沃克已经能够独立支撑理发店的门面。只有两个小弟弟还在上学。大家赚的钱再加上他从墨西哥寄的钱足可以维持生活。

雷勃听到哥哥的计划之后，十分生气。戈森一向把弟弟引为知己，可是这一次居然没有透露半点儿消息。“你总是让谢瓦牵着鼻子走，”雷勃愤怒地说。“为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儿，你抛弃了家庭，放弃了理想。”

“我什么也没有放弃，”戈森说，“在一个反对犹太人的国家，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革命理想和生存现实统一起来。瞧瞧那些民粹主义者！他们为屠杀犹太人的暴行辩护说，这种迫害表现了农民正当的愤怒。‘他们打犹太人的时候，我们能怎么办？’他们问道。‘能去保护他们吗？’”

“你听起来就像个犹太复国主义者，”雷勃说。对于他，这或许是最恶毒的骂人话。

在他们那座市场广场理发店里,他曾经满怀喜悦听戈森一边把剪刀咔嚓咔嚓弄得山响,一边把犹太复国主义者驳斥得哑口无言;一边挥舞着手里的剃刀,一边把宗教神秘主义批判得体无完肤。他伶牙利齿,唇枪舌剑,攻击乌托邦的美梦不过是一枕黄粱。但是雷勃对哥哥并不盲从。他站在年轻的犹太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边,批判“联盟”在教派事务方面陷入泥沼。尽管他完全理解犹太革命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而且自己就有切身体验,但还是坚决否认使哥哥改变信念的那些疑虑。他坚持说,革命将解决这些问题;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兄弟。戈森离家的时候,他拒绝前去送行。



戈森最小的弟弟

斯马尔克,摄于1927年

戈森的其他弟弟妹妹知道哥哥要远走高飞之后,也很难过,而且茫然不知所措,特别是最小的弟弟斯马尔克,戈森对于他就像父亲。最让人心碎的是和妈妈分别。斯维特河边那座小木屋门前,他最后一次紧紧拥抱可怜的妈妈和弟妹时,大家都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那情景戈森一辈子也无法忘记。

戈森的“背叛”使雷勃沮丧,而且加重了他肩上的担子,但他还是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投入生活。他年轻、英俊,喜欢音乐、舞蹈。小镇里的许多姑娘都爱他,

他也爱她们。后来,有的人说,他之所以风流浪荡,是为了麻

痹敌人,隐蔽自己的政治活动。也有的人说,他那样潇潇洒洒、神秘秘是为了勾引女孩子。

不过喜欢浪漫调情和参加政治活动并不相互排斥。有一点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那就是他对音乐的酷爱。不论什么场合,他都去演奏。戈森去墨西哥之后,他组织了一个乐队,宗教仪式也好,社会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动也罢,只要邀请,他照去不误,不受任何党派观点的限制。对于他说,音乐是最大的“平衡器”。

“你说乐手雷勃·约费吗?”直到今天,提起他人们仍然这样说。“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只要雷勃站起来独奏,人们就停止跳舞,也不再聊天,只是静静地听他的演奏。”

人们还清清楚楚地记着他,但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常常截然不同。有的人或许认为他头上长角,有的人却觉得他头上笼罩着神圣的光环。在小镇人的眼里,他是天才的音乐家,或者只是一个拼命吹喇叭的乡村理发匠;他是一个富于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共产党的间谍;一个充满温情的人,或者只是一个热爱平民,而不是热爱人民的人;一个脉脉含情的恋人,或者骄傲自大的浪荡子。

由于他包蕴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雷勃成了当地一位传奇般的人物。就连1941年德国人占领扎戈前他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以及两年之后,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命归黄泉的,还是一个谜。

直到战争结束之后,戈森才知道雷勃的死讯。雷勃只给哥哥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戈森刚离开立陶宛的时候,第二封是1943年,他在战斗中受伤,就要离开人世的时候。戈森收到第一封信之后,难过了好长时间。第二封他却没能看到。

4 奥萨卡,墨西哥

本兹,谢瓦的孪生哥哥起初想去美国,而不是墨西哥。可是轮到他要走的时候,分配给立陶宛的名额已满。美国南部那块羊角状的陆地让他着迷——西边是太平洋,东边是墨西哥湾。他还注意到将美国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分开的那条弯弯曲曲的边界线是一条河,中间没有需要横渡的大海。因此,他可以由墨西哥起步,向北进发。他说,斯维特河和亚速海使他获得相当不错的游泳技术,他能横渡世界上任何一条大江大河,包括格兰德河^①。

他完全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立陶宛犹太“湿背人”^②,可是他在奥萨卡留了下来。那是墨西哥城南 450 公里的一座美丽的小镇,坐落在高原一条富庶的山谷,四周群山环绕。他写信告诉家里,奥萨卡气候宜人,当地居民都很友好。他还傻乎乎地提到这里的黑眼睛西班牙姑娘十分漂亮。妈妈听了以后,便急着给他找对象。她情愿给他找个孤儿,这样在经济上不会给儿子造成负担。

戈森也很喜欢奥萨卡。在这里,他失去了创造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新世界的紧迫感。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像一首美

① 格兰德河:北美洲南部,北出落基山脉,东南流入墨西哥湾,长约 3000 公里,其中作为美国和墨西哥的界河约 2000 公里。

② “湿背人”:指偷渡格兰德河非法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或劳工。

丽的田园诗,难怪科尔特斯^①选择奥萨卡作为自己的省。如果说财富不在周围的崇山峻岭,那么就在漫长的夏季。正如本兹信中所说的那样,这里气候温和,当地人也很友好。戈森很快就学会了西班牙语,可以很轻松地和他们交谈。他也喜欢辛辣的食物和新的生活节奏。只有在别尔佳斯克——他的另外一座“伊甸园”,他才体会过这样的自由。他经常给母亲写信,以减轻心中的负疚之感。还把辛辛苦苦赚下的钱分出一部分给妈妈寄去。除此而外,还得为接他们出来攒钱。母亲说,立陶宛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

“邻居们都不知道我们是犹太人,”到奥萨卡之后,本兹对他们说。“他们以为我们是德国人。”

谢瓦就像被人泼了一瓢凉水。“我们为什么要假装德国人呢?他们不是不反对犹太人吗?”

“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犹太人。”

“他们不是基督教徒吗?”谢瓦不肯就此罢休。在老家,牧师成天煽动农民的反犹情绪。

“不是异教徒的人都是基督教徒,”本兹只好承认。

“如果这样,他们当然知道什么是犹太人。在老家,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已经吃够了苦!”

“不要着急。墨西哥人很随和。什么都 *manana, siesta*,”本兹故意卖弄他会说的那几句西班牙语。“除了地震,他们什么都不怕。”

“地震?”

^① 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518年率领探险队前往美洲大陆开辟新殖民地,1523年征服墨西哥。

“小震罢了。很少发生。”他连忙说。“很快你就习惯了。”

“我要回家，”那天晚上，谢瓦哭着说。那以后许多个夜晚，她都哭哭啼啼。“什么都不一样，什么都不习惯。这儿的人皮肤那么黑，衣服那么鲜艳，食物太辣，天气太热。我永远也学不会他们的语言。”

她很寂寞。奥萨卡屈指可数的几个犹太人都已经融入墨西哥的生活。有两个人娶了当地的妇女为妻，其他人也不再遵守犹太人的教规，过犹太人的节日。谢瓦却做不到这一点。她每到星期五晚上都要点起蜡烛，按照犹太人的历法过节，准备好吃的，和在老家时完全一样。想起吃猪肉，或者把肉菜和别的奶制品和起来吃，她就恶心。只有本兹到墨西哥城办事的时候，买回一只按照犹太教规制作的鸡，她才能吃上点儿肉。

戈森经常不在家。他和本兹走街串巷，到周围的村子里卖布和别的小商品，还有带回村里制作的手工艺品和黑陶。奥萨卡因这些工艺品而闻名。他们打算赚到足够的钱之后，在城里租个铺子做买卖，还可以轮流到乡下卖货。

谢瓦最怕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特别是怀孕之后。和她唯一有来往的邻居是他们的房东胡安妮塔，一个总是乐呵呵的中年妇女。她和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胡安妮塔很同情谢瓦。她教她一些最基本的西班牙语，带她到市场，告诉她买不同的蔬菜和水果。在胡安妮塔的辅导之下，她学会了足够的西班牙语和小贩讨价还价，和邻居们说短论长。谢瓦的心逐渐安定下来。

“地震开始的时候，”有一天胡安妮塔一边比比划划，一边对谢瓦说。“要站在门廊的过梁下面，等它过去。不要急着往



1929年摄于奥萨卡。后排谢瓦、

罗斯、亨德，前排戈森、本兹、乔尔
外跑。不过用不着害怕。大的地震不常发生。”

有一天，真的地震了，正巧戈森和本兹都不在家。地板好像翘了起来，家具摇摇晃晃，架子上的瓶瓶罐罐都掉下来打得粉碎，窗玻璃咔哒咔哒地响。谢瓦已经有了6个月的身孕，一个人呆在家里吓得要命。她跑到胡安妮塔的家，两个人抱在一起，站在过梁下面。有一阵，连胡安妮塔也吓得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抱着谢瓦，只是朝自己身上划十字的时候，才松开一只手。这一次，城里损失很大，连对过那座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基督教堂也成了一片废墟。

晚上，戈森回来之后，谢瓦朝他嚷嚷：“想想看吧，如果基督教徒遭此大难，我们犹太人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我要走！我要回家！”

那是1928年，已经谈不到什么回家了。立陶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巩固了他们的统治，少数民族的权利被肆意践踏，有一段时间，雷勃不得不躲起来。戈森拼命攒钱，想赶快把家里

人从立陶宛接出来。他知道雷勃的脾气,生怕他头脑一热做出什么事情,被当局抓去流放,或者杀害。

离谢瓦生产的日子越来越近。胡安妮塔带她去看镇子里唯一的一位医生。那人是个酒鬼。胡安妮塔费尽唇舌,他才勉强答应在孩子出世前,保持头脑清醒。起初他倒没有食言,可是谢瓦分娩的日子偏偏比预产期晚了两个星期。胡安妮塔和戈森把他从酒吧里拖出来。接生的时候,他满嘴酒气,站立不稳。谢瓦痛得哭爹喊妈,毫无用处。酒鬼嫌她生得慢,干脆动用了产钳。

谢瓦被折腾得精疲力竭,看见婴儿满脸是血——她的脑门儿被产钳夹得凹了回去——哭着说:“与其养个白痴,还不如让她死了。”这个差点儿死在酒鬼医生手里的女孩儿就是我。后来,我一有什么异常之举,妈妈就要提起这事儿,似乎这就是那次损伤的后遗症。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宣布要到一个基布兹^①去生活。妈妈听了大惊失色——她最担心的“后遗症”终于变成了现实。

不过,小时候,我并没有脑子受了损伤的迹象。我是那个小区唯一一个皮肤白皙、金发绿眼的小姑娘,左邻右舍都特别喜欢我。他们渐渐把我们带入社区的生活。没过多久,本兹那位“邮购”的新娘从立陶宛来到墨西哥。和她一起来的还有谢瓦的小弟弟乔尔。

这时,本兹和戈森已经在城里开了一个小铺子。乔尔学了一点儿西班牙语之后,便也走街串巷,到村子里做生意。就

^① 基布兹:以色列的合作居留地,尤指合作农场。

在谢瓦开始习惯并且享受奥萨卡的生活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们命运的事情。有一天中午,谢瓦正睡午觉,被一阵枪声和叫喊声惊醒。她连忙把我从小床上抱起,冲出屋子,在院子里看见一群人正围着一个用纸糊的、头上长角、鼻子老大、其丑无比的人。男人们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朝天空放枪,还把阔边帽子扔得老高。女人们朝那个纸糊的怪物挥舞着拳头,不停地叫骂。

“出什么事儿了?”谢瓦问胡安妮塔。

“今天我们庆祝一个盛大的宗教节日,”胡安妮塔解释说,“今天是我们杀犹太人的日子。”

“你见过犹太人吗?”谢瓦把我紧紧贴在胸口。

“愿上帝保佑,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胡安妮塔划了个十字。“那个,”她朝人群中那个怪物指了指,“就是犹太人。”

戈森屈服于谢瓦的压力,终于同意离开墨西哥。连本兹的恳求也没用。谢瓦坚决不在一个犹太人的偶像被公然“枪杀”的国家生活下去。她说,先是纸糊的犹太人,接下去就是真人。她想去南非。她的母亲,一个妹妹和另外两个弟弟已经在那儿定居。

就这样,在墨西哥呆了3年以后,他们又要远走他乡了。本兹把他们送到维拉克鲁斯^① 他们从那儿乘船到南非。戈森对奥萨卡一直十分留恋。更糟糕的是,为了这次迁移,他用光了原来准备接家里人出来的全部积蓄。

1930年,我们来到南非。那正是经济大萧条中期,戈森在约翰内斯堡找不到工作,只好到沙巴尼。沙巴尼是罗德西

① 维拉克鲁斯:墨西哥东部港市。

亚一个矿区小镇。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年。那时,他才攒够钱,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理发店。

雷勃终于打破多年的沉默,给哥哥写来一封信:“你们生活在黄金之国,怎么连供养母亲的钱也没有?毫无疑问,你养着谢瓦一家人。”

“恰恰相反,”戈森写信给弟弟说,“我们仅仅因为挤在人家的屋檐下,才勉强糊口。约翰内斯堡的大街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铺满黄金。上个月,我还不得不为付房租而四处告贷。”

他还解释说,大多数犹太移民既没有钱,又不懂当地人的语言。他们极力为自己在社会上找到一个位置。这个社会把说英语的白人和南非白人划分开来,又把黑人和所有其他人区别开来。“犹太人第一次没有被打入最低层。如果你是白人,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某种优惠。犹太人对这种可恶的制度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我们不能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连自己的困难都应付不了。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多少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就这样被踩在脚底,我们怎么能改变黑人的命运,减轻他们的痛苦呢?”戈森没有说他持哪种态度。雷勃无法理解戈森的政治信仰已经让位于设法活下去的需要。他没有写回信给哥哥,戈森接到妈妈一封信。那是一首歌:“A Brivale di Mammen”。

*A brivale di mammen ,
Zolst du mayn kind misht farzamen ,
Shrayb geshwind , liebes kind ,
Shenk ir di nechome .*

Di mamme vet dayn brivale lean ,

Un zi vert genezn ,

Heilst ir shmerts , ir bitter herts ,

Erkvikst ir di neshome...

歌词大意是：给你的妈妈写一封信吧，给她一点安慰。她那颗饱受磨难的心会因此而宽慰，她的痛苦会减轻，她的灵魂能安宁。

这首歌的结尾是儿子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她最后的愿望是，他能为死者祈祷。

面对这样一封信，戈森束手无策。他无钱可寄，也没有多大的希望攒足够的钱把他们接到南非。结果，他写给家里的信越来越少。常常一年只有一两封，里面有时候夹点钱。1939年战争爆发之后，再想给妈妈写信已经为时太晚。用不了多久，就该给死者做祈祷了。

5 问 题

戈森从未变成雷勃想象中的富人。起初，在这座传说中连大街都是黄金铺就的城市，我们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城里工人失业，农村连年饥荒。干旱，牲畜得病，管理不善，迫使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和贫穷已极的黑人争抢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作。



戈森、罗斯、谢瓦,摄于1932年

希特勒上台之后,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在马兰^①的领导下,公开和纳粹勾结。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又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把经济萧条完全归罪于黑人和犹太人。马兰说,必须禁止犹太人参加商业活动。如果南非白人在商业领域没有竞争力,“穷白人”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必须阻止移民。当犹太人占人口4%(南非官方的统计数字是占白人人口的4.52%)的时候,势必生出一个“犹太人问题”。

“这次,我哪儿也不去了,”戈森对谢瓦说。“哪儿都一样。老家是‘立陶宛人的立陶宛’。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结果连立陶宛人的身份也没有。我们逃离奥萨卡,因

^① 马兰(1874—1959):南非总理(1948—1954),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致力于实现南非独立。

为他们对着犹太人的模拟像开枪。逃到这儿,什么黑衫党^①,灰衫党又褻渎犹太人的教堂,叫嚣不准犹太人移民。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犹太人问题’,可是解决的办法在哪儿呢?”建立自己的国家!长大之后,我和爸爸争论。乌托邦的空想。他总是这样说。

父母亲和我跟姥姥一家住在一起。姥姥还有两个儿子——伊特兹和希勒。他们俩在城里开了一个成衣铺。姥姥的小女儿叫荷达,也是裁缝。我和姥姥特别亲,管她叫包比。我们俩住一个房间。我和荷达处得也非常好,从来不叫她姨妈。我们住的地方离一个很大的矿山废石堆不远,一到爱刮风的8月,屋子里,甚至人身上都是沙土。老家的斯维特河和散发着树脂清香的松树林、白桦林虽然在那个遥远遥远的世界,但是对于我来说,远比我们生活的这个满目矿坑的郊区更真实。

给我讲讲老家的事儿吧,我经常这样请求。他们讲述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描绘石子铺成的马路两边那一座座低矮的木屋、市场、把小镇分成旧扎戈和新扎戈的斯维特河、米尔山、森林,还有最让人难以忘怀的纳瑞斯金公园。那是情人幽会的地方,也是让人伤心落泪的地方。戈森讲老家,谢瓦唱老家。她的歌仿佛包容了小镇的所有生活:在雪地里赤脚走路的孤儿;父母双全的孩子们在拉比家壁炉旁边反复地念希伯来语的字母;父亲远走他乡去谋生,把妻子儿女留在家里;妈妈等待儿子的信;寡妇摇晃着摇篮里的孩子,答应给他买葡萄干和杏。谢瓦唱“Rozhinkes mit Mandlen”的时候,戈森总是喃喃着说,真是雄心勃勃。还有的歌唱犹太人遭受的迫害,被烧

^① 黑衫党:前意大利法西斯组织。

毁的村庄,以及四处流亡的苦难。但她最喜欢唱的是一首关于一对不幸的恋人的歌:

*Vie ken ich in finstern vald ,
Fargessen die liebe zu dir ,
Dermon ich mir dein geshtalt ,
Ervekt zich a veitik in mir...*

大意是:

在这片昏暗的树林里,
我怎能忘记你。
你的容貌在我心底萦绕,
唤起我痛苦的记忆。

父亲唱歌总跑调,但喜欢背诵诗歌:工人建起高楼大厦,自己却住在贫民窟里;裁缝给富人缝绫罗绸缎,自己却穿破衣烂衫;农民整日在土地上辛劳,自己却填不饱肚子。他最喜欢的一首诗让亚伯拉罕姆·雷森谱了曲,广为传唱。这个雷森和我外祖父家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姓相同。那首诗的大意是,有一个人不知道该拿什么衡量自己的一生。富人用钱计算他度过的岁月,快乐的人用喜悦计算流逝的时光。如果悲伤是衡量他生命的尺度,那么他一定已经很老很老;如果幸福是他生命的标志,他还没有出生。

*Eih leben heist laiden , dan leb ich shein lang
Dan hob ich genrug shein die yahren ,
Eib leben heist heren fun glick chotz ein klang*

Dan bin ich noch gornisht geboren……

后来我常常想,他们为什么那样思念故乡?不过当时,只有那些故事、诗歌和歌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很久以后,才想起这个问题。

也有欢乐的歌。许多年之后,我们到扎戈寻访纳瑞斯金公园的万人坑,回来的路上,雷勃的遗孀就给我们唱了这样几首歌儿。“活着的人还要好好地活下去,”她说。“否则那些与我们为敌的人就是胜利者。你知道那首唱猫的婚礼的歌吗?”

他们给我讲了许多故事。有一个女人叫罗莎。她生了一个私生子,被人抢走之后,可怜的罗莎成了疯子。还有一个名叫贝纳的罗锅,一直是下流笑话的主角。叶克柯是个复员回乡的战士。他在胸前挂了许多金属片、破布条、纸片,说那是他得的“奖章”。

“大多数人的生活面儿都十分狭窄,思想被束缚的程度也很严重,”戈森经常对我说。“对不随波逐流、循规蹈矩的人,对行为偏执、狂放无羁的人,不能容忍。”不过有时候,对自己出生之地的骄傲之情,冲淡了对故乡人的批评。他常常如数家珍般地念叨扎戈出的作家的名字:阿夫拉姆·扎克斯,叶果夫·迪尼森,斯缪尔·加扎戈,叶赫斯娃·马加赫,还有雅里叶,本杰明和约瑟夫·曼德尔。此外,还有不少科学家、学者、教育家。在他的这张“名单”上第一个人是西德尼·赫尔曼。1906年,赫尔曼19岁因为革命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他移民到了英国,后来又到了美国,在那儿成了著名的工人领袖。“我们还有几位颇有名气的犹太学者,比如萨拉特,”他总是有点儿勉强地补充道:“当然还有别人。”

6岁时,妈妈生了小弟弟,于是我的故事来源之一被切断了。去,找姥姥去。妈妈常常这样说。我便跑到厨房,姥姥一边做饭,一边讲老家的生活。春天,斯维特河漂着刚刚开始融化的冰凌;夏天,森林里,长着各式各样的浆果。她告诉我哪种能吃,哪种不能吃。姨妈荷达,是另外一个讲故事能手。她讲的故事引人入胜,难以忘怀。给我修补裙子的时候,她常常取下衔在嘴唇间的别针,讲起纳瑞斯金家族的故事。纳瑞斯金是家在外地的俄罗斯地主。每逢夏天就来扎戈的庄园消夏。那些故事虽然讲过许多遍,但我还是兴致勃勃。“给我讲讲伯爵夫人和她扔糖果的事儿吧,”我经常这样求姨妈。

于是荷达清清嗓子,摆出一副说书人的架势,说:“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俄罗斯将军。叶卡捷琳娜一世^①对他非常宠爱。为了表彰他的忠诚和对皇家所做的贡献”——我那时候年纪太小,对这几句话半懂不懂——“叶卡捷琳娜送给他扎戈一座美丽的庄园。将军死后,庄园就留给他女儿的儿子纳瑞斯金伯爵。从那以后,这座庄园就成了纳瑞斯金家族的财产。他们豪华的住宅环绕着美丽的花园和森林。有一部分已经对扎戈的居民开放,直到现在,每逢安息日,人们还到那儿散步游玩。”

“公园里有秋千、滑梯和大转盘吗?”我问。其实我早就知道姨妈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听过这个故事,可还是希望这些最基本的设施会突然出现在她的故事里。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公园,”荷达耐心地解释道。“更像一

^① 叶卡捷琳娜一世(1684—1727):俄国女皇(1725—1727),原为立陶宛农家女,被俘入俄国后为彼得大帝第二个妻子,在位时建立最高枢密院。

座非常大的花园,或者一片森林。夏天刚刚开始,纳瑞斯金一家人和他们的朋友、仆人坐着非常气派的马车,来到扎戈。小镇里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伯爵夫人朝人们招手,还从车窗大把大把地扔出糖果。糖块外面都包着好看的花纸。我们这些傻乎乎的小孩子就冲过去捡。就像南非的黑人小孩一样。”

谢瓦从来不承认自己也干过这种丢人的事儿。“我的父亲,”她说,“花满枝头的时候,经常租伯爵家的果园。那时,我们便整整一个夏天住在果园的棚屋里,帮雇来的工人摘果子。扎戈的樱桃在整个立陶宛都很出名。父亲就把水果运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大一点的城市去卖,再买回日用品,卖给农民。”

“像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一样,立陶宛犹太人也永远只能是‘中间人’,”舅舅伊特兹插嘴说。舅舅和爸爸跟我说话时,从来不用居高临下的口气。他们认为一个6岁的孩子应该知道这些事儿了。“在大多数地区,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只能租人家的地。”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姥姥连连点头。虽然我还小,不大懂事儿,但也看得出,老太太对她的大儿子非常赞赏。“这样一个聪明人,”私下里,她经常在我俩的房间里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能干成一番大事业。”

“再给我讲讲老家的事儿吧,”我常常没完没了地缠着她。

“那时候的日子很艰难,”她叹了一口气说。“可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总是快快乐乐。你姥爷阿夫罗姆死的时候,我才40岁。一个人要拉扯7个孩子。就像谢瓦说的那样,阿夫罗姆夏天租伯爵的果园,我们就在星光下睡觉。附近的农田飘来阵阵干草的清香。有一年夏天,”姥姥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伯爵骑着他那匹白马到果园里看你姥爷。他看着我,脸

上露出和蔼的微笑,用俄语跟阿夫罗姆说了几句什么。‘他说我娶了个漂亮的妻子’,后来阿夫罗姆对我说。‘他要是再来,你就赶快藏起来。你可不知道这些贵族是些什么玩意儿。’”

“他后来来过吗?”我问。

“没有,”姥姥说。她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说,一位王子爱上一个非常朴实的农村姑娘,赢得了她的爱情。可是后来,为了一个美丽的公主,抛弃了她。



20年代摄于纳瑞斯金公园

“你姥爷,”有一次戈森对我说,“还有一个雅号——‘黄瓜大王’阿夫罗姆。他除了租果园,还从伯爵那儿租了一块地,雇当地的农民种黄瓜。然后就到市场上去卖。就像伊特兹说的那样,我们犹太人只能当‘中间人’,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

妈妈不高兴地瞥了他一眼。“只有那些傻瓜蛋儿、爱嫉妒的人才管他叫‘黄瓜大王’阿夫罗姆。谁都尊敬阿夫罗姆·雷森,不像——”

“当然，”爸爸又去看他从工人俱乐部借的那张 Forverts，那是美国出的依地语工人报。

“1919年，我们流亡回来，情况就不同了，”姥姥对我说。“阿夫罗姆再也租不上果园和土地了。他只好到大城市贩点儿货，回来卖给农民。他死了之后，愿他安息，你舅舅本兹，也就是你妈妈的孪生哥哥接替他干这活儿，直到他到墨西哥。他从来不写信，这个本兹。也许因为他很小就挑起一副沉重的担子。可总该给妈妈写封信——”

“这是犹太母亲的‘国际歌’，爸爸喃喃地说。

“你有家吗？”我问爸爸，突然意识到，一谈起亲戚，全是妈妈那边的。

“当然有，”爸爸加重语气对我说。“我有母亲，3个弟弟，两个妹妹。我的父亲早就死了。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他们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立陶宛。你奶奶是个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老人。她个子不高，很结实。一双褐色的大眼睛，脸颊总是红扑扑的。她的日子一直很艰难。”

“我爷爷也是为租金辛辛苦苦干活吗？”我其实不大明白租金的意思。但妈妈和爸爸吵架的时候，老是提什么租金、租金。“租金还没交，你怎么能给家里寄钱呢？”妈妈总是这样说。戈森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半晌说不出话来。

“立陶宛在哪儿？”

“立陶宛，”他说，“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个国家。一个小国，过去受俄国统治。”爸爸从来不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我。如果他真的那样对待我，也许我能明白更多的东西。但我总提问题。他的许多答案，是我长大之后才慢慢弄明白的。

俄国，俄罗斯。我认识的人都是从俄罗斯来的。那是他

们称之为老家的地方。冬天,他们在冰冻的河流上滑冰;夏天,到松林里采野草莓和蘑菇。老家,那真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常常在梦中坐着雪橇从高高的米尔山滑下来。可是在这个到处是废矿坑的郊区,我们只能坐在瓦楞铁板上,在散发着刺鼻的气味的矿渣堆上面滑着玩。这儿没有树脂清香的森林,只有黑人的种植园和一条矿泥堆成的大坝。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儿到大坝那面玩,再也没有回来。结果,那儿成了大人们严厉禁止小孩儿去玩的“禁地”,可也变成我们的秘密“娱乐场”。

我们那个郊区只有几条纵横交错的大街。除了桉树,还有几株胡椒树。孩子们经常互相用射豆玩具枪射胡椒籽玩。还有悬铃树,上面挂着豆荚似的树种,人们管那玩意儿叫“痒痒球”。秋天,非犹太教的孩子们拣上一大堆“痒痒球”,把毛茸茸的树种弄到我们的脊背上,齐声叫喊:“犹太佬是布儿什!犹太佬是布儿什!”

“什么是布儿什?”我问爸爸。

“他们说的布儿什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大多数都生活在俄罗斯。如果他们喊你布儿什,不要觉得受了侮辱。我认识的最好的人都是布尔什维克。”

我听不大懂。我想只有犹太人生活在俄罗斯。“这么说,布儿什是犹太人?”

“有的人是,”他回答道。我越听越糊涂。后来,他和伊特兹舅舅讲起这事儿。我听了,觉得很丢面子。

作一个移民的孩子可真难!

“让我看看爷爷、奶奶的照片好吗?”我对爸爸说。我估计他们的照片一定也在妈妈那个鞋盒子里。那里面放着不少深

褐色的照片,妈妈总是小心翼翼放在衣橱最下面,散发着一股樟脑味儿。

“我没有他们的照片。我父母那一代人只有办护照的时候,才照相。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扎戈。”

我瞥了一眼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黄瓜大王”阿夫罗姆放大的照片。爸爸耸了耸肩。我已经开始明白,有的问题很难回答。

不过爸爸拿出几张弟弟妹妹的照片让我看:大妹妹亨克;弟弟雷勃——他们俩的关系很密切;小弟弟斯马尔克,照片上的他才3岁。

没有费沃克和布雷娜的照片。父母的照片大都是在城里沙布赛尔班的照相馆照的。背景死板,但挺优雅。剩下的便是在纳瑞斯金公园里照的。他们都穿着安息日才穿的最好的衣服,神情严肃,面无笑容,呆呆地看着照相机的镜头。

说起家人,戈森眼圈变红,声音哽咽。弗瑞德,我的祖母,在我的脑海里模模糊糊。我只知道她善良,勤劳,圆脸盘,黑眼睛,目光总是那样忧郁。祖父西蒙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更清晰一点儿,不过也许不大准确。他显然个子很高,很英俊,挺像雷勃,只是他满头红发。我想象西蒙一定扎煞着红胡子,有点儿像海盗。我只知道,日俄战争时他到前线打过仗,平常也很少在家。孩子们谁都跟他不亲近。祖父西蒙的事儿,妈妈闭口不谈。爸爸提到他的时候,她总说:“跟一个小孩儿谈他有什么意思。”

我弟弟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姆·西蒙,是根据外祖父和祖父的名字取的。可是人们都叫他亚伯拉罕姆,从来没有人叫他西蒙——祖父这边的姓。他淘气的时候,妈妈常常摇着头说,

真不知道他像了谁。只有一次,我长大以后,姨妈荷达无意中向我透露了这个秘密。

“为什么谁也不愿意提起西蒙?”我问。

“人们说,他有一个立陶宛情妇,”她回答道。“谁知道呢?一定是因为漫漫长途,风雪交加,或者别的什么坏天气,路上太寂寞了,他才带着那个女人。也许她是他的翻译。到别的地方做买卖,你总得懂人家的语言。你知道,他长了一头红头发,”她若有所思地说,似乎红头发可以解释他的劣迹。

在我们老家的村子里,红头发和斜眼、瘸腿一样被人们视为“残疾”。人们常说,她长了一头红头发,要不然挺漂亮。或者,他头发红但脾气好。我父亲的胡子是红的。他的妹妹布雷娜的头发也是红的。亨克和雷勃是黑头发。费沃克和斯马尔克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就不得而知了。

“他是跑运输做买卖的,”我问妈妈的时候,她这样说。“西蒙是个马车夫。他有几匹马,一辆大车,拉人,有时候拉货。从扎戈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大城市。有时候甚至到库宁斯堡。”关于立陶宛情妇的事儿,她避而不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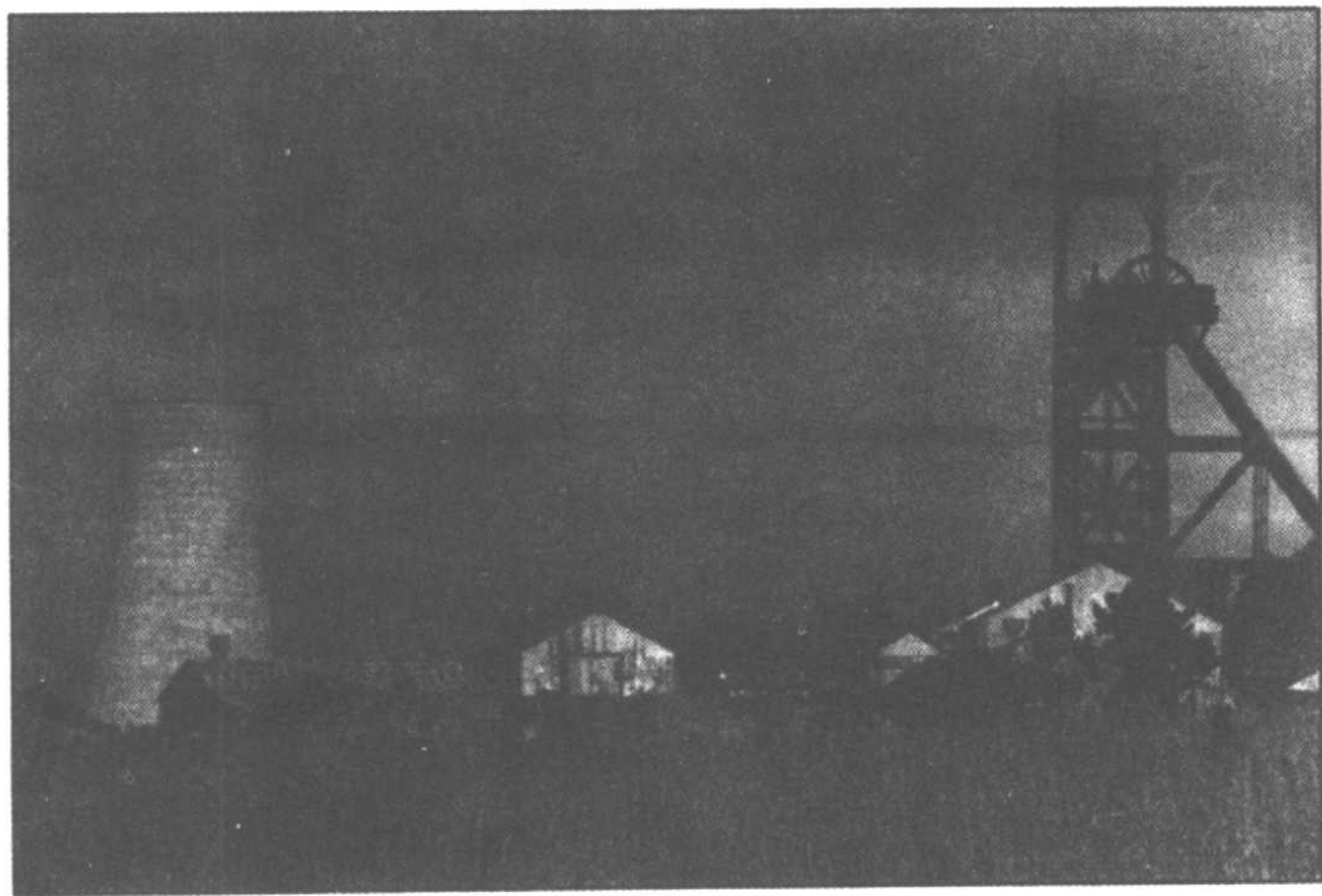
“不管别人怎么说,”戈森说,言外之意,还有关于祖父西蒙的流言蜚语。“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除了依地语和希伯来语,他还能说、读、写立陶宛语、俄语。他在边防哨所和海关帮乘客们填写各种文件、表格,还给他们当翻译。在我父亲那个年代,离扎戈最近的港口是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最近的火车站也有 25 公里,一个叫贝内恩的小地方。1915 年,我们就是从那儿流亡到别尔佳斯克的。”对于立陶宛情妇的事儿,他自然避口不谈。他只强调历史,回避个人琐事。

1992 年,我访问扎戈的时候,走过满目凄凉、寒风横扫的

公墓,寻找西蒙的坟墓。但是,只找到几块歪七倒八的墓碑,上面的碑文早已斑驳不清。还有几座墓冢,连用以纪念的石碑也被当地居民挖走,铺了路,或者派了别的什么用场。西蒙死后也像他生前那样难以捉摸。关于他,再也不可能知道什么了。他似乎最不应该落得这样一个结局——在自己的床上寿终正寝。

6 “德国人来了!”

像从前老家扎戈的文化站一样,约翰内斯堡犹太工人俱乐部也成了许多犹太移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活动场所。尽管俱乐部有明显的亲苏倾向,还是吸引了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移民的生活没有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够艰难的了。在这儿,他



约翰内斯堡矿区的井架

们跟老朋友见面,自由自在地说依地语。如果不听什么讲座,或者参加什么学习,他们就三五成群地去看戏、跳舞、野餐。那时候,犹太人的合唱团名气很大,就连保守的南非广播公司都邀请他们到电台录制节目。他们用依地语唱的《红旗歌》大受欢迎。

戈森和伊特兹都是俱乐部的成员。谢瓦本来是扎戈文化站合唱团的“红歌星”,但到南非后,从来不参加俱乐部的活动。那是年轻人的事儿,她经常这样说。其实那时候她也不过30岁。她聪明,脑子很快,颇有点儿音乐细胞,还是一位天才的滑稽演员,可惜没有什么观众,只有家里人和亲戚朋友对她的戏剧才能略有所知。她完全可能成为一位出色的歌手或者演员。不过人们对她被埋没的天才不像对她的哥哥伊特兹那样惋惜。姥姥总是非常遗憾,云雾遮挡了她想象中的“明星”。

尽管俱乐部交费的会员从来没有超过300个,但是它在犹太人社会,乃至全国的影响,远非这个数字可比。后来,它的成员逐渐融入移居国,成为更大的社会组织的一部分,这种影响也就随之减弱了。移民中的裁缝、木匠、鞋匠和别的手艺人开了小工厂或者小商店,渐渐离开南郊,搬到绿树成荫的城北郊区。在一个社会地位更多地取决于肤色而不是阶级或者文化的国家,犹太人逐渐把南非看作一块充满希望和机会的土地。

还有一些人,政治经验和阶级出身使他们走上新的工业工会的领导岗位。曾经联系紧密的犹太人社会按照阶级阵线重新划分。不过因为是白人,还属于地位优越之列。1939年8月23日,“纳粹—苏维埃条约”签定之后,戈森就不再参加

俱乐部的活动了。对党的路线绝对服从的理想家们，在俱乐部为这个条约声嘶力竭地辩解，戈森听了觉得十分刺耳。戈森和伊特兹以及另外几个老朋友的关系变得冷淡起来。

“斯大林知道他在干什么，”伊特兹坚持说。“只是策略。他在争取时间。”

“他在出卖革命！”

“你太天真了，”伊特兹恼怒地说。“他没有别的选择。西方列强恨不得把他一口吃掉。他跟你我一样，也恨透了希特勒和纳粹。时机一到，他会狠狠打击他们的。”

直到1941年，德国人入侵俄罗斯，他们几乎没怎么说过话。星期日下午，是我们举行“家庭招待会”的日子。朋友们来就着草莓酱喝柠檬茶，一直呆到晚上，吃热腾腾的肉和黑麦面包。他们当中有伊特兹和戈森在俱乐部交的朋友。都是些形单影孤的年轻人，在金矿的租地商场打工。他们住在商店后面黑乎乎的小屋里，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工资却很少。不会当地的语言或者没有手艺的移民，没有多少就业的机会。在老家，他们学的是拉比（希伯来）语，在家里做点儿小买卖。

所谓“租地商场”是矿业公司租给 kafferitniks——这是当地的土语，贬义词。它的意思是“特许权获得者”——的商店。kafferitniks 像剥削矿工一样剥削商店里的打工仔。由于黑人矿工没有允许不得离开矿井，所以他们只能到租地商场买东西。租地商场应有尽有，从自行车、毯子到小首饰、面包。矿工是被囚禁的顾客，店员是被囚禁的雇工。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是 Fanagalo——一种祖鲁语、南非荷兰语和英语的大杂烩。

白人矿工工会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利益不受黑人廉价劳动

力的侵害,不允许黑人做技术工作。黑人大多数是从邻国雇来的合同工,也不能组织工会。他们住在矿区大院里的单身宿舍。白人矿工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房子也是矿上的财产。虽然大家都穷,但白人还是受到优待。

舅舅伊特兹的朋友里有一个人名叫艾赛·H。他在租地商场打了几年工,对那儿的情况了如指掌。就是他告诉了我们黑人矿工悲惨的生活状况。一间什么设备都没有的小屋里挤着 8 到 10 个人。上下床不是木头做的,而是冰凉的水泥台子。要嘛就是 50 到 100 个人住在一间连风雨都遮挡不了的大房子里。什么设备都谈不到,甚至连放他们那点儿可怜的个人物品的地方都没有。盛在一个大桶里的食物糟得不能再糟。他们在井下干很长时间的活儿,但每天只能赚 1 个先令。洗澡的地方只有几个淋浴的喷头,和几个大池子。没有座位,更没有分隔间。人们最后的一点隐秘和尊严也被剥夺殆尽。

由于和矿工接触,艾赛变得非常激进。后来,他因为拒绝为另一位反种族隔离的激进分子出庭作证,而被投入监狱。有的售货员慢慢地自己也攒钱开了小商店。

“和这些可怜的黑人比起来,我们怎能心安理得?”戈森说“雷勃要是在这儿,绝不会袖手旁观。他一定会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

戈森终于放弃了把家人接到南非来的打算。他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在一个种族主义比立陶宛还严重的国家,像他这样拼命挣扎?此外,雷勃不会离开欧洲。他要等待革命的到来。亨克已经结婚,费沃克也成家立业。亨克在里加,费沃克到了沙维尔。最小的弟弟斯马尔克和雷勃一起在理发店干活。布雷娜在一家小工厂当编织工。他们 3 个和妈妈住在一

起。

进入30年代,星期日下午的谈话已经变成谈论犹太人被屠杀、驱逐、砸碎玻璃、污辱神物。客人们讲的犹太人在德国被迫害的情景越来越骇人听闻。每句话的开头几乎都是“德国人……”谁也不去注意,小孩子们正充满恐惧,睁大眼睛,出神地听着。

我无论做梦还是醒着都非常害怕。当然是怕德国人。夜里,我梦见一群群野人挥舞着大棒,砸烂玻璃窗,破门而入。举起刀枪把我们刺倒在地。白天,我在石板路上走的时候,小心翼翼,不踩石板与石板之间的接缝。如果能一直走到家门而不踩上接缝的话,就觉得德国人不会来。仿佛整个犹太村社的命运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的脚底。所以,我一会儿也不敢放松警惕。

我的父母死了好久以后,有一次我碰到艾赛。让我想起童年的一件事。这件事模模糊糊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桓,但总不能清清楚楚想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儿。经他一提,往事如在眼前。他对我说,有一个星期日下午,他到我们家作客,我突然叫喊着,冲进家门:“德国人来了!德国人来了!”

大伙都急忙跑出去,看哪儿的德国人来了。我抱着妈妈不敢出去。

大约离我们家一个街区远,一群黑人正向我们这边走来。他们都穿着长及小腿的裤子,旧汽车轮胎做的胶底鞋,头上裹着扎染印花头巾,一边齐声歌唱,一边踏步前进,手里还挥舞着南非部落用作武器的圆头棒。

“也许是一群矿工,那天休息,”艾赛对我说。“或者是棒子队的队员,去那儿聚会喝酒。谁也不曾想到你已经听说德

国人的事儿了,更不用说那些黑人!”

我想不起那些切切实实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做过的恶梦还记得一清二楚。

恶梦很快就变成现实。1939年9月,战争爆发,移民和欧洲的家人失去了联系。所有通讯联系都突然切断。戈森把先前挂在理发馆墙上的那些展示女人大波浪发型的照片都取了下来,换上一张很大的欧洲地图。他既沮丧又焦急,每天都看着那张地图发愣,计算着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向欧洲推进的速度和路线。

“他们离立陶宛已经很近了,”他报告说。“家里人该往哪儿跑呢?他们怎么才能得救呢?我为什么不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把他们接出来呢?”

后来,有那么几天,他又觉得还有点儿希望,全然忘记头一年对“纳粹—苏维埃条约”的愤恨。1940年6月,传来红军“解放”立陶宛的消息,他感到非常振奋。“他们不但会保护犹太人不被纳粹屠杀,”他说,“我们盼望已久的革命不用流血就来到了。”

“我压根儿就不应该来这儿,”他非常懊恼地说。“雷勃呆在老家没走是正确的。他有信仰。我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可是真正到来时我在哪儿呢?躲在这块陌生的黑暗的土地。”

1992年,我见到雷勃的妻子丽赫,跟她谈起这事儿。丽赫说,要是他真的亲眼看见那场革命,并且经历了后来发生的事情的话,真不知道他会做何感想。

“革命?戈森并没有错过什么。一辆坦克隆隆地开过扎戈的大街。一位俄罗斯军官就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因

为我们家正对市场广场——对已经聚集在那儿的人们说：“你们现在已经是苏联的一部分了。”人们都散了，不知道他们还会有什么新花招。

纳粹占领东欧之后的种种暴行很快就传到西方。集体屠杀，集中营，苦役。大家听了都人心惶惶。戈森看报纸，听广播，一天都不拉。他还经常出入于能够打听到任何一点关于德军后方消息的公共场所。他在理发馆那张地图上推算德军的进程。当他们横扫立陶宛，向东北方向的莫斯科推进时，他急得几乎发疯。红军全线溃退，老百姓完全陷入灭顶之灾。

尘世间的“调查研究”已经把戈森折腾得精疲力竭，但是还不够，他又去求神问卜。铁路那边，住着一个很出名的巫师，名叫瑞特奇太太。约翰内斯堡的人有事儿都愿意找她。从男婚女嫁到流年运气。为这事儿，爸爸和妈妈压底嗓门儿，争论了好几个星期。这当儿，不时冒出瑞特奇太太的名字。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弟弟和我进屋的时候，他们常常马上打住正说的话。我知道什么话题最让父母亲伤心，便尽量忍着不去问这问那。我又生性矜持，即使有机会也不愿意站在门外偷听。

星期三，休息半天，下午所有的铺子都关门。我听见妈妈求他不要出去。

“我的妹妹菲吉塔和她的一家人都在里加。我们心里难道不着急吗？”她说。“可是我们从来不求神问卜。”

谁说我们不求神问卜呢？他们可是姥姥寸步不离的伙伴。他们在她梦里出现，给她出谋划策，劝她谨慎从事。就连送煤工人少给她送一袋子煤，她都拿神鬼诅咒他们。但她认为，孩子们不该和神鬼为伴。晚上我打口哨或者坐在桌子上

摇晃两条腿的时候,她就命令我赶快停下。因为这样会招来鬼。于是,我故意在半夜三更吹口哨,没招来鬼,只是把狗给叫来了。

那时,我对瑞特奇太太的职业一无所知,因此见妈妈那么着急,大惑不解。爸爸走了以后,妈妈压低嗓门儿和姥姥说这事儿,姥姥只是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

几个小时之后,戈森回来了。他脸色苍白,心烦意乱。妈妈扶他上床,把我和弟弟赶了出去。我在他们卧室的窗户外面徘徊,努力克制着心里的焦急。

“让你别去你非要去,”她似乎非常沮丧,正不高兴地质怪爸爸。“都是胡说八道。人死了就死了,有什么灵魂!过去你不是总嘲笑我妈是迷信的老太婆嘛!那个瑞特奇怎么能知道你叔叔的名字?还不是她施了催眠术,你自个儿说出来的?这些巫师有的是让你开口的办法。”

“我什么也没有对她说,”爸爸有气无力地说。“她把我领进一间黑屋子,我们一起在一张圆桌旁边坐下。她不吱声,我也不吱声。过了一会儿,她便鬼魂附体,口中念念有词。不过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听到了别的声音,感觉到空中有什么在不安地骚动。她叹了一口气,呻吟着,似乎用手挡开什么东西。我记不得过了多长时间,自己也仿佛进入催眠状态。口干舌燥,心怦怦地跳着。胸口和胳膊都很疼,连气也喘不过来。又过了一会儿,她才从昏睡中清醒过来,看起来精疲力竭,用颤抖的声音说:‘本杰明在哭泣,他给你捎话来了。都是坏消息……’”

“拿水来!”妈妈喊道。“快点儿!妈妈!他晕过去了。”

我坐在窗户下面哭,吓得连动也不敢动。过了好长时间,

终于听见爸爸的声音。

“家里的人都完了。一个不剩。”他断断续续地说。“……死得很可怕……满街是血。”

“你们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住在扎戈。你母亲写信说，亨克已经嫁人，住在里加。费沃克一家住在沙维尔。瑞特奇太太根本就不知道她在胡扯些什么。好好休息吧。别信那些鬼话。她也许是个反犹太人的家伙，知道说什么最能伤害你。”

这天夜里，父亲的心脏病第一次发作。

他的病刚好，姥姥就催他借一笔钱，到“好一点”的郊区租房子住。“我们的邻居差不多都搬走了。女儿眼看长大了。她必须认识些有教养的犹太小伙子。不能成天跟我们这条街上那些野小子爬树，上房，到矿坑里疯跑。你知道会出什么事儿的……”

爸爸在保持自己的傲骨和女儿的堕落之间做了一番权衡，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借了一笔钱，在约翰内斯堡东北的郊区租了一幢橘黄色的砖房。我们在那儿没住多久，妈妈一位表姐来信说，德班^① 市区有一个小咖啡馆，用不了多少钱就能租下来。快来吧，她催促我们。德班的商业很发达。现在市里熙熙攘攘，尽是海员，正在准备到各个战争舞台去“表演”。

“贪得无厌！”爸爸说。不过他还是带着妈妈和弟弟去了德班。我和姥姥还有伊特兹舅舅呆在约翰内斯堡。那时，荷达已经结婚，希勒舅舅搬到了比勒陀利亚^②。我不愿意离开朋友们，也不想中断学业。

^① 德班：南非（阿扎尼亚）东部港市。

^② 比勒陀利亚：南非（阿扎尼亚）首都。

“我在这儿为好一点儿的生活奔走，别人却在死亡，”戈森从德班写来信说。“真是莫大的讽刺！现在我要是有办法把他们接到南非该有多好。可是只有上帝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再也没有提起过瑞特奇太太。

他还在地图上计算战争的进程，还不停地给红十字会和别的组织写信。可是他们的回答都一样，根本没有办法从敌人占领的欧洲打听到任何消息。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同盟国披露了纳粹惨绝人寰的暴行。关于死亡集中营的第一批电影到达了南非。敌占区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已经无可怀疑。

这时，我的父母和弟弟已经从德班回来。戈森坚持要去看那些电影。“我也许能认出几个从前的熟人，”他说。“认出熟人？”谢瓦说。“你的心脏病又该犯了。”但他坚决要去。弟弟太小，当然不能让他看那些可怕的场面。我好说歹说才得到允许，跟他们一起到地区电影院。

整整一个半小时，我们坐在那儿一声不响，一动不动，仿佛冻成了一块冰。死亡营一座接着一座。毒气室外尸体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匆匆挖成的万人坑里，横七竖八全是死尸。幸存者瘦得像骷髅，神情惶惑，在解放他们的士兵中间拖着脚慢慢地走着。大眼睛目光呆滞，视而不见。他们太虚弱了，连高兴的力气也没有。我们一声不响走出电影院，相互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你不应该来，”戈森对我说，往嘴里放了一粒药。“我跟你不一样。我必须知道。”

“我也必须知道！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我已经 17 岁了。”我愤怒地绝望地抽泣着。“不要总护着我。像我这样大的时候，你已经养活一家人了！”

放弃寻找家人之后，戈森连体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的体重增加了，脸也胖了，走起路来动作迟缓，小心翼翼，好像每迈一步都要试探试探脚下的地结实不结实。他似乎总是屏着呼吸，压抑着随时可能爆发的悲泣。就在他渐渐开始习惯这种令人肝肠寸断的痛苦的时候，戈森听到了关于家人悲惨命运的更多的消息。

战争结束几个月之后，父母亲的一位老乡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从意大利难民营来到南非。他们是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获得自由的头几个月，他们逢人便讲自己的悲惨故事。有一个星期日下午，他把那个可怕的故事讲给了我们。

临近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从扎戈搬到沙维尔。那个地方离扎戈 70 公里远，城市的规模大一些，孩子们受教育的条件也要好一些。德国人占领沙维尔之后，把老人、病人和孩子们统统杀掉。把剩下的犹太人关到隔离区，身强力壮的男人和女人做苦役。1941 年 10 月末，多维德——那位父亲——正在修理隔离区的围墙，先前在扎戈认识的一位农民从他身边走过，悄悄地说，扎戈的犹太人都被杀了。

当时，多维德觉得他的话不一定可信。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沙维尔隔离区的犹太人都被送到死亡营。女儿和他的妻子、儿子和他分别被送到两个集中营。经过几个月的恐怖、折磨和饥饿之后——那人详细描绘了死亡营令人毛骨悚然的苦难——他们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在难民事务所的帮助之下，一家 4 口终于团圆。

离开立陶宛之前，他们去扎戈寻找亲戚朋友，可是只见到四五个犹太人。他们是在德军入侵之前逃到俄罗斯，才幸免于难的。战后，他们回到扎戈，从充满敌意的邻居手里要回自

己的房屋。那个农民的话得到证实：小镇的犹太人都被杀死了。他们告诉多维德，德军占领扎戈前一天晚上，镇子里乱作一团。俄国军队撤退了，立陶宛国民军开始大显身手，他们关闭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之间的边防关卡，切断了犹太人的逃路。这之前两天，雷勃和丽赫开着一辆大卡车从沙维尔来到扎戈，准备把两家的亲属都接到拉脱维亚，然后从那儿再跨越边界，到俄罗斯。

镇子里有些老年人一直指责雷勃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你又制造紧张空气来了。”他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见过德国人。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他们认为雷勃相信的那些俄罗斯人才烧杀抢掠。他们威胁雷勃，如果不马上离开，就把他送到立陶宛国民军。他们还不允许雷勃把自己的家人和丽赫的家人带走。他们说，如果那样，就会搞得人心惶惶。

国民军允许雷勃和丽赫离开，但是不能带家人。多维德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人世。他只知道，扎戈的犹太人都死了，埋在纳瑞斯金的万人坑。谢瓦姐姐一家已经到了里加，他们的情况，他一无所知。他说，活下来的人现在都住在考那斯和维尔纽斯这样的大城市。

这天晚上，戈森的心脏病又发作了一次，在床上躺了整整6个星期。虽然想到最终“抛弃”家人的是雷勃，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稍稍的宽慰。

几个星期之后，母亲的姐姐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因为地址没有写对延误了一些时间。她说，他们一家人都活着。他们乘最后一列火车离开里加。她和丈夫在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度过战争年月，3个孩子都参加了红军。现在他们住在维

尔纽斯。因为她是凭记忆写这封信的,所以不知道妹妹一家能否准确收到。

希望又从戈森心底升起。他躺在病床上给他们写信,问他们见没见过他家里的人。见过,她回答说。雷勃的遗孀和他们的孩子。短短几个字概括了这一场悲剧和残存的一丝快慰。

总算联系上了。他的弟媳丽赫从维尔纽斯来信了。“我们像你们期望的那样一切都好……”那是因为我们的期望不高。从扎戈逃出来之后,她和雷勃一直在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避难。1942年,雷勃参加了红军立陶宛16支队。1943年,在奥廖尔^①前线战死。战争结束之后,她带着雷勃没有见过的孩子回到维尔纽斯。

戈森现在终于知道全家人的命运了。他至少能够为他们哀悼了。

戈森和丽赫的通信联系一直持续到1961年戈森去世。我从来没有打听他们通信的内容。战争结束之后,我下定决心和过去,和老家的小镇,和千百年来的苦难、压迫割断联系。我再也不唱关于孤儿、饥饿的孩子、被烧毁的村庄、被遗弃的家庭、被剥削的工人的依地语歌曲。我参加了左翼犹太复国运动。我们只唱两首歌:《国际歌》和《希望》。我们歌唱让荒漠开遍鲜花:歌唱过一种白天劳动、傍晚唱歌跳舞的新生活。那生活也许不无艰辛,但也充满快乐。在我们那个基布兹:以色列合作农场。我和我的同志们丢弃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变成工人。我们没有私有财产,我们建立了一个充满活

^① 奥廖尔:苏联西部城市,在莫斯科之南。

力、处处表现出道德之心的社会，希望它成为样板，在全世界推广。一个人 18 岁的时候，似乎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戈森对犹太复国主义十分反感。

“我们要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建立家园，”我对他说。“以便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发生……”

“现在已经在巴勒斯坦居住的阿拉伯人怎么办？”

“我们并不想取代他们。我们可以在一个双民族的国家跟他们和平共处。”

他总是说：“乌托邦的空想。”

我用尽量轻松的口吻说：“为了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总得有人去斗争。一个叔叔在战争中死了，另外一个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你迷失了革命方向。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人了。”

可惜我们这一代人也没能干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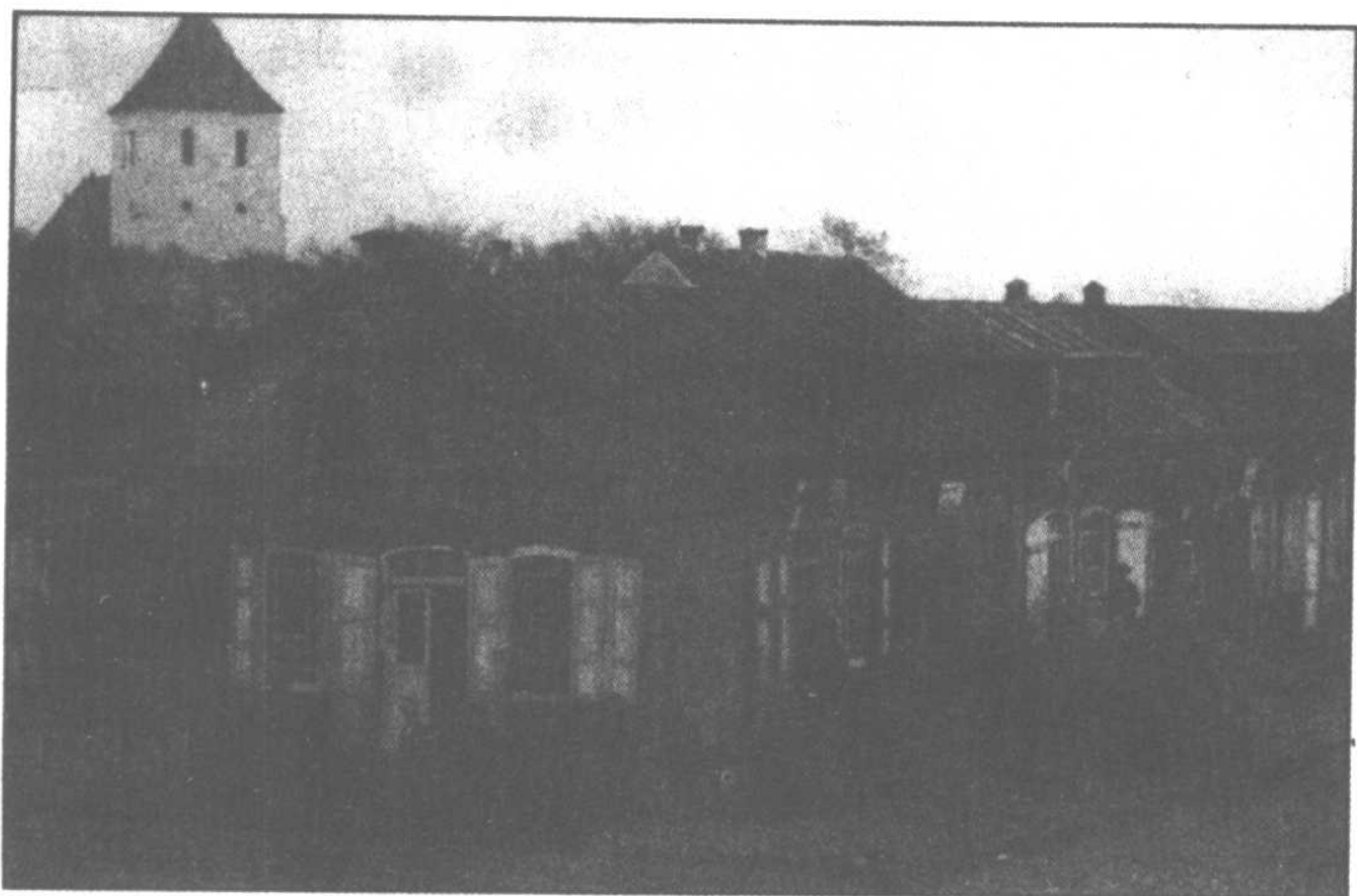
我在以色列呆了 3 年，又回到南非。过了几年，雷勃去世。他不在人世之后，我仍然和雷勃的妻子丽赫，和我的堂妹弗雷达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但是对她们的生活情况知之甚少。她们的信讲述了一个并不轻松的故事。我从照片上看着弗雷达长大：一个穿着校服的可爱的小学生，一位列宁格勒的大学生，乌拉尔的一位女演员，维尔纽斯的一位文化工作者。结婚之后，她生了一个孩子，棕色的大眼睛，像弗雷达，也像雷勃。我们谁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见面。

第2部

7 回 家

好多年以来。我就一直想回老家看看。我的祖先繁衍生息的地方,早已变成铁幕背后的一座坟场。可是1991年立陶宛独立之后,踏上那块土地不仅成为可能,而且那是我一定要回去的“家”。在那里,还有未曾安息的灵魂需要我抚慰。要是妈妈还活着,她一定会说:“别信神信鬼了,瞧你爸爸求神问卜,问了个什么下场。”不过,尽管爸爸因为听信巫师的话,好长时间痛不欲生,他还是明白应该去告慰那些饱受磨难的亡灵,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姥姥经常警告我,不要在天黑之后吹口哨。她对神灵总是毕恭毕敬。现在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处——我在黑暗中吹起了口哨。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了衡量一切暴行的标准。许多年来,我对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压迫剥削进行斗争,但都没有



20 年代扎戈的市场广场

成功。我终于对看起来似乎坚如磐石的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彻底绝望,1988 年移居澳大利亚。18 个月之后,尼尔森·曼德拉被释放。那是一个让人欢欣鼓舞的时刻,但是激动之余,我的心里又感到无限遗憾。和父亲一样,我又和为之奋斗多年的胜利失之交臂。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没能身临其境。

弗雷达听说我们离开南非,非常高兴。她写信说,现在我们可以自由通信了。她怂恿我去立陶宛。跟她一块儿去扎戈。我会去的,我告诉她。但是我首先得把从童年时代起听的那些故事、神话和民歌从“事实”中分离出来。我要先到纽约和耶路撒冷的档案馆查阅当年的档案。

我给纽约 YIVO 写了一封信。关于东欧犹太人历史的材料大部分集中在这里。档案馆负责人很快回信告诉我,从 1919 年—1925 年扎戈的档案材料,他们就有 15 个卷宗。我到纽约之后,随时可以查阅。耶路撒冷 Yad v'Shem 保存的材料更多。他们有许多大屠杀幸存者证词的微缩胶卷,但是我

必须花时间寻找和扎戈有关系的东西。他们还告诉我,这些目击者的证词都是用希伯来文或者依地语写的。而这两种语言我读起来都很困难。

我在准备这次旅行的时候,读了一些关于立陶宛和犹太人历史的书。我还开始和以色列、南非,以及澳大利亚的“老乡”联系。戈泰和杰克·特拉贝克老夫妇是我们家在澳大利亚的朋友。我把回老家的打算告诉他们之后,杰克拿出他和姐姐20年代在扎戈拍的一些照片。

影集里面那些深褐色的照片把我带入另外一种现实。这些照片和母亲放在衣柜里那个散发着樟脑味的鞋盒子里的照片有很大的不同。母亲的照片都是穿着最好的衣服在照相馆里拍的,或者是年轻人们坐在纳瑞斯金公园的草地上,摆出种种姿势拍摄的。全然不知,那芳草青青的土地将是他们的坟墓。

看杰克这些照片的时候,从童年时代起便被神话和思乡之苦缠绕的种种幻想突然烟消云散:人们穿着普普通通的衣服,站在狭窄的店铺或者房屋前面;挤过熙熙攘攘的市场;走过泥泞的大街;跨过斯维特河上的大桥;看立陶宛民族主义者游行。这些人马上就要振臂高呼:“立陶宛是立陶宛人的立陶宛!”还有一张照片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之间的边防哨卡——横在乡村公路上的一根吊杆。1941年,只有那些逃过这条边境线的人才有可能幸免于难。

我夸奖这些照片拍得相当不错。杰克告诉我,他跟城里一位名叫沙布塞尔班的摄影师学过徒。杰克生长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但是麻烦事也不少。他的父亲是个商人,慈善家,一直是犹太人社团中受人尊敬的成员,为创造犹太人的家



17岁的杰克·特拉贝克

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家一直是扎戈犹太人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可是母亲患中风之后，不幸的阴影就一直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他母亲温柔美丽，得病时年纪尚轻。祸不单行，时隔不久，20岁的小弟弟死于非命。杰克的姐妹后来都到了巴勒斯坦。他于1927年来到南非。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找不到工作，只能到矿山的租地商场打工。只有弟弟梅伊尔和老父亲留在立陶宛。

杰克让我看梅伊尔和他3个姐妹的照片时，老泪纵横。还有一张照片是他自己，下巴下面夹着一把小提琴，目光迷离，仿佛在如诗如画的梦中。

“1941年，德军占领扎戈前，”杰克说，“梅伊尔的朋友们催促他和他们一起骑自行车往国境线那边跑。可是梅伊尔不忍心扔下年迈的父亲，结果和乡亲们一起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

“一提起扎戈，他就激动得要命，”戈泰悄悄对我说。我还

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戈泰和她家里的人。对于我来说,她的家几乎就是我自己的家。我第一天上学,就是戈泰的妹妹露茜送到学校去的。因为妈妈英语太差,怕丢面子。

“我还会来看你的,”临走的时候,我对杰克说。“关于老家和这些照片,我还有许多问题要问。”

遗憾的是,再也没有下一次了。杰克已经80多岁,几个星期之后就去世了。戈泰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扎戈,小镇的情况知道得很少。我由此认识到,要想从过去挖掘点什么,必须赶快行动。知情人都年事已高,有的人对过去的事情已经忘了十之八九,有的人正命归黄泉。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材料可以以后再看。

南非可以说是立陶宛犹太人的第二故乡,从那儿开始我的探寻自然是合乎逻辑的。我也特别想回“家”一趟,和朋友们一起欢庆种族隔离的结束,亲眼看一看一个新社会的开始,但是又不愿意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出现在大伙儿的面前。和长时间流亡在外,终于回到家乡的人不一样,我不知道家在哪儿,他们却肯定知道。然而,对于流亡的日子比在出生国呆的时间还要长的人来说,“家”又意味着什么呢?面对索维托、约翰内斯堡和尼尔斯普鲁特,他们会有家的感觉吗?

到南非之后,我开着汽车驶过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和我的孩子们长大的那所房子。往事如在眼前,感情的浪花在心中奔涌。可是仅仅靠砖石和沙浆构筑不成一个“家”。凄清婉转的歌声,缠绵悱恻的故事,叮咚的吉他,草原的霜花,连绵逶迤的小山,尘土飞扬的矿坑,才是家的全部含义。我并不是第一次这样绞尽脑汁探寻“家”的含义。你出生并且长大的地方就是你的家吗?因为你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明媚的阳光,美丽

的晚霞,它就是你的家吗?或者离开之后,让你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你的家吗?

现在我要寻觅的是父母的家,是他们在立陶宛小镇里的生活,而不是我在约翰内斯堡郊区的生活。我用杰克提供的照片“武装”着,希望能激起哪位“老乡”的回忆,得到我一直不曾问过他们的那些问题的答案。我访问了一对年老的夫妇。他们都是我父母亲的“老乡”,现在在养老院里苦度残生。

“这是德国人的啤酒厂,”老太太指着一张照片说。照片上有一幢都铎式的建筑,前面站着一群人。

“不对。这是纳瑞斯金伯爵的宫殿。”

“宫殿?瞧你说些什么呀!纳瑞斯金的宫殿比这个大5倍。这幢房子如果不是啤酒厂,就是伯爵仆人们住的地方。”

“把放大镜递给我,”老头说,“这个梳辫子的姑娘像我的堂妹布鲁希克。”

我给拉希尔打了个电话。上学时,她跟我是好朋友。她的父母亲都是约翰内斯堡扎戈犹太人圈子里的活跃人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不要失望,”她安慰我。“我还认识几个‘老乡’,他们对扎戈了解的情况比较多。我父亲临死前还写过回忆录。你哪天过来喝茶。”

“我和另外一个女人?”我想起我们两家过去经常说的那个笑话。

拉希尔已故的母亲名叫恰娅·费德勒。她是诗人,非常聪明、幽默。许多年以前,她去看我母亲,“谢瓦,”她说,“我又热又累又渴,”她一口气喝完妈妈给她倒的茶,又把杯子伸到妈妈面前。“我觉得我简直成了另外一个女人,”她说。“现在,

再给另外那个女人倒一杯茶。”

如果恰娅在世，她一定会给我讲许多关于扎戈的事，不遮遮掩掩，不隐瞒缺点。我要是有兴趣，她或许还会讲讲祖父西蒙的故事。4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搞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你还记得卢巴吗？”拉希尔说。她又向我提供了未来几个星期我应该接触的人的名单。“她和她家里的人虽然被关进集中营，但幸免于难。她或许因为那时候年纪太小，不记得多少扎戈的事情，但她的朋友很多，有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一定能给你介绍好多‘老乡’。”

后来，卢巴的父亲多维德给我们讲了雷勃试图营救家人，结果没有成功的事情。

分手的时候，拉希尔给了我一本她父亲写的回忆录，那里面有许多记述扎戈生活的内容。

卢巴热情，好客，但是对扎戈的事知之甚少。她告诉我，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家就搬到沙维尔了。

“但是，以色列有我一位朋友，她和雷勃的关系十分密切，”她说。“在沙维尔犹太人居民区，她和我们家住在一起。为了振奋精神，我们经常回忆过去美好的事情。她便给我们讲雷勃的故事。”她看了看手表。“现在正好给她打电话。”

过了几分钟，我便和雷勃这位朋友通了话。她的名字叫米尔克。

“雷勃·约费！”她在电话那边喊了起来。“你是他的侄女？他可是我的情人！”

我告诉她，几个星期之后，我就到以色列寻找“老乡”，还要到档案馆搞点儿研究。

“一定来看我。卢巴会把我的地址给你的。”

我非常高兴。对于我那位捉摸不定的叔父，还有谁能比他的情人更了解，更拥有一份美好的记忆呢？

卢巴还建议我去找曼克斯·B。我记得他是我们家的常客。

“时间过得真快呀！”当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曼克斯激动地说。“前几天，我还想起戈森来着。”

可惜我们不能见面。曼克斯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开普敦。我们在电话上谈了好长时间。他回忆起在梅凡尔度过的最初几年的情景。那时候移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可是后来，有的人平步青云，带着家小搬到条件好一点的郊区，有的人还呆在原来的地方，刚来时那张“关系网”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总是满怀激情，想起从前的好时光，”他说。

“在梅凡尔的时候，”我提醒他，“从前的好时光是指在扎戈度过的岁月。公园，米尔山，白雪，野草莓，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那时候的梅凡尔，日子并不好过。”

“是啊！这就是人类的一大弱点，总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我对父亲家里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死的时候遭受了哪些苦难？”我问。

“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1919年，我们流亡回来没多久，就离开了老家。尽管我和戈森关系不错，但很少去他家。他们家的其他成员我都不认识。连雷勃也不熟。他比我一定小七八岁。我最小的弟弟斯罗莫和他很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俩在一个部队。他不但知道他活着时候的情形，还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父亲一定知道雷勃是怎么战死的。可是，后来我不愿意

再刨根问底，惹他伤心。那时候似乎没有时间为过去哀悼，新世界亟待我们去建设。

曼克斯把他弟弟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我。他向我担保，斯罗莫一定愿意把雷勃的情况告诉我。

有两个和雷勃密切相关的人物等着我，我巴不得马上飞到以色列。那是另外一个我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可是在南非，还有几条线索需要我去挖掘，还有几块东西需要缝缀到我那床千补万衲的“百衲被”上。有的可能又短又宽，有的可能又长又窄。它们也许形状不同，质地各异，颜色也千差万别，但是，那是我在那个混乱时代所能找到的唯一的“材料”。

阿达·斯特拉尔是我要探索的“源头”之一。我的舅舅伊特兹钱夹里一直夹着她的照片，直到她嫁了别人。

阿达自从丈夫去世之后，一直跟女儿住在一起。几天之后，我在她女儿家见到她。“已经有多少年了？雷扎拉！你长大以后，我就一直没见过你。”

相互谈了这些年的情况之后，阿达告诉我，1960年，她和丈夫、女儿回过一次扎戈。

“我们坐汽车从里加到扎戈，不过两个小时的路程。可是小时候，觉得远在天边。”

他们先到旧扎戈的公墓，在无人照看、破败不堪的坟堆中，找到朱利尤斯的母亲和哥哥的坟墓。他们是大屠杀前去世的。然后驱车到纳瑞斯金公园。苏联政府已经在那儿为“3000位苏维埃公民”立了那座纪念碑。

“注意，不是犹太人，而是苏维埃公民。可他们因为是犹太人才被屠杀的！”阿达气愤地说。

“听说战后有俩家犹太人又回到扎戈——兹洛特一家和

贝特勒一家。这两家的男人都在红军立陶宛第 16 支队打过仗。其中一位后来还当了扎戈的镇长——一座死了 3000 个犹太人、到处都是心怀敌意的立陶宛人的小镇的镇长。这真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满脸不高兴的人们指给我们兹洛特的小铺。他的妻子正在门廊站着。看见朱利尤斯——你知道，他西装革履，雪白的衬衫，漂亮的领带，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南非人——高兴地喊了起来：‘啊！斯特拉尔！你们是从旧扎戈来的？’她关了店门，把我们领回新扎戈的家。贝特勒一家也来了。我们坐在桌子旁边，一边喝茶一边吃草莓蜜饯。他们讲扎戈犹太人受难的经过。”

阿达告诉我们，德国人占领扎戈之后，启用立陶宛国民自卫军管理扎戈，自己又到别的地方作恶去了，直到 10 月大屠杀才又露面。犹太人被赶到市场广场屠杀，然后埋到纳瑞斯金公园的万人坑。战后回到扎戈之后，兹洛特和贝特勒从当地的立陶宛人嘴里听说大屠杀的事儿，但矢口否认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清白无辜，或者只是奉命行事。有的人干脆说，出事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在城里。“你们怎么还能在这儿生活？”阿达问他们。“这是我们的家，”他们说。“为什么要让他们赶走？”

“我们谈一会儿，哭一会儿，哭一会儿，谈一会儿。男人们一直走到和他们那幢房子相对的斯维特大桥，站在桥上凭吊往事。就在这时，一个穿黑色长裙的立陶宛妇女——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着她的样子——跑到朱利尤斯面前，抓住他的衣领使劲摇晃着，用依地语激动地说：‘你是费佳 - 瑞瓦的儿子！’朱利尤斯不记得这个女人。她说她给他母亲洗过衣服。贝特勒竖起一根手指挡在唇边，示意朱利尤斯不要多说。朱

利尤斯很礼貌地跟她寒暄了几句,对她提出的问题闪烁其词。然后赶快抽身离开大桥。

“越少跟人说话越好,兹洛特和贝特勒告诉我们。他们让我们在他们家过夜。我把朱利尤斯拉到一边,说:‘难道你能在这块浸透了我们同胞鲜血的土地上睡着?’我们在那儿呆了几个小时便回到里加。我整整一夜没有睡觉,给孩子们写了一封长信。我洒在信纸上的眼泪比写的字还多。”

几个星期之后,他们收到前镇长的一封信。他写道,他们离开扎戈的第二天,军警就找他和他的妻子查问“外国人”来访的事儿。他们不是外国人,兹洛特告诉警察。他们就是扎戈人,现在住在里加。是来给他们的老祖宗上坟的。

阿达说:“一定是那个见了朱利尤斯好像非常高兴的女人,跑去报告警察的。她说城里有几个外国人。幸亏我们走得及时,没有惹出什么麻烦。”

我拿出杰克提供的照片让阿达看,可她谁也不认识,哪个地方也辨认不出来。“父母离开扎戈时,我才四五岁。你还记得我那几个奥金家的表姐吗?”阿达说。“丽赫·尤代金,老大,年纪和你的父母亲差不多。她肯定能认出照片上这些人,对戈森家的情况一定更了解。”

她给了我丽赫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替我问候她,”临走时她对我说。“我们也好长时间没有来往了。”

我没有马上去找丽赫。还有些地方要去,还有些朋友要看,还有几座坟墓要祭扫。南非毕竟是我度过大半生的家。家,老家。对于我的父母来说,那是森林,河流,纳瑞斯金公园,脚下咯吱咯吱直响的积雪和再也无法找到的那种犹太人村社的感觉。对于我来说,是南非高原的早晨,莽莽丛林的黄

昏，袅袅升起的炊烟，枝头小鸟的啁啾，长颈鹿，白额头褐翅鸦鹃和一种灰色的小鸟——我终于听懂了它的叫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目击者

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奥金一家许多年都是我们的邻居。守寡的老妈妈热情、朴实。为了拉扯大3个女儿，两个儿子，她放弃了扎戈可能给她带来的一切快乐，背井离乡，来到南非。到南非之前，她从来没看过电影。后来大伙带她到当地一家电影院，看一部描写牛仔生活的故事片。整场电影她一直咳嗽个不停。“都是那些马踢起的尘土呛的，”她说。小时候，我经常去她家玩。我一去，她就拿些精美的小食品给我吃。不过，我只是在她那3个宝贝女儿上班的时候才去。她



20年代的扎戈，立陶宛人为独立举行的游行

们都留着很长的指甲,而且涂得特别红。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怕那些指甲,总觉得它们蘸过鲜血。

我在那座作住所用的旅馆里见到老太太的大女儿丽赫·尤代金。我们俩在客厅握手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看了一眼她那双手。她的指甲虽然涂过指甲油,但颜色比较暗,而且比以前短了许多。或者只是我的一种感觉。

谈起扎戈,自然而然又想起一大串儿名字。看了杰克那些照片,她非常激动。

“这是泰特希赛嘎斯街!我认出这些房子了。可是从大街上走过去的这些人是谁呢?也许是扎戈消防队?你叔叔雷勃经常在他们的管乐队演奏。可是这里面还有穿制服的妇女。看热闹的人也不像犹太人。也许是教堂举行的游行。复活节前,他们经常组织这类活动。”

后来我搞清那是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举行的游行。可能是争取独立,也可能是庆祝独立,要看照片拍摄的时间。

“就在这个街角,”丽赫用手里的放大镜指着另外一张照片说。“镇子里一个名叫阿夫兰姆·布罗依迪的有钱人开了一家很大的商店……这是新扎戈,店铺都在这儿。新扎戈还有一个电影院。那时,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去看电影。波拉·尼格里,是一位棒极了的女影星,我最喜欢看她演的电影。哦,你不会知道她的。扎戈比一般镇子大,是个大地方,有电影院,还有犹太人的教堂……这就是教堂。在市场附近。赶集的日子,我母亲经常来这儿跟农民买鸡蛋、黄油、蔬菜……这是梅斯凯·斯特拉尔的磨房。我记得他是尤德凯家的一位表亲。扎戈一共有两个磨房……啊!这就是纳瑞斯金公园。非常漂亮。青年男女常到那儿散步。到公园之前,一定

要经过一座森林。我们在那儿采草莓,还有 agresin。我不知道英语怎么说 agresin。一种草莓,只有欧洲才有……”

她说话也爱用“省略号”,总是给人“意犹未尽”之感。

“时间过得真快啊! 1915 年,我们被赶出扎戈,流放到俄罗斯。在那儿,我们辛辛苦苦地干活。1921 年,变卖了所有家产,回到立陶宛。在火车上晃荡了整整两个月。一个车厢 35 个人。男人,女人,孩子都睡在地板上。回来之后,发现我们的房子被烧,家具什物荡然无存。要不是收到从美国寄来的那些包裹,都得饿死。战后,扎戈到处都是乞丐。我们家虽然很穷,全靠寡妇妈妈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是每到星期五,她都要多烤些面包,送给那些要饭的人……

“你父亲家吗? 戈森,亨克,雷勃,我都认识。亨克是个漂亮姑娘,几个男孩子也都英俊、聪明。你的祖父西蒙个子很高,红头发。不过我不了解他。他不大和社区的人来往。你祖母我干脆就没怎么见过。她总是呆在家里,忙忙碌碌照顾孩子。

“我跟你母亲家比较熟。特别是伊特兹。他跟我的几个哥哥弟弟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可惜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他在扎戈有许多女朋友。可我们这一代人是动荡不安的一代。大家都漂泊不定,即使海誓山盟的恋人,最后也常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伊特兹想娶阿达为妻。阿达你已经见过。他们俩相爱挺深。可是我的姑妈,也就是阿达的妈妈不同意。她嫌伊特兹年纪大。那时,阿达 22 岁,伊特兹 35 岁。就这样一对有情人未成眷属……

“还是回我的房间里去吧,在这儿没法儿谈话。”她朝客厅里另外几个正旁若无人、大声喧哗的老太太指了指。“我刚想



20年代亲戚朋友们摄于纳瑞斯金公园。

后排左起第三人是戈森,第四人谢瓦,第五人丽赫·

奥金,第六人希勒舅舅,第八人荷达,第九人雷勃
起一件事情,你一定非常感兴趣。”

回到她的房间之后,老太太给总机打了个电话。“请接尤代金太太,”她说。

我开始怀疑她提供的情况有多少是真实可信的。

“这家旅馆住着两个姓尤代金的老太太,”她连忙解释,一只手捂着话筒。“经常搞不清是叫我还是叫她。尽管这两个姓虽然声音一样,但拼法不同。她的丈夫是扎戈附近一个小村庄的人。那天,她对我说,他们家有人写了一本关于扎戈的书……啊,尤代金太太……”

丽赫把我到南非的来意告诉这位尤代金太太的时候,她邀请我们一起到她的房间。她把我们介绍给她刚从美国来的儿子。他告诉我,他的一位堂兄研究了好长时间他们家族的历史,发现从他们的老祖宗在立陶宛定居到法西斯大屠杀,尤

代金这个姓共有 6 种拼法。他拿给我一本 40 页厚的家史。这本书是作者分送给尤氏家族成员的。

“这里面有许多地方提到扎戈。我们的一位亲戚还被关到扎戈的犹太人隔离区。你可以把这本书拿去复印一份。”

我非常高兴这个意外的收获。这本书的作者是 1941 年赎罪日(10 月 6 日)前,扎戈犹太人隔离区那一段血腥历史的见证人。战争爆发之前,尤代金家族的一位成员伯莎·塔布曼和她的丈夫、孩子住在沙维尔。沙维尔被敌军轰炸之后,她和家人一起逃到离扎戈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帕皮里加。1941 年 6 月 22 日,4 个德国军官控制了帕皮里加火车站,然后把这个地区交给立陶宛国民军和游击队管理。他们对犹太人非常残酷。

起初,他们在市场广场当众侮辱犹太人。他们大把大把揪下拉比和别的男人的胡子。非犹太教的邻居们站在四周,有的哈哈大笑,有的掩嘴窃笑。后来,事情越来越糟。几天之后,所有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社区的领导都被抓了起来。伯莎·塔布曼的丈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被押解到库德加附近的一座森林,敌人强迫他们给自己挖坟墓,然后统统枪毙。那些马上就要被枪杀的人们在刺刀的逼迫之下,掩埋了已经被打死的同胞。

剩下的犹太人都被赶到城里。敌人让他们举着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从大街上走过,看热闹的人们朝他们叫喊着,骂不堪入耳的脏话。然后,他们被送到离城 10 公里远的一座农场。男人和女人被分开。3 天之后,从帕皮里加和别的村庄来了一群喝得醉醺醺的立陶宛人。16 岁以上的所有男人都被赶到附近一座森林里枪杀。塔布曼太太的哥哥伊特兹哈

是他们中的一个。

农场里只留下妇女和儿童。身体好一点的妇女在地里干活,老人和孩子们留在营地。没有多少食物,大人小孩都饿得要死。8月25日,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他们扔到马车上,押送到扎戈。到达目的地之后,一个名叫斯坦卡斯的立陶宛国民军士兵说:“早就该像杀狗一样把你们都杀死。如果老实点儿,好好干活,还可以给你们碗饭吃。要不然,统统枪毙!”

“……我们被关进一座小教堂,里面点着几支蜡烛,”塔布曼太太写道。“我碰到几位沙维尔地区的犹太人,都是大家庭的幸存者。他们脸色苍白,充满恐惧,脚步蹒跚,就像活死人,无奈而又无望。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游击队员随时都可以把犹太人抓走,拖到附近的树林里枪毙。”

后来他们被转移到扎戈的犹太人隔离区。那地方正在围一道铁丝网。

“隔离区里总共有9000人,”塔布曼太太写道。“我在那儿呆了大约10天。大部分时间和别的女人、孩子藏在一起。游击队的人抢劫,侮辱,强奸了许多妇女。我们祈求上帝,赶快把这块地方圈起来,宣布为德国人的隔离区……许多犹太人成了疯子,神情呆滞,面无人色,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还有的人自杀身亡。”

扎戈当时集中了从克什加、阿克米恩、维克沙恩·卡道斯和别的地方押解来的犹太人。许多从拉德维莱斯基来的犹太人,在来扎戈的路上,就被立陶宛游击队杀死在一片森林里。

有一个立陶宛游击队员名叫万基斯,是个做棺材的木匠,从前是塔布曼先生的客户。他帮助塔布曼太太弄到几份允许她和她的女儿回到沙维尔隔离区的文件。她家里别的人都没

有得到批准。

“告别的时候，”塔布曼太太写道。“我心情沉重，最后一次拥抱我的母亲、妹妹和约瑟夫。我们离开扎戈几个星期之后，德国人便完全隔离了犹太人的居住地。所有能干活的人都被组织起来做苦役。参加劳动的人可以得到一份面包(这都是母亲设法告诉我的)。母亲甚至后悔，不该让我们离开那儿。因为情况好转了一点。可惜好景不长。

“10月5日，星期三，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群被煽动起来的立陶宛人——衣冠禽兽——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到市场广场。搜身之后，把他们推上一辆辆大卡车，拉到一个公园。9000人，整整杀了3天。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兄弟姐妹，父老乡亲。被那些禽兽不如的东西像屠宰牲口一样屠杀。我和我的女儿瑞维拉是1941年10月7日赎罪节9000名被屠杀的犹太人中唯有的幸存者。”

从1941年到1944年，她在沙维尔犹太人隔离区的富兰克尔兵工厂干活。配给的食物很少，勉强维持生命。1943年11月5日，老人和孩子都被集中起来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乌克兰的士兵和立陶宛游击队员都参加了这次行动。

“那是一个星期五，”塔布曼太太写道。“像平常一样，工人们被押送到工厂。老人和小孩都被扔上马车拉到火车站。他们将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毒死。下工回来的时候，刽子手们把守在营房门口，来抓那几个跟我们混在一起，设法逃脱早晨那场搜捕的孩子。

“我去求那个名叫福斯特的军官……那家伙高高的个子，是这次迫害儿童行动的总指挥。我求他把女儿还给我，然后把我们俩一起带走。他的回答是：你得干活，你的女儿由我们

来照顾。

“我没有勇气回首往事。我不敢再回想我所经历的那令人肝肠寸断、肝胆欲裂的痛苦。”

俄罗斯军队进军立陶宛的时候，德国人把这个地区所有幸免于难的犹太人都集中到沙维尔隔离区。伯莎·塔布曼又见到几位幸存的家人。在一位绰号叫沃瓦的立陶宛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他曾经从虎口里救出许多犹太人——他们挖了一个可以藏身的地道。结果被敌人发现，没有多久被押送到斯塔特霍夫集中营的兵工厂干活。经历了可怕的折磨和艰难之后，1945年3月10日，她和其他幸存者被苏联红军解放。

尤代金的回忆录为我提供了一个想象我的祖母弗瑞德和她的家人遭受苦难的背景。当我读到别人的祖母、叔叔、姑妈、双亲、兄弟、姐妹惨死在敌人屠刀下面的时候，我想，我的亲人们一定已经死过好多次了。弗瑞德，一个弱不经风、浑身是病的老妇人，也许因为雷勃没能成功地把家里人接走，她就忧伤而死了；也许在犹太人被赶往隔离区的时候，倒在路边再也没能起来。我还想象，老祖母紧紧抱着女儿布雷娜，走到市场广场，然后被扔上卡车，拉到纳瑞斯金公园。子弹向她们射去，殷红的鲜血从胸口流出，不管死活扔进大坑，埋到地下。小斯马尔克在森林里给自己掘了坟墓，然后被打死，和许许多多多人一起，埋进万人坑。

几天之后，我和尤代金告别。分手前，我对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非犹太教的邻居和他们相处了那么多年，到头来可以这样残酷地迫害犹太人。

“你们在扎戈的时候，和异教的邻居们相处得怎么样？”我问道。

丽赫耸了耸肩。“那时,除了到市场买卖东西,彼此没有多少接触。在郊区,我们从他们门前走过的时候,他们的狗就汪汪汪地叫。就像在南非郊区,白人的狗朝黑人狂吠一样。对于他们,我们是陌生人。也许杀陌生人容易一点。”

也许,几个星期之后,当我和现在生活在以色列的大屠杀的幸存者再谈起这个话题时,我将弄清楚,犹太人的“好朋友”是怎样变成屠杀他们的刽子手的。



扎戈全景,中间为市场广场

9 米尔克

以色列,意味着结束流亡生活的家。对于那些真正需要一个家的人,它的确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对于米尔克、斯洛莫和其他幸存者;对于理想主义者,也许还有现实主义者。而剩下的人,还在寻找,尽管心存疑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

的有这样一个家。

我一到以色列,就和米尔克取得了联系。在卢巴家和她通话之后,我希望她能继续给我讲关于她的“情人”(geliebter)雷勃的故事。米尔克非常友好,但有几分拘谨。她邀请我去她家里吃午饭。问清楚我是不是一个人旅行之后,再三说:“带你的丈夫一块儿来。”我有点儿犹豫。我发现,不管采访谁,最好不要有第三者在场。可是她一定要我的丈夫来。

我还给斯洛莫打了电话,向他解释我和雷勃·约费的关系。“你哥哥说,你跟他很熟,建议我跟你了解他的情况。”

“哦,是我哥哥派来的特使,想了解她叔叔雷勃·约费的情况?好啊!欢迎光临。”

他的口气不无讥消,我听了心里不大舒服,不过也没有在意。米尔克和斯洛莫两家相距不远,我打算访问米尔克之后,再去看他。

米尔克个子很高,长得也很体面,站在门前迎接我。她穿了一件衬衣式连衣裙,袖子卷得老高,好像正准备干活。跟她走进那座一尘不染的房子的時候,我觉得她一定后悔那天不该一时冲动,说自己是雷勃的情人。她虽然已经满头灰白,但还夹杂着一缕缕金发。好看的嘴唇紧紧抿着,只有稍微虚肿的眼皮下面,绿眼睛低垂着,显露出抹不去的忧伤。雷勃要是活着,已经83岁了。她的年龄应该是75岁左右。倘若走在街上,两个人未必能认出对方。

“不管忘记什么,或者不愿意想起什么,”她一边说一边把我们领到一张摆满精美小吃的桌子旁边。“立陶宛好客的习惯,我一直没有丢掉。我们吃完饭再谈。我的丈夫——第一个丈夫,战争刚刚爆发就被打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他

是另外一个村子的幸存者,但是对扎戈和镇子里居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鱼丸冻^①,红烧鲱鱼,腌鲱鱼,土豆煎饼,奶酪薄饼卷,充分显示了我们同祖同宗,同枝同根。吃饭的时候,她只谈些平常的话题,打听我们俩都认识的还在南非的朋友,问询澳大利亚的情况。她告诉我们,她生在扎戈,但是在沙维尔接受教育,后来就在那儿成家立业。和许多人一样,她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敌人需要劳动力。像富兰克尔的兵工厂、巴塔的制鞋厂、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工程团一样,沙维尔也需要一大批劳动力为战争服务,而扎戈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这架战争机器。

吃过这顿丰盛的午餐,米尔克开始回答我的问题。我问她父亲家的情况。她说,雷勃、亨克、费沃克都身材高大,漂亮潇洒,大伙都愿意和他们呆在一起。他们下面那两个小的,她就不熟了。亨克和本兹·坦希尔谈了好几年恋爱。他一直深深地爱着她,但是两个人没能结婚。

“让我给你解释解释那时候村里的习俗,”她说。“一般人家都得先把女儿嫁出去,再给儿子娶媳妇。为什么雷勃好多年没有结婚,就是这个原因。费沃克,他的弟弟,像戈森一样,远走高飞了。雷勃没有结婚,总得有人照顾那个家呀!亨克16岁那年,本兹就向她求婚。两个人整整相爱8年。那份爱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刻骨铭心。可是本兹有3个没嫁出去的姐妹,不能越过她们自个儿先娶妻生子。‘再等他,你就成老姑娘了!’雷勃对亨克说。雷勃不是故弄玄虚。亨克那时24

① 鱼丸冻:一种犹太菜肴,用鱼糜加入鸡蛋和面包粉制成。

岁,在大伙儿眼里已经就是老姑娘了。雷勃给她另找了一个对象,是一个拉脱维亚小伙子,人很不错。你好像挺惊讶。那时,就是这样。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雷勃别无选择。他得为自己的家人负责。那年月,没有条件考虑什么爱情。都得面对现实。本兹一直没有结婚。后来,亨克在拉脱维亚被杀害,本兹和他那几个没有出嫁的姐妹一起,在扎戈被屠杀。他们连死也没能死在一起。”

“戈森家的其他人呢?”

“你的祖父,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没几年,他就去世了。你的祖母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人。你简直无法想象,她怎么能把孩子们一个个打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且都供他们上学。她和两个最小的孩子布雷娜、斯马尔克,一定是在扎戈大屠杀时被害的,或者是在逃跑的时候被打死的。你一定听说过雷勃想把他们救出去的故事。他自己是1943年在前线牺牲的。费沃克也是那次大行动中被杀害的……你听说是死在扎戈?也有可能。众说纷纭。那时候,一切都乱套了。

“费沃克也是一个出色的乐手。他吹长号。他和约费家别的孩子都一样,长得很漂亮,只是个头比雷勃低一点儿。最小的弟弟斯马尔克和戈森特别像。一模一样的脸形。他们家的孩子都漂亮,但最出色的是雷勃。他不论什么时候到沙维尔,都去看我。那时,我第一个丈夫的堂妹住在我们楼下。她经常开玩笑说:‘哦!他太潇洒、太迷人了。我简直不想让他上楼去了。’”米尔克的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

米尔克没有再用 geliebter(情人)这个字眼儿。也许 geliebter 还有“可爱的”意思,不仅仅是“情人”。依地语毕竟是

我呀呀学语时使用的语言。我很难分清这样细微的区别。我写的依地语不合语法,读起来也并不轻松,尤其是字迹潦草的时候。讲起来更是一股“英语味儿”。真正说依地语的人听了刺耳,或者觉得挺好玩儿。但是我对这点儿依地语,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因为它可以把我和我们的传统连接到一起,和我正在挖掘的过去连接到一起。

我开始后悔不该接受这种“立陶宛的好客”,非来吃这顿丰盛的午餐不可。我宁愿和米尔克两个人单独呆在一起,到咖啡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旁边没有“听众”,可以更自由地问这问那。

“我听说,1940年俄罗斯吞并立陶宛之后,雷勃在沙维尔工作,”我说,没有说明消息来源。实际上是侄女弗雷达最近给我写信提到这事儿的。

米尔克看起来很吃惊。“也许,”她皱着眉头说。“他是个神秘人物,左翼分子。不过我不知道他究竟参与了多少活动。他从来不和我谈政治上的事儿。我只知道,在扎戈,他的朋友大多数都是左翼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很少。这也许正是人们对他看法不一的原因。你搞错了,”她口气非常肯定地补充道。“在沙维尔的是费沃克,不是雷勃。如果那时候他在沙维尔,就一定会去找我。他绝不会错过和我见面的机会。”

她变换了话题。“你知道雷勃是怎么牺牲的吗?斯特拉尔告诉过我。不,不是尤德克。是他的表弟,也是个乐手,和雷勃一起都在立陶宛第16支队的管乐队。有一次,红军打了一场大仗,他们那个营从德国人手里夺回沦陷的土地。雷勃和战友们到一幢房子里休息,以为里面没人。没想到顶楼上藏着一个德国人。他们睡觉的时候,那个家伙从楼上下来,朝

雷勃头上开了一枪。雷勃当场死亡。情况就是这样……”这时，米尔克的丈夫回来了。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人。米尔克给他端上茶点，故事的“连续性”被打断了，又转到别的话题。

“我在沙维尔念书的时候，每年夏天和每个赎罪日都要回扎戈。那里的田野、河流、森林都非常美丽……在立陶宛，扎戈犹太人村社的历史最为悠久。那里地灵人杰，出过许多著名的学者、作家、拉比。就拿新扎戈的拉比伊斯雷尔·瑞夫来说吧，即使你不信犹太教，也会对他非常尊敬。他很聪明，不像现在那些狂热的宗教信徒，动不动干涉别人的私生活，他经常对镇子里的青年人说：‘孩子们，跳舞去吧。尽情地欢乐。但是要记住，最危险的事儿都是出在跳舞之后。’”她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你听说过纳瑞斯金公园吗？那是年轻人的幽会之地。可惜，那些爱情故事全都没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哦，我是跟你说拉比来着。他的大儿子是旧扎戈的拉比。他的另外一个儿子跟我关系很好，也是个拉比。德国人到来之前，立陶宛国民军——那是一帮强盗和刽子手——脱光了老拉比瑞夫的衣服，逼迫他在市场广场跑。他们就在后面朝他开枪。所有异教徒朋友、邻居，站在周围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这事儿是战后一位异教的妇女对我讲的，她从前给我母亲干过活。我不忍心听下去。直到现在，也还是无法忍受……

“1941年6月14日，德军侵占立陶宛之前一个星期，布尔什维克开始遣送边民到西伯利亚。我的第一个丈夫全家都被驱逐。成千上万的人被流放，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一样。如果你是知识分子，或者手里有两个戈比，就说你是资产阶级。

可是,纳粹和他们的立陶宛走狗却因为你是‘布尔什维克’屠杀你。我们还有什么活路呢?俄罗斯人的大驱逐一个星期之后,德国人开始轰炸沙维尔。我们四处逃命,又无处可逃。跑到边境便被立陶宛国民军挡了回来。他们还要拿我们派别的用场。”

米尔克告诉我们,德军入侵两个星期之后,沙维尔便建立起两个隔离区。隔离区里拥挤不堪,条件极差,让人无法忍受。犹太居民委员会^①向德军当局表示不满时,德国人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犹太人的安全,否则,那些无法控制的势力就有可能加害于我们。他们还说,这只是战争期间的权宜之计。事实上,他们的上司早就发布命令,如果当地有反共和反犹太人的组织骚扰、迫害犹太人,一律不要干涉。米尔克说,立陶宛新闻出版界和立陶宛反对犹太人的势力总体上来说,支持德国的政策。他们巴不得侵吞犹太人被赶到隔离区之后留下的财产。

“在隔离区,”米尔克说,“我们和卢巴家一样,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我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的工厂需要人干活儿。扎戈是个小镇子,没有工业,只有劳动力可供他们消耗。可是到战局不利德国的时候,我们便被送到斯塔特霍夫。在那儿,德国人像分羊群一样,把大家分开,一大批人被遣送到死亡营。我就是在那儿和家里人永别的。后来,我的丈夫被杀,全家人被杀,孩子被抓走……”

她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不再哭泣了。眼

^① 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at):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犹太人集居地指定的犹太居民委员会。

泪不会给人安慰……

“战后我回到扎戈,希望碰到一些幸存者。可是没有一个幸存的犹太人,只碰到那个从前给我们家干活的女人。她告诉我,俄罗斯军队撤退之后,立陶宛国民军封锁了边境线,只有几个人设法逃了出去。结果,5000人被屠杀,有的是扎戈人,有的是别的村子里的人。她描述了犹太人被赶到市场广场屠杀的情景。她说,鲜血顺着小巷一直流到斯维特河。曾经那样欢快地流淌的河水变成红色,渐渐干枯。那都是鲜血,她边哭边说,是犹太人的鲜血。

“她还告诉我一个女教师的故事。那个女人我也认识。她违背父母的意愿,和一个男人结婚。德国人到来之前,那个男人逃走了,她因为有孕在身,无法逃跑。不过谁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许他们认为,灾难很快就会过去;也许以为敌人不会残害一个孕妇;或者觉得,至少他应该先逃活命。生的欲望总是非常强烈。我,一个幸存者,似乎对此最没有资格加以评判。女教师在纳瑞斯金公园万人坑旁边生下孩子。敌人枪杀母亲之后,又把孩子活活扔进坟坑。我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孩子们的。因为我自己的孩子……

“是的,我可以说说这件事情。那是1943年11月4日,一个星期四的夜晚。德国人开着一辆辆大卡车,来到沙维尔犹太人隔离区。大喇叭叫喊着,让我们把所有的孩子都送上卡车。为了平息大家激动的情绪,他们说,要把孩子们送到里加一个疗养院,在那儿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发疯似地爬上汽车,那情景想起来,至今心有余悸。敌人在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音乐,企图盖过大人小孩的哭喊声。狼狗汪汪地叫着,四处乱窜,寻找藏起来的孩子。

找到之后,就扑上去乱咬。他们一共抓走 720 个孩子。那时,我的儿子才 7 岁……”

后来,我从玛莎·格林褒姆的《立陶宛犹太人》一书中,读到了关于沙维尔犹太人隔离区这次“儿童大清洗”的详细情况。有的犹太父母从异教的立陶宛人那儿事先得知“大清洗”的消息。为了救孩子,他们想尽办法,甚至不惜采取最为极端的办法。他们给小孩子吃麻醉药,让他们昏睡过去,然后装在麻袋里或者装在每天都往外面运送的垃圾桶里。一旦送出隔离区,被他们买通的立陶宛人就把孩子接走,救他们一条活命。还有的父母把孩子们扔过隔离区高高的铁丝网,事先安排好接应的立陶宛人在大墙外面张开双臂等着接孩子。沙维尔隔离区里的犹太人警察头目埃夫雷姆·盖恩斯是前立陶宛部队的军官,研究生毕业。他相信德国军队的“信誉”,更信任和他一起长大的立陶宛人。他坚信德国人和立陶宛人都不会加害于无辜的孩子。他带头把自己年幼的女儿交给德国人,还劝说别人也向他学习。

“战后,”米尔克继续讲她那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我在一个俄罗斯军官家干活。有一天,他问起我的情况。‘你知道你儿子被抓走以后的情况吗?’他问。我当然一无所知。他告诉我,那些孩子都被送到里加一座陆军医院。后来都死在那儿了。我当时将信将疑。大约 3 年以后,我读到一份官方的报告。报告说,德国人急需血浆为他们受伤的士兵输血。这时,犹太人的血派上了用场。于是他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里加医院,抽走他们最后一滴鲜血。这个可怕的事实陪伴了我几十年。我没有一天忘记我的儿子是怎样流尽最后的一滴血的……”

我忘记了想要问的关于雷勃的事,为自己勾起她的伤心事万分抱歉。

“说出来心里也好受点,”她说,“只要我活着,就无法忘记。”

告别的时候,我对她说,我已经安排好拜访斯洛莫和他的妻子恰娜。

“他们很幸运,”她很宽厚地说。“及时逃离了虎口。恰娜和一个名叫爱德华的异教的立陶宛人——我忘了他的姓——非常友好。他们经常在街头拥抱接吻。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父母那一代不完全一样。我们和异教的立陶宛人还有一些接触。然而,就是这个爱德华,犹太人的好朋友,后来成了扎戈最凶残的刽子手之一。”

我们和米尔克的丈夫道别。和米尔克谈话的时候,他一直静静地坐在那儿听着。

米尔克指给我们去斯洛莫家的方向。

“如果想知道雷勃的情况的话,”跟我握手的时候她苦笑着说,“可以问恰娜。她跟他也很熟。”

10 雷勃,是英雄吗?

我从南非给米尔克打电话的时候,她似乎心情很好,不但愿意接受我的采访,而且显然很想跟我谈谈她的“情人”雷勃的故事。没想到,一旦说起往事,她会那样伤心。我有什么权利探究一个陌生人内心深处的秘密,并且引起她这样的痛苦呢?可是不这样做又怎能洞悉那场巨大灾难呢?我怀着忐忑

不安的心情敲响了斯洛莫的门。谁知道在他那干练的举止、简洁的言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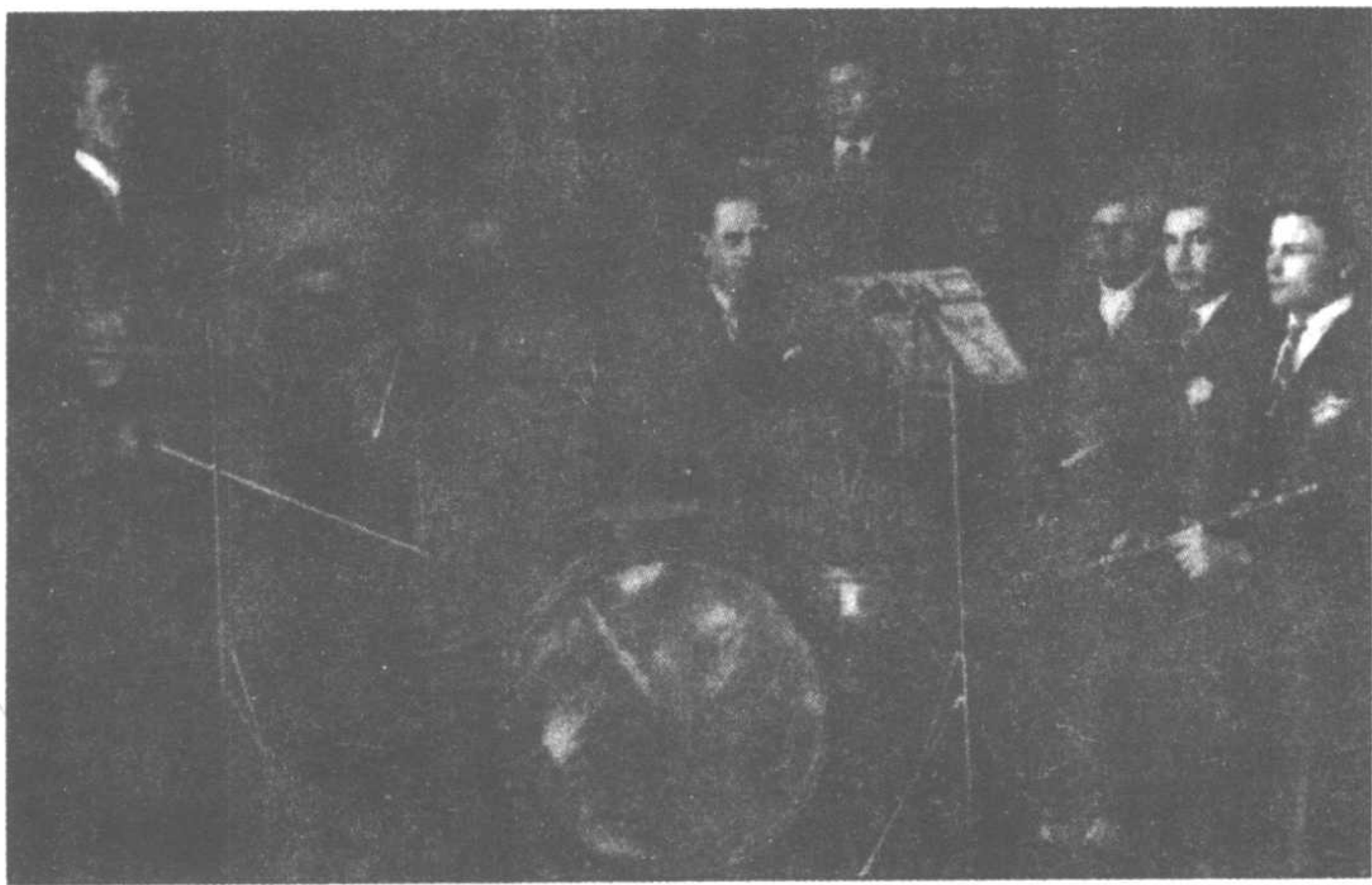
他的妻子恰娜又把我们请到一张充分显示了立陶宛式好客的桌子旁边。她圆圆的脸上喜气洋洋,小镇美女的风采依稀可见。斯洛莫两鬓斑白,背有点儿驼,也在桌子旁边坐下。

起初,谈话不大自然。可是一提起朋友、亲戚们的名字,所谓“代沟”和文化差异就烟消云散了。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对斯洛莫说,“你哥哥是星期日下午到我们家做客的‘老乡’之一。”

“我对哥哥的情况一无所知,”斯洛莫说。“我三四岁的时候,他就远走高飞到了南非。直到战争结束,我和恰娜来到以色列,才又和他相见。”

斯洛莫回答我的问题时,显得不大耐烦。他仿佛在说:这些说英语的人怎么能理解我们的生活?



20年代,雷勃和他的乐队。右起第二人为雷勃

的确,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我们没有经历战争、流亡、死亡营、饥饿的折磨。我们的父母在开普敦登陆的时候,或许有一种异国他乡的陌生之感。我们却觉得这种相对而言比较优越的生活理所当然。当欧洲的犹太人被追杀、被迫害、被灭绝的时候,我们在上中学,玩曲棍球、打网球,或者橄榄球。我们对于这场战胜希特勒的战争的贡献,仅限于为在北非打仗的战士们织不大合适的袜子和巴拉克拉瓦盔式帽。或者为“总督国防基金”义卖糖果和糕饼。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些切实的安排。我们知道自己能够长大,并且决定长大以后做什么;而不是像他们那样,总是想,如果能够长大……

斯洛莫又黑又瘦,一双棕色的大眼睛深陷在眼窝里,鹰钩鼻子上方,两道浓眉不时皱在一起,似乎总在生气。我们说到老家的事情,用依地语,说到别的事情,就用希伯来语。我对这两种语言的知识,足可以提问,并且明白他的意思。

我向他解释,为什么寻访幸存者,还告诉他,我对雷勃从沙维尔冒险回扎戈接家里人的事情略知一二。

“用不着等雷勃跑来告诉我们德国人要来了的消息,”斯洛莫说。“我们不是白痴。我们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问题是,没有办法逃出扎戈。就是雷勃虽然开来一辆汽车,也没能把家人接走。”

“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说到这儿,我连忙打住。我的角色应该是一个不偏不倚的采访者,而不是雷勃名誉的维护者。

“此话不假,”他用一种让人们情不自禁产生疑问的口气说。“可是这也没能帮助他对付我们后来在前线碰到的那些艰难困苦。许多了不起的理想主义者都垮了。从南非或者澳

大利亚来的那些没见过战争的人,无法理解、也很难想象我们经历的那一切。比如我的哥哥,20年代就离开扎戈,从那以后就没挨过饿。”

这种哥哥远走高飞,不管家人死活的“综合症”使我想起雷勃对戈森的愤恨。似乎没有必要解释,虽然我们的生活还算优越,但从来没有忘记同胞们的苦难。战争之前,战争期间,战争之后,我的父母没有一天不为亲人们的命运担心、痛苦。而我们这些孩子则把歉疚和焦虑深化为生命的一部分。

在斯洛莫眼里,我和我的丈夫衣冠楚楚,距离那场悲剧和苦难那样遥远,50年来漠不关心,现在却突然跑来“寻根问祖。”

“雷勃,”他和缓了一下语气说,“比我大13岁。我起初一星期到他的理发馆一次,后来去两次。去刮胡子、理发。我跟他很熟。他总想说服我信仰共产主义。他是个很有趣的人,还是个非常出色的乐手,会演奏许多种乐器,参加镇子里所有的音乐会和庆祝活动。”

扎戈的年轻人都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都很活跃,朝气蓬勃。在寻求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道路上,他们分成两派。少数人信仰共产主义,其余的人大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自己曾经是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运动——Hashomer Hatzair 的成员。

听说我们也曾经是 Hashomer Hatzair 的成员之后,他扬了扬眉毛。

“在南非?哦,真没有想到……我刚才说过,扎戈的共产党员不多。我们那个时候,共产党在立陶宛还是非法的。可是这些党员的信仰都非常坚定。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一

切问题,包括最严重的反犹太主义倾向的灵丹妙药。他们有一座藏书 6000 册的图书馆。那时,在立陶宛就算最大的图书馆了。比文化站还大。因为扎戈当时只有一个教立陶宛语的中学,这座图书馆就成了我们唯一受教育的地方。那时候,我们都很穷,很少有人能到大一点的城市去念书。”

斯洛莫说,1940 年,俄罗斯吞并立陶宛之后,反犹太人的情绪陡然高涨。主要原因是,犹太人在共产党里的比例很高。犹太人占总人口的 7%,占共产党员人数的 15%。15%就意味着代表了 450 名党员。可是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几乎没有犹太人。

“然而,所有犹太人都被贴上布尔什维克的标签,而且把驱逐 33000 名立陶宛人的责任都推到犹太人的头上。他们从来不愿意提及的是,这 33000 被驱逐的人里有 7000 人是犹太人。这个比例也相当之高,他们却视而不见。至于我们遇到的麻烦和我们的人口更不合比例。”

斯洛莫谈到的这些情况,在我后来看到的一篇题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的文章中均有论述。从立陶宛共和国内务部的档案和另外两个立陶宛的消息来源收集到的材料表明,6 月 14~15 日的大驱逐是中央委员会在地方委员会的协助下完成的。中央委员会里压根儿就没有犹太人,地方委员会里也只有 4 个或者 5 个犹太人。苏维埃的政权机构中本来就没有什么犹太人。比如说,1940 年到 1941 年人民内务委员部的人民委员是立陶宛人;副委员中,一位是俄罗斯人,另外两位也是非犹太教的立陶宛人。所有地区政权机构的正职和他们的副手都由立陶宛人担任。人民内务委员部的 279 名工作人员中,除了打字员、司机、清洁工,只有 20 个犹太人。

“扎戈的共产党员，”斯洛莫说，“并没有因为苏联吞并立陶宛而得到什么实际利益。他们当时都欣喜若狂，以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社会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说他们天真幼稚，一点儿也不过分。”

“听说俄罗斯人并吞立陶宛前不久，市场上发生过一场冲突，雷勃因此而被捕，”我说。

“雷勃从来都没有坐过监狱。”斯洛莫非常肯定地说。“他也许被拘留过，但是没坐过牢。有一个绰号叫德·希普斯的人被判过8年徒刑。不是雷勃。我给你讲讲德军入侵前一天的事儿吧。雷勃逃离扎戈后的那天夜里，我和母亲、3个妹妹跟着许多人一起向边境线逃去。那是一个星期四，战争已经爆发了一个星期。立陶宛人为德国人的胜利而庆贺。犹太人意识到，再在镇子里呆下去将非常危险，都想逃到安全的地方。等我们来到边境线的时候，哨卡的栏杆已经放下，不允许我们过去。

“我们老实得像一群绵羊，对当局的命令不敢违抗，掉转头又向扎戈走去。唉，真是些傻瓜！我们只须朝左走100米远，躲过那几个喝得醉醺醺的边防战士，就可以轻而易举来到拉脱维亚。当然也有别的因素。拉脱维亚人的排犹情绪也非常激烈。再说，老人孩子很难徒步走到里加。里加是我们的目的地。从那儿才能坐火车到俄罗斯。

“第二天，栏杆吊了起来。我和另外10个也许是12个人一起骑自行车跨过了边界线……我的朋友梅伊尔·特拉贝克舍不得扔下老父亲，没有跟我们一块儿走。包里斯·卡尔诺维奇——人们都管他叫包拉奇·德·雷特——跑到我妈妈那儿，说：‘谢娜，你为什么让他走？他是逃不到拉脱维亚的。’我的

母亲说,他必须走。就这样我们逃脱了虎口。”

“家里人呢……?”

“都被杀了。妈妈,3个姐妹,一个姐夫,两个外甥。都死了……”

“再喝一杯茶吧……”恰娜打破沉默。

“一路上充满了艰险,”斯洛莫继续说。“德国飞机轰炸,拉脱维亚人朝我们打冷枪。有一个人的自行车坏了,我不得不让他坐在我的车架横梁上走了整整40公里。到里加时,拉脱维亚人在我们过桥的时候,朝我们开枪。我的自行车铃都被打飞了。”

恰娜一直默默地坐在那儿听着。听到这儿,她一边点头一边接过话头,说:“我住在泰特希赛嘎斯街,是到拉脱维亚的必经之路。那天,斯洛莫在我家停了一会儿,说他要到拉脱维亚。我就对家里人说,他要是走,我也走。我套了一辆大车,拉上妈妈、爸爸、哥哥、嫂子和他们的3个孩子,一起逃离立陶宛。那天早晨,边境线大开。没有军队,没有政府,什么都没有。我们逃走的第二天,德军就来了。”

斯洛莫和朋友们来到里加之后,住在他的表姐家,离火车站400米远。他们不时派一个人爬过草丛,看去俄罗斯的火车来了没有。车站上一片混乱,想坐火车逃命的人越来越多。混乱中,拉脱维亚国民军不时朝拼命叫喊的人群开枪。火车终于来了。斯洛莫还在催促表姐和表姐夫带上小女儿跟他们一起走。

“我们怎么能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呢?”他们说。“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结果他们失去了一切,包括性命,”斯洛莫说。“我们赶

到火车站的时候,火车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拉脱维亚警察不让我们上车。他们全副武装,可我们年轻。那时我 20 岁,敢拼敢闯。我们从他们手里夺过枪,挤上火车。站台上有个女人带着孩子上不了车,我们从窗口把她拉了上来。旅途中,那位母亲疯了。这只是我以后将要经历的许多悲剧中的一幕。

“火车开了。我们向俄罗斯驶去。我们到处流浪,直到 1941 年夏天。天气快冷的时候,来到乌兹别克,在那儿加入了立陶宛第十六支队。支队的大部分战士最后都战死了。我们曾经打过好几场恶仗……

“参军不久,我就碰到了雷勃。起初,情况还可以。可是没过多久就糟糕得让人无法忍受。战场上没有被敌人打死的人,遭受着饥饿的折磨。我们总在挨饿。每天只有一小片面包和一点儿水,别的什么也没有。我见到雷勃几个月之后,发现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你怎么能忍受这一切呢?’他问我。我说:‘如果命运让我们活下去,好歹都得活下去。否则就死。’‘我可受不了了,’雷勃说。‘我连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他非常悲观。我们之中有的人,”他做结论似地说,“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垮了。有的人没有。但是没有垮下去的人也没资格责怪他们,难道不是这样吗?”

恰娜点了点头。斯洛莫看起来勇敢、坚韧不拔,在逆境中泰然自若。我想起米尔克意味深长的话:“关于雷勃,可以问恰娜。她跟他也很熟。”可是雷勃的事儿,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斯洛莫在那儿“喋喋不休”。看起来,直到 70 岁的时候,斯洛莫还在向恰娜证明,她嫁给他,实在是明智的选择——如果她确实做过选择的话。在我采访过的人里,斯洛莫是第一个动摇了雷勃“英雄”地位的人。

“后来,真正的大仗开始了,”斯洛莫继续说。“在莫斯科南面的奥廖尔。雷勃在一个叫尼克尔斯克的村庄被敌人打死。我们向那个村庄发起进攻,被敌人打退。第二次冲锋才终于成功。我问一个士兵见没见过雷勃。他告诉我,雷勃已经被打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战斗结束以后,大家都累得要命。雷勃走进一幢看起来好像是空着的房子,喝了点水,便在床上躺下。没想到楼上有德国人。他们下楼的时候,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俄国兵,当场把他打死。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米尔克说的是,雷勃被藏在屋子里的一个德国兵朝脑袋上打了一枪打死的。在后来的采访中,关于雷勃的死还有许许多多的说法。

“关于扎戈的大屠杀……我听到的情况是,7000名男人、妇女、儿童被杀害。那时,城里只有一个德国人。杀人的事都是我们那些非犹太教的立陶宛同胞干的。他们满怀仇恨,积极性很高。这一切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曾经是我们的朋友、邻居。他们先杀了村社的领导人。拉比瑞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个子很高,很壮,像个巨人。但是视力极差。他要是想看东西,必须扬起眉毛,把眼睛睁得老大。立陶宛人像套马一样,把他套到一辆装满大石头的车上,命令他拉着车跑。拉比在前面拉车,他们在后面开枪。但是他没有倒下,而是咬着牙继续向前。人们看了都非常害怕,以为他是刀枪不入的神。他当然不是,终于倒了下去。”

“战后,斯洛莫像其他幸存者一样回到扎戈寻找家人。谁也没有找到。1946年,他和另外几个人找石匠定做了一块很大的石碑,用马车拉到扎戈。一位名叫蒙德尔松的犹太人的妻子是个俄罗斯人。她一直负责清扫墓地。后来扎戈镇有关

政府部门负起了这项责任。

“直到离开以色列，”斯洛莫说，“每年岁首节和赎罪节之间，我们都要从维尔纽斯回扎戈，祭奠死去的亲人。这几年，听说回去祭奠的人越来越少了。大部分人都到以色列或者别的地方去了。留在维尔纽斯的人都年事已高，没有多少钱，连自己的问题也应付不了。再过几年，恐怕没有人会再记着这个地方，也没有人会再来祭奠亡灵。”

我把杰克的照片拿给斯洛莫和恰娜看。他们相互问，这是新扎戈还是旧扎戈的磨面坊？这些游行的人是谁？照片上的人他们一个也认不出来。这些照片拍摄的时候，他们大概只有三四岁。

我们和斯洛莫、恰娜告别的时候，气氛比刚见面时轻松了许多，也友好了许多。我答应到扎戈后给他们写信。斯洛莫和恰娜都没有谈起爱德华。按照米尔克的说法，他们曾经是亲密的朋友。爱德华，会说一口流利的依地语，成天和犹太人朋友们混在一起；爱德华，1941年德国人侵占扎戈以后，变成屠杀犹太人的头号杀手！爱德华，当他在纳瑞斯金公园挖好的坟墓旁边，面对斯洛莫和恰娜的时候，也会举起手中的枪吗？

几天之后，我在以色列 Yad v'Shem 档案馆查资料时，发现了叶赫兹凯尔·弗莱斯科的一份证词。这份证词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我的疑问。一位名叫契尔尼可夫斯基的小伙子站在克山森林的坟坑边，认出准备向他们开枪的杀手中，有一个从小就和他一起玩的异教的立陶宛人。“阿迪拉斯！”他大声喊道。“打中点儿，别让我受罪。”

那位阿迪拉斯倒是没辜负朋友的重托。

11 扎戈的毁灭

“雷勃·约费？”跟我谈话的人都这样说。“我挺了解他。”有的人也许说他是个音乐家；偶尔，会有人说他是她的情人；也有个别人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共产党员。可是，对他的描绘越多，他的形象反而越让人困惑不解。但是透过神话般的迷雾，总算画出一个淡淡的轮廓，虽然瑕疵点点，不无支离破碎之感。斯洛莫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希望破灭的理想主义者，以为共产主义是医治世界上所有疾病的灵丹妙药。一个英雄，一个疲惫不堪、灰心丧气的士兵，为消灭纳粹献出年轻的生命。一个深爱着家人的儿子，万般无奈才舍弃



20年代扎戈赶集的日子。1941年10月2日，
犹太人就是在这里和纳瑞斯金公园被屠杀

了家庭。可是谁该对此做出评判呢？当然不是斯洛莫和其他从家里逃走的年轻人。

父亲家里其他成员的消息已经无从得知。亨克嫁了一个“非常好的人”之后，一直在里加生活。拉脱维亚被屠杀的犹太人有 65000，她恐怕很难幸免。

有人说，费沃克，他的妻子和孩子跟雷勃逃出沙维尔之后，又被诱骗回扎戈，死于那场大屠杀。还有的人说，扎戈落入德国人之手前一天，曾经在扎戈城外的大路上看见他。米尔克则说他死在战场上。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情况更是无人知晓。

我的祖母和布雷娜、斯马尔克以及扎戈的其他犹太人一起经历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斯马尔克那时大约 22 岁，一定和其他年轻人一起，不等最后的集体大屠杀，便被立陶宛国民军枪杀了。

要见的人都见过之后，我把在以色列的其他时间都花在图书馆和档案馆，查找“客观的、不带感情色彩的”资料。我去了港市特拉维夫的 Bet Hatfutsot 和耶路撒冷大屠杀的中心 Yad v'Shem。

Bet Hatfutsot 是一座海外犹太人博物馆。我希望从那儿查到大屠杀前有关扎戈的材料。可是只看到一篇 31 行字的短文，介绍 19 世纪扎戈的学者和拉比。看来只有等到纽约之后，才能从 YIVO 的档案室里查找到战前东欧犹太人总的情况和扎戈犹太人的具体情况。

在 Yad v'Shem，档案材料里——不论缩微胶卷还是书——凡是提到扎戈的地方，我都一字不漏仔细阅读。后来，我终于发现两份证词和一份目击者撰写的材料。在《德军行动

报告》——纳粹行刑队写给柏林盖世太保总部的紧急报告选集中，刽子手报告了他们处死犹太人的详细情况。我从这本选集中找到了可以证实那几份证词的第四份材料。

那3个证人中，实际上只有雅各布·卡干恩在扎戈隔离区呆过。他说自己是那场大屠杀唯一的幸存者。尽管叶赫兹凯尔·弗莱斯克和伯·派雷兹曼都和扎戈有过接触，但是扎戈被毁灭之前，他们都被关在沙维尔隔离区。

弗莱斯克是克山人。克山是扎戈西南50公里的一个小镇。小镇沦陷前，他想逃走，结果被抓回来送到沙维尔隔离区。他的妈妈和妹妹通过一个农民设法给他送来两封信，所以他知道一点克山和扎戈犹太人的消息。

德国人进入克山之后，命令犹太人掩埋俄国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清理丢在路上的武器弹药。他们不提供必要的工具，却责备犹太人效率不高。没多久，他们就把12岁以上的男人都集中起来关进犹太教堂，由立陶宛人看守。病人和因为受刺激精神错乱的人被拖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一个星期后，男人们被赶上一辆辆卡车，拉到3公里外的一座森林。一个个15米长的坑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弗莱斯克的弟弟也在其中。他跳下车，藏到舒克瓦、波派兰和沙维尔周围的森林。有一阵子，他还和妈妈、姐姐保持联系，后来就踪影全无了。

弗莱斯克的妈妈和妹妹给他写的第二封信说，她们和克山别的妇女、儿童一起被转送到扎戈隔离区。她们在菜园子里，给扎戈一个农民干活。那人对他们还不错。几个星期之后，那个农民到沙维尔隔离区找到弗莱斯克，告诉他，扎戈的犹太人都被杀死了。在1943年清洗儿童的大行动中，隔离区

一片混乱,弗莱斯克趁机从沙维尔逃了出去。他在好几个村子里都躲藏过,靠了立陶宛农民的帮助,才活了下来。

他在证词里还叙述了战后去纳瑞斯金公园寻访万人坑的情景。“墓坑长 120 米,两个人宽,”他写道。当地人告诉他,至少 6000 个人埋葬在那里。

伯·派雷兹曼的证词和弗莱斯克的证词一样,是 1947 年在范尔达芬难民营写的。他是土生土长的扎戈犹太人。他先被关在沙维尔隔离区,后来又在斯塔特霍夫、达桥、尤亨集中营受过非人的折磨。

派雷兹曼在证词中说:1941 年 6 月,德国人侵占扎戈不久,由立陶宛游击队头目爱德华·艾克王尔德·包梅斯特签署的布告,贴遍了整个小镇。布告命令,所有犹太人都必须在衣服的胸前和背后绣一颗黄色的星;犹太人不能在人行道上走路,不能打开百叶窗,不能从不属于犹太人的井里取水喝,他们的烟囱不能冒烟。布告还禁止卖给犹太人食物。他们只能到泰特希赛嘎斯街路口一家立陶宛人开的铺子里买面包,而且只能在晚上下班前一两个小时卖给他们。到那时,异教的立陶宛人早把大部分供应的东西买光了。不过,隔离区完全用铁丝网圈起来之前,还可以冒着危险,从越过边境线来扎戈市场做买卖的拉脱维亚人那儿偷偷买点儿吃的。

扎戈沦陷之后,他们把犹太人都集中到市场广场,拉比瑞夫站在最前面。领到铁锹、扫帚之后,犹太人被赶到纳瑞斯金伯爵府邸,打扫牛棚、马厩。回来的时候,他们在市场广场排成一行,被迫跪在地上。谁的工具没有按他们的要求放好,或者上面的泥土没弄干净,就被毒打一顿。拉比瑞夫的个子特别高,他们就找了一个个子最低的犹太人,把两个人一起套到

车辕里,强迫他们拉着车游街。镇子里的立陶宛人看了以后高兴得拍手叫好。立陶宛游击队的人还组织每天一次的“仪式”,更加残酷地折磨、侮辱拉比瑞夫。他们把犹太人集合起来,强迫他们从他面前走过,并且朝他脸上吐唾沫。游击队威胁那些拒绝朝拉比脸上吐唾沫的人,要把他们就地镇法。拉比恳求他的教友们执行游击队的命令。有的人实在做不出这样的事情,便被当场击毙。

6月25日,一群犹太人被集中到一座犹太教堂。立陶宛人说,要把他们送到拉脱维亚去干活。结果40个人被带到森林里用枪打死。第二天,一个名叫斯塔塞斯·巴塞斯的教师和一个名叫克鲁普塞斯的律师来到教堂,又带走40个人,开玩笑说请他们赴宴。这几个立陶宛人把他们的手绑在背后带到新扎戈公墓,然后全部枪毙。

“扎戈的立陶宛人,”派雷兹曼写道,“无法无天。他们随时都可以袭击任何一个犹太家庭,偷他们的东西,残酷地折磨他们。”

他说,有一群立陶宛人冲进布罗依德太太家。布罗依德太太从二楼窗口跳下去,摔断一条腿。她痛苦地哭喊着,又被他们抬到屋里,放到床上,活活用斧子砍死。他说,这只是许多悲惨事件中的一件。

7月初,所有犹太人都被集中到镇子里一个被划作“隔离区”的地方。他们被允许携带少量物品。渐渐地,男人被处死之后,周围村镇的犹太女人和孩子都被送到这个隔离区。派雷兹曼估计,到这时扎戈隔离区的犹太人大约有六七千。

隔离区不受任何保护,立陶宛人可以自由出入。他们经常骑着马或者赶着大车跑到隔离区,抢走犹太人的财物,谁也

不敢反抗。没有一级政府或者一个机构倾听犹太人的哭诉。他们曾经搞了一个委员会,但没有任何权利。到了晚上,男人们都被锁在教堂里。家里只有女人孩子。立陶宛人经常破门而入,把妇女和年轻姑娘拉出去肆意奸污。至于食物更糟,许多人活活饿死。

就这样一直拖到 1941 年的赎罪节。这一天,从沙维尔来了 30 个德国人,立陶宛游击队队员陪伴着他们。傍晚,军官叫来几个有身份的犹太人,要他们把黄金、钱和其他贵重物品都交出来,同时向他们保证,把犹太人都送到一个有活干,有饭吃,安全,不受迫害的地方。军官还命令所有男人、女人、儿童都要在第二天早晨 6 点到市场广场集合。赎罪节这一天,大部分人都集中到市场广场。一小部分人觉得不大对劲儿,设法把孩子们藏了起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引用了雅各布·卡干恩的证言。他是扎戈大屠杀的见证人。

卡干恩生在克罗克,那是一个离扎戈不远的小村子,只有 150 口人。战争爆发之后,大部分立陶宛城镇的居民都立刻把他们的犹太人邻居视为仇人,极尽欺压迫害之能事。可是克罗克的牧师一直保护犹太人村社,坚决禁止他那个教区的教徒迫害犹太人。不过犹太人还是从村子中心被赶到更贫瘠的地方。在那里,靠给当地农民干活勉强糊口。

8 月中旬,从柴莫尔村和林克瓦村来了一帮全副武装的人。他们已经杀光自己村里的所有犹太人,现在开始参与其他城镇灭绝犹太人的暴行。他们把犹太人赶到市场,然后把他们押上大车,在严密监视之下,送到扎戈。

到达扎戈之后,卡干恩叙述道,他们被送交给当地的立陶

宛人看守。这些看守的头子是一个名叫斯塔特科斯的扎戈当地人。此人是个鞋匠,和扎戈犹太人的关系一直很好,会说一口流利的依地语。他的副手艾斯戈达斯,也是扎戈的一位鞋匠。他们清点了一下人数,把他们划分成小组,然后就把他们关进新扎戈教堂。在那里,他们度过第一个夜晚。

卡干恩写道,隔离区被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在新扎戈,沿泰特希赛嘎斯街。这条大街直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边界。隔离区从市场广场入口开始,直到另一头斯特拉尔斯那幢二层楼房为止,环绕斯维特河岸上的磨房。所有街巷都与那条河相通。隔离区的第二部分在旧扎戈,河的那面,囊括了所有从旧公墓到河的小巷。隔离区的两个部分由斯维特河相连,或者说被斯维特河分隔。

卡干恩估计,隔离区大约有 6000 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许多人都是周围十五六个村子里的幸存者。她们的丈夫已经被杀害。剩下的人都是扎戈当地的犹太人。

隔离区那时还没有完全围起来,光修建围墙的小组就有五六十个。卡干恩在其中的一个小组。他们每天都要干很长时间的活儿,没有星期天,更没有休息日。他说,立陶宛看守那时对他们还不是特别凶残。每天傍晚,他们都要站在新扎戈两座教堂前面做汇报,汇报之后点名。点名之后就把大家分成两队,按照他们的指定分别到两座教堂里睡觉。看守在大门外面加锁。

“我们每天夜里都是和衣而睡,躺在又硬又冷的长椅上,”卡干恩写道。“朝不保夕,心里充满恐惧。好容易熬过一个夜晚,天刚亮,便被立陶宛看守带出去干活。”

只有几个鞋匠和裁缝被允许出去干活,傍晚回到隔离区。

剩下的男人都去干修补围墙或者其他苦力活。由于不和妇女在一起,卡干恩对她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他们的工作之一是把犹太人的家具什物都搬出来,堆到市场广场。驻扎在沙维尔的德军地方司令部派车统统拉走。除了大屠杀前几天,卡干恩还没有见过别的德国人。

隔离区里,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内部组织。负责管理犹太人的是斯塔特科斯、艾斯戈达斯和别的立陶宛人。他们都不穿制服。看守和几个犹太人的头面人物保持一种非正式的关系。但是这几个头面人物已经没有什么影响,更谈不到权力。斯塔特科斯会说一口流利的依地语,而且总是装出一副朋友的样子,向大伙许愿情况很快就会好转。这样一来便麻痹了不少人,并且牢牢地控制了隔离区的局面。实际上,他的警惕性一直很高。他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藏在隔离区,密切注意犹太人的动向。

“大伙想活下去的愿望都很强烈,”卡干恩说,“在他们的欺骗和引诱之下,我们都相信,只要拼命干活,就能找到一条活路。”

不过,人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很少有人自愿出去干活。194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斯塔特科斯要50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第二天早晨到市场广场报到,说是派他们到城外干活。起初因为点名还不太严格,出去干活的人有时晚上偷偷溜走,不回教堂。看守也很少查问。可是到了这时,犹太人受到严密的监视。发现有人逃跑,所有的人都要遭到痛打,而且强迫补齐空缺。

50位牺牲者被带到旧扎戈公墓,集体枪杀,埋进万人坑。卡干恩写道,行刑队的头目是当地立陶宛人中的两个知识分

子。一个叫帕里斯毛斯卡斯,另一个叫包埃塞克,是个教唱歌的教员。包埃塞克说,他这样做是对“犹太共产党员”的报复。因为他的哥哥,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反犹分子遭到流放。

这50个人没有回来,隔离区里一片恐慌。斯塔特科斯像平常一样,在大家住的屋子里窜来窜去,指天发誓,一口咬定那些人是执行特殊任务去了。谁也不相信他的鬼话,更不肯出去干活,劳动秩序全被打乱了。

回想往事,雅各布·卡干恩认为,这一切都是德国人和立陶宛人精心策划的结果。他们先把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杀死,几个星期之后,再集体屠杀剩下的人。

最初的恐惧、不安、沮丧之后,一种令人心神不定的平静笼罩了隔离区,生活又恢复到先前的样子。大屠杀前的一个星期,隔离区周围戒备森严。从别的地方调遣来的立陶宛国民军陆续到达,但是他们躲躲闪闪,似乎不愿意公开露面。卡干恩从那些人里认出几个曾经在柴默尔和林科瓦杀害犹太人的刽子手。谁也不许离开隔离区。日常活动全部停止。拉脱维亚农民去市场的时候,不准走泰特希赛嘎斯街。隔离区里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传说隔离区很快就要封闭,里面的人都要转移到别处。

“没有一个人想到,”卡干恩说,“他们正面临可怕的末日。”

赎罪节前一天,从沙维尔来了一群特遣队^①队员。那之前,扎戈看不到德国人。第二天,所有身体健壮的犹太男人都被集中到市场广场,开始划分新的劳动小组。卡干恩和另外

^① 特遣队:纳粹德国集中营负责处理死者的囚犯分遣队。

几个人想到最近发生的屠杀事件,悄悄藏到广场那头的斯特拉尔家。

后来他听说,立陶宛看守们要按行业划分小组时,广场上乱成一片。大家都害怕大清洗或者类似的屠杀在扎戈发生。几个代表犹太人村社的德高望重的“发言人”向长官提出,他们可以去收集犹太人的财宝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条件是不得封锁隔离区,让犹太人还像先前一样在隔离区生活、干活。长官接受了这个条件。犹太人集中了他们的金银财宝,及时送给那位立陶宛国民军的长官。长官命令所有犹太人第二天都来集合点名。

那天夜里,隔离区周围的看守不见了。“牵制战术”起作用了。犹太人以为平安无事,第二天早晨老老实实来市场广场点名,卡干恩也不例外。立陶宛国民军说,当局将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命令他们再次按行业分成小组。广场上又乱了起来。

弗雷曼德医生那座小楼的阳台俯瞰广场。德军军官曼泰夫站在阳台上叫喊着维持秩序。他痛斥犹太人没有纪律。他说德国人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组织一个营,而犹太人连几个劳动小组也组织不起来。然后,他号召当过兵的犹太年轻人都出来,站在前面维持秩序。对敌人的阴谋一无所知,年轻人们都规规矩矩站了出来。

“我们很快就按行业排好了队,”卡干恩写道,“面对与广场相连的一条条大街、小巷。点名报数之后,有几分钟广场上一片死寂。

“突然,曼泰夫吹了一声哨子。一直藏在广场周围房子里等这个信号的刽子手们,立即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人们一

片片地倒下,牺牲者的鲜血在广场的石板上横流。刽子手们从隐藏的地方出来之后,继续向我们疯狂地扫射。试图逃跑的人被他们抓住之后,乱枪打死。紧接着,敌人开始搜寻藏起来的人。找到之后就枪毙。与此同时,当地的立陶宛人冲进隔离区,把犹太人的家洗劫一空。牺牲者的尖叫声,刽子手的叫喊声,受了伤正在死去的人们的呻吟声在广场此起彼伏。仿佛到了世界末日……真是奇迹,杀人魔王们的子弹没有打中我。我设法找到一个藏身之地……我是从扎戈隔离区逃出来的唯一的幸存者。”

卡干恩没有描绘死难者在广场上最后的反抗,这一点令人惊讶。但是伯·派雷兹曼在他的证词中谈到了犹太人临死前和敌人的搏斗。曼泰夫吹响哨子之后,一位名叫阿尔特·扎果斯基的扎戈犹太人大喊:“犹太人,情况不好!快跑!”人们立刻向四处奔逃,试图躲过向他们泼洒的弹雨。扎果斯基掏出一把匕首刺向一个立陶宛游击队员。两个人一起倒在地上死了。阿夫拉姆·阿克曼手无寸铁,扑到另外一个立陶宛游击队员身上,咬住他的喉咙。最后他被敌人打死。

犹太人的反抗开始之后,德国人向70公里外的沙维尔守军求援。不一会儿,装备精良的立陶宛游击队带着机关枪和白兰地赶来了。那些混乱中逃走藏起来的犹太人都被找了出来。立陶宛人把他们和广场上还没有被打死的人一起扔上大卡车,拉到纳瑞斯金公园。坟坑已经挖好。犹太人被剥光衣服站在坑边,用机枪全部扫死。派雷兹曼还写道,他们不愿意在小孩身上浪费子弹,抓着他们的脚朝树干上狠狠地摔。那些可怜的孩子被摔得脑浆迸流,然后扔进坟坑。许多人干脆活埋。

派雷兹曼也写到罗希尔·门德尔松(就是米尔克向我讲起的那个女教师)怎样在坟坑边生下孩子。

“刽子手们把她放到地上,让她生下孩子,然后把母亲和孩子一起杀死。”

关于这次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在柏林党卫军总部的档案中找到了记录。《苏联动态报告,第55号》,时间是1942年1月11日。这份报告讲述,为了尽可能彻底地清除东欧犹太人,他们都做了哪些努力。爱沙尼亚“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在里加、拉脱维亚,还有2600个犹太人,立陶宛东南部的陶格夫匹尔斯市有962个犹太人。他们都是因为劳动力奇缺才暂且留下来的。在立陶宛,为了肃清农业区和小城镇的犹太人,他们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这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任务。因为共产党,特别是恐怖组织和波兰抵抗运动组织已经和犹太人取得了联系,煽动他们进行破坏和抵抗”。他们还指控犹太人在原先忠诚、合作的立陶宛人士中煽动反德情绪。这份报告对扎戈大屠杀作了如下的描述:

“扎戈的犹太人特别活跃。1941年10月2日,50个犹太人从已经封锁的隔离区逃跑。他们之中绝大多数被抓获,并且在随后立即进行的大规模行动中消灭。在准备对他们集体行刑,押赴执行地的时候,扎戈犹太人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袭击了看守和军警。有几个犹太人因为立陶宛看守搜查不彻底,掏出藏在身上的匕首和手枪,一边喊:‘斯大林万岁!’‘打倒希特勒!’一边朝军警扑去。我们有7个人受伤。抵抗立即开始。150个人被当场击毙。之后,剩下的犹太人在去刑场的时候没有再反抗。”

就这样,按照幸存者的证词和刽子手们的报告,扎戈隔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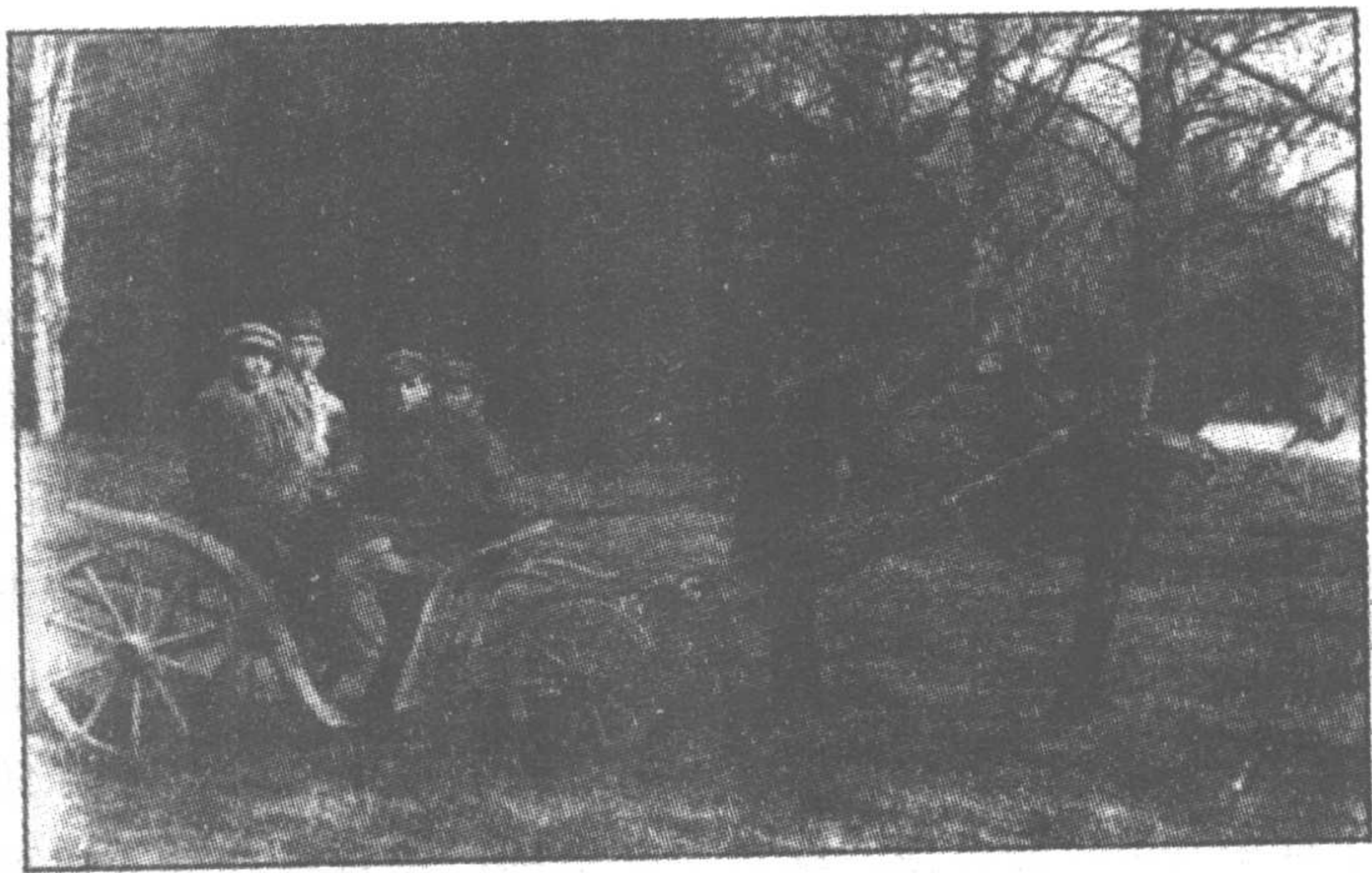
区和它的全部“居民”都被纳粹灭绝了。

当我读到市场广场的恐怖和一片混乱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个子不高的老太太和她的红头发女儿站在人群中。曼泰夫吹哨子的时候,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或者赤身露体站在纳瑞斯金公园的坟坑旁边,面对朝她们举起步枪的立陶宛杀手。斯马尔克长着一张和我的父亲一模一样的面孔。他那熟悉的面影出现在许多地方。那 50 个被骗自愿去袭击德国人,然后在教堂里被杀死的年轻人里或许就有他;教唱歌的包埃塞克为了替他那位被流放的哥哥报仇而杀害的 50 个青年人里可能有他。或者他在市场广场曾经和敌人以死相拼。

但是他们最终和所有那些不幸的死难者融合在了一起。我终于意识到,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离开人世的。然而,这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在我的心目中,所有死难的同胞都是我的亲人。

12 探 索

带着几次采访的录音带,有关文件、文章,还有扎戈大屠杀目击者撰写的那些令人心悸的证词,我离开以色列到纽约,开始了对“客观”历史进行探索的最后征程。YIVO 是我的目的地。按照档案馆负责人的说法,我可以在这儿找到 15 个卷宗的文件和资料。这些材料都是关于扎戈犹太人从 1919 年到 1925 年的情况。而这一段历史正是我要探寻的。我的父母 1919 年从乌克兰流放地回来,直到 1926 年到墨西哥,一直



应召到立陶宛部队当兵,摄于20年代的纳瑞斯

金公园。右起第二人是舅舅伊特兹生活在扎戈。YIVO 的总部设在第五大街玛尔博物馆旁边。1922 年,维尔纽斯的一些犹太人学者仿佛预感到了什么,鬼使神差建立起这样一个机构,开始收集和东欧犹太人文化有关的文件和其他材料。1940 年,这个组织搬到纽约。1941 年纳粹劫掠 YIVO 的档案之前,犹太档案工作者已经设法把许多日记、文件转移到维尔纽斯隔离区。战后,300 万册图书,成千上万的照片、报纸、信件、犹太教的全部经文和一些工艺品被抢救出来,收藏到 YIVO。

YIVO 总部的墙壁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里曾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太太的府邸。穿过铁大门,走进黑白大理石相间的前厅,眼前是漂亮的螺旋形楼梯,晶莹剔透的枝形吊灯,我突然觉得这个豪华的所在和它现在的用途很不相称。

“我们正往格林尼治村^① 一幢算不上华丽的楼房里搬迁。”档案保管员利奥告诉我。“我们这个机构需要一幢更大的房子,而且要和像纽约大学、希伯莱联合学院这样的教育中心保持密切的联系。眼下,YIVO 的许多资料保存在布鲁克林一座库房里。如果找不到你要找的东西,也不要沮丧,”他补充说。“世界各地许多人都来这儿寻根问祖,真正满意而归的却寥寥无几。”

半个小时之后,我已经坐在图书馆一张桌子前面,翻阅分装在两个盒子里 15 个卷宗的材料。岁月流逝,这些描绘扎戈的材料早已泛黄。里面有许多大小不同、字迹褪色的文件。这些文件有的是用依地语写的,有的是用希伯莱语、立陶宛语或者英语写的。有装在薄薄的信封里面的各种票据和私人信件;有出生证、死亡证、结婚证和按姓名、住址、职业分类的各种花名册。除了这些材料,还有官方的信件和文书。信笺和文件头上印着一匹后腿站立的骏马。马背上,一个武士高举宝剑。这个图案上面有一行呈半圆形的字:立陶宛共和国。这是大约 1922 年,独立后的立陶宛共和国的象征。

随后的一个星期,每天早晨 YIVO 一开馆,我就坐在桌子旁边开始查阅资料,直到下午闭馆。我慢慢地翻阅那些卷宗,复印准备以后翻译的文件。我把几封用英文写的信件先放到一边。粗略地、非常失望地翻看着那些用立陶宛语、希伯莱语、依地语写的文件,对图书馆里别的研究者不由得产生了羡慕之情。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颇为明智地雇了一个翻译。

^① 格林尼治村: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部分,是作家、艺术家等聚居的地区。

抚摩着那些泛黄的文件和各种分类账,我仿佛回到久远的过去,看到扎戈那座古老、宁静的小镇。人们在那里出生、结婚、死亡——正常死亡——交租纳税,接受慈善机构的帮助,抱怨苛捐杂税太多,下水道不通,登记选举犹太人地方政务委员会。那是立陶宛犹太人的黄金时代。立陶宛成为国际联盟宪章的签署国之一,为少数民族提供了保障。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犹太人事务部,考那斯街头用希伯莱文写的标牌随处可见。

犹太人村社政务委员会和犹太人事务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来往信件很多。出生、结婚、死亡证明都是用立陶宛语、希伯莱语和依地语写的。给村社地方政务委员会写的信则用希伯莱语和依地语。有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接受村社衣物、现金补助的破破烂烂的花名册,还有皱皱巴巴、折叠处已经碎裂的私人信件。

在这些信件中,有一页空白的信笺,右上角印着:“拉比伊兹拉里斯·瑞法斯,扎戈”。这是拉比瑞夫办公室的信笺。旧扎戈——或者新扎戈?——那位身材高大、视力极差的拉比。1941年,被立陶宛国民军凶残地侮辱、折磨、杀害的拉比。空白信笺上只有他的名字。

好像是为了从那一堆依地语和希伯莱语的材料中暂且“解脱”一下似的,我把注意力集中到4封用英文写的信上。这些信都是1925年之后好多年写的,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立陶宛犹太人想尽办法逃走的故事。这些令人心碎的故事虽然大体上相似,但各有各的不同。1938年10月21日,罗伯特·伯恩斯坦——他在纽约有一座专门生产男人、男童睡衣裤的工厂——给俄亥俄州的丹尼尔·罗宾斯写了一封

信。他在这封信里说,刚刚收到同母异父妹妹寄来的一封信,读了以后心痛不已。

“……毫无疑问,你很清楚他们是在怎样的困境中生活。他们被希特勒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德军侵略。她写信给我说,前些时候,你出于好意,曾经答应把她的女儿接到美国和你一起生活。这些日子,为使女儿尽快移居美国,她跑领事馆,办理有关手续。其中的艰辛难以尽诉。现在她写信给我,说已经多次致函于你,但迄今为止,未见回音……”

三天之后,丹尼尔·罗宾斯写来一封回信:“请你相信,我始终没有忘记把我们的亲戚接到美国。但是要想办好一应手续非常困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给美国犹太人难民及移民援助中心多次去信,而且按照他们的要求,办理了我这里可以办理的所有手续。我还可以告知,我已经签署了对这位亲戚的经济担保。这是办理此类事情至关重要的文件。

“9月16日,我收到从‘援助中心’寄来的一封信,要一些补充材料,他们将把这些材料转交国外有关部门,进一步审核。这样一来,当然需要时间。看来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耐心等待……我相信,我这里小心翼翼所做的一切已见成效。收到玛丽和她女儿的来信之后,我马上办理有关手续……”

另外两封和一位名叫蔡斯·斯瓦兹的妇女有关的信,也充分显示了这架官僚主义大机器运转得多么缓慢。

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39年4月26日,发自犹太人难民及移民援助中心,写给俄亥俄州的塞缪尔·纽曼。“来函收悉。关于尽快得到签证一事,我们实难办到。因为此类事情受移民法之限制。所有申请人必须等到规定的数额,方可获准签证。立陶宛的数额很少,而等待签证前去美国的人很多。因

此,需要长时间的等待方可获准……”

后来,显然是一位名叫迈克·J·柯万的众议员干预了这件事情,1939年6月23日,塞缪尔·纽曼收到考那斯美国领事馆的一封来信。

“我们荣幸地通知您,我们已经收到内务部转来的您1939年6月2日关于蔡斯·斯瓦兹签证一事的信函。蔡斯·斯瓦兹拟办理的是没有优先权的移民签证。

“我处的记录显示,斯瓦兹小姐的申请已获通过。待立陶宛的移民名额下达之后,她便可以办理没有优先权的移民签证。鉴于斯瓦兹小姐的登记日期在1938年11月4日之后,而名额限制又十分严格,她的签证只能在1939年12月之后办理。”

后来我查阅了不少资料,想弄清楚蔡斯·斯瓦兹和玛丽·瓦伦西克女儿的命运,但一无所获。卷宗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德军入侵之前,她们是否已经离开扎戈。

我在YIVO的最后几天,主要查阅还没有看完的那些已经泛黄的材料,复印一些文件和信件,准备回去以后找人翻译出来慢慢地研究。这当儿,我看到一本用依地语写的《1923年选民花名册》。花名册上盖着一个经常可以看到的骑在马背上高举宝剑的武士的徽章。我翻着那本花名册,发现已经知道的几个“老乡”的名字。约费这个姓氏下面有不少名字:赫斯克、里夫卡、阿耶赫、杰尔达、伊兹恰克……突然,我看见祖父西蒙和祖母弗瑞德的名字!他46岁,她39岁。街道的名字已经模糊不清,但他们那幢房子的门牌号数却一清二楚,是1号。约费家紧挨着斯维特河,是那条大街的头一幢房子。我情不自禁喊了一声。花名册上的日期也很清楚。西蒙生于

1877年，弗瑞德生于1884年。1903年，我的父亲出生时，奶奶19岁，爷爷26岁。在别尔佳斯克快结束流亡生活的时候，西蒙得了喉癌。几年之后，就撒手西天了。

西蒙和弗瑞德终于从笼罩他们一生的迷雾中“冉冉升起”，变得清晰起来。我甚至连他们的照片也没有见过。结果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从选民花名册向我走来。

利奥听见我的喊声连忙跑了过来。这时我已经忍不住泪流满面。我把那本写着祖父、祖母名字的破烂不堪的花名册送到他的面前。

“你很幸运。很少有人能从这样一大堆材料中，找到自己家人的名字，”他说。“我还找到一样东西，或许你会感兴趣。”他递给我一个黄褐色的信封。“这是我们这儿唯一一张和扎戈有关系的照片。”

我小心翼翼取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当然不是这张，而是同一底片的另外一张。照片上，一群年轻人爬在山顶——那是米尔山。里面有我的舅舅伊特兹和雷勃。照片背面潦潦草草写着一行已经褪色的字：“大自然爱好者的远足”。

告别利奥和档案馆其他工作人员的时候，我答应他们，请戈泰·特拉贝克把杰克拍的那些扎戈的照片，洗印一些给档案馆寄来。不一定哪天有人会从照片上认出一位姑姑或者叔叔，或者奶奶。

离开纽约的时候，我碰到一位美国妇女。她生在立陶宛，父母都是天主教徒。我们俩一位共同的朋友意识到我和她正从完全相反的“两极”向同一个立陶宛的背景探索时，介绍我们相识。这个女人——我姑且把她叫作布朗妮——不久就给

我写来一封信,解释她为什么要重新审视立陶宛的过去。我知道她所从事的工作不会一帆风顺,而且为她探索本民族历史的真诚深深感动,立即回信给她,介绍了犹太人的历史和我所感兴趣的立陶宛的背景。我们安排在纽约会面。

我们会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彼此的收获都很大。她带来一包书,其中有一本《立陶宛七百年》。她说,这是供他们这一代人学习的不乏“浪漫色彩”的经过“净化”的历史教科书。居住在美国的立陶宛年轻一代,只是通过战争罪行特别审判法庭,才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当年立陶宛人和纳粹一起干过的勾当。在考那斯、维尔纽斯那样神话般的地方,居然有过纳粹的支持者,有过隔离区和大屠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当这方面的出版物、文章多得无法视而不见的时候,那种抹杀历史的行为使布朗妮感到深深的痛苦。在读描绘大屠杀的书籍和犹太人幸存者的证词时,她看到一篇记述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文章,而那屠杀正发生在她的“老家”——一个风光秀丽的村庄。那之前她对故乡的印象,只是一张张人们脸上挂着幸福微笑的照片。

就这样,布朗妮开始了对“事实”毫不懈怠的搜寻。她开始核对犹太人和立陶宛人撰写的本该相同而实际上相去甚远的历史,并且展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情。

“经过一年还算不上仔细的阅读,”她说,“我对父辈的叛卖行为简直无法容忍。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去做那样的事情。”

这次见面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直到今天。这种友谊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我是听着那个遥远小镇快乐与

辛酸的故事长大的。犹太人在纳粹和他们的立陶宛帮凶手里的可怕命运深深印在我的心底。她则是从关于她的出生之地田园诗般的故事中吸取营养长大的。那故事还包括苏维埃政府怎样勾结“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残酷压榨她的民族。我，一个共产党员的侄女，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南非立陶宛犹太人的圈子里。而她，和家人一起在德国难民营度过大部分童年之后，在50年代编织得非常紧密的美国立陶宛人关系网中长大。

假如我的父母一直呆在立陶宛，我也许早就和他们一起长眠于纳瑞斯金公园的万人坑里了。假如她的父母没有在苏军把成千上万的立陶宛犹太人和非犹太教的立陶宛人驱逐出境前几个小时逃走的话，她或许会和家人一起，在西伯利亚度过童年。

我们俩都不相信所谓集体犯罪。

布朗妮提供的材料对于我非常宝贵。那些书，学者、历史学家撰写的文章的复印件，剪报，从立陶宛语翻译过来的资料，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们显示了历史学家和学者们是怎样抹杀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同一件事情解释成另外一个样子。在他们的笔下，牺牲者不但常常变成谋杀者，而且把加工制作的“事实”作为历史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把具有破坏性的古老的神话变成永恒，同时创造新的神话。

比如说在《立陶宛七百年》这本书里，长达500页的鸿篇巨制中只有3处短短的文字提到立陶宛犹太人。而犹太人从14世纪起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占立陶宛总人口的7%。第一处是这样写的：16世纪，外国商人和手艺人来立陶宛定居。“对于农业区被土地束缚的农民而

言,他们是些陌生人。也就在这一时期,犹太人开始进入立陶宛。他们大都来自德国。渐渐地,这里成了东欧犹太人的中心。”

事实上,犹太人至少在 14 世纪即已耕耘这块土地。到 1388 年,维陶特斯大公正式签署文件,承认犹太人在立陶宛的存在,并且详细阐明他们享有的法律的和宗教的权利。

《立陶宛七百年》第二处提到犹太人的地方,是说 17 世纪克梅尔尼凯大屠杀,更是寥寥数语:“暴乱主要攻击对象是波兰人和犹太人。(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屠杀超过了这次屠杀。)”

括号里所说的“这次屠杀”,大约 10 万人在 10 年期间被杀。斑斑血泪岂可一语带过!

至于二战期间的大屠杀,虽然 22 万立陶宛犹太人死于非命,也只给了短短 6 行的篇幅。“立陶宛犹太人遭遇了残酷的命运。从德国人占领开始,他们就被成批成批地屠杀。灭绝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作者没有说,立陶宛行刑队是德国人心甘情愿的帮凶,他们一起制造了这“残酷的命运”。他倒是坦言:“不少立陶宛人因为窝藏犹太人而受到惩罚。”

布朗妮还给我寄来一份只有 800 字的关于扎戈历史的材料。这份材料是她从芝加哥立陶宛文化巴尔扎克斯博物馆找到的,其内容主要是讲扎戈多少个世纪以来和条顿骑士团^①进行的斗争。条顿骑士团一直试图让异教的立陶宛人皈依天主教。犹太人被提到一次,尽管作者承认 19 世纪“大部分居

^① 条顿骑士团:原为中世纪十字军的一个组织,建于 1190 年。

民是犹太手艺人 and 商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归纳成半句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4000名扎戈居民的三分之一被迫离开家园……”并没有说只是立陶宛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而且战争结束之后，当他们从流放地回来的时候，家已经被洗劫一空，成了一片废墟，了无生计，陷入困境。

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只是说：战争结束以后，“扎戈新建了许多公共场所和私人住宅。”

在这份材料里，犹太男人、女人、儿童被屠杀一事又一次被一笔勾销。

而巴尔扎克斯博物馆，布朗妮告诉我，在所有立陶宛组织中，散布的假话最少。也许浓缩了的历史容易被曲解。也许这段历史的作者对扎戈的建筑比对犹太居民的命运更感兴趣。

在布朗妮随后寄来的文章里，我发现，当“合作”这个字眼儿不得不用到的时候，他们总是加个引号，以期冲淡它的含义。而且把立陶宛人和纳粹德国的合作辩解为“适应性行为”。

她的信使我感觉到，从牺牲者的角度出发，更容易接近历史。你感到痛苦、愤怒、伤心、恐惧和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但是如果在你要探索的那段历史中，你的先人是谋杀者，甚至仅仅是旁观者，你就只有三种选择：极力证明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矢口否认他们有罪；坚持不懈，弄清事实真相，就像布朗妮现在正在做的那样。

她发现，许多人对立陶宛纳粹的过去采取矢口否认或者中立的态度。她不愿意向这种态度让步，因而处境艰难。她会因此而疏远她从小与之建立了亲密关系、至今对她仍然十

分重要的立陶宛人的圈子。

“但我决心已定，”她在信中写道，“绝不重新描绘一幅‘美丽图画’而违心地涂抹什么色彩……”

我在研究这幅历史画卷的时候，并没有指望所有的事实都已达成共识，但看起来我还是过分天真——当我发现学者、历史学家、大学教授和别人一样，很少能够超脱一些，对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时，还是感到非常失望。

如此说来，难道没有真正“客观”的历史？难道没有无可辩驳的事实？文件、报告、日记，以及受难者的证词所指出的完全相同的事实难道还够不上“客观”吗？比如关于扎戈毁灭的叙述；或者1941年1月10日党卫军头目莱恩哈特·海德里克在万西会议提出的“最后解决”的方案；或者盖世太保关于在东欧城镇乡村屠杀犹太人的详细名单的报告，以及特别提到的当地居民给予的无法估价的帮助。凡此种种，难道还算不上“无可辩驳的事实”？

历史学家，像文字出现以前他们的先辈——专门唱赞歌的人一样，把国王的名字、国王的业绩，连同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信仰偏见一代一代地传唱下去。如果我们不想重复历史的错误，就必须学习历史。如果我们不敢承认历史，而是否认、歪曲历史，对令人心痛的方面极尽回避之能事，何谈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这样，不但早已被证实是谬误的神话将继续流传下去，而且会给一代代后人增加新的偏见。

整整一代非犹太教的立陶宛人已经在对犹太人的偏见中长大。因为他们的长辈歪曲了犹太人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历史教科书或者学术论文中，犹太人都被描绘为爱惹事生非的少数民族，和当地人格格不入，不真诚、不

老实,和压迫立陶宛人民的苏俄结为同盟。而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为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很少被人们提到。

当95%的立陶宛犹太人被屠杀的事实无法回避、无法否认的时候,他们就祭起这样一件法宝,或者说这样一个荒谬的逻辑:犹太人是共产党,共产党压迫和驱逐了成千上万的立陶宛人,因此犹太人应当对这些罪行负责。当对灭绝犹太人种族的大屠杀不得不承认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是非犹太教的立陶宛人对他们遭受的迫害自然而然的反应。那种犹太人是因为勾结了苏俄才招致自身毁灭的说法实在太卑鄙了,我不想在这里浪费笔墨。

我从 YIVO 的档案室和其他渠道收集了不少材料,布朗妮又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可以暂且放下对“客观历史”的探究,赶快踏上新的征程。现在是回“老家”的时候了。那是我祖先的家,不再存在的家。

第3部

13 维尔纽斯

“就是她！”有人用依地语喊道。“头发花白的那个！”

为了相见的这一刻，我真的等了许久许久吗？

他们站在查验护照的办公室外面，手里捧着鲜花。我们——早已相知的“陌生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丽赫，她的第二个丈夫海尔斯尔；他们的儿子米沙，米沙的妻子阿莎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弗雷达——雷勃从未见过的女儿，她的丈夫尤瑞和他们十几岁的儿子欧内斯特。

“雷扎拉！”丽赫说，她的一双眼睛因为热泪盈眶而显得很大。我早已泪流满面。她往后退了一步，仔细打量着我。“和戈森的嘴巴一模一样。也像雷勃。”

熟悉的名字又开始在我耳边回响。



从左到右:丽赫, 弗雷达, 欧内斯特(站立者),
米沙, 海尔斯尔和阿莎

我们坐着汽车向丽赫和海尔斯尔那幢房子驶去。尤瑞那辆破破烂烂的汽车里面坐5个人,剩下的都坐在米沙的车里。我和弗雷达、丽赫坐在后面。丽赫似乎一会儿也不想和我分开,不让我到前面去坐。“她在这儿只呆一个星期。为什么只呆一个星期?雷扎拉。”

外面下着毛毛细雨,起伏的山岭和郁郁葱葱的树木都看不大清楚。弗雷达曾经当过导游,告诉我维尔纽斯和郊区的小镇建在一块四周环山的盆地,正对内瑞斯河和维尔尼亚河。弗雷达说,维尔纽斯非常漂亮,特别是旧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都是一马平川,连丘陵都很少。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有的立陶宛人还认为地球是一块平地,”她说。“直到16世纪,他们还没有宗教信仰,只

是崇拜橡树。我自己倒更喜欢白桦、松树和冷杉。”

她朝公路两边的白桦林和松树、冷杉指了指。

丽赫一只手抚摩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抚摩着汽车灰色的软座。“这辆车是米沙从德国买的，”她说，“他常常去那儿买布。”

米沙告诉我，他以前是个帽子商。一个月赚 3000 卢布，中等工资。独立之后，他自己开了一家小工厂，生产裤子和衬衫。几年之内，就可以花 30 万卢布——折合 2500 美元——买一辆 Wartbrug 牌小汽车。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引入非常欢迎。

弗雷达却有不同的看法。她说，物价飞涨，房租、公共交通、食品的价格更是直线上升，人们对自己的工作缺乏安全感。她的丈夫尤瑞是个工程师，不得不提前退休。她现在也只能上半天班。她在文化部工作。几年前，通过单位，花 8000 卢布买了一辆俄罗斯产的拉达牌小轿车。

“现在我们连这辆车也快养不起了。只有尤瑞开开。我出过一次车祸，碰断了鼻梁骨，一开车就紧张。”

弗雷达基本上跟我讲依地语，有时候也夹杂几个英文句子。她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书时学的是英国文学，但是没有机会讲英语。我们俩之间的通信联系也是断断续续，

“你讲依地语就像讲英语一样，”她模仿我的发音。“我可从来没听过这种依地语。”

“你讲依地语时，就像一个伦敦佬，”我说。“俄语里是不是没有 h 的发音？没有定冠词和不定冠词？”

“I’ ave big’ at，”她开玩笑地说，故意省掉 h。“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互了解。我们说的一切都发自内心。”她又把

“心”——heart，故意说成 eart。

丽赫和海尔斯尔住在维尔纽斯旧区。穿过一道石头拱门，走进一座用大卵石铺成的院子。几只癞皮猫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猫尿味扑鼻而来。顺着几级木头台阶走进昏暗的门廊，一股潮湿的、熟悉的气味又和猫尿味儿混合到一起。后来丽赫告诉我，他们在进门的地方又开辟了一个卫生间。她和海尔斯尔都老了，冬天出去上厕所很不方便。

昏暗之中，几乎看不清楚前门在哪儿。推开门却是另一番天地。明亮的厨房干净得一尘不染。厨房左面一扇门通往一间不大的卧室，右面一扇门与起居室相连。这间屋子很大，顶棚也很高。

“我的两个儿子都生在这个屋子里。就在那张长沙发上，”丽赫说。“弗雷达不在这儿。她是1943年生的，在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但他们都是在这儿一块儿长大的。最小的儿子阿列克现在在以色列……哦，还是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聊。”

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大碗的罗宋汤^①、大盆的煮土豆、腌鲱鱼、清炖鲱鱼、鱼冻丸，还有好多从小就熟知的好菜。我回到了立陶宛好客传统的发源地。

面对丰盛的宴席，我十分惊讶。“人们告诉我，你们这儿什么都缺。”

“这是米沙的本事，”丽赫解释说。“他干得不错。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上。”

米沙40多岁，黑头发，胖乎乎的圆脸，一双明亮的眼睛。

^① 罗宋汤：以牛肉、卷心菜、土豆等或用甜菜煮成的浓汤。

睛总是荡漾着笑意。他从桌子那边走过来，往小酒杯里倒冰镇伏特加。表示了欢迎之意之后，对我说，要一口干掉。“干杯！”他笑着说。

“母亲告诉我，犹太人不喝酒的，”他给我倒酒的时候，我这样说。

“可不是嘛，”丽赫叹了一口气说。

弗雷达悄悄告诉我，战争期间，海尔斯尔喝酒喝得很凶。不过他无论在言语上还是行为上，都不曾过分失态。下班后，他经常跌跌撞撞回到家，爬上这张长沙发倒头就睡。这是他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

丽赫给我唱了一支小曲。这支歌说的是，一个不思改悔的酒鬼在坟墓里抱怨说，死了以后最糟糕的事是没有酒喝。

*Az men' t aruf gein oifen bashailem
Vet men zoggen az a pyanitze likt do
Vel ich entfernen mit a troierikke shtimme
Az do iz kain branfen nisht do .
Vos hob ich gezindikt mit der mit?
Ich hob getrunken branfen
Un farbissen hob ich nit ,
ich hob getrunken branfen...*

弗雷达给尤瑞翻译这首歌。“他在圣彼德堡长大，”她解释说。“只会说俄语。数学和下棋是他的长项，学语言没天分。”

弗雷达的儿子欧内斯特的母语是俄语和立陶宛语，他还懂依地语。因为经常和外公、外婆在一起。在学校里，他还

学英语。米沙和他的妻子阿莎听得懂依地语，可是几乎连一个句子也不会说。他们的儿子一个19岁，一个6岁，对依地语更是一窍不通。

“我从来没有想到，在立陶宛会碰到不会说自己母语的人，”我说。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母语是俄语，”弗雷达说。“在学校里学一点立陶宛语，但是没人重视。独立之后，情况也许会发生变化。”

“独立，”丽赫哼了哼鼻子，轻蔑地说。“谁知道独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1990年，一个和我作了20年邻居、总跟我说俄语的非犹太教女人，突然责问我：‘你们犹太人为什么总说俄语？为什么不说立陶宛语？’她的话就像一把刀子刺痛了我的心。我对她说：‘会说立陶宛话的犹太人都躺在万人坑里。万人坑！这个国家到处都有。’”

米沙、弗雷达、欧内斯特都用俄语和她争论。她朝他们摆了摆手。

“我的立陶宛爱国者们，”她说。“你们对自己的过去知道得太少了。”

米沙换了个话题。“雷扎拉，你是我的姐姐，”他一边给我倒酒，一边结结巴巴地用依地语说。“我干了这杯，你也干。”他的妻子阿莎是小学英语教员，用很不流利的英语跟我交谈。

“没有练口语的机会，”她说。她读和写比说强得多。

尤瑞开始用俄语长篇大论致欢迎词的时候，全家人都哼哼唧唧地抱怨起来。“雷扎拉，”他说。“我们刚刚找到的姐姐……”他个子不高，秃顶，浓眉大眼，留着灰色的唇髭。

“翻译！”他不停地催促弗雷达。

尤瑞在这个家里，也是个讲笑话能手。他不时跳起脚来，举起一只手，宣布：“趣闻！”弗雷达不愧为一个好演员，连比带划，把他的幽默传达得非常准确。

整整一下午，都是在俄罗斯伏特加制造的飘飘欲仙的感觉和新找到的家庭的温馨中度过的。还没有面对那或许属于我自己的过去，

“雷扎拉，”米沙要走的时候对我说，“告诉我，你想到哪儿，想看什么。我带你去。”

“扎戈，”我毫不犹豫地说了。

“明天我们就去扎戈。”

“我们还没在一起好好说说话呢，”丽赫表示反对。

我犹豫了一下。我不想打搅他们，本来打算雇一辆车自己去。可是弗雷达对我说，他们已经把什么都安排好了。她已经请好假。米沙的儿子利奥尼替父亲照顾工厂的事儿。她和米沙都没去过扎戈，都急着想去看一看。丽赫和海尔斯尔也一定要跟我们去，尽管弗雷达怕又勾起他们对往事痛苦的回忆。

海尔斯尔喝多了伏特加睡觉去了。尤瑞和欧内斯特到加油站排队加油，至少得一个小时才能回来。弗雷达见我要去刷碗，连忙把我推到一边。

“我妈想和你说话呢，”她说，“趁现在海尔斯尔不在旁边。他们虽然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彼此还有些不愿意让对方闯入的‘禁区’。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大屠杀中被杀害，而妈妈从来没有忘记我爸爸的死。”

起居室一角有一个灰色瓷砖砌的炉子，把屋子烧得暖融

融的。屋子里只有我和丽赫。外面还在下雨，窗户正对小院，灰蒙蒙的光透过橘红色的窗纱照射进来。丽赫和我坐在那张曾经诞生了她的两个儿子的长沙发上。桌子已经擦过，铺着亚麻油毡的地板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屋子那头，一个镶玻璃门的橱柜里放着几件陶瓷工艺品和一套大小不同的玻璃杯，还有丽赫几个孙子的照片。

“都是我的宝贝，”丽赫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从哪儿开始呢？雷扎拉。从哪儿开始？自从1946年，战争结束一年之后，我就没有再回过扎戈。离维尔纽斯400公里远。不过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我只能在现实中生活，要不然，就得发疯。不，不，我也需要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那些事儿就像埋藏在心底的癌，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我。你想知道什么呢？”

“什么都想知道。先给我讲讲父亲家的事。尤其是我的祖父西蒙。他在我家好像一直是个犯忌的话题。至于我的祖母弗瑞德，我也只知道她的日子很艰难，她长了一双美丽的褐色的眼睛。三个最小的叔叔姑姑，我知道的就更少了。”

“约费家，”丽赫说，“像扎戈大多数人家一样很穷。西蒙有一辆大车，几匹马，经常拉着人们到拉脱维亚。他会说好几种语言，认识海关的所有官员，可以帮助他的乘客办propisk和别的证件。你不懂什么是propisk？哦，弗雷达，”她朝厨房喊了一声。

“告诉雷扎拉，什么是propisk。”

“护照！”弗雷达在厨房大声说。

“听说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相好，”我说。

“另外一个女人？我那时候太小了，不大懂这种事儿。”

我只知道人们都说，弗瑞德日子过得很艰难，因为西蒙有外遇。外遇，你总该明白吧。西蒙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雷勃就像他。戈森个头矮了一点。”

丽赫家住在戈森和雷勃开的理发馆的楼上，市场广场对过。前面是个很大的房子，用作编织车间。她的父母、一个哥哥，还有三个学徒，在那儿干活。

“上完小学之后——最穷的人家也要送孩子上学，学习读、写和算术——我也成了编织车间的学徒。雷勃对我就像对他的小妹妹。他比我大6岁。后来他对我说，最早是我们家饭菜的香味儿吸引了他。我们家的人都烧得一手好菜。你再吃一块蛋糕好吗？吃块小的。不吃了？你怎么就吃那么一点儿东西？像只小鸟。”

“我就不记得还有不爱雷勃的时候，”她继续说。“那时候，我经常看见他和别的漂亮姑娘在纳瑞斯金公园散步。一个人气得偷偷地哭。和他比，那时我是太小了点儿。我个子不高，胖乎乎的，长得倒是满漂亮，梳着两根粗粗的辫子，在背后晃来晃去。”她指了指长沙发后面墙上挂着的那张大照片。“我心里想，要是剪成短发，一定显大，雷勃就会注意我。于是我就跑到楼下的理发馆。戈森热情地问候我。雷勃正忙着给另外一位顾客理发。‘我能帮你什么忙吗？丽赫。’戈森问道。他以为是我妈妈打发我来办什么事情。我那时才13岁。‘我想把辫子剪掉，剪成短发，’我说，羞得满脸通红。他们一定都猜出了我的目的。‘剪掉这么漂亮的头发？’戈森喊了起来。‘快回家去，小东西。我敢保证你妈妈不知道你干啥来了。’

“泪水夺眶而出，我三步两步跑到楼上。雷勃假装没看

见这一切。过了一会，他像平常一样上楼跟我们一起吃午饭。我藏在车间里。吃完饭，要下楼干活的时候，他找到我，捧起我的辫子吻了吻，说：‘丽赫，不要改变你身上任何一样东西。我等你长大。’

“我们等了好久好久，直到1941年6月才结婚。结婚没几天，就逃到俄罗斯。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问她，雷勃都参加了哪些政治活动。

“这方面的事儿，我一直不大清楚。雷勃和我的姐姐卡娜、他的弟弟费沃克都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成员。我只知道他们在秘密会议上收听俄罗斯广播电台的广播。在立陶宛那是非法的。他们一直等待革命的到来。”

丽赫告诉我，对于犹太人来说，德国人侵略立陶宛3年前，战争就开始了。一批流氓无赖经常打破犹太人家的玻璃，拆下他们的大门，抬到广场砸个粉碎。有一天，他们袭击几个在犹太人宰杀牲畜的屠宰场干活的年轻人。

“那几个犹太小伙子成天搬运一扇一扇的牛羊肉，个个力大无比，把流氓们打得狼狈逃窜。好一阵子他们没敢再找事儿。可是接下去那个一年一度的大集——这种集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们，一群恶棍开始朝犹太人扔石头。大家都觉得一场灭绝种族的大屠杀随时都可能发生。他们大喊：‘杀死犹太人！’的时候，我的一位堂兄柴依姆·贝特勒、他的朋友卡尔曼诺维奇和另外几个小伙子跟他们打了起来。那位堂兄举起旁边放着的一扇铁门朝他们砸过去。匪徒们拔腿就跑，有好几个月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

丽赫说，到1939年年底，战争爆发前，费沃克在市场广场碰上三四个歹徒。他们把他推倒在地上，骂他是该死的

犹太布尔什维克，还扇了他几个耳光。雷勃听见外面的吵闹声，连忙跑出理发馆，去帮费沃克。他也被他们打了。在随后的扭打中，他打倒一个歹徒。警察来了。非犹太教的目击者一口咬定，事情是雷勃引起的。犹太人旁观者的证言被置之不理。他们把雷勃抓起来，以打架斗殴罪判他两个星期的监禁。为了进一步侮辱他，还责令他扫大街。雷勃不服提出上诉，取保候审。

“雷勃觉得判得不公平，”丽赫说。“他是为了自卫，为了保护费沃克，才跟那几个流氓打架的。到头来他们反倒逍遥法外。雷勃立刻给他服兵役时认识的一个非犹太教的 nachailnik 打了一个电话……你不知道什么是 nachailnik? nachailnik 就是……哦，弗雷达！雷扎拉不懂得什么是 nachailnik。你告诉她是什么意思。”

“大官儿，上尉，反正是军官之类的人吧。”弗雷达用英语说。她提醒丽赫，我不懂俄语。

“谁说俄语了？哦，我刚才说了，雷勃服兵役的时候，和这个当官儿的交上朋友。那人也是共产党。后来，他成了离我们不远的阿克曼加镇监狱的头头。

“雷勃向他讲明情况后，这位长官——他的名字我忘了——让他等天黑后从扎戈溜出来，到阿克曼加。他到了之后，那人就给扎戈警察局打电话。‘我已经拘捕约费了，’他对他们说，‘我打算就把他关在阿克曼加监狱。我知道该怎么收拾他这种人。’他向他们保证。扎戈警察局巴不得赶快有人把他弄走，因为镇子里犹太人已经群情激奋。长官当然知道如何‘收拾’雷勃。白天，他让雷勃呆在阿克曼加监狱办公室，晚上就回他家睡觉。”

雷勃的朋友们想了一个巧妙的、不至于引起警察怀疑的办法去阿克曼加看望他。他们组织了一场和阿克曼加足球队的比赛。几天之后，扎戈“拉拉队”带着一个装满精美食物和饮料的食品篮来到阿克曼加，慰劳雷勃和那位长官。

“那天，我从早晨到傍晚，一直和雷勃呆在一起，”丽赫说。“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扎戈队输给了阿克曼加队。或者他们这样宣称。”

1939年，纳粹—苏维埃互不侵犯条约签定之后，对立陶宛犹太人的骚扰愈演愈烈。在纳粹和俄罗斯瓜分东欧的时候，立陶宛落入苏维埃之手的可能性极大。立陶宛民族主义者把满腔愤怒发泄到犹太人头上。他们成群结队从扎戈的大街上走过，高喊：“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他们砸烂犹太教堂的玻璃，冲进犹太人家里打砸抢。那以后好几个月，犹太人不街上街。

“其实扎戈犹太人里共产党员并不多，”丽赫对我说，“可是匪徒们把犹太人都说成共产党。1940年，他们盼望已久的革命不流一滴血就成功之后，雷勃、我姐姐和他们的同志们确实欣喜万分。生活将更安全，更公正。人人都将有工作做，有书念，有更好一点儿的房子住。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将永远成为历史。那些号称‘铁狼’的流氓无赖将被赶回到森林里，那儿才是他们应该呆的地方。

“他们相信革命就像信教的人相信上帝一样。雷勃对戈森一直耿耿于怀。他经常说，戈森青年时代一直为革命成功努力工作，可是最后，为南非的黄金抛弃了理想。但是我觉得戈森比较理智，雷扎拉。也许我年轻，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就连傻瓜也能看出，事情不像雷勃和我姐姐卡娜想

得那样简单。他们说，新生活已经开始了。让我给你讲讲那是怎样的新生活吧。

“有一天半夜，俄国人开进扎戈，在我们家住的那幢楼，也就是雷勃开理发馆的那座楼，设立了总部。他们带来一箱箱书、小册子和别的宣传品。第二天，人们被集中到市场广场，一个军官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就是我经常站在那儿看农民们在赶集的日子支起货摊的阳台——宣布，扎戈已经归苏维埃管辖。然后，一辆坦克轰隆隆开过小镇。这就是革命的开始。”

第二天，所有的商店和作坊都被年轻的政治委员控制。他们允许业主——大多数是犹太人——当顾问，但是不许他们管钱。

“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丽赫说，“俄国人的到来还是一件好事。首先，反犹太人的匪徒们都从城里消失了。我们又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大街上走了。少数几家有钱的犹太人和隐藏粮食不交的富农被流放。大多数人因为都是穷人，并没有因为革命遭受背井离乡之苦。极端的立陶宛民族主义分子也被送到西伯利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逃进大森林，后来都成了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帮凶。他们叫喊，所有犹太人都是布尔什维克。我的姐姐卡娜是共产党员，雷勃是共产党员，费沃克是共产党员。可是我母亲和父亲是共产党员吗？我7岁的小妹妹是共产党员吗？所有那些躺在纳瑞斯金公园万人坑里的犹太人都是共产党员吗？”

“不要太激动了，妈妈。”弗雷达从厨房里面走出来。“今天就讲这么多吧。尤瑞和欧内斯特随时都会回来，我还听见爸爸的房间里有响动。明天我带雷扎拉到维尔纽斯城里逛逛

就回来，你还可以接着再讲。”

“我要讲完，”丽赫擦了擦眼泪，坚持着。“你问雷勃革命以后做什么工作？他是个 perevotchik。”

“翻译，”弗雷达说。“你又说俄语了，妈妈。”

“哦……俄国人让他当 perevotchik，因为他会说、会写波兰语、俄语、立陶宛语。德军入侵波兰之后，大批难民涌入立陶宛，他们需要会说波兰话的人跟那些难民打交道。扎戈有一个波兰学生难民营。都是从维尔纽斯逃来的。1939年，维尔纽斯还在波兰人的统治之下。雷勃搞了几个月的难民工作，然后被调到 Voyen Kamat。Voyen Kamat 用英语怎么说？你能断定这不是依地语？弗雷达，给雷扎拉解释一下，Voyen Kamat 是什么意思。”

“Voyen Kamat 就是报名当兵的地方。”

“雷勃那时还不算部队的人。他只是在那儿工作。他的任务是和农民们谈话，记下他们有多少土地，多少牲畜，多少马。谁知道他们了解这些情况干啥。”丽赫耸了耸肩。“他不大跟我谈他的工作，不过我知道他的事儿很重要。他总是在画表格，没完没了地画表格。”

“那时，他的家庭负担已经不重了。最小的斯马尔克将近20岁，已经接管了理发馆。他的妹妹布雷娜也跟我学会了编织技术，她给尤代金的儿子干活。他们还跟你奶奶弗瑞德住在一起。弗瑞德已经老了，浑身是病。我和雷勃带她到沙维尔看过医生。不知道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反正肚子总胀。费沃克一家搬到了沙维尔。亨克最终嫁了那个里加来的小伙子。你一定听说过她和本兹的恋情吧。唉，那真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你一定纳闷，我和雷勃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结

婚？起初是我年纪太小，后来是他得照顾家。戈森有理智，结婚以后就远走高飞到墨西哥了。我倒不是责备他。我是说，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都落在雷勃的肩上了。

“等我们能结婚的时候，那个 Voyen Kamat 又搬到沙维尔。雷勃也跟着去了。他在沙维尔一家犹太人开的编织厂给我找了一份工作。我还记得那家工厂的名字挺有意思，叫墨丘利。我很快就适应了那儿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好，雷勃为此非常骄傲。有一首歌可以描绘我对雷勃的感情。

*... Ich vel gain durch alle gassen
Un vel shrayen, "ves tzu vassen!"
Nor mit dir in einem zein.....*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做什么都愿意，
哪怕走街串巷吆喝：“洗衣！洗衣！”

“可我们还没有结婚。找不到房子。我和已经怀孕的姐姐卡娜住在一起。她的丈夫、孩子和雷勃一起住在费沃克家。

“费沃克只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栗色的头发，像布雷娜。不是红头发，”丽赫特别强调。“栗色。弗雷达在集体农庄出生之后，雷勃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她头发的颜色。虽然死神正追赶着他……

“雷勃在沙维尔呆了6个月，我呆了5个月。然后战争就爆发了。世事变化得真快。我们的世界一下子坍塌了。纳粹侵占立陶宛的时候，俄罗斯全线撤退。他们的支持者有的逃走，有的藏了起来。雷勃等待一生的革命突然结束了。前

后整整一年。

“这么快？”丽赫看了一眼走进起居室的尤瑞和欧内斯特说。“雷扎拉，我需要一年而不是一个星期，给你讲我经历的一切。明天来吃午饭。我把剩下的讲给你听。”

14 谁的耶路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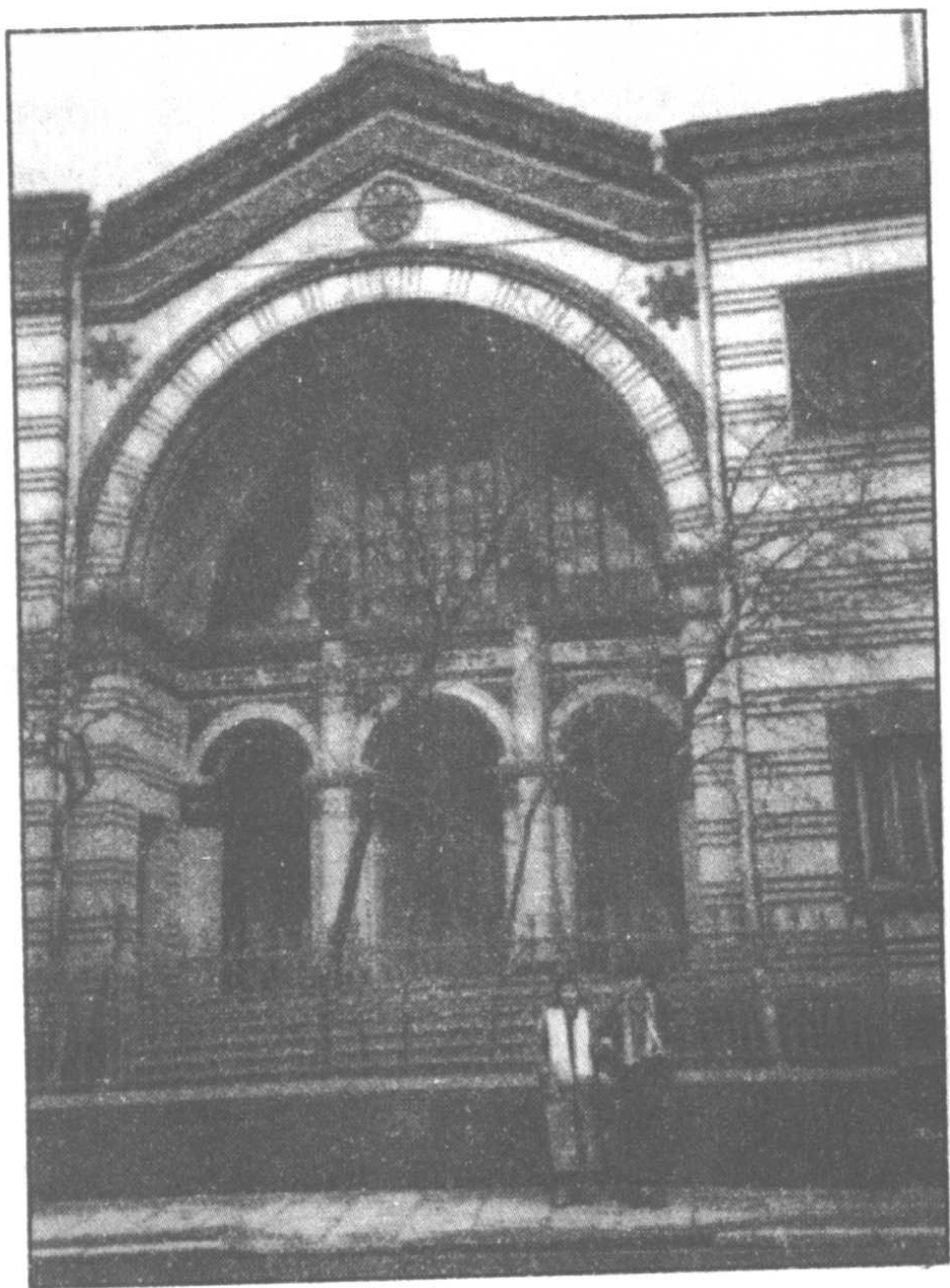
弗雷达一家住在离市中心大约 10 分钟远的住宅小区。但是尤瑞开车，路就显得格外长。他是个过分小心、甚至有点紧张的“司机”。一路上，他和欧内斯特用俄语争论不休。直到弗雷达出面干涉，车里才恢复宁静。不过那时尤瑞的车已经拐下大路，颠簸着开上一条雪水浸泡过的、高低不平的小路。几排三层楼房出现在眼前。楼房和楼房之间草坪相连。时令还早，草坪上的树光秃秃的，还没有长出叶子。

我问弗雷达那些树叫什么名字。“酸橙，”她告诉我。“人们也管酸橙花开的那个月叫‘酸橙’。那是 7 月，黄色的花儿挂满枝头，散发出醉人的清香。”

下车的时候，她告诉我，雪刚刚开始融化，所以人行道两边一片泥泞。向那幢楼房走去的时候，她很热情地问候那些面无笑容的邻居。

“这儿住着许多艺术家和音乐家，”她说。“我因为是搞文化工作的，所以通过关系在这儿搞到一套房子。关系，”她补充道，“在我们这个国家，干什么都得靠关系。”

“你的邻居为什么都那么一本正经，面无笑容，是对犹太人怀有敌意，还是日子过得不顺心？”我问弗雷达。“连小



维尔纽斯仅存的犹太教堂

孩儿也那么闷闷不乐。”

“眼下，大家的日子都很艰难，”弗雷达说。

“这我明白，弗雷达，但是，你，作为一个犹太人，对于在立陶宛生活到底有何感想？”

“我一辈子都在这儿生活。我是立陶宛人。我的朋友、同事都是立陶宛人。他们知道我是犹太人，我也知道他们是天主教徒。我在单位是唯一的犹太人，但是并没有感觉到有什

么不好。我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雷扎拉。不过这事一下子很难说清，”她说，领我走进那座楼。

欧内斯特和尤瑞在我们后面蹒跚地走着，提着我的箱子和手提包。来立陶宛的时候，人们都劝我，尽可能多带东西。他们什么都缺。

那幢楼的门洞没遮没挡，像座地堡。我们爬上两截十分粗糙的水泥楼梯，楼梯边是一溜锈迹斑斑的栏杆。墙上连灰泥都没抹。欧内斯特打开门，一本正经地说：“欢迎到我们美丽的家。”

一截很短的走廊通向右手的餐厅。屋子很小，勉强放得下一张小桌，两个长条凳子，一个书柜，和欧内斯特睡觉用的可以折叠的长沙发。几个房间都铺着亚麻油毡或者破旧的地毯。墙壁和几件木器家具已经多年没有刷过油漆。

第二个房间也是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个五斗橱。厨房很小，浴室更小。厕所在前门后面，和餐厅相对。我看了总觉得不大顺眼。

尤瑞把我的箱子放到客厅。这是这套房子里面最大的一间，铺着地毯，放着一张沙发床、几把靠背椅、一张小圆桌和一个陈列橱。和丽赫家那个橱柜大同小异。一扇推拉门挂着淡橘黄色的勾花窗帘，下午的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这扇门和阳台相连，阳台上堆放着杂物。

“你们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住了，”我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款待。可是他们3个人一起用俄语、依地语、英语跟我争论，说我是他们家最尊贵的客人。他们巴不得我的丈夫和儿子都来，睡觉的地方总归有的是。

“吃点儿什么吗？雷扎拉，”弗雷达问。我加重语气说

不。弗雷达笑了起来。“哦，我知道，我现在絮絮叨叨像我妈了。她没完没了往我盘子里夹菜的时候，我总是不高兴。我们曾经度过那么多饥饿的日子，她总怕我吃不饱。你看我像挨饿的样子吗？”

当然不像。她 5 英尺 2 英寸高，很结实，充满活力，很少有安静下来的时候。黑发齐肩，额头上，漂亮的刘海把一双黑眼睛衬托得更加美丽。

我们俩的父亲是亲兄弟，不但性格相似，文化背景相同，而且长得也很像，可是我和弗雷达真有天渊之别。但是我们肯定能找到一种非常深刻的内在的联系。

尤瑞和他的一位同事参加象棋比赛去了，欧内斯特也拿着我送他的那些“西方来的礼物”向朋友们显摆去了。弗雷达和我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谈话。这谈话将贯穿我在立陶宛呆的所有日子。我们简直有一生的话题要谈，有许多个“如果……会……”要探讨。包括“如果戈森 1927 年不离开立陶宛，会……”

“他写来的信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温暖，或者……该怎么说呢？同情。他帮助我理解了我的母亲。妈妈和海尔斯尔结婚的时候，我年纪还小。那时候我非常不高兴。她经常跟我说，爸爸多么漂亮，多么聪明，多么有音乐天才。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我想，也许连雷勃本人也无法和妈妈心目中的这位英雄比美。”

“我也把他理想化了。我甚至给我的大儿子取名雷勃，”我说。

“海尔斯尔这个人很淳朴，也很单纯。他在市场上干很重很累的活，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喝酒，为的是忘记过

去的伤心事。但他从来不大喊大叫。他干完活，回家之后便蒙头大睡。‘你不是我的父亲，’我对他说。‘我的父亲已经死了。’他听了之后非常难过。他完全拿我当女儿看待，甚至比对自己的儿子还亲。但我还是想念自己的父亲，渴望得到父爱。我把这一切都写给戈森。戈森非常理解我。他说，我绝不能忘记自己的父亲，但是海尔斯尔把我养大，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戈森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

“是的，”我说。“可是20岁那年，我参加左翼的犹太人复国运动，并且要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就不宽容了。”

“他跟我说过这事儿。他说，他理解你，知道你想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可是他不愿意让你受苦。他想把你从苦难之中拯救出来。”

“就像当年他的父亲想拯救他一样。”我给她讲了1915年，戈森一家被流放到别尔佳斯克的时候，爷爷不让爸爸参加革命活动的故事。“父母亲这种苦心其实没用。我想人总得自己从错误中接受教训。你到叶莱茨祭扫过雷勃的墓吗？”

“没有。过去，我经常求妈妈带我去。可是一直没能如愿。起初是没钱；后来，她重新组织了家庭。叶莱茨离维尔纽斯很远，没有直达的火车。等我长大成人之后，自己的麻烦事儿也不断。”

弗雷达非常喜欢舞台艺术。她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了4年戏剧和文学。毕业以后到乌拉尔的一个剧团工作，演戏，写剧本。丽赫坚决反对弗雷达干这一行。她一口咬定，一个体面的犹太姑娘不应该过这样一种生活。头几年，弗雷达对妈妈的态度置之不理，但最终还是屈服了她的意志。

“你知道妈妈们会干出些什么事情。她们会生病、哭泣、

叫喊、让你产生歉疚之感。她住院之后，我就不得不回家照顾她。这以后，生活变得更复杂了。结婚，离婚，再结婚。欧内斯特出生之后，就更没机会去叶莱茨了。演员也没当成。现在我倒也没离舞台，但只是一名文化工作者。”

许多年，她一直是铁路工会的文化干事。她编剧，组织音乐会、辩论会，从苏联各地邀请音乐家、歌唱家和其他表演艺术家来维尔纽斯演出。她邀请过哈萨克斯坦歌舞团，列宁格勒一位著名小提琴家和莫斯科芭蕾舞团。最近几年，她一直在警察部队文化宫搞同类工作。

“从我和警察有限的接触看，”我说，“他们更需要靶场，而不是文化宫。”

“我们还有设备齐全的健身房，”她说。“不过有的警官也来听音乐会，看戏。”

她告诉我，文化宫现在也对外开放。人们经常成群结队地来看演出。不过独立以后，情况有很大的变化。许多人没有工作，票价飞涨，很难请来第一流的艺术家和表演团体。

“现在我们必须盈利，”她说。“对我们国家，这也是新玩意儿。我们给年纪大一点的人办交谊舞会，给年轻人办迪斯科舞会，还搞其他娱乐活动。上星期我们还请来一个催眠术士表演，礼堂里座无虚席。通俗文化。我们没有安全感。许多同事都失业了。”

丽赫告诉过我，弗雷达现在只上半天班。为了贴补家用，她不得不在文化宫再做点清洁工作。每天演出结束或者舞会散场之后，她就换下那套好一点的衣服，穿上工作服，擦地板，打扫厕所，用小推车把垃圾运走。尤瑞的退休金也不够花，只能到米沙的工厂当个仓库保管员，赚点外快。

我们俩一直谈到凌晨2点，才上床睡觉。睡着之后，做了一个又一个恶梦：丽赫背着已经长成大人的弗雷达，在雪地里拼命挣扎；我的父亲——我已经好多年没梦到过他了——从正燃着熊熊大火的村子里跑出来，边跑边喊：“等等我！等等我！”我在黑暗的森林中奔跑着，被砍伐后剩下的树根绊得跌跌撞撞，在厚厚的落叶上打着趔趄。

“今天我们带你游览维尔纽斯，”吃早饭时欧内斯特说。早饭是很肥的熏肉，两种奶酪，黑面包和尤瑞早晨从市场上刚买来的一听里加西鲱。

他们争论先到什么地方。欧内斯特说，应该先到烈士山。他是一位立陶宛爱国者。弗雷达建议先参观37座教堂中几座有代表性的建筑。尤瑞则坚持先登城堡山。因为从那儿可以俯瞰维尔纽斯全景。我们谈话的时候，欧内斯特见我切掉盘子里熏肉上的肥油，大惑不解。

“这是最好吃的部分！”他惊讶地叫了起来。

“气候炎热的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和我们不同。”弗雷达在桌子下面踢了踢他的脚。

“真怪，”他用英语说。

我心里想，立陶宛语和俄语里或许连“胆固醇”这个词也没有呢！

第一站是弗雷达的文化宫。那是一座样子独特、看起来又挺不顺眼的水泥建筑，轮廓模糊，仿佛和早晨灰蒙蒙的天空融为一体。欧内斯特和尤瑞在车里等我们。弗雷达带我到二楼她的办公室里看了看。楼上的房间狭窄、拥挤。弗雷达的办公室也很小，而且和另外一个人共用。

“我们就是从这儿，”她苦笑着说，“把文化传播到全国

各地。”我们走进一楼那个很大的、设备齐全的健身房，看见几个年轻人正在锻炼身体。

“什么都是文化，”她领我向剧场走去。

她站在舞台正中，面对观众席，伸开双臂，对想象之中报以热烈掌声的观众鞠躬谢幕。

“开个玩笑，”离开剧场时，她对我说。“不过那曾经是我最美好的梦。”

从城堡山的塔楼上极目远眺，我看见教堂橘黄色屋顶上的尖塔直刺云端；旧城的石板路弯弯曲曲；城市周围的青山绿树葱茏；多少个世纪以来，内瑞斯河和维尔尼亚河阻挡了十字军东侵和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城堡山下是盖德米纳斯广场。广场上有一座雄伟的教堂和高高的塔楼。

弗雷达和欧内斯特争着给我讲它的历史。

“……你看见那条大街了吗？那是维尔纽斯最主要的大街。从教堂广场——已经有 600 年的历史——到一会儿带你去看的国会大厦，整整一英里长。我们国家不同的统治者赋予它不同的名字。沙皇时代是特沃斯科依；波兰人占领的时候是米凯维支；苏联时代，起初叫斯大林广场，到了 50 年代又改名为列宁广场……”

“现在，”欧内斯特抢着说，“才终于有了它应该有的名字——盖德米纳斯。”这位盖德米纳斯显然是 14 世纪这座城市的奠基人，并且把它确立为立陶宛公国的首都。

“立陶宛每一个地方至少有 3 个名字，”弗雷达解释说。“这是历史造成的。比如扎戈用立陶宛语说是 Zagare，用俄语说是 Zhagory，用依地语是说 Zhager。维尔纽斯则是 Vilnius、Wilno、Vilna。”维尔纽斯是美丽的，但那是过去的

Vilnius，而不是现在的 Vilna。从前那个维尔纽斯已经不复存在。当欧内斯特大谈维陶特斯、盖德米纳斯，以及其他立陶宛英雄的时候，真不知道他对维尔纽斯的历史到底知道多少。多少个世纪以来，维尔纽斯一直是东欧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中心，是继科尔多瓦和布拉格之后在外面居住的犹太人心目中的耶路撒冷。我怀疑学校里是否教给过他们这段历史。但是他肯定知道维尔纽斯自从 17 世纪以来一直是立陶宛的耶路撒冷。而这个耶路撒冷由于 40 年代头几年纳粹的暴行被完全毁灭——维尔纽斯和周围城镇 70000 犹太人被杀。他们被埋葬在城外波纳瑞的万人坑里。在那里，还有几块牌匾证明昔日的辉煌。我们绕着城堡周围的防御土墙慢慢走着，不知道波纳瑞的万人坑在哪个方向。

欧内斯特指着远处的电视塔和周围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告诉我，18 个月前，立陶宛爱国者和苏联军队在那儿发生过激战。对于欧内斯特的热情我无动于衷。听见“立陶宛爱国者”这个称呼心里便阵阵发冷。一阵迷蒙的细雨遮挡了维尔纽斯的美丽，寒风把我们赶下高高的塔楼。

走到盖德米纳斯广场的时候，天已放晴，天主教堂前面敬神的人熙熙攘攘。弗雷达告诉我，苏联统治时期，教堂被改成了美术馆。现在虽然墙上还挂着画，但它最初的功能已经恢复。

弗雷达买了一支蜡烛，插到跳跃着火焰的森林般的烛台中间。我看了以后大惑不解。她发现我惊讶的目光，笑着说，“我们需要帮助，不管是谁的上帝。”我虽然是个不可知论者，但是她这种未曾屈服于异教的态度，还是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理解她作为泛神论者的愿望——为赎罪而不惜牺牲

自己一切的愿望。可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时代，这种愿望能够实现吗？我分明听见天主教的教士们正在那里怒斥“谋害耶稣的人”。

离复活节还有一个星期，从维尔纽斯的大街上走过的时候，我看见天主教堂门口排着长队。人们都手捧鲜花等待宣泄自己对宗教的饥渴。

“天主教堂看得够多的了，”我说。“维尔纽斯还有犹太人的教堂吗？”

我最后一次进犹太教堂是6年前，参加一个外甥的婚礼。我很奇怪，甚至惊讶自己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想向弗雷达解释，我并不信教，但是我想寻觅那些固执的信仰者，那些饱受磨难的幸存者。他们从来也没有抛弃上帝，是上帝抛弃了他们。可我很不善于谈论这个话题，尤其用依地语。这种语言既不是我的母语，也不是弗雷达的第一语言。我不得不说点儿类似“我们的同胞被屠杀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这样的话。如果宗教是区别犹太人与别的民族的特征之一，我宁愿把自己的“不信仰”扔到一边，根据他们的主张接受他们，哪怕他们不以同样的好意回报于我。我是一个世俗的犹太人。弗雷达从历史和文化两个方面和我的同胞融为一体，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犹太人。我什么也没说。

我们坐着汽车向维尔纽斯仅存的犹太教堂驶去的时候，尤瑞通过弗雷达告诉我，拿破仑曾经站在这座建立于1572年的大教堂前面，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维尔纽斯被看作立陶宛的耶路撒冷。”

“还有一个故事，拿破仑站在精美的哥特式建筑圣安妮教堂前面，说：真想把它放在手心里，带回巴黎，”弗雷达补

充道。

我极力想改变这种让人感到压抑的气氛，便给他们讲了一个不太有名的人物的故事：布尔人总统保罗·克留格尔^①在本世纪初主持约翰内斯堡犹太人大教堂落成典礼上说：“我谨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主持本教堂落成典礼。”他们都笑了起来。但是，这个故事在我的心中激起一阵不安。

和维尔纽斯其他教堂不同的是，没有人在这座犹太教堂前面排队等候祭拜神灵。这幢建筑物也显得破破烂烂，满目凄凉。尤瑞似乎有个堂兄经常来这个教堂。他打算晚上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去做礼拜。看起来只有提前预约才行。

我们走过一条条狭窄的石板路。那里曾经是犹太人隔离区。我看了看墙上的标牌：高恩街。隔离区的许多地方墙倒屋塌，无人问津，剩下的地方也已经“非犹太化”了。住在这儿的犹太人寥寥无几。弗雷达告诉我，立陶宛政府准备在大街、广场和建筑物上悬挂牌匾，纪念维尔纽斯犹太人遭受的苦难。把牌匾而不是人民“修缮”得更好。但是迄今为止，只有两块铜牌堂而皇之钉在墙壁之上。弗雷达给我翻译了卢迪尼库大街上挂的那块。

1941年11月3日，1200名犹太人在这个院子里被杀害。

第二块在莱德斯大街一幢楼房上。

^① 保罗·克留格尔(1825—1904)：南非荷裔布尔人，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1883—1902)，英布战争后任总司令，联合奥兰治自由邦对英作战。战败媾和，死于瑞士。

1941年9月7日，2000名犹太人在这里集中，然后在帕尼瑞阿瑞被屠杀。



日趋破败的犹太人隔离区，1993年

“刚刚开始，”弗雷达说。“政府急于给西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也急于从沉重的历史中解脱出来。但是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她告诉我，河那边犹太人过去的公墓已经被夷为平地。

“他们用墓碑铺了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的那条路。人们拒绝从那儿走。犹太人和天主教徒都反对。但是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一位著名的非犹太立陶宛诗人说：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由于欧内斯特的坚持，他们带我去看国会大厦前面为抵抗苏联军队而修筑的街垒。然后还带我看了为纪念抵抗中死难的人们竖起的一个个十字架。

这时，我对立陶宛的爱国主义和与之相伴的宗教热情都没了兴趣；对大街上、教堂前满脸严肃的立陶宛人也没了热情。或许我和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只崇拜橡树的祖先更容易沟通。

这种想法让我不安。我曾经为自己的忍耐和宽容骄傲，可是也许因为横陈于我们之间的历史充满太多的忧患，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丽赫和海尔斯尔

15 应邀参加祈祷

丽赫等我去家里吃午饭。或者是晚宴？一顿下午 5 点吃的、有 4 道大菜的丰盛家宴该叫什么呢？今天丽赫家里不会太热闹。米沙和他的儿子利奥尼上班，他的妻子阿莎到学校教书。逛完维尔纽斯之后，尤瑞就干活去了。不会有用俄语说的祝酒词，也不会有比矿泉水劲儿更大的饮料。昨天喝了伏特加酒意未消，脑袋还有点儿晕晕乎乎。

海尔斯尔吃过饭就像平常一样睡觉去了。欧内斯特找朋友玩去了。丽赫和我又坐下来继续我们的谈话。

“我讲到哪儿了？雷扎拉。”丽赫指了指那张她在上面生过两个儿子的长沙发，让我坐下。

“你跟着雷勃到了沙维尔。他在那儿的招兵站工作。你们想结婚，但没有房子。后来战争就爆发了。”

“对，后来战争就爆发了。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往哪儿跑。头天晚上我们还和费沃克一家吃晚饭，第二天就永远离开了沙维尔。他们给了雷勃一辆大 grusavik，和一个司机，命令他把所有重要 utchotten 从兵站拉到莫斯科。她当然明白我的意思。”看见弗雷达失望地耸了耸肩，丽赫不高兴地说。

“我妈说，他们给了我爸爸一辆很大的大卡车，”弗雷达说，“要他在德国人进入沙维尔之前，把所有重要的军事文件和其他文件都送到莫斯科。”

“卡车上还有 40 个孩子，”丽赫继续说。“立陶宛和拉脱

维亚的孩子，有犹太人也有天主教徒。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正在帕兰加夏令营，匆匆忙忙撤到沙维尔。别问我他们的父母亲在哪儿。也许都急疯了。雷勃的任务之一就是把他们送到里加的一个少年之家。他飞也似地跑到我姐姐卡娜家。‘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他对她说，‘车就在外面等着。’我姐姐非常焦急，也非常生气。‘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丢下我不管！’她叫喊着。那时她怀着7个月的身孕，带着6岁的女儿，丈夫恰巧不在城里。‘快跟我们走吧！’雷勃苦苦哀求。卡娜和雷勃都是共产党员，多年的同志和朋友。但是她不肯撇下丈夫，而雷勃肩负重任，没法再等。敌人的飞机已经开始投炸弹，沙维尔一片火海。德军正步步紧逼。雷勃不得不拉着文件赶快撤离。想想看，我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在那样的时刻丢下我的姐姐……”

她哽咽着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和弗雷达都劝她下次再谈，但她不肯。天空又暗了下来，冻雨纷纷扬扬落在院子里光秃秃的树枝上。海尔斯尔走进起居室。瓷砖壁炉把屋子烧得暖融融的。

“海尔斯尔也受了许多苦，”丽赫说。

他点了点头。他已经81岁，个子很高，走起路来腰板笔挺。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我以为一定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但不是。是他自己和两匹马的照片。他告诉我马的名字，用大拇指轻轻地摩挲着，仿佛拂掉照片上面的一粒灰尘。

“它们在战争中一直陪伴着我，”他说。“没有这两匹马，我一定早就死了。我的妻子和孩子被杀的时候，我在部队。他们是在柴兹墨被屠杀的。是立陶宛人干的，不是德国

人。米沙每年都带我们到那儿的万人坑祭奠他们。”

“我们都是狂风暴雨中被折断的树枝，”丽赫擦了擦眼睛说。“我已经哭干了眼泪，不能再哭了。我们是从哪儿获得活下去的勇气？生的欲望很强烈。也许太强烈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显得自私。”

后来丽赫听说，沙维尔的犹太人被包围之后，年轻一点的男人和女人都被押去干活。老弱病残统统枪毙。在清洗孩子的行动中，姐姐卡娜7岁的女儿被敌人从她的怀里抢走，扔到汽车上。孩子吓得拼命哭喊。卡娜冲过去想把孩子救回来，匪徒们使用枪托朝她已经有6个月身孕的肚子猛砸。她被送到慕尼黑附近一座集中营。集中营的名字丽赫已经记不得了。有一阵，她的丈夫在隔离区当清洁工，后来也被杀害。

“没多久，卡娜生下一个儿子。一个德国护士当着她的面用枕头把那个刚刚出生的孩子活活捂死。人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苦难和恐惧？但是卡娜活了下来。战后，她到了以色列，后来又组织了一个家庭。去年，我还去看过她。她死了刚几个月……

“哦，沙维尔被敌机轰炸，成了一片火海。我们不得不马上离开。除了那40个孩子，还有我的堂兄柴依姆·贝特勒一家——他、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费沃克、费沃克的妻子和一个孩子也在车上。还有足够的地方把家人都带走，于是我们开着汽车直奔扎戈。

“扎戈也乱成一片。苏维埃政权已经撤退。一个立陶宛军官控制了整个小镇。我的母亲因为痛苦和焦急半疯半傻，她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明白。父亲告诉我，前一天，那个立

陶宛军官要 50 个年轻力壮的犹太人自愿者去游击队接受训练，准备和德国人打仗。我的哥哥摩特拉和盖达利亚就是那 50 个志愿者中的两个。他们排着队走进犹太教堂。就在教堂里，一个不剩全被枪毙。摩特拉，是他教会了我编织……还有亲爱的盖达利亚……现在他们都躺在扎戈旧公墓，没有任何标记。母亲不相信他们已经不在人世。她要等他们回来，决不离开他们。

“那时，我没有恰当的身份证明，所以雷勃坚持马上跟我结婚。他不愿意和我分离。我们匆匆忙忙跑到办事处登了记，就算结了婚。当时没有一个家人在场。”

她打开一个盒子，颤颤巍巍地取出一迭发黄的文件，从中找出结婚证让我看。“不戴眼镜，连日期也看不清了。”她戴上老花镜。“在这儿呢，1941 年 6 月 25 日。我们在扎戈呆了两天。从 6 月 24 日到 6 月 26 日。

“第二天早晨，我们劝说母亲跟我们一块儿走。‘摩特拉和盖达利亚在森林里很安全，’我骗她。‘打完仗，我们就又能见面了。’她把值钱的东西装到一块掏空的褥子里，和我的父亲、小妹妹一起爬上卡车。你奶奶弗瑞德和家里的人已经上了车。

“‘约费一家制造恐慌呢！’我们准备开车离开扎戈时，人们都嚷嚷起来。你问，谁嚷嚷？犹太人，非犹太人都在那儿瞎嚷嚷。有的人见我们要走，心里嫉妒；有的人因为雷勃是共产党员，不相信他。还有的人不愿意承认纳粹已经到了家门口。‘你们赶快想办法救自己吧！’雷勃苦苦地求他们快走。‘德国军队在 24 小时之内就开过来了！’可是谁也不听他的劝告。‘别信约费的话。他在制造恐慌，’他们叫喊着。‘苏维

埃滚蛋了，他也要逃跑了。大伙不要跑。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我们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是个什么样子。他们都是绅士，不像布尔什维克。’

“我们驶过泰特希赛嘎斯街，向边境驶去。也有的人跟我们一起逃命。步行的，骑自行车的，赶大马车的。什么样的人都有。这时，边境线已经关闭，吊杆横在大路中间。杀死我两个哥哥和别的年轻人的那个军官领着一帮匪徒荷枪实弹站在吊杆前面。他逼迫大家回到小镇。所有的人，除了我和雷勃，贝特勒一爱，还有那 40 个孩子。也许他们害怕有朝一日，俄国人会回来跟他们算账。

“我的母亲，父亲，小妹妹；你奶奶弗瑞德，费沃克，他的妻子、孩子，布雷娜和斯马尔克都被赶下汽车。他们哭喊着，叫嚷着……我简直无法描绘那幅惨相。我坐在雷勃和汽车司机中间，不知如何是好。‘不要回头，’雷勃说。但是当汽车发动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父亲抱着 7 岁的妹妹玛申卡。她从小时候起就爱生病。‘带上她！’父亲喊道。‘至少把她带上。’其他人呆呆地站在那儿，仿佛冰冻了一般，眼睁睁地看我们离去。‘不要回头！’雷勃紧紧地搂着我。‘不要回头……’啊！我怎能承受了这一切？”

橘黄色的窗帘外面，暮色越来越浓。屋子里死一样地寂静。谁也没有去开灯。瓷砖壁炉旁边传来海尔斯尔一声长叹。“我如果当时不在部队，或许能救出我的妻子和孩子，”他喃喃着说。

“里加一片火海，”丽赫终于打破那仿佛让人连气都喘不过来的寂静。“夜里，我们睡在一个地窖里。第二天把 40 个被困的孩子送到里加郊区少年之家，然后把文件按要求送到

有关党政部门。卡车总出毛病，司机说，根本开不到莫斯科。贝特勒一家挤上一辆到俄罗斯的火车，但是雷勃不肯丢下卡车和司机不管。”

卡车最后还是坏了，他们只好藏到一片森林里面。整整一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早晨醒来却发现司机不见了踪影。

“我们俩对发动机之类的事儿一窍不通，更不会开车。现在两上人呆在森林里，炸弹就在身边爆炸，守着一辆没有用的破车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司机回来了，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说，他是到城里搞配件去了。修好汽车以后，他告诉我们，他不准备送我们到俄罗斯了，甚至连边境也不去，他要回沙维尔。雷勃气得要命。这位司机他已经认识好多年了，没想到关键时刻他会这样。火车第二天早晨才走，在车站等车很不安全，拉脱维亚民兵到处烧杀抢掠，司机便把我和雷勃送到附近的一片森林，扔下我们的行李，开着车扬长而去。天下着大雨，我们浑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又累又饿。敌机还在不停地投弹，森林里有地方已经起火。

“那时，我们能有什么行李呢？只有一口小箱子，里面装着几张照片，比较重要的文件和几件衣服。还有就是妈妈留下的那个掏空了的褥子，里面装着她所有值钱的东西。她被赶下汽车的时候，留给了我们。弗雷达出生之后，我用这点儿东西今天换一块面包，明天换一杯牛奶，后天换一个鸡蛋……妈妈救了我们两个人的命，我们却没能救她。”

第二天早晨，他们跟着逃难的人群挤上火车，终于来到和俄罗斯接壤的小镇斯可夫。在那儿，雷勃碰到几个熟人。

经过一番研究，他们决定到叶雷斯拉夫的一个集体农庄。丽赫和另外一个女人坐马车走了一天半才到达目的地。雷勃和他的朋友们只能步行。女人们到集体农庄之后，人们给她们送来牛奶、面包，还在学校的教室里用干草给她们打了地铺。男人们迷了路，3天以后才赶来。他们又饿又累，精疲力竭。这一群难民在叶雷斯拉夫停留了一个月，帮助农民们收割庄稼。后来又在另外一个集体农庄呆了几个月，雷勃便报名参加了立陶宛第十六支队。

“我们结婚3个月之后，他就参军上前线去了，”丽赫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他。”

“妈妈，”弗雷达说，“我听见你胸口又呼哧呼哧地喘呢。”

丽赫耸了耸肩，不肯接受女儿的关心。“我们很快就要到扎戈去了，雷扎拉必须把这些情况都搞清楚。我已经有46年没回扎戈了。上次回去的时候，弗雷达才3岁。幸存者们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回老家，寻找亲人和朋友。我找到了我的亲人和朋友，那是在纳瑞斯金公园的万人坑。”

她的堂兄柴依姆·贝特勒一家都活了下来。他们和另外三四户人家决定回扎戈定居。这几家的男人都在第十六支队当兵，在东线参加过最残酷的战斗。战争使他们的心变得更硬，而失去亲人的痛苦几乎让他们发疯。他们回到扎戈，决心为亲人报仇。可是那时候，主要的罪犯有的逃跑，有的已经被苏联政府抓起来，判了重刑。剩下的人都声称清白无辜。他们说，他们都被大屠杀吓破了胆。那时候，隐藏或者帮助犹太人都要被立即处死。

“他们根本就没有帮助过犹太人，”丽赫愤怒地摇着头。

“事实上，德国人还没有到扎戈，大屠杀就开始了。谁杀死了我的两个哥哥？是纳粹还是那个立陶宛军官和他手下的匪徒？他们巴不得赶快把犹太人都消灭光。犹太人尸骨未寒，立陶宛人就搬到他们的家里，强占了他们的财产。他们自己描绘怎样把受伤的人和已经打死的人一起埋进万人坑；他们自己描绘血水怎样像泉水一样从泥土中涌出。他们不得不从沙维尔叫来消防队，用高压水笼头冲洗市场的血迹。

“‘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1946年我到扎戈后问堂兄贝特勒。‘你们怎么能在这块浸透了亲人鲜血的土地上行走？’‘这是我们的家乡，’他回答道。‘是我们的亲人被埋葬的地方。苏联政府把房屋归还了我们。我们和他们并肩打败了纳粹。生活在这里，会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我们那些邻居的罪恶。’

“和他一起打过仗的兹洛特还当了扎戈的镇长。我却不能。我在小镇里走的时候，头晕目眩，多呆一分钟也是极大的折磨。我回到雷勃理发馆上面我们的家，敲了敲门。占了我们那所房子的人看见我，以为见了鬼，吓得直往后退。‘我的编织机呢？’我用非常严厉的口气问。明白我不是来要房子之后，他们松了一口气，马上告诉我先前在我们家干活的那个女人把机器都搬走了。

“我径直去了那个女人家。平常我并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可是那天我勇气十足，简直像疯了一样，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在乎。那个女人看见我差点儿晕了过去。她矢口否认拿过我们家的机器，二话不说，砰地一声就把门关上了。堂兄领着我找到镇子里一个当官的。那人问我能不能认出那几台机器，或者说出它们的特征。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

记得我用过的那台机器上面有一个挺大的标牌，标牌上面有好几朵玫瑰，玫瑰下面有德累斯顿这样几个字。

“那位长官和我一起又找到那个女人。我们的机器都在她家，放在后面一间屋子里。那台有玫瑰标牌的编织机自然也不例外。长官说，她必须马上把机器还给我。女人哭了起来。她说，她得先把机器上那件衣服织完，求我宽限到第二天早晨再把机器拉走。我真是地地道道的傻瓜，居然同意了她的要求。第二天，机器倒是要回来了，可是所有的针和其他重要部件都让她拆走了。我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没有再去找那个长官，也没有去找堂兄贝特勒。鬼才知道盛怒之下，他会拿那个女人和这台机器怎么办。我雇了一辆车，把机器放到车上，离开了扎戈。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丽赫和别的幸存者一起搬到维尔纽斯。人们都说，犹太人住在小村镇不安全。好长一段时间，她和弗雷达住在维尔纽斯旧区一间年久失修的破房子里，过着孤独而艰难的日子。后来，共同的朋友介绍她认识了海尔斯尔。

“我和他都是家里剩下的唯一还活着的人，都是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钱，没有什么好的出路。所以相处一段时间就结了婚。海尔斯尔设法弄到一些针和零件，自己动手修好我那台编织机。我马上开始用它织衣服。海尔斯尔在维尔纽斯大市场找到一份工作。两个人辛辛苦苦地工作，不再缺吃少穿。后来我们搬到这幢房子里，再也没有动地方。孩子们一直嚷嚷要找一幢有浴室、有卫生间的房子，可我不想搬。我们到公共浴室洗澡，或者坐电车到弗雷达那儿……”

电话铃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弗雷达跌跌撞撞走过昏暗的客厅去接电话，海尔斯尔摸索着找电灯开关。明亮的灯光把

我们带回到现实之中。丽赫拉好窗帘，走到弗雷达旁边，听他们说些什么。

“是米沙，”她说。

弗雷达用俄语“Da, Da”地连连称“是”，然后放下听筒。

“星期四之前，米沙没法离开工厂，”她说。“刚从德国到了一批布，他得安排生产。我告诉他没关系。我们先去哪儿都无所谓。他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日程。特拉凯，拉塞恩，也许还去考那斯。再说维尔纽斯可去的地方也不少。大学，民俗博物馆……”

“明天回来吃午饭，”我们走下门前那一溜台阶的时候，丽赫大声说。院子里，几只野猫正在争抢残羹剩饭。

我和弗雷达坐着电车回家的时候，车里很挤。我们随着电车颠簸，身体而不是目光和别的乘客接触。

“我已经记不清妈妈受了多少苦，”弗雷达说。“我这个人没耐心，爱发火。可怜的海尔斯尔，总是沉湎于往事痛苦的回忆。直到现在，他已经80多岁的时候。”

回家之后，尤瑞告诉我们，他那位常去教堂的亲戚说，第二天早上，教堂里有一个活动。有人为已故父亲做祈祷。他们已经按照犹太教举行正式礼拜仪式的法定人数召集了10个人，欢迎我们也参加。

就这样，我得到了参加祈祷的邀请。失去亲人的哀悼者对上帝表示感谢和赞颂。其实在维尔纽斯，这样的祈祷每天都应该举行。有太多的死者需要祭奠。问题是召集10个人并非易事。

尤瑞说，他上班的时候可以顺路把我们送到教堂。他天刚亮就起床，整整干了一天，早早上床睡觉去了。弗雷达因

为工作的缘故，养成晚睡的习惯，连一点儿倦意也没有。她是个“夜猫子”。

我有点累，正想去睡，欧内斯特拖出一个旧箱子，从里面拿出一把小号。

“这是外公雷勃的号，”他告诉我。“他牺牲之后，连长把这把小号送给了外婆。她希望我也能像外公一样成为一个优秀的乐手。可我吹不好。而且小号总得拆了装，装了拆，挺麻烦。我想也许吉他更容易一点。我的英语怎么样？”

“挺好，”我说。“你很少有机会和讲英语的人练习口语，就算不错了。你们在学校里学习定冠词、不定冠词吗？”

“每天都讲。对于讲俄语的人来说，这是个大问题。你能给我纠正一下错误吗？”

“如果不影响我们谈话，当然可以。我对你说的话的内容更感兴趣。”

他放下小号，答应要把他会的全部音乐技巧都表演给我看。“你喜欢俄罗斯歌曲吗？我可以给你录一盘磁带。我的朋友有一台录音机。”

“我的母亲的父亲唱俄语歌儿和依地语歌儿。”

“我要把外公的小号送给你作礼物。”

像妈妈一样，他也是个“夜猫子”。向弗雷达保证已经做完家庭作业之后，他又去邻居家找朋友们玩去了，身后留下一股香烟味儿。

“是啊，他抽烟，”弗雷达说。“这是我的错。我抽烟，他的朋友们也抽烟。他们才十五六岁。很难控制他。只能拿零花钱限制。尤瑞很生气。他说，我必须戒烟。”她耸了耸肩。“我试过，但是很难。”

我告诉她，西方人对香烟的危害十分警惕。医院、电影院和其他公共场合都禁止吸烟。

“这不也是一种自由吗？如此说来，我们这儿的自由度更大。就是得肺癌死了也没人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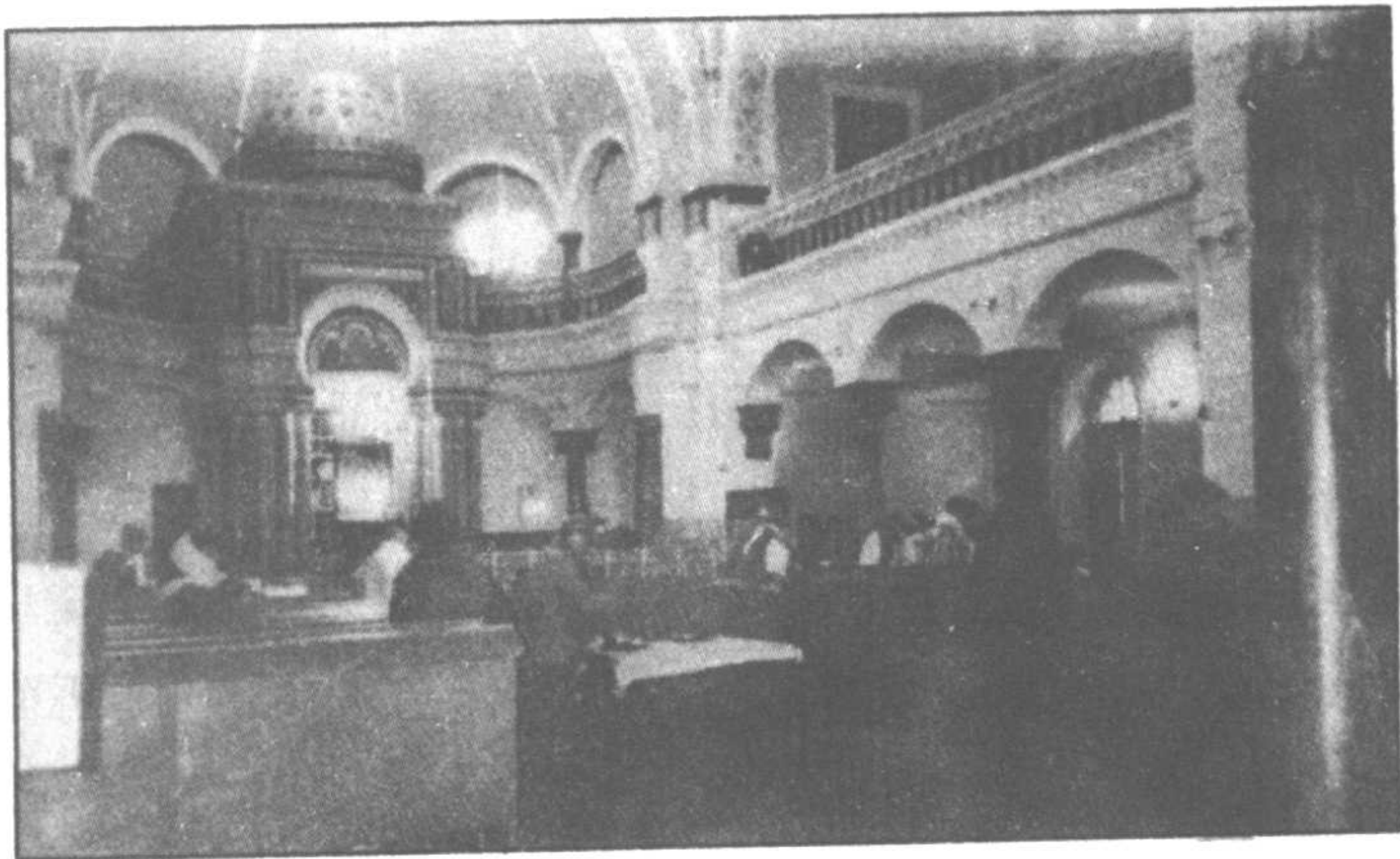
那天夜里，我又做了一晚上恶梦。那些梦非常清楚，离开立陶宛好长时间之后，还历历在目。我总是在熊熊燃烧的森林里奔跑，在落叶上滑倒，树根上绊倒。鲜血像泉水一样从泥土中冒出，骑马的人追赶着四处逃命的犹太人。每天早晨，我都是在心脏狂跳、精疲力竭中醒来。我已经不想再面对新的一天，不想再听更多悲惨的故事。我开始数日子了：已经过去两天，还有5天。

16 维尔纽斯的宗教仪式

残酷野蛮的纳粹还给维尔纽斯留下一座犹太教堂实在是个奇迹。也许他们突发奇想，打算把它改造成马棚，所以没有夷为平地。那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古典建筑。正面入口门廊顶上是一堵精美的三角墙，门廊两边是正方形侧厅，整个建筑物的边缘都是叶板状图案，宛如镶嵌着一条美丽的花边。三角墙下面宽阔的门廊呈拱形，门廊里面又有三个凹进去的拱形门洞。门廊两边有两根柱子，就像两个巨大的火炬，构筑成一个雄伟庄严的所在。三角墙和拱门之间，是石雕的犹太教六芒星形标志，意为“大卫王的盾牌”。

犹太人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从古代荒漠的移动式神堂发展到现在的教堂，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三角墙后面，屋

顶最高的地方有两块镌刻着犹太教戒律的碑匾。犹太教十戒



维尔纽斯犹太教堂内景，1992年

都用希伯来文刻在上面。第二块碑匾最上面一条是十戒的第六条，简洁明了地写着：你不得开杀戒。

走上门廊前面七层台阶，耳边传来一阵合唱声。仪式正在进行当中。弗雷达、欧内斯特和我悄悄地走进去，在门口附近的长椅上坐下。

一盏枝形吊灯和几盏壁灯在昏暗的散发着一股霉味儿的大厅闪闪烁烁，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与耶路撒冷遥遥相对的存放律法书的藏经柜敞开着，绣着精美图案的丝绒帘子拉到一边。写有箴言的饰带一直拉到教堂中间，一位教徒站在那儿领大家祈祷。维尔纽斯没有专职的拉比。所谓大拉比一年两次从英格兰来维尔纽斯主持重要的宗教仪式。诵经的声音和唱歌的声音听起来十分熟悉，但是不像我小时候跟外婆去做礼拜时听到的歌声那样悦耳动听，充满激情。那哀伤的祈祷声在日渐衰败的教堂里回荡，有点儿跑调，不合节拍，还

没有到达空旷、辽远的天国，便消失在教堂的拱门和圆顶之下。大厅里空空荡荡。曾经挤在这里做礼拜的人们如今都躺在离维尔纽斯 15 公里的波纳瑞万人坑里。

我看着那 12 个或者 13 个做祈祷的男人。他们戴着室内戴的便帽，或者普通的帽子，做祈祷时用的方形围巾披在肩头。胳膊和前额上绑着经文护符匣^①。这种信仰的坚定与顽固让我万分惊异。正是这种坚定使得这些幸存者至今还有力量，向一位曾经将那样巨大的灾难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上帝祈祷。不过即使像我这样一个不可知论者，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抛弃了犹太教，背叛了信仰，就等于把胜利赋予了那些妄图从种族和文化上灭绝我们的人。

“你和我应该坐到楼上，”我压低嗓门儿对弗雷达说，朝拱顶下面专门供妇女坐的楼座点了点头。

“没人会怪罪我们的，除了尤瑞那位亲戚雅可夫。”

她朝坐在藏经柜旁边的一个男人招了招手。那人皱着眉头，把脸转了过去。“这家伙还挺虔诚。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从打我们进教堂，他就一直躲着我们。他们为什么要把那些古怪的小皮匣子绑到胳膊和额头上呢？”

“这叫经文护符匣，”我说，突然之间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仿佛第一次意识到，几十年来东欧对犹太人文化上的灭绝使得我这一代的妇女对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能看看母亲在家里搞的一些宗教仪式。旁观者以一种非常奇妙的语言管她们叫“家庭王后”。可是花园门口便是这

^① 经文护符匣：指两个成对、内装有书写经文的羊皮纸条的小匣，由犹太男子佩带，一个在左臂，另一个在额部，用以提醒佩带者遵守律法。

些“王后”国土的边界。上帝要求至少 10 个人才能组成一个做祈祷的小组，而妇女甚至连这样一个法定的人数也召集不够。尽管有的妇女宣布放弃选择宗教仪式，但她们毕竟经常看见自己的兄弟或者儿子每天早晨摆弄经文护符匣之类的东西，所以对这种仪式并不陌生。欧内斯特总是急不可奈地告诉你这样那样的信息，现在却一反常态，一声不响地在那儿站着。也许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阵势。

“经文护符匣，也就是那种小皮匣子，装着祈祷文和写在羊皮纸上的《圣经》选录。”尽管对这些仪式已经淡忘，我还是从记忆深处搜寻出一些细节告诉他们。“一个匣子和绑在左胳膊上的一条带子相连，另外一个绑在前额上。我想，这个仪式的含义是，要用我们的心灵和思想去体会、遵守犹太教的戒律和习俗。”

“苏联的学校可没教给过我们这些东西，”弗雷达说。

仪式结束之后，一个老头——来参加这个仪式的都是老头——走过来用依地语问我们有没有需要他帮忙的事情。老头自我介绍，他叫柴依姆。他的脸很长，皱纹密布，棕色的眼睛，耷拉着厚重的眼皮。弗雷达对他说，我是从澳大利亚来的亲戚，来这儿探亲，了解了解立陶宛犹太人的生活情况。

柴依姆耸了耸肩。“有什么好了解的呢？我们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充满活力的民族。可是今天，我们是和我们的幽灵生活在一起。大多数幸存者都远走他乡了，剩下我们这些人在苦难中挣扎。我们都老了，精疲力竭，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人可以投奔，也没有非要离开这儿的理由。在这儿，至少头上还有个屋顶，哪怕一下雨就漏。这就是我们犹太教的

全部律法^①。告诉你，什么都要靠自己。”

“这并不是我们的全部律法，”一个高个子、秃顶的男人说。他满脸严肃，那副尊容一望而知便是斯拉夫人。弗雷达介绍说，他就是尤瑞的亲戚雅可夫。“你不应该这样消极。”

“我并不想强加于人，”柴依姆说，本来目光温和的棕色眼睛显露出一种恶意。“可是你和你那个委员会总该花点儿时间到犹太人的诊疗所去看一看。不要以病人的身份——但愿上帝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是去看看那些为了看医生排好几个小时长队的人，跟他们说上几句话。都是些老人，病人，拄着拐杖的老兵，落下浑身病根的集中营幸存者，养活着一大家子的寡妇，照顾着卧床不起的妻子的丈夫。你去试着告诉他们不要消极，不要悲观。”

“日子是很艰难，”雅可夫表示同意，“但是我们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

“你们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柴依姆说。“不过是为你们自己。上星期我去领国外犹太人团体给我们送来的无酵饼^②，人家告诉我，早就发完了。发给谁了？”

“东西本来就有限，”雅可夫说。

柴依姆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走了。

雅可夫和尤瑞不同，依地语说得相当不错。弗雷达对我讲过，他是一个由当地犹太人头面人物组成的委员会的委员。弗雷达一家对这些事儿不大关心。

① 律法(Torah):犹太教的律法，上帝启示给人类的教导。亦作全部希伯来圣经或律法书解。

② 无酵饼:犹太人逾越节时吃的一种硬面饼。

“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了？”他问弗雷达。

“不是什么风，应该是什么人。是我的堂姐。她想看看教堂。”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说。“使我想起约翰内斯堡的犹太人教堂。在那儿，也很难召集起足够的人举行宗教仪式。原因当然很多。大多数人都从城里搬到郊区去了。”

“你说的很对，原因很多。”

“我堂姐，”弗雷达冷冰冰地说，“在写一本关于立陶宛犹太人被毁灭的书。”

“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书，”我说。弗雷达用胳膊肘子捅了捅我的肋骨。其实，我这样说也算不上谦虚。

他激动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在我的身边坐下。“这座教堂是 1903 年建的，确实很漂亮。可是和 1592 年建的那座雄伟壮丽的维尔纽斯大教堂相比差得很远。过去，欧洲各地的人们都来维尔纽斯祈祷。我们这儿就是北方的耶路撒冷。二战中，被纳粹夷为平地。维尔纽斯 160 座犹太教堂，只剩下这一座。帽子匠、面包师、马车夫和别的行业都有他们自己的祈祷场所。你可以摧毁宏伟的建筑，但摧毁不了人的精神。我理解柴依姆心中的绝望，但我们决不能放弃希望。我们原来有 222000 人，现在只剩下 6000 人。我们必须团结，而不能让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

“谁是你们的敌人，或者说我们的敌人”

他犹豫了一下。“那些希望我们活下来的人更少一点的人。”

“这么说，反犹太主义在立陶宛仍然存在。”

“立陶宛政府声称，立陶宛从来没有反犹太主义，纳粹

占领前也没有对犹太人的屠杀。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立陶宛犹太人的处境也许比波兰犹太人好一点，但是毫无疑问，反犹太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没有销声匿迹。你只要看看报纸就行了。立陶宛各大报刊发表的反犹太人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旧调重弹。对这种歪曲，我们表示过抗议……”

“非常有礼貌地表示。”

“总得有所克制，否则只能激起更加强烈的反犹情绪。不要忘记政府当局已经抛弃了苏联时代的排犹主义。我们现在有犹太人学校和其他研究机关，纪念牌匾正在立陶宛各地悬挂，公墓被修复……”

“像斯内皮斯凯斯那样的犹太人公墓？最早的坟墓可以追溯到1487年，”弗雷达说。

“那片墓地为了建体育场1950年就已经被苏联政府平掉了。”

“而我们的政府用犹太人坟头的墓碑作了台阶，铺了马路，你们那个委员会吓得连一句表示抗议的话也不敢说。”

“多几个有影响的人物就能多几分力量，”雅可夫说。

“你也参加我们的组织吧。”

弗雷达和雅可夫不想受依地语的限制，用俄语争论起来，但时不时冒出几句依地语。

“……我并不认为立陶宛就是一个屠杀犹太人的民族，”弗雷达说。“我也不相信什么集体犯罪。我们自己就是这样被人错待了多少年。二战的时候纳粹和他们的走狗说，所有犹太人都是共产党，而所有共产党都是坏人……”

“立陶宛独立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不是给曾经被判犯战争罪的人平反？”我问。

“是的，”雅可夫说，做 S，做出了什么反应？”

“我们上书政府，并且作证，战争罪犯确确实实得到赦免和平反。首席检查官对此反应冷淡。他说，‘三巨头’和苏联法庭已经审判过这些人了，而且是在‘缺少应有程序’的情况之下审判的。”

平反的同时，政府还付给每人 5000 卢布——当时的平均月工资是 350 卢布——并且归还了当年被苏联政府没收的财产。然而，犹太人被没收的财产却从来没有人归还过。

“但愿，”雅可夫说，“立陶宛向西方靠拢的愿望能够显示新立陶宛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并且遏制一下反犹太主义。”

这时，教堂里的人都走了，雅可夫也收拾起他的东西，把祈祷用的头巾和经文护符匣装到丝绒袋子里。我们跟他一起走出教堂，走进清冷的阳光。

“有一份名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的报纸每个月出一期，”雅可夫说。“用英语、依地语、希伯来语和立陶宛语印刷。你也许会感兴趣。告诉尤瑞，”他转过脸对弗雷达说，“就是无神论者也能参加我们的礼拜仪式。”

“是个聪明人，”弗雷达看着他的背影说。“只是太冷漠了点儿。”

我们沿着旧城弯弯曲曲的街道慢慢地走着，走过维尔纽斯大学铺着鹅卵石的校园。在大学的书店里，我买了一张立陶宛地图。我们伸长脖子欣赏拱形屋顶精美的壁画。弗雷达念着牌匾上立陶宛作家和学者们的名字：“……西曼纳斯·道坎塔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

“我姥姥家从前就住在道坎塔大街，”我说。

“等到我们到扎戈之后，可以去寻访那个地方，”弗雷达说。

在欧内斯特的坚持之下，我们去参观人种史博物馆。他领我走过一个个展览大厅，指着关于立陶宛历史和史前文明的说明读给我听。

“这些山叫匹力阿卡尔尼斯山，”他说，在一块展览板前面停了下来。展览板上面裱着一幅幅古代墓葬的照片。从那些墓葬里曾经出土过不少陶器、铁器、武器、铁项链和臂章。对于他来说，这些大山上的墓葬代表着立陶宛辉煌的历史。而我却由此想到另外一些坟墓——森林里的那些坟墓……

我们还走过一些复制的木屋，屋子里面没有地板，全是泥地，摆着几件手工雕刻的家具和乡下人用的陶罐。这是一段被净化了的田园短诗般的历史。妇女穿着民族服装在灶台上做饭，男人磨镰刀准备收割。他们的儿女很快就会离开温暖舒适的家搬到城里。在那儿，商业、小手工业都掌握在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的手里。

我们走进一个挂着旗子的大厅。这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一面黑色和橘黄色相间的旗子代表立陶宛贸易、商业、工业和小手工业工会。另外一面旗子则向人们宣示：如果所有农民都团结起来，国家就会富强。第三面旗子上面绣着：立陶宛是立陶宛人的立陶宛！那些生活在立陶宛、把立陶宛当作自己国家的波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都算不上立陶宛人。这就是他们的口号：立陶宛是立陶宛人的立陶宛！

欧内斯特用立陶宛语在观众留言簿上写了几句话，后面还画了几个惊叹号，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我也写了一句话：“那些使立陶宛从封建社会跨入新时代，并且为建设

现代文明做出过贡献的少数民族应该置于何地？”

半个小时后，弗雷达和欧内斯特把我送到一套摆满了书的小小的公寓。主人恰兹克利斯·莱姆凯纳斯就是这样一位为立陶宛现代文明做出贡献的犹太学者。他的外甥女多拉住在悉尼，让我替她问候这位德高望重的舅舅。恰兹克利斯很谦虚，很少谈起自己学术上的成就。至于个人生活上的事儿，谈得更少。我回到澳大利亚之后，才从多拉那儿听说，他是《俄罗斯立陶宛大词典》的主编。他和他的合作者们因为对立陶宛文化做出杰出贡献于1987年获国家奖。他还是《俄罗斯立陶宛简明学生词典》的编撰者。恰兹克利斯·莱姆凯纳斯毕业于考那斯的维陶塔斯·玛格纳斯大学。他是立陶宛和其他国家公认的杰出的词汇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教授。他的专著《立陶宛语对立陶宛犹太人方言的影响》是立陶宛人对依地语言学唯一的研究成果。他还对我说，再过几个星期出版的《牛津依地语》第三卷，将发表他就这一课题用依地语撰写的内容更为翔实的论文。

听说我的老家在扎戈之后，他告诉我，他生在帕皮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父母亲以及兄弟姐妹在扎戈住过好几年。后来他们搬到沙维尔、考那斯、威尔克米尔。在这几个城市生活、念书。在威尔克米尔认识了他的妻子埃拉。她是一个德语教员。恰兹克利斯的父母死于1941年扎戈的大屠杀。他和妻子、两个儿子维克多和阿扎利1941年7月被关进考那斯隔离区。1944年3月“儿童大清洗”行动中，两个儿子——一个8岁，一个12个岁——被敌人从他们身边抢走，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死在那里的毒气室。恰兹克利斯被送到慕尼黑附近的达豪，他在那儿成了犯人81180。他

的妻子被押解到斯塔特霍夫。他们俩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且于1946年团聚。

他十分平静地向我简略地描述了一个又一个悲剧，只有一双眼睛在眼镜片后面闪着盈盈泪光。自从1979年妻子去世之后，他一直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套很小的公寓里。也许因为对立陶宛语的热爱和献身于事业的精神使他战胜了个人的痛苦。现在他已经89岁高龄，但仍在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重要贡献。

“立陶宛是我的家乡，我的祖国。”我问他有没有想过移民到别的国家时，他这样说。

这天下午早些时候，弗雷达和欧内斯特来恰兹克利斯家接我时，我也问起弗雷达这个问题：考虑没考虑过移民？

“这个问题很复杂，”她说。“我弟弟阿列克住在以色列。他劝我不要去。他们虽然找到了工作，可是真正适应那里的环境也很难。再说我的父母亲年纪都大了，尤瑞也不可能找到工作。我呢，一个说俄语的文化人在以色列又能派什么用场呢？”

“这儿是我的家园，”欧内斯特说。“我们独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些旗子呢？‘立陶宛是立陶宛人的立陶宛！’”

“那是历史，”他说。“我是立陶宛人。我将向他们证明我是立陶宛人。你们什么时候到扎戈？”

欧内斯特很想跟我们一块儿去，可是弗雷达不想让他耽误功课。他得准备考试。

“再过两天，”弗雷达说。“等米沙有空之后我们就去。明天他带我们去拉塞恩。那儿离维尔纽斯不远。”

“拉塞恩？”欧内斯特说。“去那儿有什么意思？那不过是考那斯附近的一个小镇。”

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一座和我并没有多少关系的小镇。毫无疑问，这座小镇和立陶宛大部分别的城镇一样，都已经“没有犹太人了”。

“我的丈夫生在拉塞恩，”我对他说。

“他为什么不跟你一起来呢？”

“他没有回立陶宛看看的愿望。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才两岁。”

路过一个报摊的时候，欧内斯特从一堆报纸杂志中找出一份英文版《立陶宛的耶路撒冷》。

“雅可夫说，你会对这份报纸感兴趣的。从今往后，我也要读一读关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报刊。我是立陶宛犹太人，可是也许我对立陶宛的了解远比对犹太人的了解多。你说是吗？”

“是的。”

欧内斯特和我开始有了某种沟通。

17 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

“我不一定非得去拉塞恩，”吃晚饭的时候我对米沙说。“主要是去扎戈看看。”

“我一直想去拉塞恩，”他一边说一边遵照丽赫的“旨意”往我的碗里又盛了一勺子汤和土豆。

“那地方很偏僻，跟你又没有多大的关系，你会对它感



拉塞恩

兴趣？恐怕连一块可以献献花的墓碑也找不到。”

米沙不听我的劝阻，临走时说：“明天早晨5点半我去接你们。”

傍晚，我和弗雷达要回她家的时候，丽赫把我拉到一边。“我跟你讲过没有？雷勃牺牲前给我来过3封信。你知道，他从来没有失望过。直到最后一刻，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理想。”

雷勃是她永远的爱人。他仿佛珍藏在琥珀之中，永远年轻，永远美好，永远是正义的化身。她决不相信斯洛莫对雷勃的评价，认为他理想破灭、心灰意冷。

盼望已久的革命成功之后，雷勃只活了3年。这3年正是爱国主义空前高涨的3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部队。如果他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在斯大林时代继续生活下去的话，他还会坚持自己的信仰吗？也许让信仰长久保留的最好办法就是英年早逝。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着他最后那封信的一字一句，”她对我说。“我躺在这里，离死神很近。但我多么希望能活下

去。美国人将开辟第二战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们一定会胜利。能熬到胜利那一天的人一定会过上幸福生活。”

“你告诉过我，他总是在那儿画表格，填写农民的土地、牲畜和别的财产。他对你说过画这些表格有什么用吗？”

“我没问过他。雷勃是党的工作者。他坚信自己是为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工作的。”

雷勃当然明白那些表格的用处。重新分配土地、财产，实行集体化毕竟是革命运动的一贯理想。

“他对后来将大批人流放的政策怎么看？”

“我们很少谈论政治。他认为我这个人天真幼稚。弗雷达，你总是不给我留一个和雷扎拉聊天的机会。”弗雷达坚持要走的时候，她这样说。“提醒我给你讲那两封信的事儿。”

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婆婆的树影在勾花窗帘上轻轻晃动，又在墙壁上留下一个个怪诞的暗影。北风在光秃秃的树枝间啸吟。我打开灯想读几行书，赶快进入梦乡。可是《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也好，《德国军警的报告》也罢，都不是催人入梦的东西。弗雷达问我读什么时，我顺口说，是我那本旅游指南。

已经12点一刻了，整个公寓大楼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响声。连“夜猫子”弗雷达和欧内斯特也都睡着了。只有我躺在黑暗中，看着墙上的树影难以成眠。经过许多年的期盼，我终于要访问我的先人生活过的小镇——扎戈了。走过他们走过的卵石路，走进他们居住过的低矮的木屋，想象他们的生活，想象他们的死亡。可是我为什么要去拉塞恩，这座和我并无直接关系的小镇呢？我此次造访能够慰藉还活着的人吗？

1949年，我和我的丈夫在以色列的时候，碰到了他的表兄莫迪塞和表姐托娃。他们在俄罗斯北部冰封雪冻的荒原小村乌斯特洛克金度过了战争年月。他们的母亲和我的公公是一母所生，后来嫁到波洛夫家。波洛夫算是拉塞恩的富户，有一片山林，还有一个磨面坊。20年代，许多亲戚朋友移居到别的国家的时候，波洛夫一家没有走。他们觉得在立陶宛日子也满不错。

1940年6月，苏联吞并立陶宛之后，波洛夫的财产全被没收。政府还把莫迪塞的父亲、叔叔以及家里别的成员都从家和磨房里面赶出去，由原来的记账员负责生产。莫迪塞一家搬到他姥姥家一所小房子里住。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他们总是提心吊胆，生怕有人敲门。

让人害怕的敲门声终于在1941年6月15日的夜晚响起。政府命令他们在一个小时内收拾好东西，到火车站集合。站台上，运牲口的车厢正等着他们。一路上，成百上千的犹太人，异教的富人、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反苏分子被塞进车厢。他们整整走了两个月，才到达俄罗斯北部的目的地。这期间许多人死在拥挤、肮脏的车厢里。

流放的那几年，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活了下来。那时，政府只让他们干一种活儿，那就是伐木，而只有伐木的人才给饭吃。莫迪塞的父母在乌斯特洛克金的第一个冬天就冻饿而死。14岁的莫迪塞和弟弟杰克尔刨开冰封雪冻的土地，埋葬了双亲。这样的流放生活整整过了5年。1948年，莫迪塞和他的妹妹托娃历经艰险，取道塞浦路斯，逃到以色列。杰克尔和叔叔一家还留在乌斯特洛克金。经过一番成功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后来娶了一个科米族女人为妻，两个

人一口气生了 11 个孩子。50 年后，这一奶同胞的两兄弟相聚时，竟塞 S，塞的故事之前，我还从来没听人讲过被流放的人在苏联经受过的痛苦。从前，甚至现在，这样的故事一概被斥之为反共宣传。莫迪塞的故事深深地撼动了我的心，也让我感到迷茫。信仰被铁的事实挑战时，那该是一种怎样的难堪。他也是我碰到的第一个认为苏联和纳粹同样坏的人。

“你要是没被流放，”我有点冒失地说，“也许早就被纳粹杀害了。”

“布尔什维克也并没有想让我们活下去，”莫迪塞说。

对于渴望更好的新社会的人来说，对苏联的失望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来立陶宛前几个星期，我给莫迪塞写信，问他我应该到拉塞恩寻觅些什么？磨房，他说，就在村口。

就这样，整整一夜，我几乎连眼也没合，刚想打个盹，就听见弗雷达敲门。“米沙来了，已经 5 点半了。”

弗雷达和米沙坐在前面。“天亮以后叫我，”我说。一夜未眠，非常疲乏，我蜷缩在后排座想睡一会儿。他们压低嗓门儿说话，只是经过一个晨雾笼罩的湖泊时把我叫醒。夏天放假的时候他们经常来这儿玩。他们第二次叫醒我是在考那斯城外的一个岔路口。再往前就是第九城堡。

所谓第九城堡是沙皇俄国为了保卫考那斯修建的最后一座城堡。1922 年到 1940 年，立陶宛独立期间，共产党人被囚禁在城堡阴冷潮湿的地下室。后来，苏维埃政府又用它监禁立陶宛民族主义者。最后，纳粹在这里折磨、屠杀了 100000 人。其中 70000 是犹太人。他们把这座城堡叫做“屠

宰场”。盖世太保说得更准确一点，管这里叫“灭绝地”。难以记数的犹太人被纳粹从考那斯、法国、荷兰、比利时押解到这里屠杀。

我们只是到城堡里简单地看了看。一条宽阔的大道通向山顶的纪念碑——那是一尊雕塑：三根截断的树干，树根裸露着，从不同的角度倒伏下来，又相互支撑着，直刺青天。周围旷野里的树木和这尊雕塑相比都显得十分矮小。博物馆还没有开门。弗雷达前几年来看过一次。她说，导游是一位异教的立陶宛妇女。那位妇女说，她之所以在这儿工作，是为了让人们记住，立陶宛犹太人曾经遭受过多么可怕的命运。而她的同胞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回到汽车上的时候，我们已经被这地方令人心悸的往事和刺骨的寒风冻得浑身麻木。米沙想带我们走穿过考那斯市区的那条路，顺便看看那里的风光。我和弗雷达都没有同意。犹太人居住过的地方我们看得够多的了。

离开考那斯，开车又走了45分钟，便看见一个很大的路标：拉塞恩。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米沙慢慢地开着车，尽量躲开车行道两侧泥泞的小路，寻找那座几十年前的磨房，但是连一个影子也没有看见。也没有找到低矮的木屋和铺鹅卵石的大街。马路两边都是一幢幢别墅式的院落，屋顶上铺着瓦，四周栽着小树。偶尔看见狭窄的小巷里有一两座破旧的木屋，年久失修，歪歪扭扭，仿佛随时都会倒塌。

街上行人稀少。米沙向一个手里提着很大一瓶牛奶的女人打听，哪儿能找到磨房。她回答说，她是战争以后才出生的，从来没见过这儿有什么磨房。不过她认识一个老太太，或许记得从前的事情。她上了汽车，把我们带到一座破破烂

烂的木屋旁边。一个没牙老太太穿着胶鞋，在泥泞的院子里走来走去，不知道正忙些什么。向导说明来意之后，老太太皱了皱眉头，又点了点头，然后指点起来。这时，木屋里跑出两个年轻妇女和一个小女孩。她们告诉弗雷达，那座老磨房早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就和镇子里的大部分房子一起被炸了。

米沙问了一个问题，我听懂一个单词 Zyde(犹太人)。老太太说，战后，有一个犹太人回到拉塞恩，不过许多年前就又走了。年轻女人告诉米沙：“我妈老糊涂了。他退休了，经常见不着他，但还在城里住着。”她可以带我们去找他。

告别了拿奶瓶子的妇女，又踏上新的“征程”。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的年轻女人起初满脸严肃，可是弗雷达生性爱说爱笑，不一会儿，车里的气氛就活跃起来，等车子开到一条静悄悄的大街，在一幢很大的公寓楼前停下时，她已经满脸微笑。她敲了敲一楼一扇房门。我又一次听见 Zyde 这个单词。对于全城唯一一个犹太人来说，名字似乎是多余的。她领我们上了三楼，按了按门铃。一个个子很高，头发灰白，看起来很有教养的长者打开房门。带路的年轻女人不肯进去坐一会儿，和我们告别之后便走了。

“阿夫拉姆·拉扎斯基，”弗雷达说明来意之后，Zyde 自我介绍道。弗雷达说，我们原本并不想打搅他。我们甚至没有想到镇子里还会有犹太人。他摆了摆手，不想听弗雷达的解释。“很少有人敲我的门，”他用依地语说。“你们能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他的房子不大，家具也很简单。弗雷达和我在长沙发上坐下。他和米沙在对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桌子上整整齐齐

齐放着一摞报纸，文具盒里有几枝钢笔和铅笔，旁边还有一个烟灰缸。

“你抽烟吗？”弗雷达满怀希望地看着那个烟灰缸。

他递给米沙和弗雷达每人一支烟，自己却不抽。他说，现在他尽量不抽烟。他举止严谨，神情自若，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

四周有好多装在镜框里面的照片。有的放在一个摆满书、带玻璃拉门的书橱里，有的挂在墙上。

“你们都看到了，”他朝那些照片指了指。“我被我的家人包围着。这两位年轻女子是我的女儿和她们的丈夫。一个嫁了个犹太人，另外一个女婿是非犹太人。她们都住在维尔纽斯。这个，”他朝一张照片指了指。照片上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抱着一个满头金发的小孩儿。“是我的大女儿5岁时照的。这位自然是我的前妻了。这两位，”他指了指另外一张黄褐色照片上两个戴钟形帽的姑娘，“是我的妹妹。1941年，她们和我家里其他人一起被纳粹的立陶宛走狗杀害了。”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弗雷达问。

“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他红着眼圈儿说。

“我的丈夫是拉塞恩人，”我说，看了看挂在长沙发后面那张小镇从前的照片。“他也有一张和这张差不多的照片。”

我们互相留了姓名。他还把从英国来祭奠先人的犹太人的姓名告诉了我。可惜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告诉了他丈夫家和他们的朋友的名字。他都认识。20年代中期，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移民到了别的国家。那时，他大约十五六岁。

“运气好的人都走了，”他很平静地说。“留下的人要嘛



阿夫拉姆·拉扎斯基

被流放，要嘛被屠杀。”

“波洛夫家的磨房还在吗？”我问。“我们转了一大圈儿也没找着。”

“早没了。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拉塞恩便被敌机炸了个底儿朝天。小城全毁了。你家里的人要是来这儿，绝对找不到过去的影子。这里完全是一座新建的城市，只有几幢老房子。”

我问他，愿不愿意谈谈他的经历。他耸了耸肩，说：“有

时候，说说也好。”

他告诉我们，大屠杀前，拉塞恩共有 2000 犹太人。从波兰逃来的难民给大家敲响警钟，许多人想逃到俄罗斯，但是没有成功。还有的人躲到小镇周围的乡下，大多数人都没能逃走。

“德国人还没来，城里的立陶宛人就开始袭击犹太人，”他说。“匪徒们闯到犹太人家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这还不算，他们折磨男人，强奸女人，城里一片混乱。乡下人跟他们不一样。我和别的设法逃出来的人要不是靠了他们的帮助，早就没命了。迫害我们的是城里人。我们几乎就没见过德国人。立陶宛国民军控制着拉塞恩。屠杀犹太人的是他们。”

他们发布了种种命令。这些命令和别的地方的命令大同小异：不准犹太人在人行道上行走，不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接触，不准犹太人到市场和村子里买东西。起初，他们要求犹太人外套胸前和背后都要缝一块白布，后来又改成缀一个黄色的星。面包定量供应，但是犹太人必须在非犹太人买完之后才能去买，结果常常买不上自己那份。犹太人还得去清理炮弹炸毁的房屋，拉走垃圾，推倒断壁残垣。立陶宛国民军极尽其侮辱犹太人团体中那些杰出人物，包括拉塞恩的拉比之能事。剪掉或者拔掉他们的胡子。医生、教师成了匪徒们折磨的主要对象。许多姑娘被绑架、强奸。另外一些人被指控为共产党，逮捕入狱，再也没有回来。他没有说起自己家人的遭遇，但说这番话时，不时抬起头看一眼两个妹妹的照片。

年纪在 16 岁到 45 岁的男人和身强力壮的年轻妇女都被

关进集中营。老人和带孩子的妇女则被集中到尼莫凯斯特大街几幢房子里。匪徒们强迫他们跑，在地上爬，一边用鞭子抽打，一边逼他们唱。后来又把他们套到装满石头、砖头的大车上，逼他们拉着跑，稍有怠慢，就打得皮开肉绽。

“300 个男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被立陶宛国民军押到离城 7 公里的荒郊野外，每人给了一把铁锹，挖一个很深的大坑。挖完之后，匪徒们搜走我们的个人物品，脱光我们的衣服，然后强迫我们站在坑边。我在他们开枪前的一两秒钟跳进坟坑，好几个小时，一直躺在已经死去的和正在死去的人们下面，完全淹没在血水之中。耳边是痛苦的越来越低的呻吟。我等待着，等待夜幕降临。天终于黑了，立陶宛国民军的士兵们喝多了酒，躺在坟墓旁边睡得死猪一般。我和另外一个还活着的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向不同的方向拼命奔逃。”

他擦了擦眼睛，半晌没有说话。“还能给你讲点什么呢？我一丝不挂，跑到一个村庄。农民们给我穿上衣服，把我藏了起来。就在这个村子里我度过第一个冬天。以后的三四年里，我在 33 个不同的农民家里藏身。他们都很穷，但是即使有一块面包，也要和我分着吃。我刚才说过，这些农民跟城里人不一样。”

后来，我看到一篇用希伯来文写的介绍拉塞恩的文章，可以算作对阿夫拉姆·拉扎斯基的故事的补充。杀死这 300 个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是 298 人）之后，那些立陶宛人高兴得又吵又闹，醉醺醺地回到城里。他们说，已经安排那些人在城外干活了，他们回来是为了给他们取点钱和衣物。已在黄泉之下的人们的妻子、母亲，立即准备好东西，托他们捎给自己的

亲人。

几天之后,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说,她在拉塞恩西南6公里处的一个村庄附近,看见一座座新坟。与此同时,一位名叫克拉明的犹太裁缝被叫到立陶宛国民军一位长官那儿。这位长官让克拉明按他的尺寸改一套男人的衣服。结果克拉明认出这套衣服正是前不久他给弟弟做的那套。而他的弟弟就在那被带走的300人当中。

真相暴露之后,立陶宛国民军的看守们公然夸耀他们的杀人罪行。他们大谈如何在同一个地点杀害柴特科染S],染大地的犹太人报仇。他们还嘻嘻哈哈地说,有些女人怕被活埋,给他们钱,让他们先把她打死。拉塞恩的老拉比阿哈伦·斯缪尔·卡兹和医生,教师,以及犹太人村社其他有名望的人自己动手挖墓。“给他们变个花样,干点儿正经活儿。”立陶宛看守哈哈大笑说。

越来越多的人被杀,关年轻人的营房已经空空荡荡。还没死的便被送到尼莫凯斯特大街。自然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杀害的命运。

从1941年7月到9月,1677名犹太人被杀。万人坑就在克拉诺斯附近,距离一个名叫卡尔诺依的村庄2公里。卡尔诺依在拉塞恩西南6公里。

“我的家人一个也没有活下来,”阿夫拉姆说。“战后,我又回到拉塞恩——除了这儿,我还能上哪儿去呢?我找到一件工作,经营一个挺大的合作社。后来又娶了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女人为妻。”他又指了指身后那张抱孩子的女人的照片。“我跟她生了两个女儿。她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一个还是工程师。我的妻子现在离我而去了。她住在考那斯。”他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半晌说不出话来。

弗雷达把她的电话号码和住址留给阿夫拉姆,请他日后到维尔纽斯一定到她家中做客。我也和他交换了地址。他一定要给我们弄点茶点。

“波洛夫一家的情况怎么样?”他问。我讲了他们的经历。“够惨的了,”他说。“不过被流放的人至少还有很多活了下来。”

在这个问题上,阿夫拉姆·拉扎斯基有发言权,我没有。

和阿夫拉姆告别时,我们相约保持联系。回维尔纽斯的路上,谁也没心思说话。米沙想放一盘录音带,又改变了主意。

“明天,”米沙打破沉默,“我们放松一下。去特拉凯湖。湖心有一座中世纪的城堡,要走过一座长长的木桥才能到达。然后到一家卡拉派^①信徒开的饭馆吃 kibinai。带欧内斯特一起来。他最爱吃 kibinai。你不知道什么叫 kibinai? 哦……也许和你妈妈做的 perogen 差不多。一种肉饼,不过非常好吃。”

“我还买了戏票。晚上我们到歌剧院看芭蕾舞去,”弗雷达说。“为了去扎戈我们得积蓄点儿力量。”

在拉塞恩城郊——我们曾经在那儿毫无结果地寻找波洛夫家的磨房——我们看见一个路标,上面写着“拉塞恩”三个大字。令人不解的是,这三个字上面划了一条红色斜杠。

“这是我们这儿的一种说法,意思是,你正离开拉塞恩,”弗雷达说。“不再有拉塞恩了。”

“是的,不再有拉塞恩了,”米沙说。

^① 卡拉派:犹太教的一个派别。

我把照相机的镜头对准这个路标,拍了一张照片。莫迪塞会明白其中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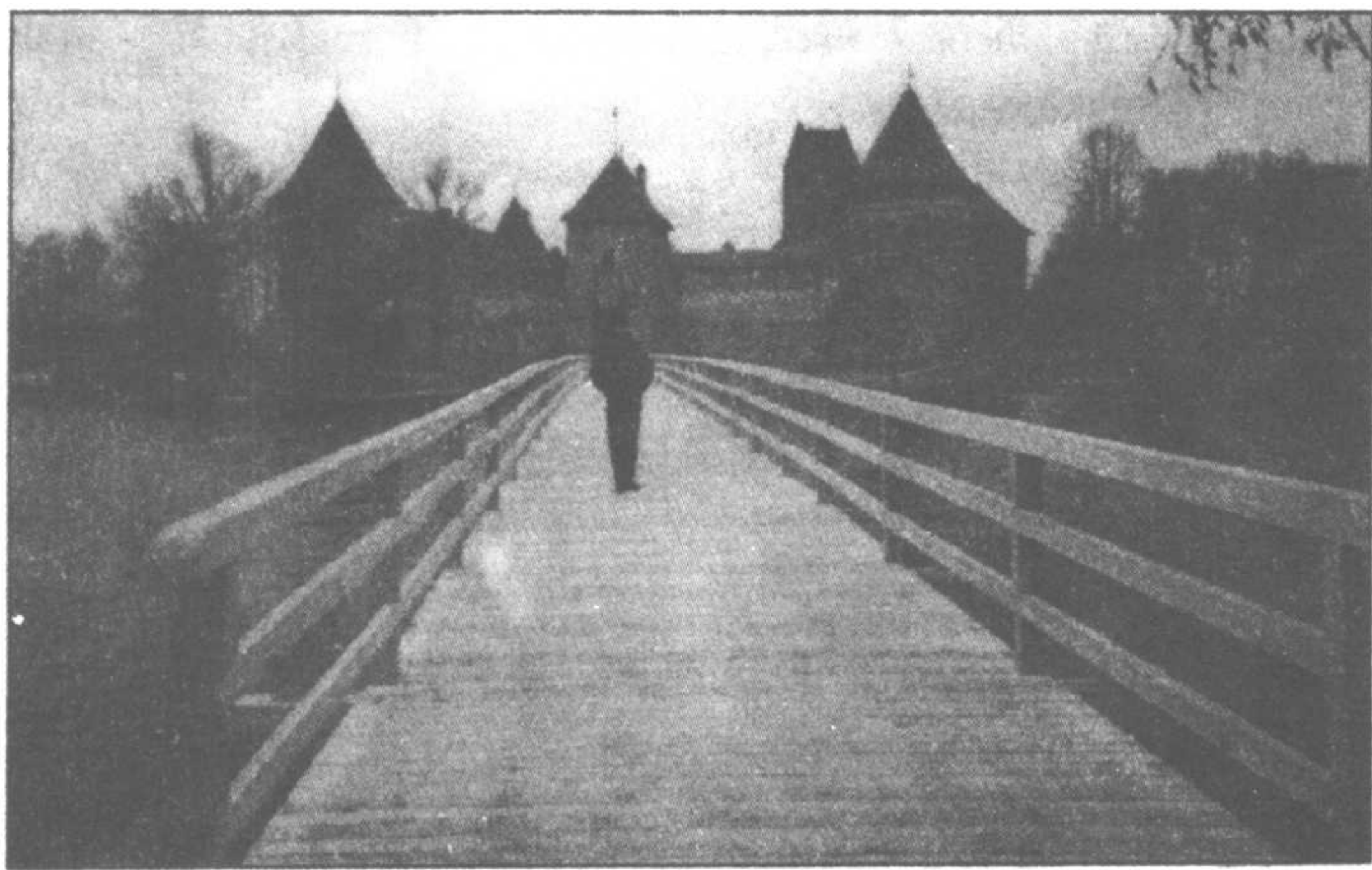
18 卡拉派信徒和哈扎尔人

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来立陶宛的,到特拉凯玩一趟虽然只是暂时放松一下,但毕竟是一件乐事。欧内斯特是我们的向导。他经常到特拉凯——作为学生,上历史课他来过这儿;暑假野游,他和家人、朋友来过这儿。弗雷达、米沙、米沙的妻子阿莎和我,跟在他身后,走过那座将城堡和陆地连起来的长长的木桥。欧内斯特告诉我们,这个烟波浩淼的湖是天然的护城河。正是因为有这道天然屏障,条顿骑士团几百年也无法靠近城堡。

我们漫不经心地走进城堡。条顿骑士团倘若也这样漫不经心,准得被消灭。城堡的大厅里穿堂风很大。欧内斯特一边指点我们看他的立陶宛英雄们用过的武器,一边告诉我,从前,立陶宛人烟稀少,到处是森林、湖泊、江河。14世纪,盖德米纳斯王朝成了欧洲的主要军事力量,领土从波罗的海扩展到黑海,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部分土地。

“盖德米纳斯很精明,”欧内斯特说。

按照欧内斯特的说法,他是挺精明。因为他不是靠战争扩大疆土,而是靠一系列政治联姻,发展、巩固了和俄罗斯的关系。他的女儿嫁给伏尔加河上游特维尔的公爵,一个儿子娶了白俄罗斯东北部广袤土地唯一的继承人——维特布斯克的女公爵。另外一个儿子娶了伏里尼亚的女公爵。她的嫁妆



通往特拉凯城堡的大桥,1992 年

就是国土的一部分。盖德米纳斯的影响远到斯摩棱斯克,普斯科夫和基辅。

“俄罗斯地理可不是我的强项,”我对他说。

“我会拿地图给你看的,”欧内斯特说。

“盖德米纳斯一定力大无比,”我说,“想想看,他穿得动这样重的盔甲,举得起这样重的宝剑。”

“精明而且强壮,”欧内斯特同意我的看法。“盖德米纳斯在维尔纽斯建都,1316 年到 1341 年在位。他是大公,比别的公爵都重要。他的孙子维陶特斯之所以也是大公,因为 1399 年,他打败了鞑靼人,1410 年,又在格拉瓦尔德之战终于打败了条顿骑士团。”

欧内斯特又给我讲了盖德米纳斯大公的儿孙们为了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的故事。他仿佛带我走进一座繁衍生息、香火接续的迷宫。盖德米纳斯生了阿尔戈达斯和凯斯图提斯,某

某生了乔盖拉和维陶特斯,某某又生了某某……与世代相传的王位相伴的是骑士团持续不断、残酷无情的侵犯,是他们一直想要征服立陶宛,或者说使之殖民化的狼子野心。后来,立陶宛和波兰联合起来,在维陶特斯的统领之下,打败了条顿骑士团。骑士团把他们的刀剑打制成犁铧,开始耕耘那块主人被他们大批杀死的土地。

经过多年的权力之争,维陶特斯最终和乔盖拉和解。乔盖拉登上波兰的宝座,条件是同意接受洗礼,并且和11岁的贾德瓦格王后结婚。他还负责让所有的立陶宛人接受洗礼。维陶特斯虽然也接受了洗礼,但人们怀疑他还是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他成了立陶宛的大公,波兰和立陶宛成了亲密的盟邦,并且最终实现了两个国家的统一。

欧内斯特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立陶宛的显贵们渐渐地波兰化了,立陶宛失去了民族感。贵族很少呆在自己的领地和庄园,农民置身于别人的领导之下。到1795年,大多数立陶宛人被俄罗斯人统治着,立陶宛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

“真是一个大杂烩,”欧内斯特说。“地主是波兰人,农民是立陶宛人,官僚是俄罗斯人。这就是立陶宛地名为什么都有三种不同说法的原因。”

“犹太人是什么时候到立陶宛的呢?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

欧内斯特不知道。我那时也不知道。后来,我弄明白他们是分两股到立陶宛的。第一股从南方来,第二股从西方来,比第一股大约晚一个世纪。从南面迁来的这股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巴比伦王国、波斯、布哈拉和其他近东国家。多少个世纪

以来,征服者像洪水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劫掠这些国家。侵略者中有一支哈扎尔人组成的部队。哈扎尔人是突厥人中的一个分支。他们曾经统治过俄罗斯的大片土地,成了巴格达的哈里发^①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一股平衡力量。他们是勇猛的武士,为阻挡伊斯兰教向东欧扩张,起到重要作用。

哈扎尔人在犹太人的历史史册中书写了独特的一页。大约公元740年,他们的统治者(哈干)布兰,他的朝廷和大多数老百姓都皈依了犹太教。这种皈依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人们知之甚少。对于这一点,以及哈扎尔人对犹太历史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影响,历史学家和作家各执一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哈扎尔人对犹太教的信仰是真诚的,当然也是持久的。从公元8世纪到13世纪中叶,哈扎瑞亚仍然是一个犹太人支配的国家。那些没有皈依犹太教的人仍然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

哈扎尔人和犹太人,真是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结合。我们从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中找到的那一点点关于哈扎尔人的记述,显示出一种相当复杂的文明。但是关于哈扎尔人的语言,历史没有留给我们哪怕是一行字。迄今为止,我们也不曾在什么碑石之上发现任何铭文。只是在希腊文的历史著作中见到过几个表示姓名的专有名词,使人想到他们可能说突厥语。而犹太人的文明在圣经中早有明确记载。

10世纪末期,北欧海盗和俄罗斯的人侵逐渐削弱了哈扎尔人的势力。到1250年,成吉思汗游牧民族的大军最终推翻

^① 哈里发: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国家元首的称号。

了他们的统治。哈扎尔人流落到周围斯拉夫人的领地。14世纪,立陶宛大军在维陶特斯的率领之下,打开一个穿越这些国家的通道,来到已经皈依犹太教的哈扎尔人的居留地。由于哈扎尔人英勇善战——皈依犹太教并没有削弱他们尚武的精神——立陶宛人就请他们驻守边疆,保卫立陶宛,抵御条顿骑士团的侵略。

勇敢的犹太武士保护一半是异教徒,一半是基督教徒的立陶宛免受嫉妒成性的条顿十字军的侵略,在后来的立陶宛人看来一定觉得荒唐可笑,耸耸肩,嗤之以鼻。

哈扎尔王国被消灭之后,犹太人从南方向东欧的大规模迁徙逐渐停止。15世纪,犹太移民主要来自西部地区:波希米亚、匈牙利、西里西亚、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捷克。这些地区的犹太人要嘛受到迫害,要嘛被驱逐。犹太人向东逃奔。在那里,他们的手艺受到欢迎。

在立陶宛,像在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从南方和西方迁徙来的犹太人相遇、通婚,扩大了犹太人的基因库,立陶宛犹太人应运而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感谢维陶特斯。是他使得立陶宛犹太人在众多的群体中有了自己的老祖宗。

维陶特斯还鼓励帝国各地的手艺人、商人、工匠来立陶宛定居。俄罗斯人、鞑靼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成员纷纷响应他的号召。政府给他们颁发了许可证,免征捐税,信仰自由。农民还分给土地。

1388年,犹太人第一次得到许可证,将自己置于立陶宛大公的保护之下。许可证对犹太人的人身保障和信仰自由做了专门规定。对犹太人的教堂和墓地免于征税,允许他们在自己愿意的地方居住,甚至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而这一

点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当时还难于做到。许可证允许犹太人自由贸易,允许他们从事手工业生产。对犹太人恶意的诽谤要受到放逐,作伪证受罚。基督教徒的证词要由一位犹太证人再一次证实才有法律效应。其他一系列反对犹太人的行为也要受到惩罚。比如朝犹太人 S],人,他的全部财产都要被没收。

从 14 世纪到 18 世纪帝国崩溃,虽然对犹太人传统的风俗习惯的侵害时有发生,但总体上讲,许可证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地位诸方面,为立陶宛犹太人提供了保障。

欧内斯特也许还会找出一些别的理由赞美维陶特斯。

参观完特拉凯城堡之后,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走到卡拉派信徒开的餐馆。我们准备在那儿吃午饭。弗雷达对卡拉派信徒的了解只限于他们和犹太人有某种联系,他们住的房子前面开三个窗户。她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立陶宛的。

“迄今为止,”我对她说,“卡拉派和哈扎尔这两个概念在我脑子里还很混乱。我只知道这两群人中,一群皈依了犹太教,另外一群背离了犹太教。”

我后来才知道,1392 年,维陶特斯打败了鞑靼人。鞑靼俘虏中一部分信仰卡拉派的从克里米亚来到立陶宛。他们大都定居在特拉凯,世代和犹太人居住在一起。维陶特斯把他们叫做“特拉凯犹太人”。这些人尽管和被他们称之为“拉比信徒”。^① 的犹太人主流社会的信仰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法国和土耳其,和“拉比信徒”的儿

^① 拉比信徒:指信奉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经》并接受传统教义的犹太人。

子们一起向著名的拉比学习经文,但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他们申请,并且得到了自己的许可证。

卡拉派源于波斯,是8世纪兴起于中东的犹太教的一派,反对口传律法《塔木德》^①,主张一切教义和习俗都应以希伯来《圣经》为根据。这种冲突直到15世纪才完全平息。这个派别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在散居各地的各阶层犹太人中传播。“卡拉派”是从希伯来文中的Karah变化而来的。karah的意思是“读”。也就是说,拉比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停下来加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塔木德》失去了摩西在《圣经·旧约全书》前5卷所制律法的简洁明快,因而加以扬弃。对于他们来说,Torah——即《圣经》前5卷才是宗教律法唯一的源泉。当“现代”生活和过时的法律发生矛盾的时候,卡拉派学者创造了不同于“拉比信徒”律法的口授的律法。比如《塔木德》规定的许多食品被废止,佩带经文护符匣的习俗也被废除。

16世纪天主教中新教徒的抗争和卡拉派的这些活动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区别在于,犹太教的拉比设法阻止了犹太教最终的分裂。面对卡拉派的威胁,一些最优秀的拉比学者据理驳斥,并且吸收了卡拉派许多可以接受的思想,改革了不少陈规陋习。卡拉派的反对逐渐平息,但是几乎花了700年的时间,卡拉派才不再成为传统的犹太教的威胁。

然而,当我们走进那座饭馆——一座屋顶倾斜、外面用原木装饰的二层小楼——时,我对卡拉派的历史一无所知。一股香味扑鼻而来,一位黑发女郎把我们领到一张桌子旁边。

^① 《塔木德》: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律法集,全书分 Mishnah 及其注释篇 Gemara 两部分,为犹太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

厨师——也许是她的丈夫——从后面一个木头分隔间出来，跟我们打了一个照面，然后又退回到他的“领地”。几个瑞典旅游者正在喝伏特加，一个个面红耳赤，酒意正浓，非常热情地朝我们举了举杯，说了几句瑞典话。我们用俄语和英语回答了他们的问候。

米沙点了好多菜：chinaiki，一种盛在陶瓷罐里的土豆肉烩菜；kibinai，出名的“卡拉派”肉饼。不一会儿，我们就像那几个瑞典人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那几个人的酒量连米沙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17世纪的时候，”弗雷达说，“瑞典人在立陶宛是不受欢迎的征服者。现在，他们是尊贵的客人。你瞧，雷扎拉，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你是说，人们会忘记过去，或者压根儿就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同意时间可以愈合创伤，但是你必须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创伤。”

“为现在而干杯！”米沙举起酒杯，大声说。

“为现在！”我们举起酒杯，齐声响应。

下午在温馨、友好的气氛中过去了。一方面因为吃得舒服，喝得痛快，另一方面因为彼此相伴十分惬意。“卡拉派”饭菜，不像丽赫的家宴，总让人想起痛苦的往事。

弗雷达伸出一只手，学尤瑞要人安静、听他讲笑话时的那副样子。“趣闻！”她非常熟练地交替使用着三种语言，讲完一个笑话，马上接着再讲一个。离开那家饭馆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恋恋不舍，但是必须赶回去，看晚上的芭蕾舞。弗雷达好一阵夸奖主人的肉饼，还问厨师如何配料才能烙出这么好吃的肉饼。黑发女郎学着弗雷达诙谐幽默的腔调，说：“别费那个

劲儿烙什么饼。维尔纽斯离特拉凯很近,随时可以光临小店品尝。”

后来,我发现卡拉派的分裂主义使他们免于二战期间的大屠杀。德国人认为,卡拉派信徒具有一种非犹太的“种族心理”。为了证实这个理论,他们找来三个杰出的犹太学者,向他们询问关于卡拉派的起源问题。为了救卡拉派同胞,三位学者一口咬定他们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三位犹太专家在大屠杀中被杀害,卡拉派却因为他们的“美言”而得救。

可是,卡拉派对犹太专家的恩情并没有回报。相反,他们揭发那些冒充卡拉派的犹太人,还向德国人和立陶宛当局提供犹太人村社的详细名单。

如果知道这一点,在特拉凯那家饭馆度过的那个下午还会那么愉快吗?很难说。我也许会想,他们是卡拉派新一代(就像德国人、立陶宛人或者别的什么人一样),不应该为父辈的罪恶负责。也许会食物哽在喉咙里,无法下咽。他们或许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一无所知,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摆脱了基于文化差异的偏见。我知道,与生俱来的偏见比历史更长久。

19 通往扎戈的道路

第二天早晨,我们8点半出发到扎戈,比原定计划晚了3个小时。因为米沙得给工人们发放这两天做衣服的布料。他坚持让我和他一起坐到前面。“前面视野开阔,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他说。弗雷达坐在后面,丽赫和海尔斯尔中间。



雷勃的遗孀丽赫在扎戈万人坑,1992年

起初,我只能看见灰蒙蒙的天空和落在挡风玻璃上的冻雨。那细微的水珠和雪粒随着车身的颠簸,渐渐化为乌有。雨刷坏了,米沙没带修理的工具。

“没关系,”米沙乐呵呵地说。“路上的车不多。”

过了20分钟,就开上有复式车道的高速公路。这条路是5年前才修的,但是已经有了裂缝。透过蒙蒙的雨雾,我看见一个路标,上面写着:前方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车里太热,米沙关了暖气,往录音机里放了一盘磁带,一边哼那首歌,一边在方向盘上打着拍节。弗雷达用深沉、略带沙哑的声音跟着录音带唱。

“你的声音比这个歌手还好听,”我说。“你应该上舞台表演才对。”

“她求之不得呢!”丽赫不高兴地说。我想起她一贯反对女儿当演员,心知说走了嘴,但后悔也晚了。

“不要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弗雷达唱道。俄罗斯民歌深沉、辽阔，对歌喉是否柔美的要求似乎不高。

“从这儿往左，”汽车离开维尔纽斯郊区时，海尔斯尔说，“就是我们那个村子柴默尔。更准确地说，曾经是。从这条路看不见。那就是我的悲剧发生的地方。”

弗雷达吻了吻他的面颊，以示安慰。

眼前是广袤而平坦的原野，我们从一座座农家院落旁边驶过。农舍都是呈斜坡的茅草屋顶，四周是麦田。间或看到一片片白桦林、低矮的松林和冷杉，一望而知是古代原始森林的“残留物”。

“白桦树，”弗雷达指着一片桦树林说。白色的树干上有一圈圈黑环。“有许多好听的歌是唱白桦树的。那些是松树。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把松树的球果染上好看的颜色。那种树你们叫什么？冷杉。对吧？春天，有一种叫鸛的鸟在树上筑巢。不过我们不喜欢那种鸟，”她指了指栖息在一棵光秃秃的树枝上的乌鸦，打了一个寒战。“给人带来坏运气。”

“眼下，它把坏运气带给了那些卡车司机，”我说。

公路边上，不少卡车司机趴在车头上，修理出了毛病的发动机。

“很难买到合适的工具和配件，”米沙解释说。“我要到下一辆卡车跟前停一下，看司机能不能借给我一把合适的扳手。”

米沙还挺走运，借了一把扳手修好雨刷，钻进汽车，甩了甩头发上的水珠。他发动汽车，脸上露出快乐的笑容。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有节奏地滑动着。

“几年前，我在这儿买了一幢夏季别墅，”他指了指河岸上

一幢幢木房子。“后来为了筹钱办工厂,让我给卖了。现在这条路上车辆不多,可是到了夏天,不管汽油有多贵,人们也要开着汽车到乡间别墅或者湖畔、海滨的旅游胜地度假。”

乌克默吉/维尔克米尔,我读着路边的路标。丽赫知不知道那首歌呢?维尔克米尔一个喜欢调情的小伙子同时爱上了3个姑娘。丽赫听说我知道这首歌,非常高兴,清清嗓子唱了起来。

… *Der bocher iz a Wilkomirer ,*
Kaift a bulke fun a fihrer ,
Essen est er umgevassen ,
Leift noch maidlech in the gassen...

“轻松的爱情歌曲不多,这支歌儿算是其中一首,”她说。“年轻时,单纯幼稚,把失恋看作天大的悲剧。可是等痛苦成为过去,你又可以为之而歌唱、欢笑。真不知道,那个维尔克米尔的浪荡子后来怎么样了。”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浪荡子”,他的命运只有两种可能。要嘛及时逃走,移民到了美国或者南非;要嘛 1941 年,德军大部队长驱直入之后,被随之而来的宪兵队包围。当时敌人行动神速,成百上千的犹太人落入陷阱,并且被杀害。他们不但行动神速,武器精良,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地方势力的支持。有时候,为了使地方上的这种支持和德国行刑队的屠杀密切配合,按既定方针进行,德国人不得不限制立陶宛人的“热情。”

为了做到“不使一个犹太人漏网”,德国人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一个地区。这样一来,一次行动,反而会有

整整一个村社漏掉。但是一次漏掉并不意味着幸免于难。他们把这些暂且活下来的犹太人都关到隔离区,交给“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立陶宛走狗看守。然后像消灭维尔纽斯的犹太人那样,两次,三次,四次,乃至第15次再回来扫荡,直到清除得一个不剩。德国人每一次大屠杀完了,都要向柏林警察总局的头子送上一份详细报告:多少男人、女人、儿童被杀;怎样杀的,在哪儿杀的;当地的立陶宛人给予多大程度的合作;人们的情绪如何,还有多少“工作”要做。正是这种日尔曼人的严谨,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留下一份份文件和如山的铁证。

“这是你的‘旅游指南’吗?”弗雷达见我又查罗尔·希尔伯戈那本《欧洲犹太人的毁灭》,问道。我已经翻到维尔克米尔那一页。

“一本令人生畏的‘旅游指南’。这本书上说,他们在维尔克米尔采取了4次行动,屠杀了4000犹太人。”

越往北走,天空变得越暗。冻雨,雪雾,没有车辆的道路,雪水浸泡的田野,低矮的白桦林、松树林,弥合成恶梦中的风景。歌声早已停歇,丽赫要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谁也没有胃口。汽车在寂静中行驶。

进入波尼维兹的时候,雨下得更大了。1941年,德国人把这里变成一片废墟。现在看到的是一座完全新建的小城。一幢幢3层小楼,整洁的马路两边树木成行。我的父母认识一些从波尼维兹移民到南非的人。像从扎戈和别的小镇来的移民一样,他们在约翰内斯堡也有自己的同乡会。他们定期聚会,还经常给老家的亲人寄钱。1945年,同乡会解散。因为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经过德国宪兵的6次行动,他们的

亲人都已不在人世,有钱也没处寄了。

快到沙维尔的时候,天晴了。沙维尔也是这个省的名称。从地理位置讲,扎戈隶属沙维尔。一个很大的白蓝两色的路标显示,这是 A-216 号公路。往左拐通往扎戈,离沙维尔 80 公里;往右拐通往里加,只有 16 公里。

里加是周围村镇中最大的城市。扎戈人经常到里加去看病,走亲戚,或者从那儿乘船到别的地方旅行。如果我的父母,姥姥,姨妈,舅舅还在人世,我或许会写信给他们说:“这次我不去沙维尔了。现在我正在去扎戈的路上。”可惜已经永远没有这种可能了。母亲这边最后一个幸存的亲戚——姨妈荷达,也在去年去世了。我从小就和她特别亲,从来也不叫她姨妈。但是她死以前,从几乎尘封的记忆中,找到一个闪光点。我写信问她老家的地址时,她告诉我:“道坎塔大街 41 号”。当我向这个“老家”行驶的时候,快要忘记的故事和民歌又在我脑海里出现。

“这是沙维尔?”丽赫问。驱车驶过小城的时候,看着眼前一幢幢漂亮的房子,她简直难以置信。“我们坐着那辆大卡车向扎戈逃的时候,半个镇子都在火海之中。炸弹就在我们周围爆炸。镇子旁边还有一个湖……认不出费沃克当年住过的地方,也认不出我干过活的那个工厂,还有雷勃工作过的那个兵站。后来,我姐姐就被关在这儿的隔离区。她的小女儿和别的孩子们被德国人从这儿抢走。刚生下的婴儿被活活捂死……哦,就是这座小城。看起来普普通通,和别的城镇没有两样……”

“你就不应该来,”弗雷达说,一只胳膊搂着丽赫,另一只胳膊搂着海尔斯尔。“我知道,会让你们想起痛苦的往事。”



通往扎戈的路

快到叶尼索克的时候,农村景色更具特色。从前,母亲经常唱一首关于叶尼索克的歌,我只记得调子和开头的两句歌词。

In di kleininke shtetala Yaneshik,

Der trauer is zeier greis...

叶尼索克虽然是一个小镇,
痛苦却无边无际……

丽赫已经不记得这首歌了。

“但是我相信,”她说,“叶尼索克曾经有非常活跃的犹太人村社。哪里有犹太人,哪里就有痛苦。”

离开这个小镇的时候,我看见一座木屋的墙壁上写着一条大街的名字:通往扎戈的路。还有30公里路要走。辽阔的黑土地,不时有一个小村庄从眼前闪过。有一个村庄的名字

是斯凯斯戈瑞。我舅舅本兹的妻子就是这个村的人。她叫亨德。是我的姥姥把她送到墨西哥和从未见过面的新郎成亲的。这桩婚事完全是“父母包办”。姥姥怕舅舅在墨西哥找一个黑眼睛的基督教徒姑娘当儿媳妇；而把亨德养大的她的舅舅当时也遇到了难题。亨德爱上了一个异教的立陶宛小伙子，败坏了舅舅的家风。舅舅抱怨说，自己一片好心，没想到遭此报应。亨德的父母亲死了之后，舅舅就把她带到自己家。她给他家洗锅刷碗，挑水做饭，收拾屋子，什么活都干。现在，能不花一分钱的嫁妆，把她嫁给一个犹太人，他求之不得——哪怕他在美洲中部的不毛之地，他也愿意。他妻子有点儿犹豫。他对她说，当地人，没有一个小小伙子会娶一个被异教徒糟蹋过的姑娘，不管她长得多漂亮。

小城镇里，这样的伤心事很多。

扎戈越来越近。我们沿着一条不宽的柏油路行驶，两边是泥泞的小路和高高的白桦树。许多年以前，我的外祖父“黄瓜大王”就是沿着这条路，到城里卖他种的蔬菜。祖父——红头发西蒙也是赶着大车，沿着这条路，把他的旅客送到柯尼斯堡。也许没有这些树木，但是蓝灰色天空下面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肯定还是当年的模样。在这晚冬的萧瑟与阴冷之中，无法想象这块被雪水浸泡的土地会变成绿莹莹的麦田，麦田中还会点缀一株株鲜艳美丽的罂粟花和矢车菊。

祖父走过这条路许多年之后，这片沃野一定和农民们一起默默地、满腹狐疑地注视着沙维尔的消防队开着消防车向扎戈飞也似地驶去，去冲洗市场广场犹太人流下的鲜血。

一条排水沟上方，立着一块长方形路标：扎戈。啊！扎戈，我们的老家，我终于来到你的身边。我用照相机拍下这个

标志,先拍了一个远景,又拍了一个特写镜头。扎戈,白底黑字,周围是荒凉的田野,偶然可见一片新绿,一丛丛还没有吐叶的小树在雾蒙蒙的背景下摇动。我用照相机照下了一切。记忆常常是靠不住的。

“这不是扎戈,”丽赫说。“进扎戈的时候必须经过一片树林。还有纳瑞斯金公园上哪儿去了?”

“也许我们正在去公园的路上,”弗雷达说。

四周一片荒凉,没有公园的影子,只有冬天枯黄的衰草和积雪压弯了树枝的水淋淋的松树、冷杉。

又走了50米,米沙在公路左边一块蓝色的长方形标牌前停下。箭头指向不远处的一片森林,下面写着一行字:Fasizmo auku kapai,0.2.“法西斯主义牺牲者纪念地,”弗雷达给我翻译这几个字的意思。“这种牌子简直随处可见。通常是在森林边缘,那是他们杀人的地方。”

丽赫一口咬定:“这不可能是扎戈。万人坑在纳瑞斯金公园。你们看,这像个公园吗?”

谁也不想跟她争论。

米沙把车开上一条狭窄的小路,汽车在松软的泥土上颠簸着,向纪念碑驶去。

眼前出现一片树木围起来的很大的空地,四周还围着一道低矮的铁丝网。门口有两根铁柱子,上面钉着三块金属牌。第一块用立陶宛语,第二块用依地语,第三块用希伯来文写着如下的文字:

1941年10月2日,希特勒匪徒在这里屠杀了沙维尔地区3000名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

周围七八个村庄,包括扎戈的犹太人被纳粹屠杀。帮凶是当地的立陶宛人,他们从前的邻居。这就是美丽的纳瑞斯金公园!

丽赫连连摇头。许多年前栽种的那些可爱的灌木丛、秀丽的白桦林都哪儿去了?少女时代,她经常在浓荫覆盖的小路上踟躅徘徊,看见别的姑娘挽着雷勃的胳膊散步,伤心地偷偷哭泣。1943年,他从前方写信给她,战争结束之后,你和我一起再到纳瑞斯金公园散步。不成想,3个月之后他就死在异国他乡。

我的父母结婚之前,父亲曾经和他那位俄罗斯女教师在这里散步;母亲也曾和她那位不守信用、独自扬帆远航去了非洲的小伙子幽会。年轻朋友们在幽深的树丛下摆好姿势,请摄影师沙布塞尔班拍照片。他们直盯盯地望着照相机,仿佛要和命运做一番抗争,不容许把这座美丽的公园变成他们的葬身之地。

我们从汽车里出来,沿着一溜很长很长的花坛慢慢地走着。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花坛,而是那万人之冢。丽赫默然无言,脑子里一片混乱。

“战后,1945年,”叶赫兹凯尔·弗莱斯克在他的证词里写道,“赎罪日后的第二天,我来到纳瑞斯金公园的万人坑。120米长,两个人宽。据说,那里埋着6000犹太人。”

坟墓左边是纪念碑。三层台阶的水泥底座,上面是凿刻得非常粗糙的方尖碑。这以前,我已经看见过两张这座碑的照片。第一张上面刻着用依地语写的碑文,顶端还有一个银球。第二张照片上的石碑已经变了一个模样。一个金属牌子覆盖了依地语碑文,上面用俄语写着:1941年10月2日,3000

名苏联公民在这里被屠杀,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牺牲者。碑顶的银球也被取掉,只留下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尖顶。

现在屹立在我们眼前的这座纪念碑就是经过改造的第二张照片上的那座方尖碑。“苏联”的字样刚刚被凿掉,最早的依地语碑文只隐隐约约留下四个字:“这里躺着……”

方尖碑被风雨剥蚀,留下一道道泥土和地衣。刺骨的寒风在松树枝头呼啸,凝冻了所有感情。我们默默地站在纪念碑前,眼里没有泪水。不知道是谁在碑前放了一个塑料花瓶,瓶子里插了一株小小的塑料冷杉。风吹倒了花瓶,丽赫小心翼翼把它扶了起来。

我的手和眼似乎完全脱离了思想和感情的支配,一直不停地拍照。我一定要把什么都记录下来。我决不再来这个可怕的地方。照相机嗡嗡地响着,一个胶卷用完了,我连忙又装了一个黑白卷。我们向汽车走去的时候,弗雷达挽着我的胳膊。米沙脸色灰白,在海尔斯尔和丽赫中间慢慢地走着。

“我们的森林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坟墓,”弗雷达说。“我知道在纳粹的唆使之下,有些立陶宛人的确干过许多可怕的事情。可是如果我要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就得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有坏立陶宛人,也有好立陶宛人。因为我自己就是立陶宛人。有时候,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当我碰到那个年龄段的人,我常常想问他们,在战争中你都干了些什么?可是人不能总这样生活。”

我们第一次注意到,一排树后,有一幢砖房子。呈斜坡的屋顶上面有3个加了防护罩的烟囱。屋顶下面,12个小阁楼的窗户和底层的窗户平行,活像鸽棚。丽赫不记得曾经有过这样一幢房子。沿着那条小路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种马场，农业部。

“我想知道的是，这是不是扎戈？那些树都哪儿去了？”我们向城里驶去的时候，丽赫问。

“砍掉了吧，”弗雷达说。“还能上哪儿去呢？”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谁也不想说话。房屋和一座教堂的尖顶已经遥遥在望。我们终于来到扎戈。

20 扎 戈

通往小城的沙土路坑坑凹凹，积着雪水。米沙手里握着方向盘，转来转去，极力避开水洼。雨停了，但是铅灰色的乌云还低低地压在低矮的木屋上。屋顶上面铺着瓦，竖着电视天线。街区最末一幢房子改成一个小商店。门口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音响、录像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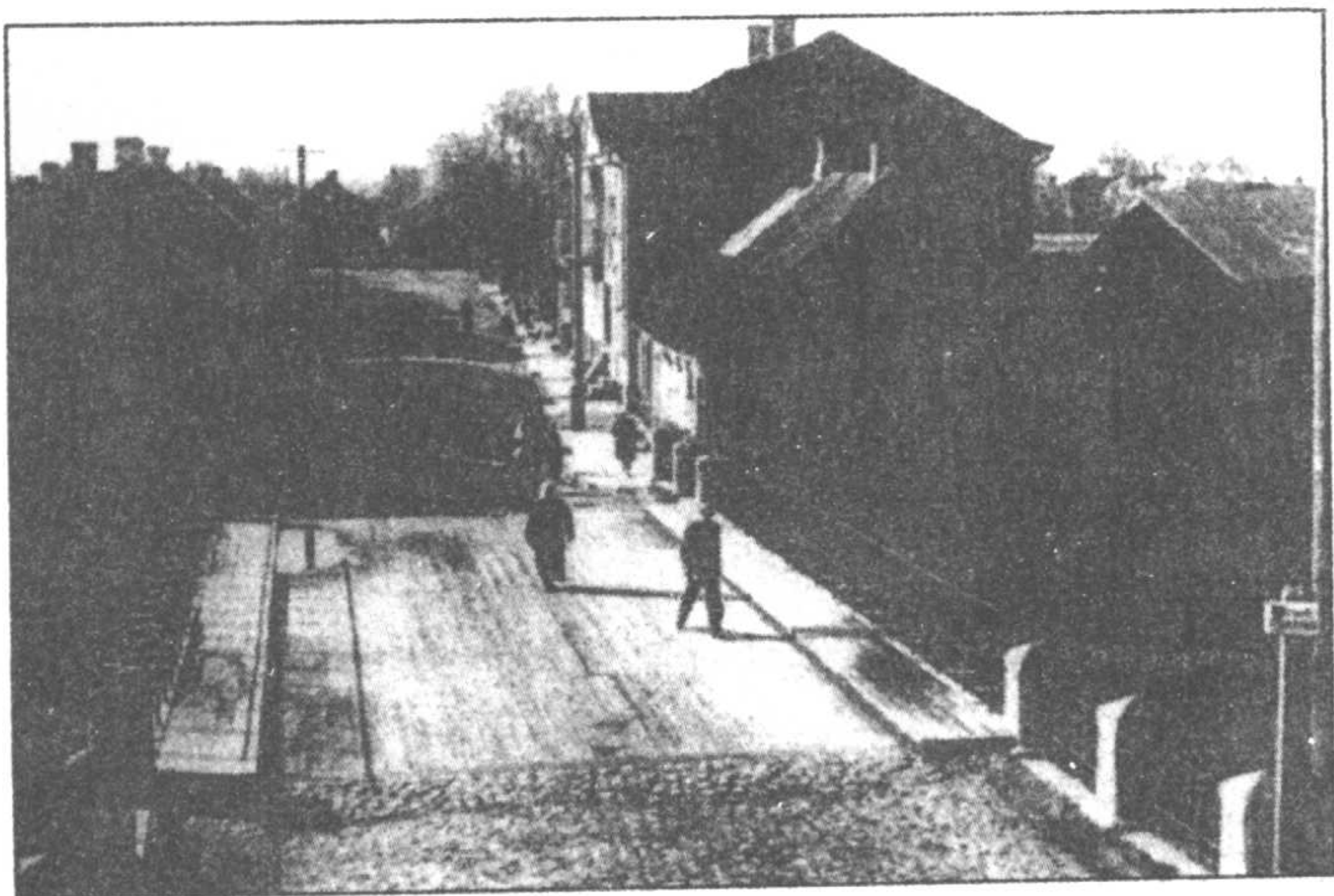
“不是扎戈，”丽赫还在叨叨。

“她认不出那个卖音响设备、录像带的铺子，”米沙说。

“妈，”弗雷达终于没了耐性“你怎么这么糊涂？路标清清楚楚写着‘扎戈’，刚才我们还到了纳瑞斯金公园的万人坑，看到了那座纪念碑。你还要什么证据呢？你已经46年没来过这儿了。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也忘了好多东西。”

然而，丽赫是对的。这不是她心目中的那个扎戈。这是一个新的扎戈。我的父母倘若来到这里，也认不出这便是他们朝思暮想的“老家”。

“我有一个地址，道坎塔大街41号。我母亲家曾经在那儿住过。我们试一下，看能不能找到。”



20年代的扎戈,斯维特河上的小桥

米沙把车停到街角站着的一对衣衫褴褛的老夫妇跟前。老头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身体前倾,扶着老伴儿。可是老伴儿也比他强不了多少。米沙问他们,道坎塔大街在哪儿。两个老人抬起脏兮兮的脸,眯缝着昏花的老眼,看着米沙,然后,相互看了一眼,摇摇头,转身就走。米沙又去问另外一个围着头巾、上了年纪的女人。老太太似乎大吃一惊,话也没说,扭头就走。

“他们以为我们反攻倒算来了,”弗雷达说。

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指给我们去河那面镇公所的路。

汽车驶过一座小桥,桥下浅浅的河水缓缓地流动着。丽赫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有点儿歇斯底里。

“这不是原来那座桥,也不是斯维特河!”她喊了起来。“你们难道不知道,雪化了之后,这条河应该是什么样子吗?有一年春天,还冲走一个小伙子呢!”

从杰克·特拉贝克拍的那些照片看,斯维特河的确很宽,

水流也很急。小时候,舅舅经常给我讲在斯维特河游泳的故事。可是现在,这条河里杂草丛生,浑浊的河水在桥下懒洋洋地流淌。米尔克——雷勃的“情人”,战后回到扎戈,一位曾经给她家当佣人的异教妇女对她说,广场的血从一条条小巷流进斯维特河。河里全是血,她一边说一边在自己身上划十字。现在这条河正在干涸。

又是一个浸透了鲜血的神话,又得让犹太人负责。只不过这一次要负责的是他们的鲜血。当然,实际上只是污染,我对自己说。农田里的肥料或者别的废物都被冲到河里,河水上到处漂浮着蓝的绿的水藻,不是鲜血,但是驶过小桥的时候,我还是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斯维特”,桥头立着一个蓝白两色的牌子。汽车在一幢飘扬着立陶宛国旗的白色二层楼房前面停下。丽赫一句话也说不出。

弗雷达和米沙到楼里去了,我和丽赫、海尔斯尔呆在车上。丽赫从放在脚边的一个提包里拿出煮得很老的鸡蛋,切得很厚的黑面包片和装在暖瓶里的咖啡。她一边往塑料杯子里倒加了糖的黑咖啡,一边说:“来吧,活着就得吃东西。”感谢她递给我的咖啡。鸡蛋好像噎在了喉咙里,难以下咽。

弗雷达和米沙似乎走了好长时间。我从车里下来,向四周张望着。车停在镇公所办公楼前面。办公楼正对一个广场。广场很长但不太宽,四周都是店铺和住宅。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通往广场中央,大道两侧是花坛和树木。花坛里黑油油的泥土仿佛告诉人们,这里将繁花似锦。人行道两侧的草坪已经吐出点点新绿。这一定是镇广场。难怪丽赫认不出这就是扎戈,我的家人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扎戈有这样一个广场。

丽赫在车里向我焦急地招着手。她心里很不自在。其实我也不自在。我在广场拍照的时候,有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嘴里愤怒地骂着什么。街上的人不多,但是从我们旁边走过的人都铁青着脸。是对外国人的憎恶?还是仇恨?我虽然无法解读他们脸上那种表情,但是感到一种冷嗖嗖的敌意。

弗雷达蹦蹦跳跳地走下镇公所前面那一溜台阶,后面跟着米沙,两个人脸上都带着微笑。他们没有回到车上,而是和一个正向广场走来的壮实汉子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弗雷达向我们快步走来,米沙还和那个陌生人站在一起。

“这就是扎戈,妈妈,”她说。“但是道坎塔大街已经没有了。办公室那位女士知道我们是犹太人之后,很帮忙。‘扎戈只剩下一个犹太人了,’她说。‘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她拿起听筒,无意中朝窗户外面看了一眼。‘他在那儿,’她喊了起来,‘那就是伊沙克·蒙德尔松!你们要是现在下去,正好能碰上他。’”

“伊沙克·蒙德尔松……”丽赫皱着眉头想。“是个野小子。成天跟一帮孩子瞎跑。”

“别管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也别管镇公所那位女士说了些什么,如果他就是野小子伊沙克·蒙德尔松,毫无疑问,这儿就是扎戈了,”弗雷达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他已经邀请我们去他家作客了。”

伊沙克·蒙德尔松块头很大,鼻子也很大。他腰板笔直,两腿稍稍分开,两条胳膊叉着腰,好像要摔跤似的。他朝我们点了点头,脸上连一丝笑容也没有。一双蓝眼睛闪烁着警惕的目光。

“我是丽赫·贝特勒,柴依姆的堂妹,”丽赫说。“我记得

你。那时你还是个孩子。”

“战争爆发时，我 17 岁，”他说。“我是纳粹入侵前逃出来的。”

丽赫把我介绍给他，说：“她是戈森·约费的女儿，雷勃的侄女。”伊沙克摇了摇头。他是 1924 年出生的。戈森离开扎戈的时候他才两岁。“她想知道扎戈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些什么。她想理解……”

“理解？谁能理解呢？”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不过我可以把我知道的情况都告诉她。而我知道的事儿都是阿尔托娜，我的妻子告诉我的。她看见了一切。她不是犹太人，”她补充说。“走吧，上我们家去。”

他住在广场对面一幢二层公寓楼的一楼。入口是楼旁边一条小巷。我们从一个个子细长的女人旁边走过。那个女人正在对面的小院里劈木头。她停下手里的活，好奇地瞥了我们一眼，拍了拍拴在柱子上的那条阿尔萨斯小狼狗，然后继续劈她的木柴。小巷那头，几个小孩儿在玩球。门里几条小狗兴奋地叫着。伊沙克开门之后，两条达克斯小猎狗围着他跳来跳去。

“哦，真晦气！”丽赫踩了一脚狗屎，不高兴地嘟哝着。

伊沙克连声道歉。他的妻子喜欢狗。平常它们不会这样随地拉屎撒尿，可是今天他把它们关在屋子里的时间太长了。他把它们抱起来，关进厨房。丽赫脱下鞋，小心翼翼地提在手里，跟在伊沙克后面走进客厅。前门开了，劈木柴的女人走了进来。她朝四周瞥了一眼，拿起一块布，擦干净地板，然后从丽赫手里接过那双鞋，一声不响，走了出去。

几分钟后，她提着已经刷洗干净的鞋走进客厅。“这是我

的妻子阿尔托娜，”伊沙克说。

她五官端正，线条明晰，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伊沙克向她介绍我们几个的时候，很庄重地微笑着。“她不会说依地语，但是能听懂。还会唱依地语歌儿。她的大多数朋友都是犹太人。战争爆发时，她还是个孩子。”

他跟她用立陶宛语说了几句什么，她走了出去。客厅不大，但是布局合理，几件家具摆设得也很有趣味，一扇大窗户正对广场，屋子里面很明亮。

“正对广场，景色多好，”我说。

“广场？”伊沙克喉咙里爆发出一阵咯咯咯的笑声。“这是他们屠杀犹太人的地方。从前是市场。”

我走到窗口，看见广场上站着几个人，正在谈论什么。我觉得他们是朝伊沙克这幢房子张望。还有些人从广场上走过。丽赫也走了过来，她脸色苍白，下嘴唇颤抖。

“我怎么认不出来呢？这座楼，旁边那条小巷，还有这些房子的布局，连一点点印象也没有。伊沙克，”她说，“你记得约费的理发馆吗？”

“当然记得，”他说。“就在我们这幢房子旁边。费沃克经常给我理发。斯马尔克是他的助手。雷勃我是后来在部队认识的。这是图加维特街19号……”

“我们家住在18号，就在理发馆上面。弗雷达、米沙，这是我长大的地方！是我的父母、家人生活的地方！对面就是市场广场，我们这个镇子的中心。赶集的日子，我经常看农民们摆摊卖东西。从我们那幢楼的阳台上……伊沙克，那个阳台哪儿去了？”

他告诉她，那座楼翻修过一次，阳台也变了地方。

“难怪我认不出来！孩子们还以为我老糊涂了。就从那个阳台上，一个俄罗斯军官宣布，我们成苏联公民了。不过，至少俄罗斯人没有杀害我们。纳粹却把犹太人都集中到这儿，残酷杀害。伊沙克，你怎么能在这儿生活？”

“给我 100 万卢布，我也不会离开扎戈，”伊沙克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的出生之地，我的亲人全都埋葬在这里。我想离他们的坟墓近一点。1947 年，立陶宛 16 支队解散之后，我回到扎戈。我没有钱，也不会什么手艺，简直一无所有。只会打枪。怎么维持生活呢？该上哪儿去呢？那时，有几个犹太人已经回到扎戈。你的堂兄贝特勒，兹洛特——我的一个哥哥。现在他们都死了。我碰到阿尔托娜，跟她结了婚。现在我们有 3 个儿子。这 3 个儿子都按犹太教的规矩，行了割礼。是从里加来的一个拉比给做的。”

“你在这里怎样谋生呢？”米沙换了一个话题。

“我有一块地，可以养鸡，鸭，鹅和几头牛。我雇了一个帮工干这些活儿，自己做皮毛、肉类生意。我还是猎人。森林里有的是兔子、鹿和别的动物。旅游者来这儿，主要是为了打猎。他们付不少钱。有一次，我带一个德国人去打猎，我觉得他玩得一点儿也不痛快。到密林深处之后，林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对他说，我是犹太人。”

米沙告诉他，他本来学做帽子，可现在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他很愿意买伊沙克的皮毛。

“货币稳定之前，我什么都不想卖，”伊沙克说。“钱连废纸都不如。”他们相互留了电话号码和地址。

“你住在这儿，不觉得有点儿紧张吗？”我问。“只有你一个犹太人，在一个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的地方。在我

的印象之中,虽然已经过去将近50年,犹太人还是没有安全感。人们劝告米沙,不要在扎戈过夜。”

“你想看看一个犹太人是怎样生活的吗?”他说。

他领我去他的卧室的时候,我寻思那一定是个豪华舒适的所在。因为言谈话语中,伊沙克对他的物质享受似乎颇为满意。在他和米沙大谈他的生意如何发达时,丽赫悄悄地喃喃:“吹牛!”

他拉开一道帘子,露出立在墙角的一支长枪。“犹太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他说。

“你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呆着呢?”

“哪儿能更好一点呢?在这儿,我至少知道谁是敌人。”

我无法想象在这样一种环境如何生活。危险到底有多大?枪毕竟是他狩猎所必须的武器,未必就是真的用来防身。我们又回到客厅。

“从战场上回来之后,我一点儿也不怕他们。在东线战场上,我出生入死,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没有经历过。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他解开衬衫,露出左肩,一道深深的伤疤出现在我眼前。“一场又一场的恶战。我们那个师死了一半人。回到扎戈,听说家里人的悲惨遭遇之后,我清算了这笔血债。”他没有详细叙述这方面的情况。“战争爆发之前,我经常和一些异教徒的男孩儿一起踢足球。他们对我的归来表示欢迎,但是警告我,如果我还叫伊沙克,匪徒们会杀了我。他们说:‘把你的名字改成帕特鲁斯吧。’我不愿意改。但他们还是叫我帕特鲁斯。‘这样一来,’他们说,‘谁都知道不能加害于你了。’”

“是你的朋友叫你帕特鲁斯,还是基督教的牧师命名你为帕特鲁斯?”丽赫气得浑身发抖。

“妈妈！”弗雷达瞪了她一眼。

“我的朋友。当然是我的朋友，”伊沙克说。“他们都知道我是犹太人。谁都知道。从扎戈到维尔纽斯，到里加，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是犹太人。每逢赎罪节，我都到里加的教堂里做礼拜。我的妻子坐在楼上，我坐在楼下。过我们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时候，还要买无酵饼……”

“也就是哄哄鬼吧，”丽赫说，然后紧紧地闭上两片嘴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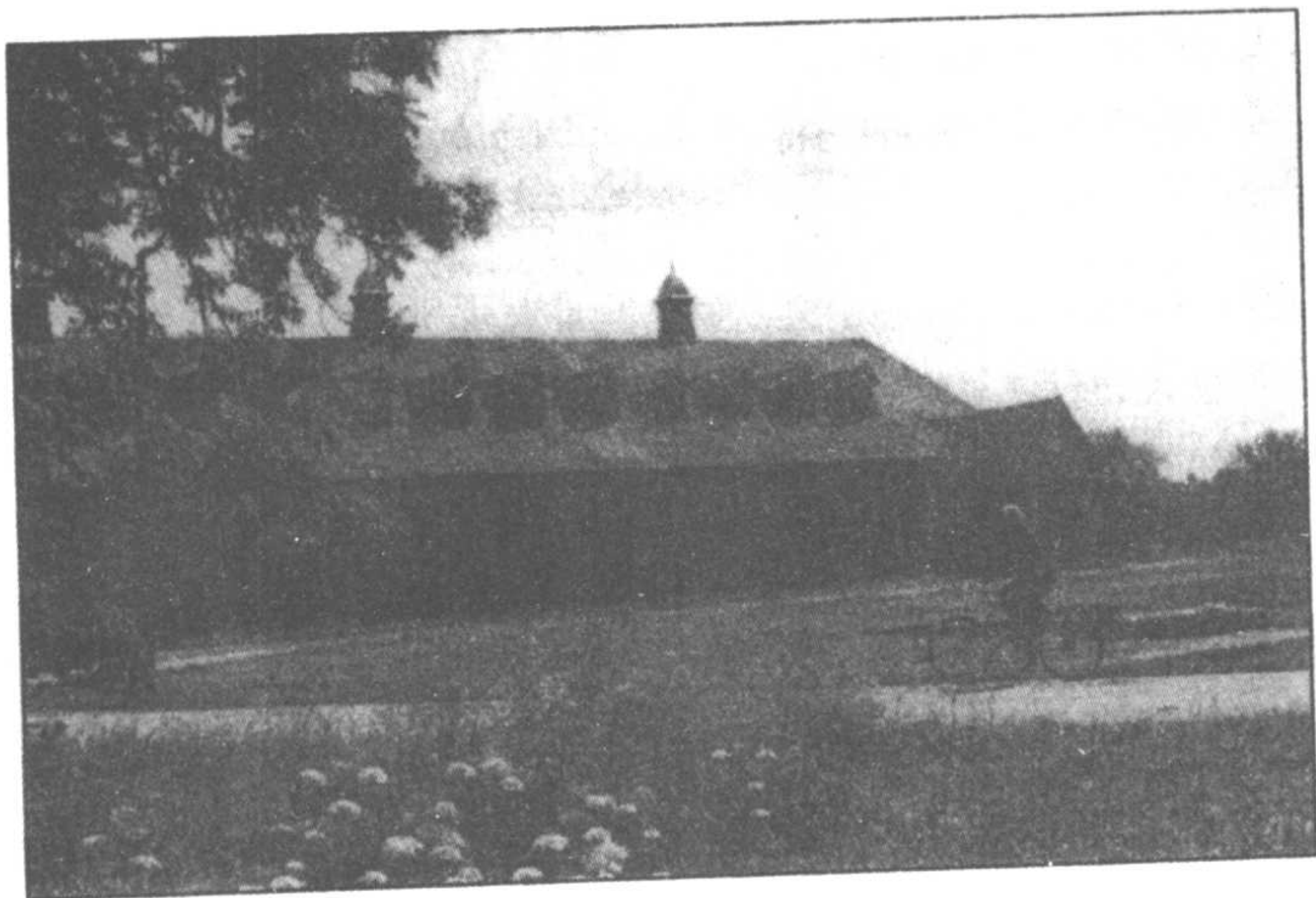
“你是怎么逃出扎戈的？”“和事佬”米沙问道。

“骑自行车。许多年轻人都是骑自行车逃命的。贝特勒、约费和另外一些共产党员是坐一辆很大的俄罗斯卡车跑的。剩下的人，有的骑马，有的坐车。一路上，多次受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国民军的袭击。马被抢走，东西被偷走，人被打死。我们家很穷，没车没马，所以连逃跑的机会也没有……”他皱着眉头，默默地坐着半晌说不出话来。

“扎戈一直是个养马的好地方。我们这儿有许多马贩子。你们来扎戈的时候，看见那座很大的建筑物了吗？那是纳瑞斯金伯爵给他女儿盖的。最初是为了给朋友们看室内马术表演。现在成了种马繁殖场……”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哦，讲我是怎么逃出扎戈的。我们是好几个人一起相跟着骑自行车跑的。一个犹太裁缝，两个异教徒，马兹卡斯兄弟。他们一个人带出一个犹太姑娘——让她们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上。两兄弟救了两个姑娘的命。现在她们都在以色列生活。马兹卡斯两兄弟的弟弟成了陆军中校。听说我在第一营的时候，曾经去看望过我。他最近死在维尔纽斯。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弗雷达和丽赫都想起这个人。她们承认，那是个好人。



纳瑞斯金伯爵的马厩和进行马术训练与表演的大厅

“哥哥在一次狙击战中被敌人打死。当时就在我身边。裁缝后来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我们差点儿没有逃出虎口。我母亲和姐妹们……都完了。我们逃到里加之后，冒着敌人的炮火，爬上一列到俄罗斯的火车。有钱的人一直跑到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我没钱，只好到了一个集体农庄。我想参军，但那时部队还不要立陶宛人。我的脚都肿了，饿得要命，只能靠草莓、野果为生。那个集体农庄有一位从里加逃来的犹太医生和他的妻子、3个孩子。‘伊沙克，这样下去你会死在这儿的。’医生对我说，‘当兵去吧。就说你是拉脱维亚人，’就好像当兵就死不了似的。不过，怎么死也比饿死强。那时，我说拉脱维亚语就像拉脱维亚人一样好，就按照医生的话去征兵办公室报名参军，被分派到拉脱维亚支队。1941年，我在莫斯科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负伤。”他摸了摸脊背、肩膀和大腿。

“伤好之后，我参加了立陶宛第16支队。这支部队当时

有 12000 人,许多是犹太人。我们在奥廖尔一带打仗。天下着雪,没有粮食吃,真是糟透了。他们认为犹太人打不了仗,可那时,我已经是老兵了。我知道怎么样使用机关枪。许多立陶宛法西斯分子开小差跑到德国人那儿,把我们的位置告诉了敌人,还说我们那支部队里有许多犹太人。于是,敌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阵地。德国人的武器比我们强得多,但是我们一直坚持战斗,直到弹尽粮绝,上级才命令我们撤退。那一仗,死了几百犹太人。”

“雷勃那时也在奥廖尔,”丽赫说。“你认识他吗?”

“谁不知道约费! 他的头是敌人标了价的。那时候,扎戈到处张贴着布告,抓住雷勃,赏钱 1000 卢布。我是在亚斯那亚·波里亚那见到他的。还有贝特勒、布鲁姆、兹洛特……”

“Da! Da!”丽赫说。伊沙克讲他的故事时,他们经常不由自主地讲起俄语。

“求求你们,讲依地语!”我说。“关于雷勃的死,我至少听过 3 种不同的说法。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

“雷勃·约费是在奥廖尔牺牲的。不是在城里,而是阿列克塞耶夫卡附近。埋葬在叶莱茨,”伊沙克说。“他和努内恩在 156 或者 166 营,我和维伦斯基在 249 营。扎尔茨曼和雷勃一起参加了那次战斗。他给我讲了当时的情况。天非常热。打完一场大仗,雷勃渴得要命,就说要找点水喝,‘别去!’大家都警告他。可他不听劝阻,走进一个离他们隐藏的地方大约 300 米的村庄。就在他喝水的时候,被德国人开枪……”

“不对! 不对!”丽赫大声说。“不是这么回事。朱可夫对我说……”

“朱可夫?”伊沙克轻蔑地说。“他知道什么? 他不是战

士。他是个鞋匠。后来，他们打死了那3个杀害雷勃的德国人。4个人我都看见了。都死了。”

“雷勃没死。他只是受了伤，”丽赫说。“他还从医院里给我来过3封信。”

“他是伤在这儿，我想起来了。”伊沙克指了指脊背。

“Da, da,”丽赫转过脸对我说。“以后我告诉你真实情况。关于雷勃的死，似乎谁都是专家。”

这时，阿尔托娜端着一个茶盘走进客厅。茶盘里放着雀巢咖啡，黑面包和一大块奶酪。伊沙克对我们说，在扎戈，这都是稀罕玩意儿。阿尔托娜在厨房的时候，那两条达克斯猎狗挺老实，现在又抓着门，汪汪汪地叫了起来。阿尔托娜对丽赫说，要是知道我们来，她一定准备一顿好饭请我们吃。

“我有一个好妻子，”伊沙克说。阿尔托娜苦笑着耸了耸肩。她切面包，递奶酪，倒茶和咖啡，自己却不肯坐下。伊沙克继续用他那颇具个人特色的依地语讲他的故事。

前些年，每到赎罪节之前，都会有五六十辆小汽车从维尔纽斯和里加开过来，到万人坑祭奠死难的同胞。阿尔托娜总要杀一头小牛，款待大家。现在来的人很少了，伊沙克说，只有一辆汽车，大多数犹太人都离开立陶宛了。凡是来扎戈祭奠亲人的犹太人，都要来伊沙克家看看他们夫妇俩。阿尔托娜和他们都很熟。

“她是个难得的好女人。她照顾我，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给我做犹太人爱吃的饭菜。鱼丸冻之类的东西她都会做。她从来不对我发脾气。帮我干活儿，什么都靠她。发生那些可怕的事情时，她一直在这儿。给他们讲一讲，阿尔托娜。”

伊沙克从厨房搬来一张椅子，让阿尔托娜坐下。她慢悠

悠地说：“战争爆发那年，我 14 岁……”

21 阿尔托娜的故事

阿尔托娜告诉我们，她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小时候，她说一口流利的依地语。

“现在，没人跟她讲依地语了，”弗雷达翻译道。“她差不多忘光了。不过她还记得足够的话，听得出，伊沙克也快忘光了！”

她母亲是个裁缝，做完一件衣服之后，阿尔托娜就送到河岸边的一幢木屋，一位少女用一种很特别的机器在领口和袖口上面绣花。

“哦，那是亨克！是亨克！”丽赫喊了起来。

“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阿尔托娜说，“但是还记得她长了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人很漂亮，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总是轻轻的，柔柔的。她干活很麻利，干得也好。她母亲个子不高，挺胖，经常病在床上。约费家别人我就不认识了。但我几乎每天都要路过他们开的那个理发馆。”

阿尔托娜回忆往事的时候，亨克栩栩如生，仿佛出现在大家眼前。她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妹妹、女儿或者爱人，而是坐在机器旁边的一位温柔少女，一边给阿尔托娜的妈妈绣领口和袖口，一边朝她微笑。一旦在情感上沟通，阿尔托娜在我们面前就不拘谨了。我们有一段共同的过去。我把杰克·特拉贝克的照片拿给她和伊沙克看。他们认出那些地方，但是认不出照片上的人。这些照片拍摄的时候，他们还是孩子。



伊沙克和阿尔托娜·蒙德尔松

阿尔托娜生在1927年，伊沙克生在1924年。

弗雷达问，德国人进驻扎戈的时候，当地立陶宛人的反应如何。

“大多数人高兴，”阿尔托娜说。“他们恨苏联。认为是苏联人把立陶宛民族主义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把农民的土地变成集体农庄。德国人来了之后，藏在森林里和苏维埃作对的游击队都兴高采烈地跑出来，手捧面包和盐表示欢迎。他们说，德国人会帮助立陶宛人独立，可是结果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他们对德国人迫害犹太人怎么看？”

“他们说，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的同志发配到了西伯利亚……”

“或者说他们是资本家，”丽赫插嘴道。“抢夺了立陶宛人的财产。首先是仇恨犹太人，然后找理由。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用不着德国人教。”

“妈，让阿尔托娜讲嘛！”弗雷达扯了扯丽赫的袖子。

“我们家和另外一些人家，只想平平静静地过日子。我们已经习惯和犹太人一起生活了。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他们的邻居。德国人入侵之后，立陶宛游击队的头头贴出布告……”

“我很了解那个家伙，”伊沙克说。

“……犹太人衣服上必须缝一颗黄颜色的星……”阿尔托娜列举了种种限制犹太人的规定。“离这儿不远有一家铺子。犹太人只能在太阳落山之后，到那儿买面包。可是到那时，面包差不多都卖光了。我母亲常常偷偷地给犹太邻居买面包。直到别的邻居威胁，要把我们家的房子烧掉。形势很快就恶化了。”

阿尔托娜讲的事情虽然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和幸存者们的证词基本上相同。她讲到拉比瑞夫受的侮辱。立陶宛人如何把他和一个小个子犹太人一起套到一辆装满石头的大车上游街。围观的人拍着手，有的哈哈大笑，有的掩嘴窃笑。

“实际上，德国人来之前，可怕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立陶宛游击队的头目挑选了 80 个犹太青年人，说是让他们参加训练去打德国人。他们排着队离开扎戈，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都被打死，埋葬在旧公墓的万人坑，”伊沙克说。

“我的两个哥哥，盖达利亚和摩特拉就是……”丽赫说，但又哽咽着说不下去。“我们是事情发生之后，坐一辆大卡车回到扎戈的。”

“人是谁杀的？”米沙问。“德国人？”

“那时，我们几乎连一个德国人也没见过，”阿尔托娜说。“他们都在沙维尔。是立陶宛国民军干的。他们大权独揽。他们说，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的亲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现在这样做是给亲人报仇。令人发指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弗雷

德曼医生和他的妻子也被杀了。有名望的犹太人首先被杀。”

“年轻力壮、有可能反抗的人也在大屠杀之前杀害，”伊沙克说。

“7月，”阿尔托娜说，“扎戈的犹太人都被赶到河两岸的隔离区。几个星期之后，周围城镇乡村的犹太人陆续集中到这里。大多数人是妇女和儿童。男人们早已成了刀下之鬼。扎戈的犹太人意识到前景不妙，人心惶惶。”

“我从幸存者的证词里看到，有一个名叫斯塔塔科斯的鞋匠和他的助手艾斯戈达斯负责管理隔离区，”我说。

“斯塔特科斯，”伊沙克说，“不是斯塔塔科斯。”

我让他和阿尔托娜看了一张幸存者提供的凶手的名单。

“我认识梅特利凯斯·乌兰迪斯，”伊沙克边看边说。“他是主要的刽子手之一，和斯塔特科斯一样，一个杀手。他被判了25年徒刑，可是只坐了19年牢就出来了。他女儿跑到俄罗斯，花了一大笔钱，把他弄了出来。回扎戈的时候，这小子像个英雄。听说我还住在这儿的时候，他说：‘怎么让这个犹太人逃脱了？’后来，他听说我当过兵，现在是个猎人，晚上从来不敢出来。他开始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我去找那位对我很了解的牧师。‘你怎么能让这样一个人走进你的教堂呢？’我问他。你们猜牧师是怎么说的？话说回来，他又能说些什么？钱能通神，钱能买通任何人。梅特利凯斯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住在扎戈，日子过得像百万富翁。他们到瑞士度假，住着最大的房子，开着最豪华的汽车。他女儿开一辆“伏尔加”。人们管那辆车叫‘犹太人车’。谁都知道，那辆车浸透了犹太人的鲜血；谁都知道，那辆车是用她老子从死人身上偷来的钱买的。他3个月前死了，”伊沙克补充说。“像他这样

的坏蛋居然从从容容死在自个的家里,真是太不公平了……呆会儿我指给你他的房子看。在去公墓的路上。”

伊沙克“喧宾夺主”,撇开阿尔托娜,自个儿讲了起来。

“我有一个朋友,非犹太教的立陶宛人,”他说。“国民军强迫他到公园挖墓坑。他描绘犹太人怎样被扫射,怎样倒在坑里,怎样用泥土和石灰掩埋。然后,下一批人被枪毙,再用泥土和石灰掩埋……不管死活,统统扔到坑里。我的母亲和姐妹们就在其中……

“这还不算。1943年,许多异教的立陶宛人从16支队开小差逃了回来。有一个家伙告诉匪徒们我还活着,他们就把我家的房子烧了。

“在扎戈,”他说,“梅特利凯维斯和埃克维尔达斯是最主要的刽子手。战后,许多匪徒逃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只要声称他们是反共分子,就受到热烈欢迎。埃克维尔达斯是扎戈游击队的头目,改名换姓逃到加拿大。不久前,回扎戈看还住在这儿的两个姐姐。我跟他从小就认识。他的一个姐姐跑到我这儿求我去看看他。‘我要是看见他,’我说,‘就会把他打死。’哦,还是让阿尔托娜给你们讲讲,那时候,在扎戈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

“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我们简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她说,“只有坏人才能睡得安稳。普通老百姓都心烦意乱。我们从小和犹太人小孩儿一起上学,从犹太人开的小铺子里买东西。这条路上,犹太人鞋匠给我们修鞋。但是,国民军威胁我们,如果胆敢窝藏犹太人,全家都要和他们一样被枪毙。谁都害怕,只有少数人敢帮助他们。”

“战后,”伊沙克说,“扎戈城外一位比较富裕的农民对我

说,1941年,他藏了4个犹太人,兄弟俩和他们的两个堂姐。他给他们挖了一个地窖,上面盖着桦树枝,他们在里面藏了大约一个星期。后来其中一个姑娘大白天跑出去取水,被一个邻居发现,报告了立陶宛国民军。5个人都被逮捕。农民花钱贿赂国民军的头头,总算买了一条命。4个犹太年轻人都被枪毙。他是个好人。3年前死了。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我们没有亲眼看见大屠杀的场面,”阿尔托娜说。“国民军警告我们呆在家里。但是听到了枪声和叫喊声。大屠杀进行了整整3天。先在市场广场,后来在纳瑞斯金公园。后来,我们看到市场广场到处都是鲜血,好多天才冲刷干净。我不能从那儿走,总是看见一滩滩鲜血。别人也一样。所以后来人们把市场广场改造成公园。尽管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但我夜里还是经常梦见那可怕的情景。有时候我想,真该和他们一起死去……”

我对他们说,在派雷兹曼的证词里,描写了犹太人被屠杀前在市场广场进行的反抗,还提到几个人的名字。后来德国宪兵队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

“干得好!”伊沙克说。“我要是在场,也会这样干的。我宁愿这样死——在战斗中死去。”

他建议我们去旧扎戈,那是约费一家从前居住过的地方。然后坐车到犹太人的老公墓和其他比较远、徒步没法去的地方。

海尔斯尔在整个访问中一直默默无言,说他愿意呆在屋里。“扎戈,我看得够多的了。足够我做一辈子噩梦了,”丽赫说。“我也不想出去了,就在这儿和阿尔托娜聊一会儿吧。”

22 凄凉的墓地

...un iz di gesala, vu iz di shtieb?

Vu iz di meidala velche ich lieb?

Nisht do mer di gesala, nisht do mer di gesala,

nisht do mer di shtieb,

Nisht do mer di meidala velche ich lieb.

那条小街在哪里？房子在哪里？

我爱的姑娘在哪里？

小街没有了，房子没有了，

我爱的姑娘也没有了。

我们驶过那座小桥，进入扎戈的旧区，左躲右闪，极力避开路上的水洼。天已放晴，惨白的阳光照耀着仿佛变得肿胀的河面、光秃秃的树木、卵石大街和低矮的木屋。新扎戈的房子比较大，都是砖木结构。路上的行人很有礼貌地朝伊沙克打招呼，好奇地看着我们。伊沙克十分庄重地朝他们点点头，算是回礼。

他难道就是为了提防这些人，而在卧室的帘子后面放了一枝步枪？他们看起来无精打采，连一点生气也没有。小酒店外面站着一群人。我对着曾经是父亲的理发馆的店铺拍照片的时候，他们都直盯盯地看着我们。我又一次感觉到一种敌意，或者说仇恨。



20年代扎戈的斯特拉尔磨房

“要是他们不理睬我，我也不理睬他们，”伊沙克说。“他们明白，这儿是他们的家，也是我的家。”

他们的确应该懂得这一点。从14世纪到1941年10月2日，犹太人一直在扎戈繁衍生息。19世纪末，扎戈有5500个犹太人，占小镇总人口的60%。今天扎戈有3000非犹太教的立陶宛人，只有1个犹太人。伊沙克是最后一个传人。

沿着满目萧瑟的小镇泥泞的大街漫步的时候，很难想象这就是父母的故乡。似乎没有一样东西能“对上号”。不是故事中那个小镇，也不是歌曲中那个小镇。我仿佛迷失了方向。

他们是从哪个方向到纳瑞斯金公园,或者到米尔山的呢?哪边是和拉脱维亚接壤的边境呢?母亲是到什么地方练习合唱,父亲又是到什么地方参加学习的呢?文化站在哪儿?教堂、学校、浴室在哪儿?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伊沙克比我的父母亲小20岁,完全是在另外一个环境长大的。

我的父母是在一个犹太人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小镇长大的。从小镇外面异教徒的房前走过时,狗总要对他们汪汪汪地叫。对于当地的立陶宛人,他们是陌生人,是侵犯他们土地的人。伊沙克却完全融入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他的立陶宛语说得比自己的母语还要好。他和非犹太人朋友们一起踢足球。在丽赫眼里,他是个小流氓,和野孩子们一起到处乱跑。斯洛莫和卡娜的亲密朋友是艾克维尔德斯·爱德华。他说一口流利的依地语,有许多犹太人朋友,但并没有阻止他成为1941年大屠杀的刽子手。

在这座拥有一段黑色秘密的小镇,历史已经和它的死难者一起被埋葬。公园和森林掩盖了万人坑和造成死亡与毁灭的地方。小城广场飘着花草树木的幽香,隐没了浸透犹太人鲜血的市场广场。犹太人的家园被别人据为己有,或者被拆毁,被重建。时间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镇子里来个陌生人还要受到怀疑。他们是哪个死难者的后代?是来索要他们先人的财产吗?扎戈满脸阴郁的居民们夜里睡得安稳吗?睡梦中,他们还听得见密集的枪声和哭喊声吗?走在浓荫覆盖的市镇广场,他们不觉得脚底发烫吗?血腥味还在他们鼻翼间缭绕吗?

“约费家的房子就在这儿,”伊沙克在斯维特河岸边一块杂草丛生的土地旁边停下。一株光秃秃的树下,一匹马啃食

枯草，不时甩着尾巴，赶走落在屁股上的苍蝇。旁边一幢房子后面，放着一辆大车。

在那幢早已坍塌的房子后面的小院里，1915年被流放前的那个夜晚，戈森、雷勃把奶奶的铜锅、铜烛台、钵、杵埋藏起来。4年后他们重返扎戈的时候，房子成了一片废墟。窗户被人扒了，地板被人撬了，连房顶上的瓦也全被人揭跑了。1926年，我的父亲到墨西哥的时候，奶奶弗瑞德和她的孩子们：布雷娜、斯马尔克——雷勃拒绝为哥哥送行——就在这里抱作一团。他们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走上那条大路，从他们的生活中永远消失。

“邻居们把约费家的房子都拆了，”伊沙克对我说。“他们用这块地种菜，停放大车，放马。你说你母亲家住在道坎塔大街41号？现在叫塞沃克思大街，离这儿不远。”

朝那条大街走去的时候，我看见路边有一口老式压水井。

“要是我们那幢老屋还在，一定替我拍张照片回来，”戈泰·特拉贝克的弟弟知道我要去立陶宛时，非常恳切地说。“在一口老式压水井对面，道坎塔大街。”

“这口井是不是20年代的压水井？”我问伊沙克。

他耸了耸肩。“也许是吗。从来没人用过。现在人们都用自来水。”

我以后面的房子为背景，给这口井拍了一张照片。我什么都照：房子，卵石大街，河，树，人，总而言之，并没有特殊的目的，碰到什么就照什么。以后可以把这些照片拼接起来。

我们沿着道坎塔大街——现在的塞沃克思大街慢慢地走着，我看见房屋之间有空缺：31号，35号，39号。41号已经不复存在。它的位置被一个花园所替代。我给那片空地拍了一

张照片——那是我母亲的家！

我问伊沙克森林在哪个方向。就是他打猎的那座森林。他指了指，但我弄不清东南西北，所以还是不得要领。我的祖母和她的儿女们是不是就在那座森林里采野草莓，做成蜜饯冬天吃？她从来没有说过森林里有野兔、鹿，或者别的动物。也许那些动物在密林深处，那里才是猎人的天下。

这座森林在民歌中，是情人幽会的地方。是目睹了那么多悲欢离合的地方。那些民歌有的欢快，有的悲凉。

*Vi ken ich in finstern vald
Fargessen di liebe tzu dir
Dermon ich mir dein geshtalt ,
Ervekt zich a vaitik in mir ...*

在这密密的丛林里，
我怎能忘记你？
你那美丽的面容在我心头闪现，
唤起多少痛苦的记忆……

还有一首轻松愉快的歌，唱的是一位少女到森林里采雏菊花，结果碰到一位美少年：

*In veldel bein taichel , dort zainen gevaksen
Margarikalach elent un kiei
Vi kleininch zunen mit vaisinke stralen ,
Mit vaisinke , tra lala lala ...*

现在，森林里到处都是坟墓。这里已经变成猎场，不再适

合采野草莓和雏菊花了。

弗雷达挽住我的胳膊。“你想什么呢？”她轻声问。

伊沙克正指着一座破旧的浴室让我们看。那是一幢已经破破烂烂的老房子。底层有两个窗户和一个门。再往上，还有两扇小窗，就像一双离得很近的眼睛，挤在金字塔形的二楼。

“从前，逾越节前，人们在楼上烙逾越节吃的无酵饼。现在成了库房。楼下的浴室还用着。”

“过去的东西还留下些什么？”我问。

“还有一座教堂。一个空壳子而已。起初，他们拿它当库房。现在成了室内篮球场。里面的东西全毁了。战后，我经常在垃圾堆、废弃的房子，甚至厕所里发现一堆一堆的希伯来文和依地语的书。我便把这些书整理好，送给赎罪节来祭奠亲人的犹太人。最后一批给了沙维尔犹太人委员会。”

我们跟着他走过一条沙土路，眼前出现一幢很大的白色建筑物。这座建筑高踞于周围的房屋之上，到处是风雨剥蚀的痕迹。屋顶上涂着一片片沥青，四周都是很高的拱形窗户，尽管一派无人照管的样子，还不失威严和体面。或者说在我的眼里，它仍然是一个神圣的所在。然而，现实是，这座毫无华贵可言的建筑物——从前的犹太教堂——现在是一个室内篮球场。这座教堂性质上的根本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我们透过窗户朝里面望了望。教堂长方形的大厅已经被改造成一个篮球场。正对耶路撒冷的墙壁，过去放藏经柜的地方，现在堂而皇之立着一个篮球架。另外那个篮球架立在靠门的地方。一道道惨白的阳光从拱形窗户照射进来，落在木头地板上，照出篮球场黑色的线条。面对这

座被掏空“内脏”、取走精华的教堂,我无法想象我的同胞们当年在这里怎样做祈祷。

“这就是那 80 个年轻人被枪杀的地方吗?”我问。

“不是。那座教堂已经被烧掉了。”

往回走的路上,伊沙克在一座二层红砖楼房前面停下。

“这是犹太人的小学校。我在这儿可没少惹老师生气。”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现在还是学校,不过孩子不同了,老师也不同了。”

我的母亲,我的父亲,还有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在这里上过学吗?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这是拉比瑞夫住过的地方,”走进一条僻静的胡同时,伊沙克指着前面一幢被高高的树篱遮挡着的红砖房子说。“他是新扎戈的拉比,他的一个儿子是旧扎戈的拉比。老拉比的个子非常高。真是个好人。谁都尊敬他。他被敌人杀害之前,真是受尽了屈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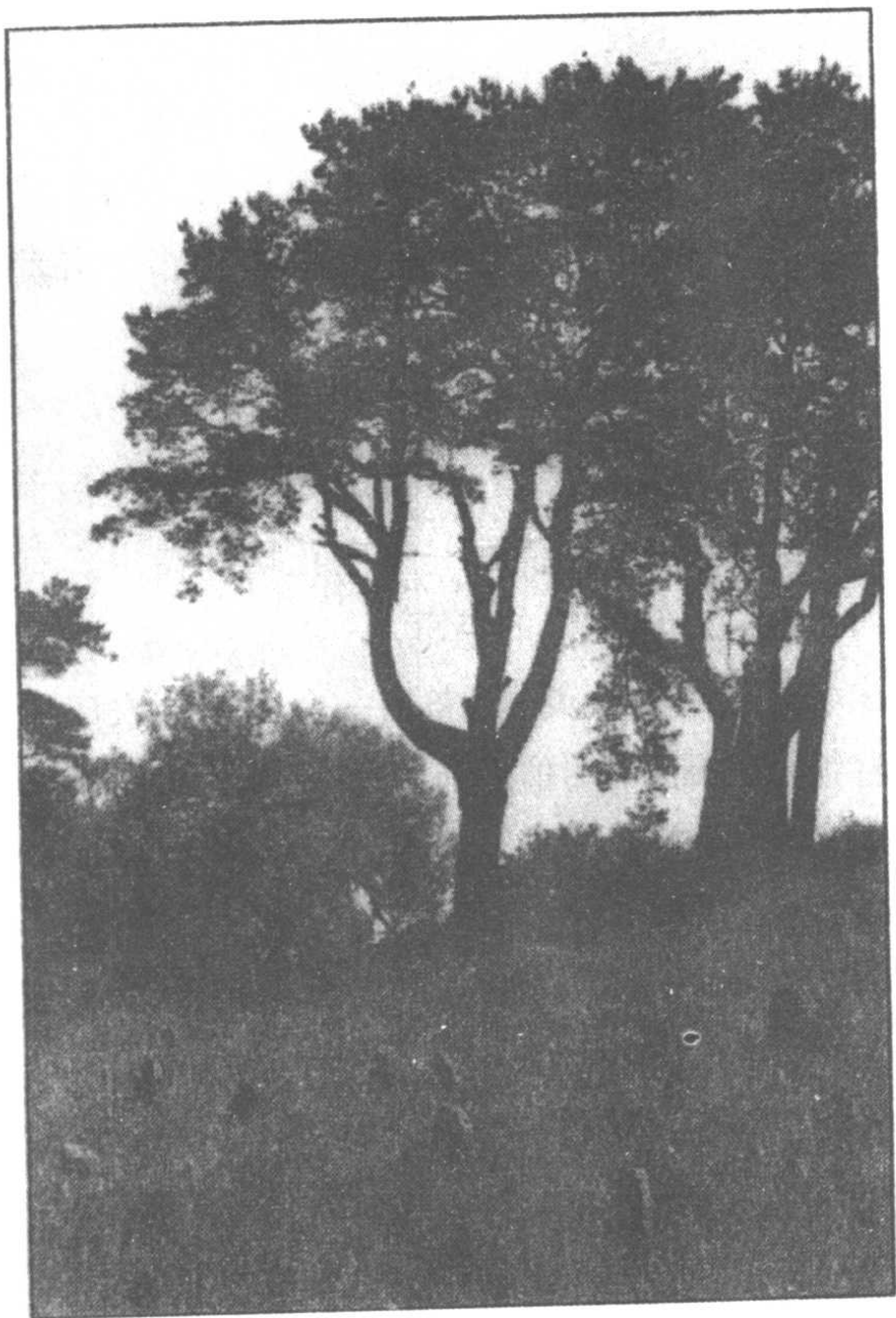
寒风驱赶着乌云。我们走过小桥,向伊沙克家走去的时候,太阳已经躲到乌云后面。米沙看了看手表。

“3 点 20,”他说。“我们得在一个小时之内离开扎戈。天黑之前,必须上高速公路。”

“下一次早点儿来。可看的地方还很多。扎戈不像你们想得那么小,”上车的时候,伊沙克说。“先去看看旧公墓吧。”

“我的祖父和祖父的兄弟就埋在那儿,”我说。“阿夫拉姆和西蒙。他们至少没有死于非命,而是寿终正寝,死在自家的床上。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他们的墓碑。”

“恐怕很难。开慢点儿,”他说。前面出现一幢很大的、刷成黄色的木头房子。“这就是梅特利凯斯家的房子。那个杀



犹太人公墓, 1993

人如麻的刽子手。那个判了 25 年, 坐了 19 年就被释放回家的家伙。我对你们讲过。他几个月前才死。一个自由人。他给家里人留下一大笔遗产。而那些财产全是从犹太人那儿抢来的。他活着的时候, 在扎戈晃来晃去, 就像英雄。”

路越来越窄。米沙左躲右闪也避不开积满泥水的坑洼。过一会儿上了高速公路, 泥水就会干在汽车轮胎和底盘上。米沙得费点力气才能清洗干净。我们行驶在农田之间。有的

地已经耕过,只等下种;有的却已吐出星星点点的绿色。农舍矗立在农田里,仿佛和泥土融为一体。袅袅炊烟从烟囱里升起,好一派田园风光。这就是伊沙克那位农民朋友挖地窖藏4个犹太青年的地方吗?如果是,也是他的邻居出卖他们的地方。

“那是天主教徒的公墓,”伊沙克说。

我们右边有一座仿佛画上画的小教堂。教堂后面是排列整齐的十字架和墓碑,环绕着一座座花坛和树木。有个围头巾的女人正在拔一座坟上的杂草。

又往前走了大约半英里,来到一个小小的农庄。有一个农民穿着很脏的靴子,和他的狗站在门口。我们从他旁边走过的时候,伊沙克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嘟囔了一句什么,踢了一脚身边的狗,转身进屋。他那块地收拾得一点儿也不好,不像邻居们那样精耕细作。房子也需要修理,院子里到处乱扔着生了锈的农具。伊沙克摇了摇头,领我们向一座很大的土丘走去。离公墓不远有一道篱笆。野草疯长,没过了篱笆。

“这就是80个年轻人被埋葬的地方,”伊沙克说。有一阵儿,他好像对这一点没有把握。“有人说,那些年轻人是被集中到教堂杀害的;有人说是在斯维特河岸;还有的人说他们是被带到公墓,先给自己挖好墓坑,然后就死在那坑里。不过,这儿是他们的墓地。连一块作标志的石头也没有。”

斯马尔克是不是就躺在这里?还有丽赫的两个哥哥?我们只知道,这里埋葬着80个年轻人。他们是躺在纳瑞斯金公园的那些人的儿子、兄弟。

我们跟着伊沙克爬上那座满目荒凉的小山包,几株树在寒风中抖动,白草萋萋,费了好大劲才辨认出那黑乎乎的蚁冢

似的东·西是墓碑。这些墓碑东倒西歪,只有几块还是直立着的。岁月的冲刷,风雨的剥蚀,墓碑上的字早已斑驳不清,无法辨认,只留下一层层地衣和苔鲜。

“平整一点儿的墓碑都被挖走铺路了。”

我们在墓碑间转了一会儿,希望能分辨出一个名字,或者一个年份,可是一无所获。

“该走了,”我说。

不一会儿就回到伊沙克家。临行前,阿尔托娜紧紧握着我们的手,再三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来就来,她都非常欢迎。如果能从维尔纽斯提前打个电话,她会准备一顿丰盛的家宴。她还送给丽赫一大块奶酪,用雪白的餐巾包着。她说,这是扎戈的特产。丽赫紧紧地拥抱着她。

“娶了这么好个老婆是你的福气,”她对伊沙克说。“你该好好地待她。自个儿劈木头!”

海尔斯尔脸色苍白,看起来不大舒服,大伙坚持让他和米沙一起坐在前面。我让伊沙克和阿尔托娜面对广场,站在家门口,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我们沿着来时走过的那条路,赶在天黑前上了高速公路。

“伊沙克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丽赫说。“德国人打过来的时候,他压根儿就不在扎戈。阿尔托娜知道。她可真是个好女人。她说的话我都信。想想看,她经常把衣领和袖口送到你奶奶家,让你的姑姑亨克给绣花。我完全可能在你奶奶家见过她。不过,那时谁会注意一个孩子呢?伊沙克呢?他根本就不在雷勃那个营,还吹牛说他知道雷勃是怎么死的。雷勃住院的时候给我写过3封信。让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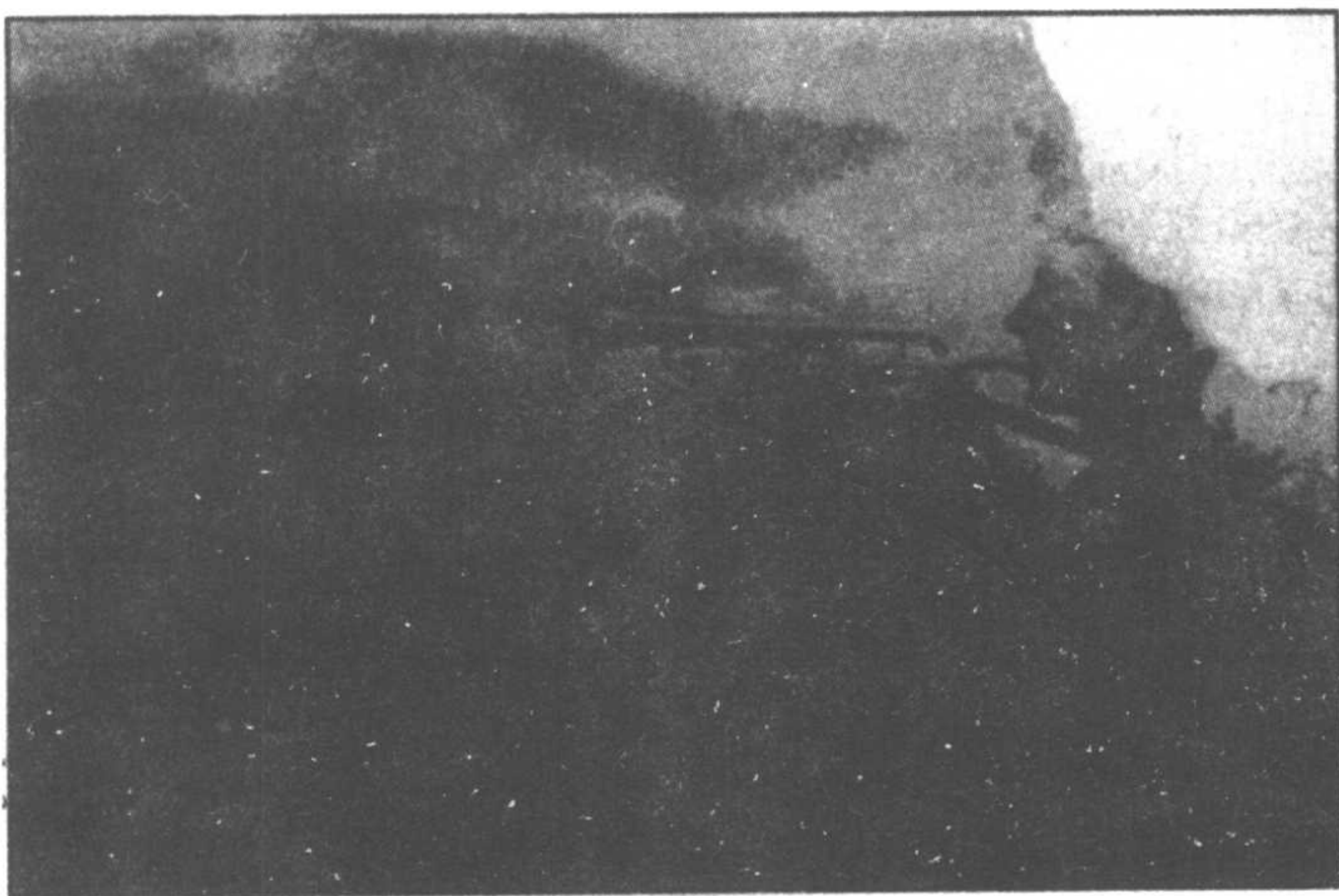
23 雷勃之死

雷勃和丽赫逃到俄罗斯之后,在叶瑞斯拉夫一个集体农庄呆了一个月。他们在那儿帮助人家收割庄稼。后来在伏尔加格勒地区的一个集体农庄又呆了两个月。这时,立陶宛支队已经组建,雷勃立刻报名参军。

“找死去了,”丽赫说。汽车在一片黑暗中,沿着雾霭笼罩的公路,向维尔纽斯疾驶。“留下我一个人,挺着个大肚子,周围全是陌生人,连一句俄语也不会说。受的苦简直没法说。一想起撒在沙维尔的姐姐卡娜,就心如刀绞。她带着一个6岁的孩子,怀着7个月的身孕,丈夫不在城里,炸弹在身边爆炸……哦!真是苦不堪言!集体农庄一位俄罗斯妇女看我可怜,答应生孩子的时候,帮帮我。”

雷勃和部队一起,驻扎在莫斯科附近。他在部队管乐队当演奏员。上级不允许丽赫跟他呆在一起。他们说,一个怀孕的妇女,在集体农庄呆着更安全。为了帮助她度过难关,部队首长发给她一份文件。文件上说,约费·雷勃·西蒙诺维奇在红军,当地政府应该给他的妻子配给粮食和其他福利。

“这份文件我现在还保存着。回家之后,我可以拿给你看。那上面写着他所在部队的番号。炮兵营,NK0249。1942年6月11日,沙库斯上校签名。说来真怪。弗雷达的电话号码我怎么也记不住,可是这份文件上面的数字就像刻在我心底,多少年过去了,仍然记得清清楚楚。靠着这份文件,集体农庄给了我一间屋子,还给我牛奶和别的东西。还有一位医



苏联红军军官雷勃

生经常来看我。

“生弗雷达的时候难产。整整生了12个小时。缝了好多针,感染,发高烧,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那时,雷勃还没有上前线,写来好多封信。他问的第一件事情是孩子头发的颜色。那样的时候,问那样的问题。能活着就够走运的了。知道女儿不是红头发之后,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雷勃想让女儿跟他妈妈叫一个名字。可是如果老人还活着就不能这样做,而我们当时对老人家是死是活一无所知。于是雷勃让我管女儿叫弗雷达,不要叫弗瑞德。我很惊讶他会在乎这种事情。他并不信教。我和你奶奶弗瑞德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我给她织过一件灰色羊毛衫,还常常给弟弟妹妹们织外套。用我的织机给他们织袜子。弗瑞德总盼着见我。她要是想知道雷勃正在干什么,或者脑子里想什么,就问我。雷勃虽然很爱他的母亲,但是从来不跟她说心里话。他这个人很内向。你奶奶要是想到沙维尔看病的话,就让我陪她去,

从来不用别人,她非常爱我和雷勃。

“我把女儿的照片寄给他。他高兴得要命。她的眼睛像我母亲,他写信说。他是 1943 年 8 月 20 日死的。只是在照片上见过他的女儿。

“海尔斯尔睡着了吗?”她小声问米沙。米沙点点头。“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一提起雷勃,老头子心里还不是滋味儿。”

公路上出奇地安静,就连中途抛锚的卡车也全都不见了。偶尔对面亮起一盏车灯,刺破浓重的黑暗,落在我们的汽车上,然后一闪而过,留下更加浓重的黑暗。

“1943 年,雷勃上了前线,”丽赫说。“在奥廖尔地区。一场又一场恶仗。人死得堆成山。”

几个月之后,我便掌握了足够的史料,可以将丽赫的故事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冬天,德军的装备、给养都很差,1941 年,便被红军从莫斯科打退。他们开始缓慢地撤退,形成从库尔斯克^①到奥廖尔、到梅迪尼捷耶夫南北 320 公里长的战线。红军从东向西进军,在库尔斯克西部德军防线造成一个突出部,这就严重威胁了德军在苏联南部掠夺的大片土地。希特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条防线,夺回“突出部”。为了争夺库尔斯克,敌人出动了 6000 辆坦克,4000 架飞机。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大战。到 1943 年 7 月,德军大约损失了 3000 人马和 3000 辆坦克。红军的人员和装备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成功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不再处于守势。为了削弱德军的力量,阻止增援部队到达库尔斯克,苏联

① 库尔斯克:中俄罗斯丘陵西南部城市。

红军在库尔斯克北部地区发动了“库图佐夫^①行动”。

立陶宛 16 支队从 1943 年 2 月起,就在奥廖尔地区参加了战斗。支队向阿列克塞耶夫克的德军发起进攻。步枪手和机关枪手徒步走过冰雪覆盖的原野。德军的火力占了很大的优势,支队苦战了两天两夜,直到弹尽粮绝,才奉命撤离火线。伊沙克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受了重伤。支队尽管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的一天。

“雷勃是不是也在前线打仗?”我问。“你说过他是在军乐队当演奏员。”

“那是刚开始时的事儿。他当然是在前线打仗。他是 politruk,”丽赫说。

“政治工作者,”弗雷达解释说,“政委。他是非现役的军官,负责带领、监督士兵上战场作战。”

“我又想不起该从哪儿讲起了。啊,对了。我要说我做的那个恶梦,”丽赫说。“那时,弗雷达刚满 1 岁,我总是睡不好觉。有一天夜里,我梦见一群人打着鼓,吹着喇叭,抬着一具没盖盖子的棺材,慢慢地向我走来。棺材里,死人的胸口放着他的帽子。我向棺材走过去,但不敢看那张脸。我呻吟着,哭喊着,从恶梦中醒了过来。第二天,我跟那位对我一直很友好的俄罗斯邻居讲了这个不吉利的梦,她安慰了我半晌,我也就不再在意了。

“两天以后,我被叫到集体农庄办公室。一位俄罗斯小伙

^① 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陆军元帅,曾参加俄土战争(1768—1774; 1787—1791),战功卓著。拿破仑发动对俄战争时,任俄军总司令(1812),迫使法军撤离莫斯科,击退了拿破仑的入侵。

子把我领到一间屋子里说,奥廖尔前线给我来了一个通知,是关于我丈夫的事儿。他给我读了起来。通知说,在一次军事行动中,约费·雷勃·西蒙诺维奇受了重伤,抢救无效,已经死亡,埋葬在奥廖尔地区的叶莱茨。我几乎没听见他都念了些什么。恍惚中,仿佛又回到那恶梦之中。鼓乐齐鸣,在我耳边回荡。但那不是什么鼓乐声,而是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的哭喊声!”

弗雷达挽起妈妈的手。“别说了,妈妈,”她说。

“我一定要讲完。以后就再也不讲了。你知道,雷扎拉,关于雷勃的死,和关于他的生一样,众说纷纭。有一个人对我说,打完仗之后,雷勃渴得要命,去找水喝,结果踩上地雷,炸成重伤。他显然求那个人把他打死,但他下不了手,不一会儿,他就死了。今天我们又听到伊沙克的说法。但是我收到雷勃从医院里给我写的3封信!他是被德国人的地雷炸死的还是被德国兵打死的,或者是被德国坦克压死的,真的就那么重要?我自己更相信朱可夫的说法。虽然伊沙克看不起他,说他不过是个鞋匠。鞋匠也长眼睛。何况朱可夫当时就在雷勃那个营。还有扎尔兹曼。他们俩讲的都一样。我给你爸爸戈森写信时,只告诉他,雷勃已经在前线牺牲,别的情况什么也没有对他讲。我没有告诉他那封信……什么信?等会儿我再告诉你,还是先让我把雷勃死时的情况讲给你听——按照朱可夫和扎尔兹曼的说法。”

丽赫说,在奥廖尔的大战中,立陶宛支队夺取了一座叫阿列克塞耶夫克的小城,然后攻打尼科尔斯克——附近一个村庄。可是占领之后,又被德军夺了过去,他们发起第二次冲锋,德国人才撤退。雷勃带领一个侦察小组先行进入村庄,挨

门挨户地搜查,看还有没有德国人。他们搜查到一个女人家的时候,女人说,所有的德国人都跑了。这时,雷勃和他的伙伴们都累得精疲力竭,在那个女人养鸡的棚屋里躺了下来。天又闷又热,雷勃睡不着,便和另外两个战士走进那幢房子,在楼梯下面的地板上躺了下来。

半夜,藏在楼上的德国兵爬下楼梯,被立陶宛士兵绊了一下,便朝他们开枪。两个战士当场被打死。雷勃受了重伤,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脊梁骨。听到枪声之后,棚屋里小分队的士兵一起冲出来,打死那几个德国兵。雷勃被送进医院,几天之后便死了。

“他从医院里,”丽赫说,“给我写来我跟你说过的那3封信。我是在他死以后才收到的。信的日期是8月16、17和18。他是8月20号死的。‘我的头和手,’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还能活动,可是腰部以下连一点儿知觉都没有。’在第二封信里他说,非常希望能和我,和我们的小女儿在一起。‘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在一起过平静的生活,’他写道。‘真想吃点儿好东西:西红柿、甜瓜,还有各式各样的水果……’

“多少年了,我一吃水果,就想起那封信,”丽赫说。“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只想得到生活中最简单的东西:妻子,孩子,好吃的东西……”

“第三封信呢?”

丽赫抓住我的手。“那封信是写给戈森的。用俄语写的。很长,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戈森的怨恨。时间是8月18号,他死的前两天。也算是雷勃对戈森的怨气的总结和最后的发泄。这封信是我的朋友,那个俄罗斯妇女读给我听的。我那时会说俄语,但是不会读,也不会写。信的末尾,雷勃又用依

地语写了几行。那些话我一定读了不止一千遍。我经常一边读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读。‘你坐在家里喝着上好的咖啡，抽着上好的香烟，你可知道什么叫受苦？我躺在这里，离死神很近，但我多么希望能活下去！美国人就要开辟第二战场了，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们一定会胜利。能熬到胜利一天的人，一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你该明白，”丽赫说，“我为什么没把这封信寄给戈森。”

“戈森如果看到这封信，一定会痛不欲生，”我说。“他没有一天不在对家人的思念中煎熬。他为他们的命运而自责。经过那么多年，雷勃还耿耿于怀，不肯原谅戈森。他就一直没有消除对哥哥的怨气吗？”

“雷勃经常说，戈森应该给母亲写信。这是最让他生气的事。你知道，那时人们都认为，在南非，大街上都能拣到黄金。”

“我父亲苦苦挣扎，养活一家人。我们从来没有富裕过。”

“苦苦挣扎，那是我的故事，雷扎拉。雷勃死后，我之所以活下来，完全是为了这个孩子。我们挨了多少年的饿。我能干点儿缝纫的活，帮了大忙。集体农庄的农民经常拿来几条裙子，让我帮他们改成夹克。当然是靠一双手，没有缝纫机。他们给我一个鸡蛋，一点黄油，一块面包，作为回报。后来我就成了集体农庄的裁缝。我租了一台手摇缝纫机，一星期的租金是两公斤面包。妈妈装在褥套里的东西我差不多都卖光了。当然不是全部。我还留了几样作为对她的纪念：烛台，茶炊之类的东西。

“战争终于结束了。我告别了集体农庄的人们。有几个人，包括那位俄罗斯朋友也告别农庄，回家去了。我把仅有的

几样东西装到一个箱子里,请她替我写好地址。我不会写俄语。我的箱子和别人的行李被一起送到火车站。

“可是我再也没有看见那个箱子。那里面有雷勃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件,母亲的烛台,还有她的茶炊……”

“再有一个小时,就到维尔纽斯了,”米沙打破一阵长长的沉默。“今天可真长,可是我非常高兴,雷扎拉,你来了,我们才有机会去看看扎戈。真是扎戈吗?妈妈。还是柴兹米尔,或者柴太尔,或者扎斯莱?”

“米沙就爱拿我取笑,”丽赫说。“是啊,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你知道那首唱猫结婚的歌吗?所有动物都去参加猫的婚礼去了,只留下老鼠好不快活。雷勃经常唱这首歌。开头的歌词我忘了。”

... A mazel far di kalah
 Hobben zich gevundert alle
 Di hun is gekummen mit di hindalach
 Un Zutzke mit tsvei hintalach
 Affile dem blinden Abke
 Hot men gebracht far a lapke
 Un di groya meizlach
 Tra , tra , tra , un pitz , pitz , patz ,
 Heint hot chasene unzer katz ,
 Tra , tra , tra , un pitz , pitz , patz ,
 Iz dos a chasene far a katz !

“妈妈,唱那首犹太醉鬼的歌吧。你真的相信犹太人不喝酒吗?雷扎拉。”

海尔斯尔已经醒了。“喝，喝，”他证实道。

“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喝酒怎么总也不过量，虽然那么豪爽，”弗雷达说，俯过身拍了拍海尔斯尔的肩膀。

汽车里响起一阵阵歌声、笑声。虽然那歌是从早已不在人世的亲人那里“挖掘”出来的。透过灰蒙蒙的夜雾，维尔纽斯阑珊的灯火已经遥遥在望。

“就是这些辛酸的笑，苦涩的歌才保持了我们正常的神志，而没有发疯，”丽赫说。

明天我就要到苏黎世，然后从那儿坐飞机到伦敦。汽车开到丽赫和海尔斯尔那幢房子前面，下车后，我紧紧地拥抱着他们。道别的时候，丽赫望着我，似乎有点惊讶。

“你难道真的以为我们会不看着你上飞机吗？”她说。“米沙会送我们到机场的。再说，我还要给你伦敦的儿子做 teiglech。你说过他爱吃。”

teiglech 是一种炸面圈。恐怕我得费口舌向伦敦希思罗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做一番解释。这是一种类似多福饼的东西，只是小一点，硬一点，先在糖浆里煮，直到变得焦黄，发亮。只有立陶宛犹太人才会做这种小吃。你也许不知道会做这玩意儿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不要拿海关的规矩刁难我，不要强迫我扔到垃圾箱里。Teiglech 是一种有危险的食品！

“真的，丽赫，没有必要。你就别费心了……”

“就是做到半夜，我也要做，”丽赫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否则，怎样才能表达我们对你到来的喜悦呢？”

我一定想办法偷偷带过海关。要是被他们查出来，就装糊涂，或者干脆装疯卖傻。

弗雷达和我回家后，发现屋里黑着灯，欧内斯特给我们留

了一个条子,说尤瑞开车带他去向一个朋友借录像机去了,10点前回来。

我们俩都不饿。弗雷达烧了一壶水,准备泡茶,我把“旅游指南”和照相机拿到我的房间,想把在扎戈照的那个胶卷取出来,再装一个新卷,明天机场告别时用。

我打开相机,发现在纳瑞斯金公园万人坑匆匆忙忙装的那个胶卷没有挂上链齿,连转也没有转过。扎戈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成。

弗雷达端着一杯茶走了进来。她看见我手里拿着照相机,坐在床沿儿一动不动,好不纳闷。

“怎么了?你病了?看起来脸色那么不好。”

我从照相机里取出那个胶卷,拿起来看了看,任凭它落到地上。

“扎戈,”我对她说,“不再存在了。”

24 尾 声

1993年夏天,我又回到立陶宛。我的探寻还没有完成。我找到了父母亲的同龄人,访问了幸存者,到了扎戈,和那个“鬼城”唯一的犹太人见了面,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翻阅了大量资料。可是,除了阿尔托娜,还没有和大屠杀发生时其他任何生活在扎戈的人有过接触。那一张张阴郁的、充满敌意的脸,那沉闷、压抑的气氛,连问路都让人打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我要问的问题会做出怎样的反映呢?

我要问,人怎么可能向和自己世代生活在一起的邻



通往纳瑞斯金公园犹太人墓地的新路标
居开枪,或者当他们被屠杀时袖手旁观?

当犹太人被当众羞辱时,他们真的哈哈大笑或者掩嘴窃笑过吗?当犹太邻居被关到隔离区,挨饿受冻,被国民军蹂躏、糟蹋时,他们表示过不同意见吗?他们是对犹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还是因为害怕而不敢有所表示?当犹太人被屠杀的时候,站在坟坑旁边的杀手,有没有一个人垂下手中的枪,或者拒绝射击?所有这些刽子手有没有因为滥杀无辜,而被他们的教会开除教籍呢?

1941年8月16日,德军的一份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最后一个问题做了回答。报告的题目是:《立陶宛天主教会之动态》。报告称:“天主教会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总的来说很明确。布利斯基斯主教禁止牧师给犹太人以任何形式的帮助。几位犹太人代表请求他出面调停,向德国当局求情时,被他严词拒绝。他还表示,今后决不会见任何犹太人。”

如果扎戈有人愿意和我探讨的话,我会对他们说: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我们都相信,古老的仇恨、对已经感知的罪过的报复、对陌生人的恐惧、贪婪和嫉妒不应该成为将普通人投入野蛮深渊的理由。给我讲点什么,让我恢复对人类的信心。理想的破灭使人感到孤单,对人性失去信念,则是彻底的绝望。

“不会有人对你说什么的,”布朗妮知道我要再次去立陶宛时告诫我。她写信告诉我,立陶宛语报纸警告立陶宛人,不要和外人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他们说,有人利用友好的交谈,诽谤我们立陶宛民族。一家立陶宛报纸对一部德国影片的评论更耐人寻味。那部电影讲一个幸存的犹太人回到她出生的地方巴特里莫尼斯。她回来的目的是寻找一个曾经屠杀过许多犹太人的前国民军刽子手。电影还记录了小城人对她此举的反映——自然是心怀不满,深恶痛绝。幸存者和那个国民军成员终于见面。那人尽管毫无悔改之意,还是得到立陶宛政府的赦免。立陶宛评论家说这部影片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诬蔑。”

提几个问题不应该看作是对一个民族的诬蔑。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不应该因为他们当中某些人的罪恶而受到指责。然而,当参与大规模屠杀的刽子手被释放,被平反,享受补助金的时候,当报纸公开鼓吹反犹太人主义的时候,当凯代尼亚一位颇有影响的农民把犹太人公墓的墓碑挖走,为他的牛棚打地基的时候,当有人告发,而首席检察官借口事情发生在30年前,驳回诉讼的时候,难道不是使这个民族大丢其脸吗?

历史不能忘记,不能否认或者掩盖。众所周知,忘记就会使历史重演,重蹈覆辙。但是仅仅知道并且牢记在心还阻止

不了柬埔寨、波希米亚、卢旺达的大屠杀发生,更重要的是弄清灾难发生的原因,并且为铲除这个原因而进行不停的斗争。

骄傲情绪,不愿意面对一段不愉快往事的弱点,以及想要得到西方援助的心情,在立陶宛引起了相当广泛的“遗忘症”。人们忘记,他们曾经满怀恢复独立的希望,欢迎德军入侵。德军占领立陶宛前几个月,他们和盖世太保以及纳粹德国国防军东部地区总司令频繁接触。“立陶宛行动主义阵线”(LAF)在柏林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公然叫嚣:“犹太人遭报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立陶宛不但要从亚洲布尔什维克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要从犹太人长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维陶特斯大公赋予犹太人的庇护权被永远取消了,犹太人将不再享有公民权。所有“诚实的立陶宛人”都应该自发地起来采取一切措施,惩罚“迫害”我们多年的犹太人。小册子还号召:“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为立陶宛的解放,为民族的纯洁而奋斗!”

1941年6月23日,德军入侵立陶宛的第二天,由纳粹的同情者、立陶宛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立陶宛行动主义阵线”(LAF)成立了临时政府,宣布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在立陶宛诞生。头目是卡基斯·斯科帕上校。此人曾任立陶宛驻柏林的大使,是希特勒的崇拜者,成员均为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组织的代表。然而,他们不折不扣的法西斯主义、纳粹思想并没有得到回报,实现其独立的梦想。1941年7月17日,临时政府得到通报,德国无意于允许立陶宛在政治上独立。8月5日,该政府的活动被停止,LAF被宣布非法,部分头目遭到逮捕。此举或多或少影响了立陶宛和德国的关系,但是并没有阻止成千上万的属于类似“铁狼”、“立陶宛自由军”、“猎鹰”以及“立陶宛复兴阵线”这样一些组织的立

陶宛人,自告奋勇为纳粹行刑队的刽子手们杀人。

Ypatinga Bura ——“特遣队”——在维尔纽斯附近的波纳瑞杀害了 70000 犹太人。立陶宛雇佣军第 12 警察营在考那斯和白俄罗斯大肆屠杀犹太人。除了这些“专业”杀手之外,立陶宛国民军参与了立陶宛 200 多个城镇、乡村的血腥屠杀,杀害了 95% 的立陶宛犹太人。他们在斯拉特斯基的暴行如此凶残,就连当地的德军司令官卡尔向白俄罗斯的德军总司令官库博报告时,也抱怨“对犹太人行刑时的野蛮”。他报告说,立陶宛第 11 警察营带着消灭犹太人村社的命令,来到斯拉特斯基。犹太人被打得半死,然后拉到城外集体枪毙。有的犹太人受了伤,但是没死,后来设法从坟墓里爬出来。库博把这份报告转给他的上级,还在上面加了几句话,意思是说,把还有可能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受重伤的人埋掉,是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应该向戈林^① 和希特勒报告。毫无疑问,他们会感到十分不安。也许这位地方司令官和白俄罗斯的总司令官都属于希姆莱^② 1943 年 10 月 4 日在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对党卫军讲话时说的那种“正派的人”。

“……在我们内部,当然可以谈论这件事情,但是在公开场合,一定要守口如瓶……我是说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你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一定知道,当 100

① 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元帅,希特勒上台(1933)后曾任空军部长、普鲁斯总理等职,负责扩充军队,发展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等。战后,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死刑,刑前自杀。

② 希姆莱(1900—1945)纳粹德国第二号头子,战犯,曾任党卫军首脑(1929)、警察总监(1936)、内政部长(1936)等要职,残酷杀害战俘、反法西斯人民和犹太人,德国战败后被俘自杀。

具尸体,或者 500 具,或者 1000 具并排放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坚持下去,与此同时——除了人性弱点造成的例外——又要保持正派人的体面,这就使我们变得冷酷无情。这是我们历史光荣的一页,别人不曾书写,也不会再有人书写的空前绝后的一页……”

这时,希姆莱手里已经掌握了更先进的、能快速灭绝犹太人的“技术”。有了这种“技术”大概就不会触动他那些“正派人”易动感情的神经了吧。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的仆从们在实行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过程中,也许只起了部分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希姆莱精心策划的这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读了布朗妮的信,我犹豫了一下,还有没有必要再去立陶宛?我去过了扎戈,但并没有找到我所寻觅的扎戈。房子被推倒了,墓碑被挖走了,浸透了犹太人鲜血的市场广场被水泥和树木覆盖了。再过 10 年,纳瑞斯金公园的纪念碑恐怕也不会再有人光顾了。还活着的幸存者有的年事已高,有的行将就木,年轻一代对他们的历史知之甚少。用依地语和希伯来文写的铭文像梵文一样很少有人能够看懂,就是能看懂,念起来也结结巴巴。只有立陶宛语撰写的铭文能够看懂。看了以后也是耸耸肩,扬长而去——我们不该为先人的行为负责。

可我最后还是下定决心,重返扎戈。也许我不会找到什么答案,但是问题我还是要提。于是,1993 年夏天,我又来到立陶宛。这一次,带着我的女儿和小儿子。他们也想回“老家”——老祖宗居住过的地方看一看。

到了维尔纽斯,丽赫一家手捧鲜花欢迎我们。我们好像昨天才分开,而不是已经15个月不曾相见。海尔斯尔看起来身体虚弱,丽赫泪流满面。米沙一家生意兴隆,志满意得。尤瑞和欧内斯特停止似乎永远不会完结的争论,再三表示,我把家里部分成员带来看望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还要我明年一定要把没来过的人都带来。弗雷达和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我们心中的感情。

丰盛的家宴,浓浓的亲情,整整一天,我们都沉浸在欢乐之中。米沙和弗雷达商量这次旅行的路线。在维尔纽斯观光,到拉塞恩和特拉凯,还可以开车到帕兰加,那是闻名遐迩的海滨旅游胜地,夏天,他们经常到那儿度假。

“这次,我们要好好看看扎戈,”米沙说。“我们可以在叶内斯克找一家旅馆住下,那儿离扎戈很近。我们坐‘梅塞德斯’^①去。会很舒服的。”

我把弗雷达拉到一边。“我们怎么能坐‘梅塞德斯’去扎戈呢?那是德国人的汽车……”我对此做出的反响也许有点滑稽可笑。弗雷达说,亲戚朋友们都开德国车。她丈夫过去上班时用的车是一辆BMW。现在的德国毕竟早已是世界民主国家中的一员了。不过,眼下这个场合,坐一辆“梅塞德斯”去扎戈,总让人心里不舒服。

“米沙特别喜欢车,”弗雷达说,似乎有点茫然。“他是从在德国工作的一个土耳其人那儿买到这辆车的,很便宜。”

我甚至不知道哪个德国公司生产过性能良好的汽车,供德国侵略军坐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东欧的城镇乡村,

① 梅塞德斯:一种德国汽车的牌号。

包围、消灭每一个犹太人村社。但是我知道,在大屠杀中,德国的工业资本家是怎样与军方串通一气,大发其财的。光凭几个狂热的党卫军头头是不可能完成这样规模巨大的种族大灭绝的。克虏伯家族^①不但用奴隶般的劳动力为他在德国的工厂生产军火,还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建立了一个雷管厂。他们强迫犹太人没明没黑地干活,累得快死的时候,便送到毒气室毒死。I.G. 法本也在这个死亡集中营新建了一个煤油、橡胶合成工厂。奴隶的劳动力不但便宜,可以随意驱使,而且无须为他们的生命负责,榨干血汗之后,便杀死,然后再来一批顶替。两家德国公司 Tesch & Stabenow 和 Degesh 利用 I.G. 法本取得的 Zyklon B 的专利,每个月都要给死亡集中营提供好几吨氰化物。像 I.A. 汤普夫和萨恩斯这样的企业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焚尸炉。迪德公司和 C.H. 科里公司不甘落后,也加入到生产焚尸炉的竞争之中。他们和党卫军官僚们的通信,使用的全是行话。听起来简直像尤内斯库^② 戏剧里的对话。

“我方已收到你方 5 台焚尸炉的定单,包括两台用于搬运尸体的电梯……”

或者:“根据为你方生产焚尸炉设备的口头协议,现将具体生产计划呈送你方。此焚尸炉性能完备,以煤做燃料,迄今为止,效果一直令人满意……嗨! 希特勒!”

① 克虏伯家族:德国大军火制造商世家,由始祖 Arndt Krupp(? —1624)靠购进大批地产起家,为 1870、1914、1939 年德国 3 次对外侵略战争提供大量武器,至 1967 年,作为军火商的家族史始告结束。

② 尤内斯库(1912—):法国戏剧家,荒诞派戏剧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椅子》等。

两天之后,我们和弗雷达、米沙一起到扎戈。坐着“梅塞德斯”。上次去扎戈的时候,天灰蒙蒙的,下着丝丝缕缕的小雨,这次却阳光明媚,一望无际的麦田满眼碧绿,罌粟花和矢车菊点缀其间,格外鲜艳。公路两边到处是美丽的野花,亭亭玉立的白桦撑起片片绿荫。有一阵,万人坑被丢到了脑后。只有路边抛了锚的卡车和小汽车让人想起上次的旅行。行李箱里放着丽赫为我们准备的食品篮,我们随时可以下车野餐。

米沙的生意做得不错,以致于引起立陶宛“黑手党”的兴趣。或许这正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的成功。除了服装厂,米沙又开了个食品厂,利润相当可观。米沙不愿意谈他被那些恐怖分子骚扰的事情。弗雷达告诉我们,几个月前,3个暴徒闯进他的办公室,把他拖进停在路边的一辆车上,打了一顿,还威胁说,如果不按月交纳所谓保护费,就让他吃更大的苦头。米沙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不管怎么说,维尔纽斯有了“黑手党”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实。米沙那张一直乐呵呵的圆脸变得阴郁起来。他打开收音机,节奏明快的俄罗斯流行歌曲骤然间在我们耳边回荡起来。

“拉斯普廷,”弗雷达说,“红歌星。”

政治恐怖分子的秘密团体早已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这个地区了。

早晨7点半,我们就到了帕尼维兹。“大艺术家索拉雷斯就住在这儿,”弗雷达说。“在俄罗斯,他是家喻户晓的名演员。我们在帕尼维兹有第一流的剧场。”

帕尼维兹的犹太人在1941年德国人的6次大清除中都被杀得干干净净。在立陶宛,还有没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没有给后人留下这种“潜台词”呢?

“帕兰加，”弗雷达指着前面一个路标说。“离这儿 200 公里。Shlingarein(吃饭)，妈妈们经常这样喊。孩子们 shlingarein！你们正在度假，一定要多吃。吃呀！我们的妈妈当然也给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等进沙维尔城之前，我们再 shlingarein。”

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在山花烂漫的原野野餐，显得那样虚幻。我实在不敢信赖这种美。谁知道鲜花下面埋藏的是什麼？我怎么就以为自己能够在这块充满敌意的土地上“扬帆远航”，向陌生人提出那些问题，并且得到回答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我对到达目的地的心情不那么迫切了。

到达叶内斯克之后，我们在镇子里转着找旅馆。小镇只有两座旅馆。其中一座正在关门维修，米沙和弗雷达去找第二家的时候，我带着两个孩子到周围溜达了一会儿。在新建的或者翻修过的房屋和店铺中，我们看到一座被人忽略，但仍然不失其当年风采的建筑。那是一幢红砖二层楼房。房顶用沥青涂过，两边都有一堵山墙。还没看见犹太教的六芒星标志，我们就断定，这是一座犹太教堂。高高的拱形窗户都已经用木板钉死或者用砖头砌死，阳光无法照射到教堂里面。上帝面对信徒的苦难闭上了眼睛。我们给教堂拍照片的时候，路上的行人好奇地张望着——如果不是怀有敌意的话。这一次，我不敢大意，娘儿仨每人都带了一架照相机。

弗雷达对我们说，有一个运动队和他的支持者已经预定了那家旅馆的所有房间。要想找到住处，还得往回返到沙维尔，离扎戈至少 67 公里。这样一来，我们只能像上次那样，在扎戈呆一个白天，晚上就返回维尔纽斯。

扎戈越来越近,我被一种似曾经历的幻觉所迷惑。只是这一次,田野和树木宛若一块巨大的调色板,从绿玉色到翠绿,到碧绿,到冷杉的灰绿,都呈现于我的眼前。红、蓝、黄、白色的野花在那绿色的调色板上绽开。路边有一块新立的路标,上面用立陶宛语写着:

在贵族纳瑞斯金的公园,有一座种族灭绝的犹太牺牲者的万人之冢。

那个用立陶宛语和俄语写的老路标:法西斯主义牺牲者之墓,0.2,已经被取掉了。

我们沿着那条小路,向万人坑驶去。原先分开立着的3块用立陶宛语、依地语和希伯来语写的纪念牌匾,现在都镶到了方尖碑上,代替了那两块苏联时代用依地语和俄语写的牌匾。我们站在纪念碑前面,没有眼泪,没有祈祷。弗雷达把一束野花放到碑前的底座上。万籁俱寂,只有几只乌鸦发出凄凉的叫声。万人坑上的花坛花儿开得正盛。丁香在死亡之地散发着幽香。

下一个去处是我们的祖先长眠的老公墓。一根混凝土柱子上面镶着一个盾形纹章,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历史遗址。左边,3块金属牌子分别用立陶宛语、依地语、希伯来语写着:

犹太老公墓,愿逝者与世长存。

是的,愿他们能比坟头的墓碑留存得更长久——大多数墓碑已经被推倒,或者不翼而飞。尚存的几块也全都歪三倒四,全无尊严可言。墓碑上的字早已斑驳不清,覆盖着一片片苔藓。我们从杂草和野花中间小心翼翼地走过,说不定就踩

上了老祖宗的坟墓。

已经 10 点多钟了,我们对扎戈的探询一定要在下午 1 点前结束。因为阿尔托娜和伊沙克·蒙德尔松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午饭。米沙没有扎戈的地图,只能按大致的方向开着车瞎碰乱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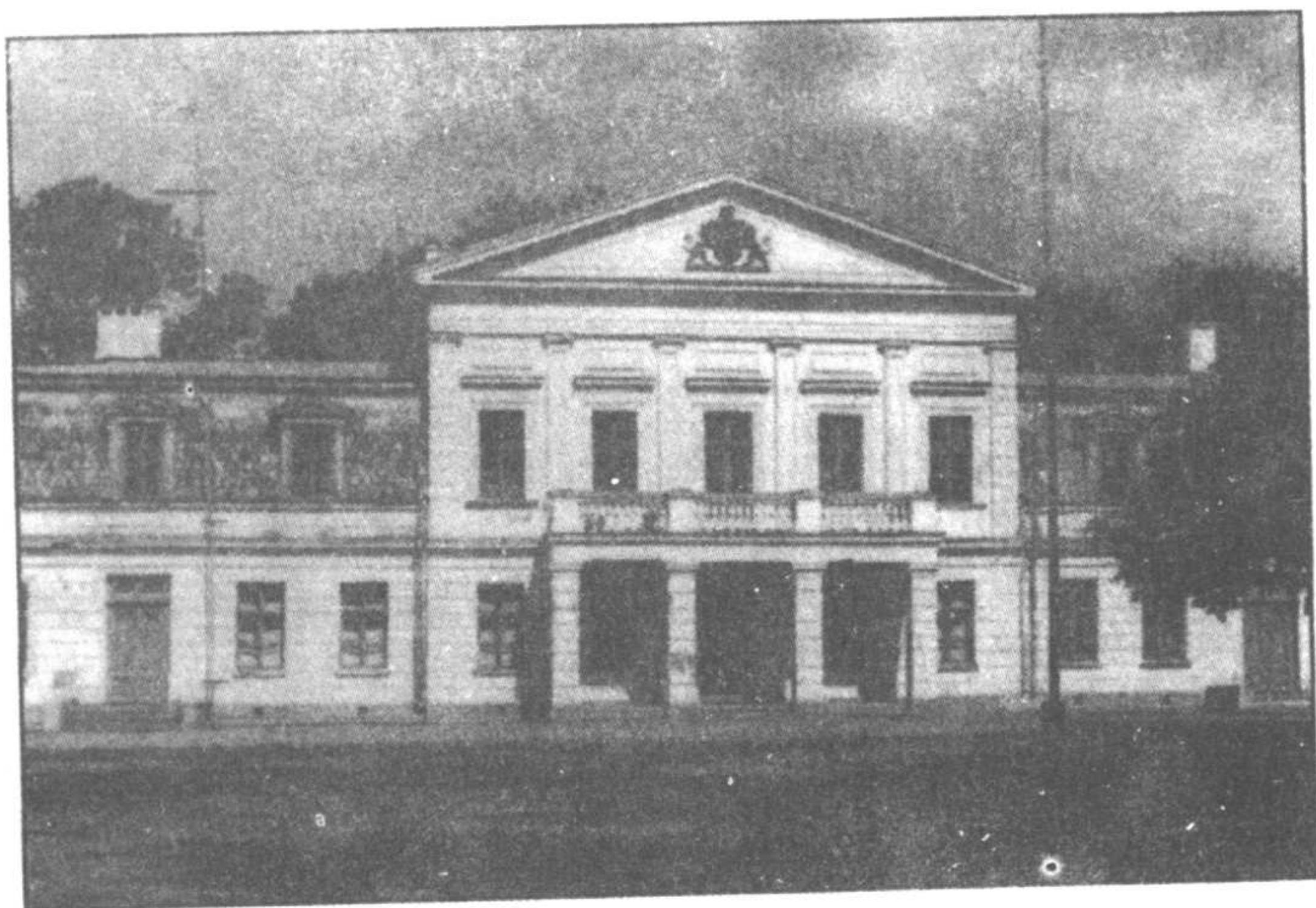
“拉克图维斯大街,”汽车向城外一座小山驶去的时候,弗雷达指着旁边的一个路标说。

我的父母说过拉克图维斯,不过我已经记不起具体内容。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说过,或者压根儿就不知道,这条大街是以一个名叫拉克图维的城堡命名的。这座城堡建在斯维特河右岸,目的是保护扎戈的居民不受德国利沃尼亚骑士团的侵略。1290 年,城堡被武士们烧毁,从 13 世纪初便居住在扎戈的人们被迫逃到立陶宛中部。15 世纪末,利沃尼亚骑士团的势力逐渐削弱,停止了对立陶宛的攻击,扎戈成了一个人们定期赶集的繁华小镇。

山下有一块不常见的、低矮的石碑,是考古部门立的。“兹维尔盖西亚公爵墓葬,”弗雷达翻译道。“9 到 15 世纪。”

在维尔纽斯人种学博物馆,我曾经见过类似墓葬的照片。有的甚至远到公元 1 世纪。这些墓葬都是西米加林人修建的。西米加林人是早期波罗的海人的一个分支。早在立陶宛人到来之前,他们就生活在扎戈一带。我的父母亲管这些墓葬叫扎戈山。这里到处都开着白花,飞着白蝴蝶。

没有几分钟,我们就回到镇子里了。无意之中,来到一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物前面。那是当年纳瑞斯金伯爵为他的女儿建造的练习马术的地方。现在是农业部养马的场所。我们把车停在一棵树下,穿过大敞着的门,走进大厅。大



纳瑞斯金伯爵的宫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改为孤儿院，

后来又改为学校，现在是医院

厅是木头屋顶，看得见一根根结实的房梁，两面是分隔栏，一共养着 10 匹马。阳光从拱形窗户照射进来，撒在分隔栏中间宽敞的过道。这是纳瑞斯金的女儿们检验骏马本领的地方，还是另有一个竞技场所？

从这座非同一般的马厩走出，我们看见不远处有个女人正在扫树叶。弗雷达过去和她谈了几分钟，然后笑容满面地走了回来。

“问题都解决了，”她说。“这个女人自己对扎戈没有什么了解，但是听说你是从澳大利亚来的，想知道纳瑞斯金的历史，就给了我一位历史老师的地址。她说，你想知道的东西，那位老师都能告诉你。如果你想看看纳瑞斯金伯爵的宫殿，就在那儿！”她朝一片小树林指了指，树林后面一座很大的白色建筑，在绿色的树叶之间闪着幽幽的光。

走过小树林，一座颇具古典风格的二层楼房赫然耸立在

眼前。实际上,这是一座比较富丽堂皇的庄园宅邸,算不上宫殿。也许依地语里的 haif 就应该翻译成宅邸——封建领主的家园。然而现在,传说中 haif 周围美丽的公园已经荡然无存。我们只能想象当年的壮美了。

前门上有一块用立陶宛语写的牌子,说明这座白房子是公园里的宫殿。房子里面似乎没有住人,目光所及也只有那个扫树叶的女人。

米沙在扎戈不熟悉的大街上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去历史教师家那条路。一辆卡车停在房前,几个人正忙着往下卸车上装着的桦木棒子。一位满头华发的女人告诉他们该把木头放到哪儿。

弗雷达和我朝她走了过去。她友好地微笑着,向我们点头致意。弗雷达告诉她,她住在维尔纽斯,我是她的堂姐,从澳大利亚来。我们听说她是研究历史的专家,特来拜访。因为我们的父母都出生在扎戈,所以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的出生地的情况。

“你们可算是找对人了,”她非常爽朗地说。“我叫维多利亚,是个搞历史的。不论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非常乐意告知。”

因为她正在忙家务,我们约好两点钟再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运气会这么好:一位友好、开朗的扎戈居民乐于给我讲关于扎戈的事儿。更让人高兴的是,她是一位历史老师,在扎戈教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讲的全是关于这座小镇的历史。

蒙德尔松夫妇像老朋友一样欢迎我们。他们的屋子里很明亮,充满欢乐。但是我的一双眼睛尽量不去看窗户,因为窗外就是广场——从前的市场。

“多漂亮的鲜花!”弗雷达说。

“今天是伊沙克的命名日,”阿尔托娜说。“圣彼得的节日^①”从早晨起就一直有朋友手捧鲜花来看望我们。

上一次伊沙克对丽赫说,信基督教的朋友们让他把名字改成帕特鲁斯的时候,丽赫大发雷霆,嚷嚷着,“是你的朋友们给你取名为帕特鲁斯,还是教堂的牧师给你取的?”

回家的路上,弗雷达责备她:“我们是谁?有什么资格教给伊沙克选择活下去的方式?”

阿尔托娜已经在餐桌上摆满了自己做的香肠、冷肉、奶酪、新烤的饼干和黑面包。这次她坐下来和我们一块儿吃饭,只是煮咖啡的时候,才离开餐桌。

弗雷达把我们见到历史老师的事情跟他们说了一遍。她解释说,我们想多知道一些关于纳瑞斯金的事儿,还想向扎戈的非犹太人提几个问题。伊沙克听了耸了耸肩。他又讲起立陶宛话,我听见他不时重复 Sajudis——独立——这个字。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似乎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

为了我的儿女不虚此行,伊沙克又给他们讲了一遍上次给我们讲过的经历。他强调说,尽管立陶宛国民军是头号刽子手,但是也有普通立陶宛人冒着生命危险,救犹太人的命。从根本上讲,立陶宛人是一个不错的民族,但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他说,那时候有一帮刽子手,杀完一个村庄,再杀到另一个村庄。他们也从扎戈招募杀手。

“从你们上次来,我们又接待了许多客人,”伊沙克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来客签名簿》。那是一个长长的

^① 以圣徒名取名,该圣徒的节日即为此人的命名日。

纸折,上面写着从美国、南非、伦敦等地来的客人们的姓名、地址。伊沙克成了知名人物,成了一个“记忆库”。那么,他百年之后,还有谁能代替他呢?我们把自己的姓名也写到了那上面。

午饭之后,我们走过那曾经是扎戈的街道。

这一次,大街上的人们见了我们并不显得紧张,都朝伊沙克/帕特鲁斯点头微笑。他们在他们当中也很自然。我上次访问扎戈时那种敌意无处不在的感觉是不是主观想象的结果?伊沙克放在帘子后面的那支枪,是不是故意摆样子?或者因为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人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我和弗雷达去找维多利亚的时候,米沙和伊沙克带着我的儿子和女儿坐着“梅塞德斯”逛街去了。

我们去早了一点,维多利亚正在后院的洗衣房里干活。我们坚持让她先把活儿干完。她一边擦手,一边说已经干完了。她把我们领进客厅,还没坐稳就说,这幢房子是从兹洛特先生手里买的。兹洛特就是战后曾经当过一段时间镇长的犹太人。看起来在扎戈,产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必须早点儿说清,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小圆桌上铺着锈花台布,花瓶里插着鲜艳的红花。花瓶旁边放着几张报纸和两副老花镜。

维多利亚告诉弗雷达,如果我想把我们的谈话录下来,完全可以,她不在乎。她明白,把立陶宛语翻译成依地语,再把依地语翻译成立陶宛语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能有录音回去慢慢研究,效果可能更好。她笑着说,我们俩不能直接对话,真是一件憾事。这时,跑进来一个大约10岁的小男孩儿。“我们的孙子,”她说。小家伙是来扎戈过暑假的。

维多利亚告诉我们,她出生在帕尼维兹,先在考那斯大学

学习历史,后来又 到维尔纽斯大学攻读,在那儿碰到现在的丈夫多马斯。多马斯是扎戈人。刚讲到这儿,这位扎戈人走进客厅。他和颜悦色,微笑着朝我们点了点头。可是开口说话时,向我示意,不要录音。

维多利亚和多马斯 1952 年回到扎戈,在学校里教了整整 40 年书。公元 1952 年,大屠杀后的第 11 个年头。悲剧发生的时候,多马斯一家很可能正在扎戈。

弗雷达告诉多马斯,我们的父亲在 市场广场开过一个理发馆。开口说话前,他又一次示意,让我关掉录音机。是的,他还清楚地记着那家理发馆。然而仅限于此。关于这个话题,他好像没有别的话可说。弗雷达问他,什么时候离开扎戈的?他说,1926 年。1952 年才和维多利亚一起重回故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经济形势恶化,许多人都往大城市跑。扎戈交通不便,天气不好的时候,简直就是与世隔绝,因而,始终是死水一潭。就是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直达任何别的地区的火车。最近的火车站在叶内斯克,离这儿还有 25 公里。他往椅背上面靠了靠,两条胳膊交叉着放在胸前。看出这就是多马斯想要讲的全部内容,维多利亚开始说话。

“扎戈的历史我知道得很多,”维多利亚说,“因为我在纳瑞斯金宫殿发现了一些重要文件。”

她说,纳瑞斯金家族延续至今的一代传人是 1939 年冬天,离开扎戈到英格兰的。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战后,宫殿改成孤儿院,后来改成学校,最近又改成医院。维多利亚就是在这所学校里教了 40 年书。她发现那些和纳瑞斯金家族有关系的文件后,谁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后来,

她把这批文件捐给了维尔纽斯科学院。

维多利亚说,这批文件主要和纳瑞斯金家族有关。叶卡捷琳娜一世对曾经支持她登基的贵族非常感谢,不但给他们加官进爵,还封赏给他们大片土地。扎戈是封给普兰顿·朱保夫伯爵家族的领地。但是朱保夫伯爵不愿意在扎戈居住,1850年卖给了纳瑞斯金伯爵。我曾经看过一份材料,说纳瑞斯金是朱保夫伯爵的外孙,从他手里继承了这个庄园。不过我没有吱声,谁能和历史文件争论呢?

纳瑞斯金家族上一代的传人尽管自己不喜欢打猎,但是为他那些喜欢打猎的朋友们建造了一些有特殊设备的房子。他自己喜欢天文学。维多利亚来这所学校的时候,还有许多纳瑞斯金伯爵购置的天文设备,后来在教学中都派上了用场。她说,庄园里那座用于训练马术的建筑物是立陶宛最好的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冬天就在这里举行马术表演和比赛,吸引了波罗的海地区各国的许多马术爱好者。

纳瑞斯金家族早年的一位伯爵,开辟了一个26公顷大的公园,是英国和法国的园艺家来设计的。公园共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设施齐全的美丽的花园,另一部分是森林。这座公园曾经是立陶宛第三大公园,有113种树和灌木。

维多利亚表现出历史学家对数字和细节特别的兴趣,而且显然对文件格外尊重。对于探讨还没有接触到的主题,这或许是一个好兆头。

“遗憾的是,俄国人占领期间,许多树木都被砍伐了,”她说。“战争期间,树木被砍去生火;前些年,一场龙卷风又造成很大破坏。独立以后,公园又得到人们的照料,新栽了不少树木。”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丽赫认不出她年轻时候的纳瑞斯金公园。

“问问她，犹太人是什么时候来扎戈的，”我对弗雷达说，渐渐地接近我想问的问题。

“犹太人是19世纪来扎戈的，”维多利亚说，“因为这里是一个比较大的贸易中心，他们可以赚到钱。”她非常肯定地说，她毕竟教过40年历史。“这里的旅馆和店铺都是犹太人经营的。有一家很特别的旅馆，业主叫克维柴尼亚，吸引了立陶宛各地的商人。不仅因为餐桌旁边的侍者穿着时髦，动作麻利，还因为老板从斯维特河对岸弄来一些妓女。那些姑娘们不在店里住，只是在那儿工作。”

谈起扎戈，维多利亚不像讲纳瑞斯金家族那样严谨，不但引经据典，而且有数据，有时间，有地点。关于扎戈犹太人的话题，她似乎只知道这么多。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给这位历史教师讲一课扎戈犹太人的历史。然而即使纠正了她的错误，也已经为时太晚。因为她告诉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历史”是：犹太人19世纪才来扎戈。他们做买卖，为妓女拉客，目的是为了自己发财。

如果我会说立陶宛语，而且当时的环境或者气氛允许，我会告诉维多利亚，早在16世纪，犹太人即已在扎戈定居。他们并不是因为这里是一个繁荣的市场，才蜂拥而至。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犹太人的辛勤劳动，艰苦努力，才把这座无名小镇变成立陶宛远近闻名的贸易中心。扎戈在它的全盛时期，被誉为“智慧之城”。这里出过许多有名的拉比，学者和作家。人们管他们叫“扎戈贤人”。

17世纪的文件——她尊重文件——记载，犹太人当时不

仅进口盐、金属,出口亚麻、谷物、蜂蜜、蜂蜡,还从政府那里租用收取进口税的权利。他们的职业从手艺人到交纳租税的农民应有尽有。到 1790 年,扎戈从事商业活动的犹太人就有大约 50 户。他们在镇子里和周围开着 30 家商店和旅店。维多利亚说的那位克维柴尼亚先生和他的“衣着时髦的侍者”大概就在其中。

1803 年,小镇用砖石铺了市场广场,在犹太居民的请求之下,赶集的日子有所增加。由于经济条件的好转,犹太人从 1766 年的 840 人增加到 1847 年的 2266 人。1897 年,增加到 5443 人。有记录表明,到 19 世纪末,犹太商人每年向德国出口价值 4000 克朗^① 的亚麻布,1000 克朗的谷物和小麦。他们还建起加工猪鬃、生产蜡烛、蜂蜜酒、金属线和皮革制品的工厂。经济持续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犹太人被流放。从那以后,扎戈一蹶不振,再也没能恢复当年的繁荣。

1923 年,独立的立陶宛已经进入黄金时代的尾声。那时,扎戈的犹太人大约有 2000 人,占总人口的 40%。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下降到 1000 人。大多数人是店主,手艺人或者菜农。1941 年,扎戈成了纳粹的犹太人隔离区,四面八方的犹太人都集中到这里,短时间内,犹太人的人口急剧增长。紧接着便是在立陶宛仆从不遗余力的帮助下,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今天,维多利亚自然也知道,扎戈只剩下一个犹太人。

我喜欢维多利亚。她友好,热情,诚挚。她对扎戈犹太人的历史的确知之甚少。原因是,没有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渠道。特别是,如果你不曾刻意寻找的话。但是我相信,对于我万里

^① 克朗:德国旧金币,相当于 10 马克。

迢迢来这里提出的那个问题,她一定能给予诚实的回答。

“人怎么可以向和自己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的邻居开枪,或者当他们被屠杀时袖手旁观?”

她扬了扬头,大声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的家乡帕尼维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到处都一样。许多事我也很难说清,但是犹太人是被欺骗了。他们骗他们说,要带他们出去干活,然后就把他们统统枪毙。我没法说这些,”她两手捂着脸。“妇女和孩子被打得死去活来,扔到汽车上拉走。大街上流着鲜血。一条条血染的大街!这都是亲眼看见的人告诉我的。犹太人都被拉到纳瑞斯金公园,3000人被杀害。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怎么可以枪杀另外一个人呢?”

屋子里静悄悄的,好一阵子没人说话。维多利亚的孙子一只胳膊搂着奶奶的肩膀。多马斯默然无语。

“我是国际主义者,”维多利亚继续说,“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我是国际主义者。我非常愿意和犹太人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很想弄明白,犹太人为什么被屠杀?谁是刽子手?可惜我连查阅档案的渠道都没有。没有文件就不可能知道真相,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作为一个人,我坚信,谁也不应该忘记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真遗憾,维多利亚连查阅档案的条件都不具备。没有文件,她就不能说出谁应该为屠杀犹太人负责。

米沙的车来了。我们没有意识到时间过得这样快。我们相互交换了地址,和维多利亚、多马斯握了握手,感谢他们和我们谈了这么长时间的话。

“找到答案了吗？”和伊沙克、阿尔托娜告别的时候，伊沙克问。

“没有，”我说，“不过我并没有放弃。我还要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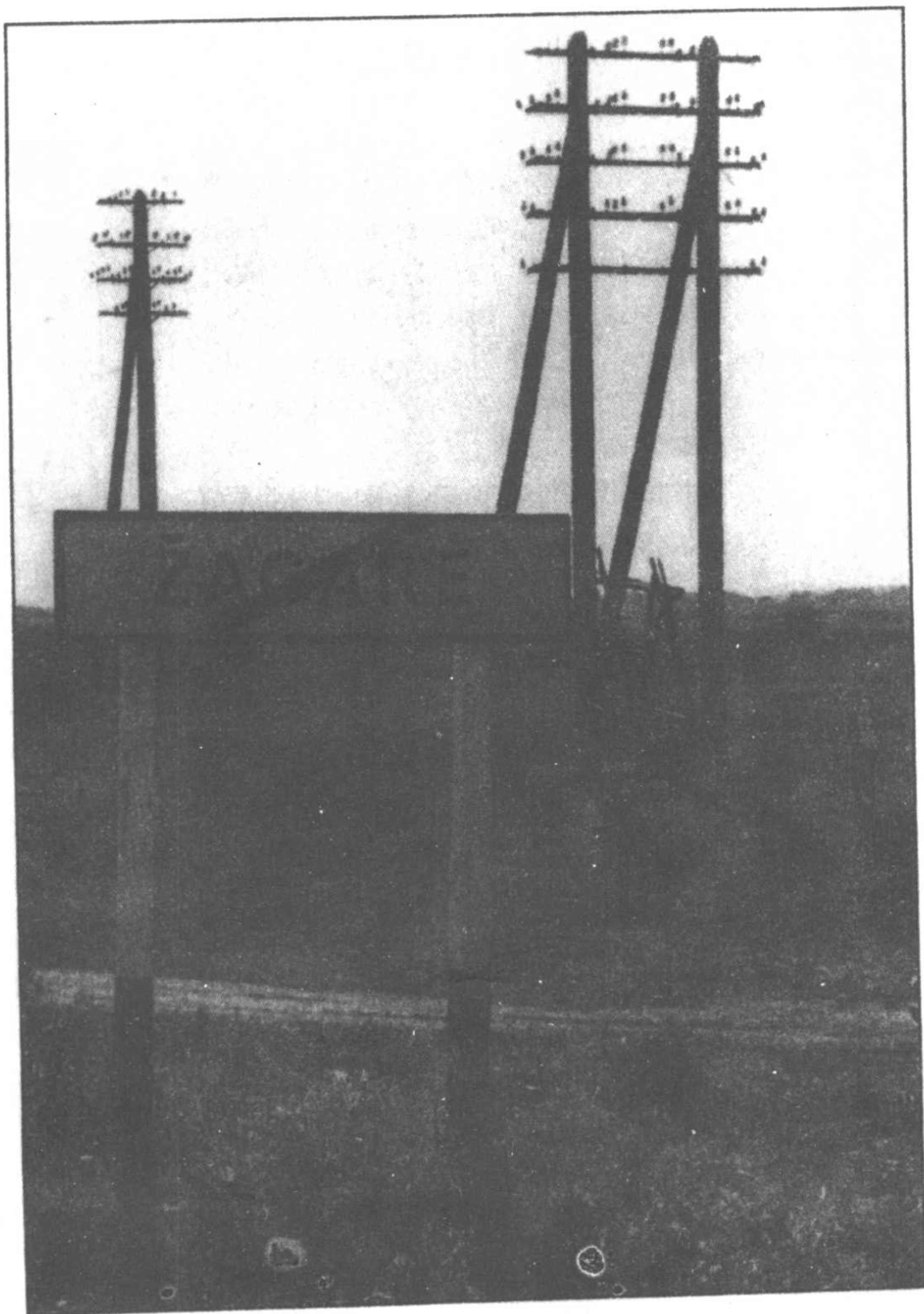
伊沙克百年之后，谁还会带着寻根问祖的犹太人到处走访呢？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什么原因，什么心理，伊沙克为人们记住扎戈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许我的悲观主义没有任何根据，人们还将继续来祭奠那万人之冢；也许第四块牌匾将代替现在镶嵌在纳瑞斯金伯爵公园方尖碑上的那3块牌匾，上面用立陶宛语写着：

不是我们干的。

或者：

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路标——“离开扎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纳瑞斯金公园最后的散步

作者 = (澳大利亚) 罗斯·兹维著 李尧译 李书敏主编

页数 = 2 6 3

S S 号 = 1 1 3 0 4 3 6 9

出版日期 = 1 9 9 9 年 0 4 月 第 1 版

中文本前言

第一部

- 1 序言
- 2 流亡到“伊甸园”
- 3 等待革命
- 4 奥萨卡，墨西哥
- 5 问题
- 6 “德国人来了！”

第二部

- 7 回家
- 8 目击者
- 9 米尔克
- 1 0 雷勃，是英雄吗？
- 1 1 扎戈的毁灭
- 1 2 探索

第三部

- 1 3 维尔纽斯
- 1 4 谁的耶路撒冷
- 1 5 应邀参加祈祷
- 1 6 维尔纽斯的宗教仪式
- 1 7 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
- 1 8 卡拉派信徒和哈扎尔人
- 1 9 通往扎戈的道路
- 2 0 扎戈
- 2 1 阿尔托娜的故事
- 2 2 凄凉的墓地
- 2 3 雷勃之死
- 2 4 尾声